傳播研究與實踐

科技部TSSCI期刊

第6卷 第1期 2016 年1月

特邀論文

賤民反叛的三個典範／Alain Brossat（譯者：羅惠珍）

專題研究論文／論壇：太陽花與占中運動的媒介與運動

網絡媒體和連結型行動的力量與挑戰：以2014香港雨傘運動爲例／李立峯

從定調到解釋性界限：占中運動、商業報紙與獨立媒體／張讚國、劉娜

作爲「劇場」的新聞／紀實攝影與社運：以「太陽花運動」的照片爲例／郭力昕

探索線上公衆即時參與網絡化社運——以臺灣318運動爲例／鄭宇君、陳百齡

論壇：從野草莓學運到太陽花運動的媒體與社會運動／校閱：蕭旭智

研究論文

臺灣「國防部發言人」臉書訊息策略之議題設定與預示效果研究／傅文成

更民主的科學溝通：科學類博物館實踐公衆參與科學之角色初探／江淑琳、張瑜倩

田野筆記：反思與實踐

318學運帶動的媒體革命——夾腳拖與iPad網路直播模式的反思／孔令信

口述歷史專題

太陽花運動中臺大新聞所學生在「E論壇」的實踐／林麗雲

典籍再現

從小說話語看衆聲群像：評介巴赫汀之《對話的想像：四篇論文》／王孝勇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傳播研究與實踐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第 6 卷 第 1 期　**2016 年 1 月**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0 2 書名頁.indd 1　2015/12/29 下午 07:21:07

編者的話

本期專題研究論文以「太陽花與占中運動的媒介與運動」為題，進稿十分踴躍，經送匿名審查後，得「專題研究論文」4 篇、「田野筆記：反思與實踐」1 篇，本刊另邀得「口述歷史專題」1 篇。

另外，發生在 2014 年 3 月 18 日的太陽花學運，有一股運動的浮流：賤民，此一浮流引發： 賤民如何行動？如何展演？以及賤民政治如何可能？等一系列的提問。本期「特邀論文」邀請到法國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名譽教授羅獨秀（Alain Brossat）撰寫〈賤民反叛的三個典範〉一文，由資深記者羅惠珍中譯。Brossat 教授以臺灣當代三部電影（蔡明亮的《郊遊》（2013）、卓立的《白米炸彈客》（2014），以及戴立忍（2009）的《不能沒有你》），論述當代賤民抵抗的策略與姿態，讓我們看到活生生的人是如何被排除在政治參與之外。從這樣的角度思考太陽花學運，讓我們更能理解學運結束當天，為何在立法院群賢樓二樓會有一群手拿「賤民」牌子的年輕人緩緩步下樓梯，以及學運期間及結束後在廣場上的「大腸花」背後所隱含的意義。

通過匿名審查的 4 篇「專題研究論文」，分別是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李立峯的〈網路媒體和連結型行動的力量與挑戰：以 2015 香港雨傘運動為例〉; 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教授張讚國與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講師劉娜合著的〈從定調到解釋性界限：占中運動、商業報紙與獨立媒體〉;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郭力昕的〈社運、真實、與作為「劇場」的新聞／紀實攝影：以「太陽花運動」的照片為例〉，以及玄奘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鄭宇君與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陳百齡合寫的〈探索線上公眾即時參與網絡化社運——以臺灣 318 運動為例〉。這 4 篇論文分別探討：網絡媒體及連結型行動對社會運動帶來的助力和挑戰（李立峯）、商業報紙與獨立媒體在社會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張讚國、劉娜）、社運影像與話語的政治意涵分析（郭力昕），和以社交媒體的鉅量資料探索線上即時參與的網絡化社運。

本期的論壇則是整理 2014 年 6 月 13 日，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主辦，由時任世新大學校長的賴鼎銘教授主持的「從野草莓到太陽花的媒體與社會運動」論壇。這場論壇是在太陽花學運發生後當年舉辦的，與會者分別從運作方式、策略思考、媒體角色等多元角度，反思此場社運如何影響臺灣民主化進程。參與與談的有：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公民行動影音記錄資料庫」負責人管中祥、臺灣大學社會系教授何明修、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臺灣農村陣線發

言人蔡培慧、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黃孫權，以及臺灣數位文化協會與潮往科技內容中心主任鄭國威。他們分別從各自的專業反思此場社運如何影響臺灣民主化進程。

本期的「田野筆記：反思與實踐」由銘傳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孔令信撰寫〈318 學運帶動的媒體革命：夾腳拖與 iPad 網路直播模式的反思〉，本文指出：不管是臺灣的 318 學運或是香港的雨傘革命，都呈現出未來媒體革命的決戰場最終還是在數位化。

本期的「口述歷史專題」，由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林麗雲撰寫〈太陽花運動中臺大新聞所學生在「E 論壇」的實踐〉。本文透過口述訪談臺大新聞所「E 論壇」的 9 位學生，分析這群解嚴後世代，如何透過現場直擊太陽花學運及第一手報導的實踐，建立其自我認同及對於民主的認知。

本期另收錄 2 篇一般論文：〈臺灣「國防部發言人」臉書訊息策略之議題設定與預示效果研究〉，作者是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新聞系助理教授傅文成，和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副教授江淑琳與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助理教授張瑜倩的〈更民主的科學溝通：科學類博物館實踐公眾參與科學之角色初探〉。前者的研究結果發現：使用社群媒體時間越多的閱聽人，受臉書的議題設定效果影響越顯著。後者試圖從跨領域研究取徑思考科學類博物館在公眾參與科學時，可以扮演的公共性角色及可以提供的溝通模式。

「典籍再現」邀請從博士論文開始即浸淫在巴赫汀理論的靜宜大學副教授王孝勇撰寫〈從小說話語看眾聲群像：評介巴赫汀之《對話的想像：四篇論文》〉。

巴赫汀之《對話的想像：四篇論文》很可能是國際 Bakhtin 學術研究社群中，公認為最具有代表性且旨意磅礴的經典著作。Bakhtin 如何廣泛深入地從語言學、歷史學、社會學等視角建構小說理論，並據此捕捉日常生活眾聲群像中多樣獨特又具對話共識的語藝實踐和語藝展演，是本書最核心的理論與實務關懷。透過本期典籍再現，讀者可以對於此一經典有更深入的瞭解。

翁秀琪
2015 年 12 月 10 日

目　次

特邀論文

賤民反叛的三個典範／ Alain Brossat（譯者：羅惠珍）　1

專題研究論文／論壇：太陽花與占中運動的媒介與運動

網路媒體和連結型行動的力量與挑戰：以 2015 香港雨傘運動為例／李立峯　11

從定調到解釋性界限：占中運動、商業報紙與獨立媒體／張讚國、劉娜　45

社運、真實、與作為「劇場」的新聞／紀實攝影：以「太陽花運動」的照片為例／郭力昕　79

探索線上公眾即時參與網絡化社運——以臺灣 318 運動為例／鄭宇君、陳百齡　117

論壇：從野草莓到太陽花的媒體與社會運動／校閱：蕭旭智　151

研究論文

臺灣「國防部發言人」臉書訊息策略之議題設定與預示效果研究／傅文成　169

更民主的科學溝通：科學類博物館實踐公眾參與科學之角色初探／江淑琳、張瑜倩　199

田野筆記：反思與實踐

318 學運帶動的媒體革命：夾腳拖與 iPad 網路直播模式的反思／孔令信　229

口述歷史專題

太陽花運動中臺大新聞所學生在「E 論壇」的實踐／林麗雲　251

典籍再現

從小說話語看眾聲群像：評介巴赫汀之《對話的想像：四篇論文》／王孝勇　271

Contents

INVITED PAPER

Trois plébéiens exemplaires / Alain Brossat (Trans.: Luo,Huei-Jhen) 1

FEATURE RESEARCH ARTICLES / FORUM: Media and social movement in Sun Flower and Occupy Central

Power and Strength of Networked Media and Connective Action: The Case of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 / Francis L. F. Lee 11

From Keying to Interpretative Boundaries: Occupy Central, Commercial Newspapers and Independent Media / Chang, Tsan-Kuo & Liu, Na 45

Journalism with Theatrical Ambience: Photographs of Sunflower Movement as Journalistic Documentary Photographic Practices / Kuo, Li-Hsin 79

Online Real-Time Civic Engagement in A Networked Movement: A Case Study of Taiwan's 318 Movement / Cheng, Yu-Chung & Chen, Pai-Lin 117

FORUM: Media and Social Movement: From Wild Strawberry to Sun Flower / Proofreader: Hsiao, Hsu-Chih 151

RESEARCH ARTICLES

The Agenda Setting and Priming Effects of the SMND Facebook Content Strategies / Fu, Wen Cheng 169

More Democratic Science Communication: Exploring The Role of Science Museums Engaging The Public with Science / Chiang, Shu-Lin & Chang, Yu-Chien 199

FIELDNOTES: REFLECTIONS AND PRACTICES

A Media Revolution Driven by 318 Student Movement: Reflecting on The Live Broadcasting Mode Established by Students with Flip-Flops and ipad / Kung, Lin-Shin 229

ORAL HISTORY FORUM

The Practices of Students at "NTU E News Forum" in the Sunflower Movement / Lin, Lihyun 251

REVIEW AND REFLECTION

Catching Sight of Life World from Novelistic Language: Reviewing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by Mikhail Bakhtin / Wang, Hsiao-Yung 271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0 4 目次.indd 2 2016/1/13 下午 01:17:18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6 卷 第 1 期．頁 1-10．2016 年 1 月
DOI: 10.6123/JCRP.2016.001

賤民反叛的三個典範 *

Alain Brossat**

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教授
（羅惠珍譯）

緣起

2014 年的 318 太陽花運動期間，其中有一個運動的伏流令人關注：賤民。這個伏流甚至可以回逆到 1990 年代的島嶼邊緣以降的反文化行動與邊緣論述。簡言之，賤民的問題不是何謂賤民的定義？賤民是誰？或者誰跟誰比起來比較賤？而是賤民如何行動，賤民的展演性（performativity）與賤民的政治如何可能？又是哪種姿態？ Alain Brossat 教授由法國當代哲學思想家 Jacques Ranciere 提出的賤民（pleb）觀點，展演臺灣當代三部電影中的賤民抵抗的策略與姿態。賤民不是指韋伯（Max Weber）在印度教研究中所說的賤民（outcast），也不是鄂蘭（Hannah Arendt）的猶太賤民（pariah），更不是指民族國家對種族階級身分的「他者」的排除。賤民到底是什麼人？就是人民，是活生生的人被排除在政治參與之外，卻又以主權者不能無視的方式不斷進行抵抗的政治行動的主體。那不就是行動中的你我他嗎？

---

* Alain Brossat 教授 2014 ~ 2015 年間應邀至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客座講學，本校舍我研究中心乃邀請 Alain Brossat 教授前來演講。講者長期關注並批判民主社會體制，尤其是民主社會體制下的賤民結構與現象。Alain Brossat 教授多次來臺授課，對臺灣社會發展頗感興趣，尤其是電影視角裡的臺灣。這篇演講文發表於 2015 年 3 月 20 日。

** 專研政治哲學、社會哲學、跨文化研究。專研傅柯、鄂蘭、班雅明等當代哲學家。近年來將研究轉向第二次大戰期間太平洋地區的戰爭電影敘事。著作頗多，且翻譯為多國語文。中文著作：《傅柯　危險哲學家》（麥田出版社）。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壹、前言

我想從一個大家比較不熟悉的面向談論當代民主；首先我不從政治體制如政黨、選舉、權力國家等等來談民主，我也不從價值理念如言論自由、良心和尊重個體等等來談，也不是從道德理想如包容力、拒絕暴力等。而是從某個我稱之為賤民的人物角色來談論民主，並提出對民主制度的批評和對歌頌民主的質疑，因為人在臺灣的關係，所以特別關注臺灣各個角落的發展。

其次，我要運用的也不是政治哲學或政治科學領域慣用的材料；如套用一些引述作者的理論、或研究調查，民意調查、或最近的選舉分析等等。我所運用的材料是電影，三部近幾年上映的臺灣電影，這三部電影中浮現了我稱之為「賤民」的人物，我認為可以做為某種政治象徵分析，毫無保留地質問當代民主；他們都是對臺灣現行體制提出質問的象徵性人物，換句話說，是對臺灣的民主，有時被視為「典範」的民主提出質問。

這三部電影分別是蔡明亮的《郊遊》（2013）、卓立的《白米炸彈客》（2014）、戴立忍的《不能沒有你》（2009）。

貳、何謂賤民

我們先來談賤民這個人物或身分的由來和意義，賤民（plébe, plébien）來自歐洲的古羅馬時代（也有翻譯成平民百姓或庶民）。賤民是羅馬公民中最大的群體，相對於握有政治經濟權力的貴族階級，賤民的政治和經濟地位貧弱。整部羅馬歷史就是一部賤貴對立史。底層賤民對抗上層貴族，也就是那些自認為是羅馬城締造者的後代子孫們，貴族握有合法權力，而賤民生活在底層。隨著羅馬城的擴張賤民人數越來越多，在羅馬貴族的眼裏，底層賤民不過是人間塵土草芥，微不足道。但是，要維持羅馬這座城的運行，數量龐大的賤民也不可或缺，他們要種地耕田、提供糧食給城裡人、還要出征賣命。只是，他們毫無行使主權的合法權利。

長久以來，羅馬城裡的高尚貴族就是不肯分出一丁點的權力給賤民們。我們可以從莎士比亞的悲劇《科利奧蘭納斯》（*Coriolan*）得到印證。在這齣莎翁戲劇中，羅馬的貴族瞧不起賤民們，貴族階級以他們的偏見粗暴認定賤民完全沒有處理政治事務的能力，賤民只能被壓縮到經濟和社會的存在，但賤民群體也很不穩定，從種種的動亂可以看出他們的破壞力和顛覆性，因此，羅馬城的貴族從來就不信任賤民大眾，對賤民階層抱心懷警覺。

賤民因此是大眾的元素，是國族的一部分；這是現代意義的國族，即使在古羅馬時代，他的身分或定義並非如此；他們是社會組成中必要且有用的一份子。因為，戰爭時刻，賤民是可大量動員的。然而，那些自認為因繼承或傳統而擁有合法權力的人，全然否定賤民的政治能力，且拒絕和他們分享政治權力的行使。

在羅馬時代，當羅馬城遭到外人入侵時，那些貴族們就動員賤民參軍作戰抵禦外侮，或者更長時間之後，到了共和時代依舊隨時動員號召，而這時候賤民大眾就起而反叛並自問道：為什麼我們要為了你們去拼命去送命？既然你們自認為是這座城的擁有者，既然你們在天下太平時期，不把我們看在眼裡，完全否定我們的政治能力，為什麼當羅馬城面臨威脅時，我們這些沒政治能力的賤民，突然間，就變成你們的一份子？你們自己去解決你們的問題吧！

當然，羅馬城的軍隊主力是由賤民所組成的，特別是步兵團。

在這部羅馬歷史中，最令我關注的是，作為一個被排除的狀態（貴族認為他們微不足道）這一個人民的一部分所呈現的形貌，他們在某種情況下，嵌進了城邦的共同空間裡。對貴族圈來說，賤民的確是存在的，他們要耕作種地，他們要完成一些有用且必要的工作如手工藝匠等。然而，賤民不是奴隸，並非貴族手上的動產。他們不是同一個世界的人，因為貴族完全不認可賤民具有任何的政治能力，或者，如古典城邦裡，所謂的公民或自由人得具有參與公共事務的管道，也就是亞里士多德在《論政治》一書中所謂的「政治生活」。這麼說來，似乎從羅馬貴族的角度觀之，賤民是活生生的存在卻又毫無輕重可言，他們被壓縮到僅過著社會生活，至於人類集體生活最高的形式——政治生活，賤民完全被排除在外，沒有通路管道。

當然，賤民們不接受這樣的生活條件，這說明了為什麼整部羅馬歷史充斥著內戰、揭竿起義，以及各式各樣的群眾運動對抗那來自繼承和傳統掌握著統治權的貴族階層。

我的假設是，現代民主是建立在幾個不同的起步，賤民的這個象徵人物在政治計算中應該是「多餘」的，他是永遠可以被辨識的。當然這其中有個很大的矛盾，這些政治體制通常都是包含全體而無遺漏，在政治的天平上，每個公民都是平等的，他們不都是在「公民帝國」嗎？然而，只要貼近觀看，我們會發現在所有被歸類為當代民主的體制裡，存在著某些不同領域的「遺漏」，具體顯現為非常不一樣的形貌。我現在要談的就是這其中的賤民形貌，或賤民立場。站在賤民的立場上，這個立場並不是自我壓縮退至邊緣地帶，被排除的境地或在社會裡毫無能見度。賤民是個政治的象徵，它是存在或現身於我們之間的某部分的民眾，

而它不被「計算在內」的，不在體制內民主（démocrtie d'institution）計算中，因此，賤民的形貌永遠缺乏認同，你不會一眼就認出他。

根據我的定義，當代的賤民在被排除或沒有能見度的情況下，以反抗之姿進入政治領域。然而，賤民因缺乏進入公共生活的民主機制管道，事實上，這些管道將賤民阻絕於一邊，賤民的控訴、要求，都不被聽見。賤民因而憤怒火大，必須想像其他的手段，用更激烈更能大聲喧鬧的方式，以便訴求被聽見。他們只能在民主體制之外陳述表達所承受的不公不義，並產生或多或少帶著暴力的騷動混亂。這樣一來，賤民就把體制民主的極限和死角攤在陽光下，因而呈現種種民主制度的真面目：一方面建立引進體制（尤其從政治參與自由和積極權利），一方面又讓各種形式的排除長遠存在且不斷產生新的排除形式。由此觀之，賤民在某種程度上如同顯影劑，呈現出民主體制失靈的地方，這就是我們的關注點。

在這個議題上，我認為電影比學院裡的經典知識更具顯影效果，電影以轉動聚焦放映出賤民身影，邀請我們探看年輕的臺灣民主制度這面鏡子裡，相異於全面普選和種種公共自由的鏡中映象。這樣的徹底移動滋養了我們的批判本質，而批判精神常常會被所有「民主的」論述所麻醉，自從蘇聯解體和東歐某些社會主義體制紛紛垮臺後，這些民主論述執意要向我們顯現「民主的全球化」、「世界民主化」如某種幸福和不可避免的大寫歷史的終結。

我會特別選擇這三部電影是因為，相反於西方世界，或是西歐國家常見的賤民案例，這三部電影中的賤民人物並不是貧窮、處在社會邊緣、備受歧視刁難、被烙上印記標籤的外國移民。這三部電影裡的「賤民」 他們都是本土在地人，而非新近的移工等等，雖然他們都是「在地」人，卻是臺灣民主奇蹟裡所「遺漏」的，臺灣的民主奇蹟和經濟奇蹟同樣令人矚目。學習從賤民的眼睛觀看當代民主，將會使我們更加警惕，而且在面對民主制度失靈時，會更有「抗性」。

參、從《不能沒有你》談起

我先從戴立忍導演的《不能沒有你》談起。這部電影講一個和女兒相依為命的男人，他們住在高雄港邊港務局廢棄的倉庫裡，女孩的母親已離去多年且行蹤不明。這對相依為命的父女——父親在高雄港打黑工，他是檢查船殼和拴緊螺旋推進去的無照潛水夫。而到了學齡卻沒去學校的女兒陪著父親奔波，有時用網籃捕些魚蟹為晚餐加料。他們生活在港都的邊緣但卻不是乞丐或街友，他們生活簡樸但卻不是悲慘，他們生活在制度和行政規範之外，父女兩人幸福快樂地生活在一起，做父親的非常關心疼愛她的女兒，真的是兩人相依為命。

這對父女幸福簡單的日子卻因國家公權力的主導和國家制度的強制規範而起波瀾，具體經由社會局兒童保護機構直接介入，打散了父女幸福快樂的生活。這名生父沒有監護女童的合法權利，而且他根本不具合法的父親身分，因為女童生母一直擁有和另一名男人的婚姻關係，但女童的生父完全不知道有這回事。簡單的說，國家的制度規範直接打擊到這個違反規範的小家庭，小女孩被強行拔離父親身邊，交由接待家庭照顧。電影的政治含量就從這裡顯現了。

這名父親很單純，但他絕不是個笨蛋！他遊走在社會紀律框架的邊緣，但從不傾斜到犯罪地步，這個父親從來不明白為什麼人家硬要把他的女兒帶走，這樣的不公不義，他完全不能忍受，聲嘶力竭吶喊「社會不公平！」。他幾度返往地方兒童保護單位，卻總是求助無門。他「北上」首都期待當上立法委員同屬客家人的小學同學能助一臂之力。這時，我們看到一部部裝上深色玻璃的黑色大轎車，載著立法委員駛進立法院停車場，這名父親苦苦等候那已成臺北名人的昔日小學同窗，他果真見到了。而他那熱情親切的小學同窗立委則請助理帶領，讓他輾轉在行政單位的櫃檯之間，因為立委之名，行政單位對他客氣禮貌給予空泛的承諾。然而這一趟下來，他仍在原地打轉，法令不會為他網開一面，行政體系如迷宮如叢林……。

這是個很普通的社會議題，一個可憐的故事，底層人受到不公平待遇到處碰壁求救無門，女兒被強行帶走，他失魂落魄絕望地尋找，心情低落沮喪。而他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是來自國家制度的穿透，這並不是個壓迫人民的制度，相反地，是來自一個很正面的制度——社會福利中的兒童保護政策，是生命政治中比較美好的地方，也是國家治理比較優良的一面。然而，一旦要依法處理時，行政單位的作風果斷手法迅速，他們的出發點還都是善意。鋪天蓋地的暴力湧向父親和離開他的女兒，從此以後，社工人員告訴我們，住在接待家庭的女童不再開口說話了……。

這部電影所凸顯的政治意義是，面對國家所造成的如此明顯的錯誤，父親的控訴總是吃敗仗，行政體系在此顯現出如一頭冷漠無情的大怪獸。他提著「不成敬意」的伴手禮到處拜託尋求解套，但行政體系的大門卻一一關閉。更糟糕的是，當他提著一箱水果在博愛特區行走時，被巡守的便衣視為可疑分子、危險人物，警察從四面八方包圍……。

觀眾至此感受到社會中的高層和底層之間的關係，政府和被治理者之間的關係，現代貴族和現代賤民之間的關係。這名男子屢吃閉門羹如無頭蒼蠅團團轉而絕望無助的時刻，完全不是民主時刻。這是法國大革命前很古老的那永不休止的

舊體制時刻，來自全國各地上訪陳情的民眾集結在首都，就是為了衝撞那高高在上驕傲自大而且和底層民眾距離天高地遠的官僚體系，觀眾不免會聯想到不久前發生在中國大陸天安門廣場上的場景。平凡平庸沒有社會地位的老百姓，受到地方官僚的欺壓後，帶著他們的陳情書來到中央權力機構的大門口，最後無功而返。

這個時候，賤民的身影隱隱出現了，來自底層的是有著豐富生活歷練的百姓，但那不過是虛有其表，禮儀繁複的民主制度卻一點都不把他們放在眼裡。民主制度對他們而言，很特定地，變成某種壓迫的部署，也是某種不公不義的機器，民主的遊戲規則將他們拋在一邊，其效應就是憤怒和反擊終將入侵民主的遊戲規則，這就是賤民氣質的標記。

他以某種形式我們可稱之為絕望的反應或行為展現而「付諸行動」，但這種行為恰恰就是要將所承受的種種過失爆發開來，要在公共空間中創造圍繞著他的能見度，某個「野蠻」的空間，卻也是政治意味濃厚的空間。他通過極端的「抵抗行為」爆發開來。賤民以他的生命、他的身體，還有對他來說最可貴的女兒，做賭注。民主體制的謊言壓縮這個賤民的身分，將他歸類為某種公共生活中的垃圾。這部電影的男主角，他展現出「公民條件」裡還僅存著不能被壓縮的部分。我不先講電影的結局，片尾其實很清楚的顯示我剛剛所說的，作為公民，那不能被貶低部分的重要性，整部電影從頭到尾凸顯「不可被壓縮」的這個差異，讓賤民得以去對抗政治體制和權威，而只有在賤民開始製造戲劇性的動盪去挑戰公共秩序時，政治體制和權威才會去注意到這些人的存在，才會開始認定這些人也「算數」。

肆、談《白米炸彈客》

接下來要談《白米炸彈客》，導演卓立，2014 年上映。

首先說明，這絕對不是一部探討社會邊緣人的電影，這是臺灣南部的小農和地方政權的衝突，加入了金權掛勾、身上多少有黑道色彩的地方政客。這些小農夫事實上和上一部電影的人物角色有些共同點，那就是在別人眼裡，自己「根本不算甚麼」的那一種感覺，是無論怎麼說到嘴破，別人都當作沒聽見，或是根本沒聽見的那一種感覺。他們到臺北想要跟那些高尚的大人物、政府單位，主管機關投訴陳情時，人家卻根本就當你不存在。有一個無底深淵把他們和國家隔開了，地方上是鄉紳政客的勾結貪汙操弄欺騙鄉村農民，呈現出經濟利益團體大肆搜刮，加上全球化的極端粗暴。從這個面向切入，所謂的民主根本是個喬裝假面：

民主制度「遺忘」了那些特別需要民主的支援去對抗不公不義、操控玩弄、經濟暴力等等。在《白米炸彈客》這部電影中，民主只是個掩飾金錢掠奪和利益競逐的面具。那些被假設為民主菁英也就是各級民意代表都只不過是寡頭政治裡的一幫打手，他們為經濟教父們（金主）服務，同時也趁機撈油水而財源滾滾。《白米炸彈客》的劇情故事取材自數年前曾經激起極大爭議和回響的一樁社會新聞，這部電影將政商勾結與金權政治描繪得非常細膩，簡直就像一部紀錄片。

這部片子的主角是那些意見無法傳到某個政治空間的農民之一，一般而言，在這樣的政治空間裡他們的控訴和要求是會被登錄、聽見或討論的。電影中的人物角色是剛退伍的年輕人，他起初選擇留在地方。一如西部片裡常見的人物，主角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豪俠，換句話說，當法律失效或政府權威掃地時，他立刻跳出來，以各種一般說來不太正統的方法去凸顯人民的權利，特別是最弱勢最無依無靠者的權利。當民主體制阻塞無法運作，以致耳聾聽不見了，這時就必須製造震撼衝擊，產生驚嚇或喚醒輿論和公權力的效果。這種震撼能殺出一個能見度強的空間，如上部電影，將那不可能以遵循民主規範進行的訴訟放到一個讓大家都看得見的空間裡。

在這類的環境背景或是地形輪廓裡，最常見的方式就是暴力姿態，這樣的動作、姿態很出色的阻斷民主的日常紀律。然而，我們的主角以相當睿智聰明的策略讓他得以在受阻前搶先行動：進行一連串的爆炸案以震驚大眾，凸顯他的訴求。如果他採取暴力行動，恐怖行動等等，恐怕會使他原來要凸顯的問題失去了重心。

行俠仗義的白米炸彈客因此要想像、發明並實驗一個相當細緻的手勢：模仿極端暴力的動作（在公共場所放置炸彈），模仿盲目恐怖行動，但卻是以一種幽默詼諧的方式，因為他在公園或部會前所放的炸彈，其實不過是裡頭裝白米、火力較強的鞭炮，聲音比較響亮的鞭炮罷了。模仿恐怖份子，多次進行爆炸。白米炸彈客開啟了一幕幕詼諧中帶著嘲諷的場景，國家和警察單位如臨大敵就是為了抓這名恐怖份子。而就是這樣令人好笑的場面，讓被剝削的農民對抗行政系統、對抗地方權力集團和對抗國家的問題，得以隨著澎哩啪啦的鞭炮聲暴露出來。由於忽視這些問題的民主制度已經短路了，不僅農民的控訴能獲的社會大眾的理解，同時也讓政治的結構性缺失完全呈現在大眾眼前。

偵查逮捕恐怖份子的場景荒誕可笑，以致令人對公權力嗤之以鼻。行俠仗義成了那些受國家欺壓小老百姓的救命英雄，像極了現代版的俠盜羅賓漢，全球恐怖份子時代跳出來一個俠盜羅賓漢，電影中畫面相當諷刺。他告訴大家「國王沒

有穿衣服」，他揭露了民主體制的死角和死巷，因而成為受歡迎的人物。白米炸彈客所具備的強大象徵性價值，使他成為保護那些在市場民主路邊沒有聲音的賤民的代表人物。白米炸彈客是賤民典範，他的行動來自憤怒火大，但他並沒有因此而盲目行動，與其將自己投入一條死路，他發明出一套策略以揭露那些無聲的人所承受的由別人的過失所帶來的苦難。憤怒和火大激發了他的政治想像力，且轉化為一股單獨行動的充沛能量。在現實生活中主角人物依舊關心小農階級的生計和權益，過去單槍匹馬如今集結群體的力量，並朝向新的土地耕作方式和結合農民共同發展小農經濟。

伍、《郊遊》

最後一部電影是蔡明亮導演的《郊遊》。我將這部電影保留到最後，是基於《郊遊》這部電影很難懂，考驗著螢幕前的觀眾（我在法國看這部電影時，就有觀眾陸續離座），同時又很精彩，如同這位大師的所有作品。前兩部作品都很值得觀賞，卻無法倖免某些缺失如：劇本結構、劇情鋪排，以及演員的選擇等，《郊遊》則沒有這些瑕疵。

關於這部電影，我首先要強調的是他的片名（英、法文片名為流浪狗（Stray Dogs; Les Chiens errants），為數可觀的流浪狗周遊在全島各地，這是在臺灣到處可見的景象。牠們，或獨自漂泊或成群結黨在城市裡的大街小巷、學校公園，或在小鎮村落、荒郊野外遊蕩，這些狗的特性是他們居住在大樓社區的空隙裡，在人類生活圈的空隙裡。狗群生活在人類社會的邊角空隙，而卻沒有任何的身分定義或地位，因為牠們不屬於任何飼主，而也沒有任何個人要為牠們負責。然而，這些流浪狗也沒有像在某些國家的案例一般，遭受到虐待迫害，或是被捕狗人抓去清理處死。牠們是在臺灣消費社會外沿生活的動物群，看起來大致過得還算不錯——牠們似乎沒挨餓受凍生病骯髒全身長滿蝨子。

我們在此要開啟的路徑很顯然就是《郊遊》這部電影人物的生活型態，他們和流浪狗都有點類型相同：他們都生活在那兒，在城市的空隙裡，他們是臺北這個大都會的風景之一，但是他們在當地社會的屬性卻成了嚴重的問題。我們也可以說他們都是城市的幽靈或遊魂，將自己安身在一條逃逸的曲線上；如荒郊野外，廢棄空屋、破舊違章，河邊空地、或高速公路邊等，他們的存在可能轉眼即消逝。如同前面兩部電影的人物，他們的存在都不是完整的，因此，他們的身分是不確定的。

這部電影劇情很簡單，主要人物是父親和他的兩個小孩在社會的邊緣地帶的生活，或存活，父親以舉房地產廣告看板賺取工資 ，無論颳風下雨，他在臺灣大都市的高架橋下，舉著預售豪宅的廣告看板，一站數小時。當父親在舉廣告看板時，二個小孩則到超市閒逛，品嚐免費試吃的促銷商品。晚上回到暫時棲身的廢棄空屋裡，兩個小孩就著昏黃的燈光閱讀寫字。整部電影幾乎就是一個接一個的長時間固定畫面或場景，鏡頭幾乎是固定靜止的，轉換時間拉得很長凸顯劇中人物的微弱、孤立、安份地過著流離不定的日子。

這名佇立十字路口孤單地舉著地產廣告牌的寂寞男子和他的黃色雨衣，和停在路口等綠燈的成排摩托車，和奔馳而過馬達聲響亮的摩托車，還有那穿梭而過似乎要撞到他的汽車、客運車，成形了強烈的對比。這是城市人群中最震撼最激烈的孤寂影像。

這部電影之所以獨特，乃是在當今電影裡常見的「題材」，有關被現代社會所遺棄的街友題材等等，它排除了其他電影常用的將社會畸零人悲情痛楚，站在受害者立場的呈現方式。電影並不是以悲慘的方式描繪歷盡災難僥倖活命的家庭孤島（孩子的母親把他們遺棄了），而是以冷靜客觀的手法：父親每個晚上先帶孩子去公共廁所借用水龍頭細心刷牙洗腳。這種儀式性場景重複出現，將觀眾調轉向某一種最低限度的抵抗之理解途徑。人啊！活著被壓縮到所能做的最簡單表達，但這麼活著的人卻毫不自暴自棄，絕不放棄他的人性。更確切地說，不僅是那種看不到明天的貧窮日子，而是最嚴重的社會疏離——電影裡的父子三人都是被社會遺棄的人。

俄羅斯作家卡拉莫夫（Varlam Chalamov）曾經在西伯利亞的古拉格勞改營度過人生歲月，在他的散文集（*Recits de la Kolyma*）一書中，他敘述在零下四十度的嚴寒裡，勞改營裡的犯人們還得在樹林裡伐木，寒與病交加纏身，勞改營裡的犯人們最後大量死亡。但儘管如此，作者認為，人是生命力和韌性都比馬還要強的動物。法國詩人作家安特爾曼（Rebert Antelme，他是莒哈絲的第一任丈夫）在二次大戰期間加入法國的反抗軍，後來被逮捕關到納粹集中營裡，德國戰敗後，他在 1947 年出版了集中營見證回憶錄《人類》（*l'éspèce humaine*），安特爾曼認為，被關在集中營的人之所以能不被那些劊子手屈服毀滅，而最終還能「戰勝」的，所依靠的並不是所謂的價值或理想，也不是哲學或政治的信念，它單純是人的「物質體」以及求生耐力。能抵擋毀滅的不是對抗野蠻的文明，而是，因為你是人類，人，這樣的種類。

不做任何比較不然會離題，我認為《郊遊》這部電影所呈現的荒蕪破敗一點

都不極端，它是以讓人易於接受的相近觀點呈現：父親和兩個孩子並不是只過著能維持生命的溫飽日子，或孑然一身過著有一天沒一天的悲慘日子，他們是過著合格的人過的日子，卻顛覆並且相反於一般認定的人過的日子。他們透過一系列很簡單的姿態如：洗澡，穿乾淨的衣服，讀書寫字等等，由那堅強不可摧毀的力量所激發，每天不間斷地去維持作為人的尊嚴。我們在此所看到的賤民，是時時抵抗著，堅持不要讓自己被甩向動物性或生物界。

這部電影所描繪的是賤民抵抗最基本的姿態，刻苦堅忍的賤民日日抵抗好讓自己能留在人類的陣營（保障孩子的生活所需），因此，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示威，挑戰臺灣這個社會的遊戲規則——那些成功人士（他整天舉廣告牌的那些天價豪宅或大樓公寓的屋主），和被排斥的墜落底層的魯蛇。他並非要向那些風光得意在社會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博取同情，我們看到的賤民將他那到處避難的生活背後的力量，具體顯現在社會的邊緣地帶，顯現在那會把他拉向死亡的邊緣地帶。

這名兩個小孩的爸爸不向命運低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因一天又一天的生存抵抗而疲憊不堪。但是，相反於前兩部電影的賤民，在某種程度上，他並不是以憤怒火大展現姿態。我也不認為他有過人的智慧，如希臘哲學家戴奧尼斯的犬儒哲學，這就背叛了這部電影的精神了。這位父親即使當他瀕臨崩潰邊緣時，他總是挺住，活著就是抵擋死亡，就這麼簡單。

陸、結語

在這三部電影中，賤民這個字眼和社群（communauté）相遇了，不久前我在報上讀到了一則關於幸福的調查，調查對象是臺灣的大學生，調查他們的私生活幸福指數，卻沒有社群生活的指數：他們的社交生活「正常」掩飾不了來自社群連結的挑戰。我之所以選擇這三部電影，是希望能夠在一個講求個人主義標準的社會裡，提供如何重建或努力去維持社群連結的思考。每一部電影都呈現出微社群歷盡滄桑搖搖欲墜的強烈影像，但最終卻似乎能拯救或保存共同生活的意義。某個避開大眾的社群，幾乎是祕密的，而且相當脆弱，但卻能抵擋現狀的野蠻。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6 卷 第 1 期．頁 11-44．2016 年 1 月
DOI: 10.6123/JCRP.2016.002

網絡媒體和連結型行動的力量與挑戰：以 2014 香港雨傘運動為例

李立峯 *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教授

摘要

2014 年底的雨傘運動，除了是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公民抗命，亦具備新社運模式網絡社會運動（networked social movement）和連結型行動（connective action）的特徵，包括以網絡媒體作為溝通協調的科技基礎。本文指出，網絡媒體和連結型行動一方面容許更多人以自己喜歡的方式參與，從而壯大運動的聲勢，但另一方面亦可以因其非中心化的傾向而增加運動組織者跟當權者進行策略性博奕的難度。通過分析現場調查所得數據，本文展示運動參與者的網絡媒體使用和活動狀況。分析顯示越活躍於網絡媒體的參與者對現場占領行動的參與程度越高，但現場參與程度越高的參與者傾向不願意在運動策略問題上聽取主要組織者的意見。分析結果指出網絡媒體及連結型行動對社會運動帶來的助力和挑戰。

關鍵詞：網絡社會運動、連結型行動、非中心化傾向、網絡媒體、雨傘運動

* Email: b200152@mailserv.cuhk.edu.hk
投稿日期：2015 年 6 月 15 日
接受日期：2015 年 10 月 17 日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成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2 李立峰.indd 11 2016/1/12 下午 07:26:59

壹、引言

2014 年 9 月 28 日凌晨，在持續了一個星期的學生罷課和示威活動之後，在香港已經醞釀接近兩年的占領中環行動終於由「占中三子」之一，香港大學法律學者戴耀庭宣布正式開始。在占中三子的計劃中，占領中環是非暴力的公民抗命行為。由於害怕暴力事件發生會令運動失去合法性和民意支持，占中發起人的原意是要求參與者有高度紀律，如在 9 月 26 日，占中三子發表「抗命手冊」，當中就提出非暴力抗命的八大守則，包括「堅持非暴力抗爭方式，面對執法者和反占中人士，不作出傷害他人身體、心靈和財物的言行」、「被捕時組成人鏈臥地以顯示不合作，但不作強力掙扎，免雙方受傷」、「即使遭受暴力也凜然以對，不會以暴力還擊」、和「尊重『和平占中』決策中心的決定」等[1]。

但占中三子料想不到的，是占領行動會在開始不久就蔓延至香港多個區域。行動模式亦變得多樣化。參與者以各自的方式和想像在占領區內進行社區建設。除了路障、資源中心，以及大專教師發起的流動教室之外，金鐘占領區內出現了風力發電裝置、自修室、連儂牆等，旺角占領區則有臨時關帝廟和教堂。參與者自發地以即場發揮的方式應付占領區的各種事態，例如以唱生日歌來回應反占領人士的挑釁。同時，參與者亦在占領區內進行個人化的行為和表達，如在水泥地上繪畫、在石壆上或天橋底種植等。占領街道不止向政權表達不滿，占領區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理想社群生活的實驗場所。

隨著行動模式由強調紀律和行為一致性的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轉化成較為個人化和非中心化的連結型行動（connective action），運動的名字亦由占領中環變為雨傘運動。行動形式的轉化一方面有助壯大運動的聲勢，因為連結型行動容許個人以自己喜歡的方式參與，不要求參與者完全同意主要組織者的指引，這有助鼓勵更多市民投身到運動之中。但連結型行動亦可以為一場運動帶來困難和挑戰，原因是運動參與者之間以及參與者和主要組織者之間只有鬆散的連繫，參與者亦不一定願意服從主要組織者的決定和指示，這大大增加了運動組織者跟當權者進行策略性博奕時的難度。

事實上，這困難在占領行動開始後不久就已經浮現。10 月 21 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的代表跟特區政府高級官員進行公開對話。在對話前，不少運動參與者已經在互聯網上聲言學聯並不能代表他們。在公開對話後，運動主要組

1 抗命手冊內容見 http://oclp.hk/?route=occupy/activity_detail&activity_id=90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2 李立峰.indd 12 2016/1/12 下午 07:26:59

織者曾希望在占領區內進行投票，以得知參與者如何看待特區政府於公開對話中提到的幾點讓步以及運動未來的策略，但一些堅持抗爭到底的團體及參與者懷疑學聯和占中三子希望藉著投票為撤退作準備，強烈反對占領區公投。學聯和三子亦被逼取消投票。在之後的一個多月中，運動的支持者和參與者對是否應該撤退以及是否應該把行動升級有不同的意見，但運動的主要組織者一直未能提出明確的策略方向。

在上述背景之下，本文嘗試分析雨傘運動參與者的網絡媒體使用狀況，以及網絡媒體使用如何影響參與者對現場占領行動投入程度和對運動領導和策略的看法。網絡媒體是網絡社會運動 (Castells, 2009, 2012) 和連結型行動 (Bennett & Segerberg, 2013) 的科技基礎。在雨傘運動期間，參與者亦非常活躍地在互聯網上進行各式各樣的傳播和行動。本文的主要研究假設，是網絡媒體加強了運動參與者的現場參與程度，但同時使得運動參與者傾向不願意在運動目標上妥協，並傾向不願意接受運動中心組織者的領導。

筆者無意對運動組織者的策略選擇和參與者的行動模式作出規範性的評價。文章只是希望通過對經驗材料的分析，指出在新媒體時代，大型社會運動的模式和行動形態往往會附帶著連結型行動的特徵，而連結型行動的邏輯則會對運動的動態發展產生影響。本文的分析應該有助社會運動的組織者、參與者和觀察者瞭解新媒體和連結型行動邏輯可以怎樣影響社會運動。

以下的討論會先簡單回顧跟網絡媒體和社會運動的相關文獻，以及闡釋網絡社會運動和連結型行動兩個概念。文章之後討論雨傘運動的形態和發展，並通過結合文獻和案例特徵而提出研究問題和假設。研究結果部分分析筆者以及其研究團隊在 2014 年 11 月初於金鐘和旺角占領區進行的現場調查所得的數據。

貳、新媒體與社運 2.0：網絡社會運動和連結型行動

近年世界各地發生了多場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由 2010 至 2011 年間的阿拉伯之春到 2011 至 2012 年間的占領華爾街，以及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和 2009 年冰島廚具革命等，都令觀察家對社交媒體的影響力刮目相看。國際傳媒中更出現了「臉書革命」（Facebook Revolution）或「推特革命」（Twitter Revolution）等說法。傳播學者傾向反對科技決定論，所以較少過分高估社交媒體的力量 (Olorunnisola & Martin, 2014)。傳播學者通常強調抗爭運動不會純粹因為新媒體科技而出現，但大部分學者亦同意，社交媒體在當今的大型抗爭運動中的確起

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Ems, 2014; Howard & Hussain, 2013; Kamel, 2014; Theocharis, 2013; Thorson et al., 2013; Tremayne, 2014)。如 Eltantawy & Wiest (2013: 1218) 就指出，在 2011 年的埃及革命中，「社交媒體引入了新的資源，使得資訊的接收和發放更加快速，幫助行動者之間建立和加強連繫，並促進了抗爭者之間以及抗爭者與世界之間的互動」。

事實上，早在社交媒體興起之前，社會運動研究者已經視互聯網為有力促進社會運動的新科技。這主要是因為互聯網降低了社會運動和集體行動的組織和動員成本，亦有助降低公民的資訊和參與成本 (Coopman, 2011; Lupia & Sin, 2003)。同時，由於主流傳媒深嵌於政治經濟結構當中 (Bagdikian, 2004; McChesney, 1999; Tuchman, 1978)，擔當著社會控制的功能，在報導抗爭行動時往往會有所偏頗，如強調暴力衝突、突顯抗爭者在言行或外表衣著上怪異的地方，卻少有論述抗爭者的議題和理念 (Boykoff, 2006; Chan & Lee, 1984; Gitlin, 1980; McLeod & Hertog, 1998; Small, 1995)。在這背景下，互聯網的出現就為社會運動提供了直接接觸支持者以至廣大民眾的平臺，而互聯網亦成為支持各類型社會運動的網絡另類媒體（online alternative media）的搖籃 (Atkinson, 2010; Forde, 2011; Leung & Lee, 2014)。

放到傳統社會運動理論中，互聯網可以使資源動員（resource mobilization）更有效率和效能 (Hara & Huang, 2011)。傳統的資源動員理論出現在 20 世紀 70 年代，為了反駁早年社會運動理論把社運的起源歸結於怨氣和結構張力之上，研究者強調社會運動是理性行為的產物，其中重點是要有人和組織把資源聚集起來 (Buechler, 2011; McCarthy & Zald, 1973, 1977)。資源不單只包括人力、金錢，和物資，亦包括如信任和人際關係等社會資本，以及知識、公信力或權威等象徵和文化資本。通過互聯網，更大量的資源可以在更短的時間內被聚集起來。所以，互聯網其中一種重要的效果就是使社會動員和集體行動的規模變得更大。Earl & Kimport (2011) 稱之為超規模效應（supersize effects）。

但比超規模效應更有趣的是互聯網可能會改變社會運動的形態。Earl & Kimport (2011) 稱之為理論 2.0 效應（theory 2.0 effects）。傳統資源動員理論強調社會運動組織（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是社會動員的核心。正規組織負責募集和分配資源、設置議程、規劃行動、培訓人材等。正規組織可以累積經驗和知識，可以用較長的時間來跟其他社會組織和持份者建立和維持關係，可以嘗試跟傳媒和新聞工作者多互動以建立自己的公信力和認受性，並在公共領域中成為自己所關注的議題的發言人 (Ryan, 1991; Rohlinger, 2002)。但隨著互聯網的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2 李立峰.indd 14 2016/1/12 下午 07:26:59

興起，平民百姓也可以自行組織及動員集體行動 (Harlow, 2012)。一些學者便指出互聯網可能成為「（正規）組織的代替品」（organizational substitute）(Buechler, 2011: 221)。而 Earl 及其合著 (Earl, Kimport, Prieto, Rush, & Reynoso, 2010: 441) 者則認為，如果研究者仍然假設只有社會運動組織才能製造抗議事件，那麼他們將忽略大量不是由正規組織發動的抗議行動。

不過，Earl & Kimport (2011) 的「理論 2.0」只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兩位學者自己並沒有對具體的新社會運動形態有所描述或分析。相較之下，Castells (2012) 的網絡社會運動（networked social movements）以及 Bennett & Segerberg (2013) 的連結型行動邏輯（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則是對特定的新社運形態的理論建構。

Castells 早在 2001 年的著作中就已經提過網絡社會運動的概念 (Castells, 2001)，但只有到了 2009 至 2013 年間幾場引起全球關注的大型社會運動發生之後，Castells (2012) 才對網絡社會運動有更仔細和全面的描述。他認為 2009 至 2013 年間的幾場大型社運非常接近網絡社會運動的理想型（ideal type）。這些運動所涉及的是一個由網絡構成的網絡（network of networks），所以運動的組織形態是非中心化的。「非中心化的結構把人們參與到運動中的機會擴至最大……同時它亦減低運動遇到打壓的風險，因為根本沒有具體的打壓對象」（同上引：221）。在行動模式方面，幾次網絡社會運動都以占領公共空間作為行動劇目的重心，但同時參與者在新媒體上有活躍的傳播和溝通行為，參與者亦因此為運動建構一個由城市空間和網路空間揉合而成的「自主空間」（space of autonomy），而這自主空間使得運動可以一方面紮根本地，另一方面跟世界保持緊密的連繫。

在源起方面，網絡社會運動是自發的，但行動的號召卻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廣泛地流傳。行動緣起於一件令人感到義憤填膺的事件，令大部分人同時間對統治者感到厭惡，並願意以行動表達強烈不滿。這些網絡社會運動沒有領袖。雖然個別參加者可以對其他參與者有較大影響，而運動中亦往往會出現一些被眾多參與者關注的「小明星」（microcelebrities，參看 Tufekci, 2013），但這些小明星並非領袖，參與者對他們的關注和正面評價的基礎，是他們不會把自己的想法和決定強加在別人和整個運動之上。運動的潛規則是「由運動中的人們來進行對運動的自治」(Tufekci, 2013: 223)。所以，這些運動亦常有內部直接民主的實踐。

除此以外，網絡社會運動有高度的反思性。參與者恆常地對運動自身以及對作為參與者的個人作出審視，思考「他們自己是甚麼人、渴望的是甚麼、希望

達致的是甚麼、想要的是甚麼樣的民主政制和社會」，以及如何避免在運動中複製他們希望改變的制度中所出現的，容易導致不平等和不公義的機制 (Tufekci, 2013: 225)。

最後一點，是這些運動沒有明確的政策綱領。它們不只是要求一些具體的政策轉變。它們的目標是改變社會的價值觀。「它們希望改變國家機器，但並不要求奪取國家機器。它們表達情感，激發討論，但並不產生政黨或支持個別政府，雖然它們也可能成為政黨和政府的政治市場推廣的對象」(Tufekci, 2013: 227)。

Castells (2012) 對新社運形態的描述，表面上的重點並不在互聯網的使用之上，但他認為互聯網是網絡社會運動出現的技術基礎，「因為人們只有在連繫了他人、分享了怒氣、感受到同在，以及為自己和社會建構了另類計劃時才能對抗支配。人們要連繫他人，就要靠互動性的傳播網絡，而在我們的社會中，大規模和橫向的傳播基本上就建立在互聯網和無線網絡之上」（同上引：229）。

Castells (2012) 的分析試圖勾劃出一種新型社會運動的基本特徵。值得在這裡先指出的是，現實上出現的網絡社會運動不一定同時擁有以上談論的所有特徵。我們可以用哲學家維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準則來理解網絡社會運動這一概念範疇，即一個實際存在的運動，只要擁有以上談論的特徵的其中一部分，就已經可以被視為一場網絡社會運動。

相比之下，Bennett & Segerberg (2013) 更關注抗爭行動的參與、動員，和協調方式。Bennett 在較早年的文章中已經提出了「自我實踐的公民」（self-actualizing citizen）的概念 (Bennett, 2008; Bennett & Segerberg, 2011)。傳統的公民概念強調公民責任，而公民對政治參與的責任則主要是指公民應該對制度化的政治有所參與，如在選舉中投票。而所謂自我實踐的公民，就是指人們不再局限於現行政治制度。他們希望通過更多樣化的政治行動來實現自己作為社群一份子的這個身分。所以，越來越多人投身如社會運動和抗議行動等非制度化的政治行動，而政治參與亦顯得越來越個人化。

在這背景和趨勢下，Bennett & Segerberg (2013: 25) 認為社會出現了一種新抗爭行動，這種新抗爭行動的特徵是動員速度高而且規模龐大、在組織形態上展現很高的彈性、有力建構具適應性的行動劇目、在意識上強調運動容納所有人的參與。兩位作者把這種行動稱為連結型行動。他們認為連結型行動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簡單而個人化的行動框架以及數位媒體網絡。個人化的行動框架使得所有人都可以很容易地把自己視為運動的一份子，而數位媒體網絡不單使行動框架迅速流傳，亦使不涉及正規組織的行動組織和協調成為可能。

Castells (2012) 和 Bennett & Segerberg (2013) 可以說是在不同的層次上剖析了一種新型社會運動。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網絡社會運動和連結型行動的出現，不代表傳統以正規組織為重心的社會運動和集體行動會消失。例如 Anduiza, Cristancho, & Sabucedo (2014) 就分析了在西班牙於 2010 及 2011 年發生的 9 次抗爭行動，其中包括被 Castells 視為網絡社會運動案例之一的憤怒者運動。他們的研究指出憤怒者運動的確和其他 8 次抗爭行動不一樣，具備著連結型行動的特色，但同時，他們的研究亦正說明大部分實際存在的抗爭行動仍然保留著傳統以正規組織為中心的形態。在概念上，Bennett & Segerberg（同上引）亦提出一種抗爭行動的三分法，分別為以正規組織為中心的集體行動、由群眾發起的連結型行動，以及由正規組織發起的連結型行動。

再進一步來說，無論是 Bennett & Segerberg (2013) 的三分法中的任何一個形態抑或是 Castells (2012) 的網絡社會運動，都是概念上的理想型。現實上出現的個別抗爭行動可能頗為接近這些新的理想型，但更多抗爭行動可能會摻雜著不同的組織形態和行動邏輯，不同的組織形態和行動邏輯之間可以有互補不足的地方，但也可以產生張力和矛盾。筆者認為，雨傘運動正是摻雜著不同行動邏輯的一場抗爭運動，而新媒體在雨傘運動中的作用和影響，亦可以通過它如何形塑不同組織形態和行動邏輯之間的關係來探討。

參、雨傘運動中的新媒體和行動邏輯

如文章開首指出，占領中環原本有嚴謹的行動規劃，但 9 月 28 日中午，當成千上萬市民到達金鐘，支持身處政府總部門外參與占領中環的人士時，香港警方卻封鎖前往政府總部的通道，令市民擁塞在金鐘主要道路的兩旁。到下午 4 時左右，一批示威者成功突破封鎖線，衝到馬路中心。結果，不少原本只是打算為占領行動打氣的市民，無意間親身參與了占領街道。到傍晚 6 時，警察向嘗試衝擊警方防線的示威者發射催淚彈，但催淚彈並未有效驅散人群。相反，警方向手持雨傘作防護的市民發射催淚彈的畫面，通過電視直播到達全香港市民家中，即時引發更大的義憤 (Tang, 2015)。直到晚上，警方共發放 87 枚催淚彈，但仍不能全面控制金鐘和灣仔區，而一些示威者為了令警方不能全面清場，於深夜時分將占領行動擴展至旺角和尖沙咀等地，形成占領行動「遍地開花」的局面，亦同時令整個運動的行動模式出現根本性的轉變。占領運動需要新的名稱。西方傳媒很快就用上了「雨傘革命」一詞。運動組織者和支持者則把雨傘革命改為雨傘運動，強調行動目的不在推翻政權，只在要求在香港落實「真普選」。

雨傘運動在幾個方面符合網絡社會運動和連結型行動的形態。首先，雨傘運動的行動劇目重心是占領公共空間，而運動參與者可說是建構了一個由城市空間和網路空間結合而成的自主空間。雨傘運動參與者多是自發動員的，和香港過去十多年出現過的，如七一遊行等大型遊行集會一樣，雖然集體行動由一些社會組織負責策劃和發起，但社會組織只具備有限的動員能力，大眾的參與是普羅市民之間相互動員的結果 (Lee & Chan, 2011)。

在多個占領區出現之後，占領運動出現明顯的非中心化傾向。當占中三子以至學生組織代表到其他占領區，嘗試跟參與者溝通和講話時，他們並不一定受到歡迎和禮遇。在占領區最前線的參與者和運動的中心組織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如設置路障時是否需要預留行車線讓應急車輛通過、應否堵塞政府總部上下班的出入口以阻止公務員上班等，往往有截然不同的意見，而中心組織者不一定能夠說服參與者聽從自己的勸喻。

運動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連結型行動的邏輯。正如占領華爾街行動以「我們是那 99%」作為簡單而有效的個人行動框架，雨傘運動的基本口號「我要真普選」也發揮類似的作用。口號沒有對真普選下明確定義，沒有強調如公民提名等具體方案，但正因如此，它使更多人願意支持和參與運動。同樣道理，黃絲帶和黃傘等運動的主要象徵符號，也沒有人對它們作嚴格的詮釋，令這些符號的開放性得以保存。在這背景下，這些符號和口號在互聯網上得到廣泛流傳，支持者和參與者可以在社交媒體上把自己的 profile picture 變為一把黃傘、一條黃絲帶，或其他類似的符號來表明運動支持者的身分。

同時，每個參加者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參與和支持運動，不願意或因各種原因不能長期駐守占領區的市民，可以按個人狀況偶而到占領區作支持，或捐贈金錢或物資。另外，運動中一些最突出的行動往往由一些個人或小組發起，除了占領區內的活動，跟運動相關的行動也延伸到占領區外，例如一群參與者自發組織在獅子山頂掛上「我要真普選」的直幡，不只成為傳媒報導的焦點，亦觸發市民在不同場所掛上類似的直幡。到 11 月中開始的大學畢業典禮季節，很多畢業生都掛上黃絲帶和手持黃傘進典禮會場。所以，雨傘運動一方面是由一大群人同時在做同一件事情（占領街道），另一方面亦是很多個人和小組在做著模式不一樣，但相互連結在一起的事情。

不過，雨傘運動和網絡社會運動的概念形態始終有著重要的差異。雨傘運動並非沒有中心組織。占領中環的三位發起人在 2013 年 3 月已經開始了「讓愛與和平占領中環」的一連串活動和工作，同時香港社會對占領中環以及公民抗命的

概念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廣泛討論，這些前期討論和籌備工作令更多市民瞭解公民抗命的原則和理念 (Lee, 2015)，亦形塑著人們對占領行動的理解和預期。在占領行動演變為雨傘運動之後，學聯和主要由高中學生組成的學民思潮的影響力更大於占中發起人，成為運動的主要組織及領導者。

雨傘運動不只有發起人和擔當領導角色的組織，運動亦可說確實需要領導者。這是因為雨傘運動跟占領華爾街或其他典型網絡社會運動另一個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它有具體的政策訴求。剛剛提到，雨傘運動以沒有提及具體要求的「我要真普選」為口號，但同時運動的主要組織者的確提出了公民提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收回 8 月 31 日的決議案，以及特區政府重新啟動政改程序等具體要求。在運動過程中，亦有不同組織和人士提出過其他具體提議，如香港特區政府向全國人大提交補充報告，促請人大重新思考 831 決議案等。

一個沒有具體訴求的運動，要面對的問題可能只是如何將運動延續下去及將運動的訊息傳達給更多人知道，但當運動有具體訴求時，運動就必須與其主要訴求對象進行策略互動。例如在運動開展後不足一個月，就已經有運動支持者認為參與者需要考慮退場機制的問題。一些公開支持運動的公眾人物，如香港天主教教區前主教陳日君，在 10 月上旬已經呼籲學生撤退以保留實力，再跟政府談判。而在運動內部的另一端，則有參與者及團體呼籲占領行動須要升級以逼使政府作出具體讓步。

雨傘運動的組織者在當時應該採取甚麼策略並非這裡的討論重點。這裡要指出的是，這種策略選擇，是 Castells (2012) 筆下沒有政策綱領的網絡社會運動無須面對的。沒有具體政策要求，運動在某種意義上根本就沒有具體訴求對象，所以亦不需要跟訴求對象互動。但雨傘運動有具體訴求，於是便有了用甚麼策略才能達致最大成效，爭取到政府作出最大讓步的問題。而非中心化的連結型行動邏輯和形態，則可能加大運動組織者進行有效決策的難度，因為當運動內部意見紛紜，而人們又強調自己是獨立的個體參與者時，運動組織者採納任何果斷的行徑，都可能要承受著被部分參與者公開批評甚至唾棄的風險。

當然，一場運動能否取得成果，要看的不止是運動的策略是否得宜，也要看運動處身於一個怎樣的政治機會結構之中 (Kolb, 2007)。雨傘運動在香港發生，但中央政府掌握著普選問題的決定權，而且一直在該問題上採取強硬的立場。同時，香港民主運動的「精英盟友」基本上只限於本地的民主派政黨和政客，連繫中港的政治架構中的「香港代表」，如特區政府官員、港區人大代表和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的香港成員，都是親中和建制派人士。另外，在法定的政制改革

過程中，沒有機制讓香港社會的聲音可以繞過特區政府或建制派精英直接進入政策制定過程。所以，政治機會結構本身就對雨傘運動要取得成果極為不利。因此，本文並不是指非中心化的連結型行動邏輯和形態是雨傘運動未能取得成果的最重要因素。但從另一角度看，正是因為政治機會結構本身已對運動不利，運動更加需要小心考慮自己的策略決定，而非中心化的形態則可能對此帶來額外的困難[2]。

肆、研究問題和假設

當然，上一節的討論只是基於概念性分析和筆者對雨傘運動的一些觀察，而文章正是希望通過對經驗數據的分析，來驗證以上提到的有關網絡媒體和連結型行動邏輯對雨傘運動的影響的說法。精確點說，本文中指的網絡媒體，泛指以互聯網技術作為基礎的媒體溝通工具，包括各種網站、網絡論壇、各種用作人際溝通的智能手機程式等。具體而言，本文提出兩個研究問題和三個研究假設。第一個研究問題純屬描述性質，我們希望瞭解運動參與者的網絡傳播行為。需要指出的是，到目前為止，有關網絡社會運動或連結型行動的文獻並沒有建立一個通用的數位媒體行為分類方法。一些研究中提出的分類亦不一定適用於本研究的關注點之上，如一些關於社交媒體和政治參與的研究把社交媒體的使用分為接觸資訊、表達意見、行動參與等不同的維度 (Tang & Lee, 2013; Valenzuela, 2013)，但這些分類提出的是較為籠統的日常社交媒體使用的維度，不一定適用於一場特定的社會運動中。另一種針對網絡媒體使用在社會運動中的作用的分析，則主要是通過研究從社交媒體上得到的「大數據」，探討運動參與者如何使用網絡媒體進行不同類型的溝通，以至組織和協調行動 (Bennett, Segerberg, & Walker, 2014; Brym, Godbout, Hoffbauer, Menard, & Zhang, 2014; Penney & Dadas, 2013)。這些研究也可能會提出一些分類，但它們指向的不是個人層次的使用問題，而是一場運動中的網絡傳播的整體動態。

2 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用 2012 年成功逼使香港特區政府讓步的反國民教育運動來做對比。反國民教育運動的成功，除了它能取得大量市民支持外，也是因為國民教育是否要被列為中小學的必修科目這問題，縱使中央官員也許有強烈看法，在制度上始終是特區的內部事務。而且特區政府要推行國民教育，也要本地學校願意合作。在這意義上，反國教運動中的其中一個轉捩點，是一些社會上的主要辦學團體，尤其是香港天主教教區，公開聲明拒絕在其管理的學校中把國民教育立即變成必修課。換句話說，當一項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要依賴一些本地社會組織和人士的支持和合作時，一場運動如何能夠撼動這些本地社會組織和人士，就有更大機會取得成果。不過，政治改革問題並不涉及這種結構和狀況。

整體而言，每一場運動都可能有其在地的特徵，例如西方社會中，社運參與者可能多用 Twitter 來進行溝通 (Penney & Dadas, 2013; Tremayne, 2014)，香港市民則可能多用 Facebook 或 Whatsapp 等手機程式。不同類型的網絡傳播行為在不同的運動中的顯著程度也可能不一樣。所以本研究在分析網絡傳播行為時，採用的是由下而上，從具體現象出發的方式（這涉及問卷設計問題，將在方法部分再作討論）。所以問題一亦較具探索性質：

問題一：雨傘運動中的參與者通過網絡媒體進行那些跟運動有關的傳播行為？不同的網絡媒體傳播行為可否被分為不同的類型或範疇？

研究假設方面，本文首先關注網絡媒體活動和現場參與程度——即參與者在占領現場投入多少時間和精力——之間的關係。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並非必然。如不少論者就曾批評網上表達和行動可能只是一種懶動主義（slacktivism），跟線下的實際行動可能脫節 (Gladwell, 2010)。不過，從網絡社會運動和連結型行動的概念出發，網絡傳播和線下的實際行動是密不可分的。很多網絡傳播正是為了協調和組織線下行動而進行。不少經驗研究亦指出，網絡傳播本身也可以具有動員的效果，因為網絡媒體是資訊來源，也是動員訊息傳播的渠道，而且網絡媒體讓一般市民可以表達意見，而表達行為會讓人對相關議題作更深入的思考 (Tang & Lee, 2013; Tufekci & Wilson, 2012; Valenzuela, 2013; Valenzuela, Arriagada, & Scherman, 2014)。不過，一般有關網絡媒體和社會運動參與的研究，都是集中分析社交媒體或其他網絡媒體使用會否讓公民更多參與集體行動，亦即是說，該些研究中的依變項是人們多不多參與抗議和集體行動。但本研究分析的是在同一場運動的參與者之中參與程度的差異。事實上，在雨傘運動或占領華爾街這類長時間占領運動中，不同參與者的現場「參與」程度可以很不一樣，一些參與者可以每天都在占領區，但另一些參與者則可能只是偶而到占領區支持 (Milkman, Luce, & Lewis, 2013)。如果網絡傳播和線下實際行動密切相關，我們可以預期網絡傳播行為會促使參與者有更高的現場參與程度。這是本文的研究假設一：

假設一：在網絡媒體上越活躍的參與者，在占領現場的參與程度越高。

不過，網絡媒體對社會運動在有所助益之餘也可能帶來挑戰。當參與者在現場的投入程度越高，付出的努力越大，他們可能會對個人的自主性以及運動的

目標有更大堅持，所以他們可能在占領者應否在政府願意作出局部讓步時撤離占領區這問題上更不願意退讓，同時亦更不願意在重大策略問題上聽從主要組織者的意見。雖然現有的文獻沒有直接測試過這些關係，但這些預期跟文章之前提及的，網絡社會運動的非中心化傾向密切相關。

不過，筆者並不假設新媒體使用會直接使參與者更不願意聽從主要組織者的意見，因為人們可以使用新媒體進行不同類型的溝通，支持運動中心組織的參與者，也可能需要通過網絡媒體來得知中心組織者的決策和動態。新媒體的非中心化效應，主要是通過加強參與者的現場參與程度和對自主性的堅持而出現。當現場參與程度在統計上被控制之後，新媒體使用和撤退意願及對主要組織者的態度之間有甚麼樣的關係，是一個開放的研究問題。總括起來，研究假設二、假設三，以及問題二如下：

假設二：現場參與程度越高的運動參與者，越不願意因政府的局步讓步而撤退。

假設三：現場參與程度越高的運動參與者，越不願意在運動策略問題上聽從主要組織者或其他人士及組織的意見。

問題二：在統計上控制現場參與程度之後，網絡媒體使用和撤退意欲之間有沒有顯著關係？同樣，在控制現場參與程度之後，網絡媒體使用和對主要組織者的態度有沒有顯著關係？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不是要驗證一個已經被建立的，有關網絡傳播在連結型行動中的影響的理論模型。所以，在研究問題和假設中出現的，如現場參與程度和因政府的局步讓步而撤退等，並非理論概念，而是針對雨傘運動的實際狀況而提出的變項。而我們從分析中可見到的，是網絡媒體傳播跟雨傘運動中一些具體的動態有甚麼關係，從而瞭解網絡媒體對網絡社會運動可能產生的影響。

伍、研究方法

以下分析的數據來自由筆者及其研究團隊在 2014 年 11 月 2 日下午進行的雨傘運動現場調查研究。調查選擇在星期天下午進行，是因為該時段裡占領區內的人數會較多，這一方面有實際資源運用上的好處，因為占領區人數較多的話，同樣的人手安排可以在同樣的時段內訪問到更多被訪者。另一方面，選擇星期天下午亦能幫助調查研究包括更多只會在空閒時間到占領區參與支持的香港市民。

Mercea (2014) 以隨意參與者（casual participants）來形容在大型社會運動中參與程度不高的參與者。雖然這些參與者不是運動的中堅分子，但大型運動之所以出現，正是因為它們能吸引到大量隨意參與者加入，所以隨意參與者亦值得被調查研究包括在內。

由於資源和人手所限，調查只在旺角和金鐘占領區進行。兩個占領區的抽樣原則一樣。擔任研究員的學生助手被安排為兩人一組，他們被指定根據特定路線圍繞著占領區行走，在過程中邀請身邊經過的每第十人為被訪者，研究者要求研究員嚴格遵從抽樣方式行動，不可自行選擇被訪者，若經過第十人時發現一群人聚在一起，研究員必須邀請與自身距離最近的一位人士參與研究。被訪者自行填寫問卷，再由研究員收回。由於旺角占領區的地理位置關係，占領區內可能會出現較多路過的市民，所以旺角的研究員會在邀請一位市民參與調查時先詢問該市民是否到占領區參與支持運動。

以上的抽樣方法基本上是以占領區內參與者的時間和空間分布作為抽樣框架，研究者對研究員作出的指示則旨在把來自研究員主觀判斷和決定的偏差減至最低。類似的抽樣方式在香港及其他地方的研究均曾被使用 (Lee & Chan, 2011; Milkman et al., 2013; Walgrave & Verhulst, 2011)。研究團隊在旺角共成功訪問 296 人，在金鐘則成功訪問 273 人，樣本總人數為 569 人。兩個占領區的回應率均有 95%[3]。

在人口特徵上，金鐘的被訪者有 51.5% 為女性，而旺角的女性受訪者比例則只有 30.2%。年齡方面，25 歲或以下人士占金鐘參與者的 44.7%，26 至 40 歲的人士則占 39.7%。41 歲或以上的被訪者只占樣本的 15.7%。在旺角，三者的百分比分別為 51.5%、35.9%，以及 13.1%。換句話說，旺角被訪者的年齡比金鐘被訪者稍為年輕一點，但兩組被訪者的年齡分布之間的差異並未達致統計學上的顯著水平。

旺角占領區的樣本有更多具專上學歷的人士：66.3% 的旺角被訪者具備專上學歷，3.1% 只有小學學歷或從未接受教育。金鐘占領區的被訪者中，55.8% 具專上學歷，12.6% 只有小學學歷或從未接受教育。兩個占領區被訪者的教育程度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旺角占領區的參與者中亦有較多現役大學生——兩個占領區中的比例分別為 28.0% 和 20.5%。在社會階層方面，問卷要求被訪者自行判定

3 兩個占領區均有很高的回應率，一方面是因為調查進行當天占領區內氣氛平和有序，不太緊張，同時亦可能是因為占領運動參與者大都希望通過各種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固此亦願意參與學術性調查研究。

自己屬於那一個階層[4]。在本身也是一個草根階層居住地帶的旺角，50.8% 的被訪者自認屬草根或低下階層，38.5% 則自認屬中產階層。而在本身是一個金融和商業區的金鐘，則只有 40.4% 的被訪者自認屬草根或低下階層，同時有 58.0% 的被訪者自認屬中產階層。換句話說，旺角占領區的被訪者有較多男性，較多自認屬草根階層，較多具大專學歷的人士，及較多現役大學生。但整體而言，兩個占領區的參與者人口特徵差異其實不大。雨傘運動的參與者大部分是年輕人和擁有高學歷，現役大學生占參與者約四分之一，而自認屬草根階層及自認屬中產階層的則約各一半。

在問卷設計方面，首先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是對一場在形態和規模上都難以預期的占領運動所作的即時回應，研究者主要希望瞭解的是具體於眼前出現的運動動態。同時，正如在概念分析部分已提及，現時相關文獻中並沒有統一的網絡媒體使用量表，因為每個運動的在地特徵和情況不盡相同，所以本調查所包含的 21 條有關網絡媒體使用的題目，是根據筆者及其研究團隊對雨傘運動頭一個月的狀況的觀察而設定的。同樣道理，現場參與程度和撤退意欲等是指向雨傘運動中出現的具體狀況的變項，問卷中的題目也是研究團隊按雨傘運動的實際狀況而發展出來的。具體操作化將在以下部分跟分析結果一併討論。

陸、分析和發現

一、雨傘運動參與者的網絡媒體使用和行為

調查問卷包含一系列跟參與者網絡媒體使用和行為相關的問題，可用以回應研究問題一。表 1 總結該系列問題所得數據。問題關注的不是一般的新媒體使用，而是參與者有沒有在雨傘運動開始後試過在互聯網、社交媒體或手機群組中進行一些跟雨傘運動有關的活動，其中一些條目也可以被視為對運動的參與行動，而且這些行動對運動的發展有一定的重要性。例如從運動一開始，網絡上就流傳不少跟運動有關的謠言，包括解放軍軍車已經出動、旺角占領區有女學生被人非禮等。如表 1 所示，只有 5% 的被訪者沒有試過通過新媒體接觸到關於運動的謠言，而有 55.0% 的被訪者經常接觸到關於運動的謠言。面對著謠言的攻擊，很多運動參與者自行在網絡上進行闢謠工作。在臉書上便出現「謠言終結者」[5]

4 由於調查在公眾場所進行，被訪者很可能不願意回答較私人的問題，故此問卷不詢問被訪者的收入，而只要求被訪者自行判斷自己所屬階級。

5 謠言終結者網頁，https://www.facebook.com/pages/ 謠言終結者－和平佔領運動資訊

	沒有	有，但不經常	經常
自占領運動開始後，你有沒有試過在互聯網，社交媒體或手機群組中：			
接觸到有關占領運動的謠言	5.0	40.0	55.0
嘗試澄清謠言	19.2	49.0	31.8
接觸到自己認識的反占中人士的言論	10.7	47.4	41.9
接觸到自己不認識的反占中人士的言論	14.0	45.2	40.8
回應自己認識的反占中人士的言論	22.5	47.9	29.6
回應自己不認識的反占中人士的言論	47.3	38.6	14.2
更改 profile picture 來表達對運動的支持	29.5	14.4	56.1
發放自己在現場拍下的照片或影片	21.9	37.2	40.9
發放自己製作的圖片，改圖等	73.0	15.8	11.2
就運動的某些方面發表評論文章	45.2	37.1	17.7
就運動發表簡短的個人感受	19.1	49.7	31.2
轉發大眾媒體的相關新聞或評論	15.8	38.2	46.0
轉發網絡上對運動的評論	19.8	39.9	40.3
轉發朋友拍攝的照片，影片或改圖	28.3	41.2	30.4
轉發朋友就運動而寫的文章	35.5	38.8	25.7
向外國的朋友解釋運動和香港的狀況	42.6	40.1	17.2
向身在中國大陸的朋友解釋運動和香港的狀況	59.3	29.5	11.2
Unfriend 跟自己意見不一樣的人士	70.8	23.2	6.0
通過手機程式傳送有關運動的訊息	18.9	44.3	36.8
通過手機程式跟朋友討論占領運動	16.7	44.7	38.7
建立專門討論占領運動的手機討論群組	53.2	27.5	19.3

表 1：運動現場參與者的網絡參與和傳播行為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和「佔中謠言追追追」[6] 等專頁，對有關運動的傳言進行查證。表 1 亦顯示，八成以上的運動參與者有在互聯網上嘗試澄清謠言，超過三成被訪者更是經常協助澄清謠言。

運動參與者亦通過新媒體接觸不少反占中人士的言論，其中部分來自認識的朋友，部分來自不認識的人士。參與者較多回應自己認識的反占中人士的言論：接近三成被訪者經常這樣做，而有這樣做的比例總共超過 85%。相比之下，有回應自己不認識的反占中人士的言論的被訪者只有 53% 左右，但這百分比也不算低。

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是一個讓使用者進行表達的空間 (Macafee & de Simone,

/1486627231608268

6 佔中謠言追追追網頁，https://www.facebook.com/OccupyCentralMythKiller

2012)。有七成被訪者有在社交媒體上更改自己的 profile picture 來表達對運動的支持。四成被訪者經常發放自己在現場拍下的照片或影片，另外三成半以上的被訪者亦曾試過發放自己拍下的照片或影片。超過三成的被訪者經常通過網絡媒體發表簡短的個人感受，只有約兩成被訪者完全沒有發表簡短個人感受。可以理解的是較少人會發表較為長篇的評論文章或自己製作的改圖，但有在網絡媒體上發表過評論文章的也有超過一半的被訪者，而有試過發放自製圖片或改圖的則有約四分之一的被訪者。

正如不少傳播學者指出，真正會在網絡上進行內容生產的普通人其實比例不會太高 (van Dijck, 2009)，大部分人都是在網絡上擔當著內容發布者和推介者的角色。不過這發布者和推介者角色的重要性不容忽視，因為它使得某些內容在網絡上廣泛流傳，而且內容對接收者的影響力可能會因為它來自朋友的推介而增加。表 1 顯示，46.0% 的被訪者經常轉發從大眾媒體而來的關於運動的新聞或評論，40.3% 的被訪者經常轉發網絡上對運動的評論，經常轉發朋友拍攝的照片、影片或改圖的也超過三成，另外約四分之一的被訪者經常轉發朋友就運動而寫的文章。

雨傘運動受到全球關注，但國外人士不一定瞭解運動的來龍去脈和香港的狀況。同時，由於大陸的新聞封鎖，身處中國大陸的人士較難得知有關運動的資訊。表 1 顯示，40.1% 的運動參與者有試過通過網絡媒體向外國的朋友解釋運動和香港的狀況，17.2% 的運動參與者更是經常這樣做。29.5% 的運動參與者則有試過向身在中國大陸的朋友解釋運動和香港的狀況，而 11.2% 的運動參與者經常這樣做。

運動發生後，香港社會上出現了因對占領運動意見不一而在社交媒體上把朋友「unfriend」的現象。現場調查結果發現，真的有在社交媒體上把朋友「unfriend」的運動參與者比例其實不高，只有不足三成有試過這樣做。最後，問卷亦包括了幾題跟手機程式使用直接相關的題目。超過三分之一的被訪者經常通過手機程式傳送有關運動的訊息，同時亦有超過三分之一的被訪者經常通過手機程式跟朋友討論占領運動。另外，接近一半的運動參與者有建立專門討論占領運動的手機討論群組。

總括而言，表 1 顯示運動參與者在網絡媒體上有活躍的傳播和參與行為。為方便進一步分析以及回應研究問題一的後半部分，筆者對表 1 的題目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使用的是最大概似（maximum likelihood）分析和斜交轉軸法。表 2 顯示因子分析的結果。雖然 21 個題目並非來源自已被檢驗的量表，但大部分題

	因子一：網絡表達	因子二：手機溝通	因子三：網絡辯論	因子四：網絡闡釋
接觸到有關占領運動的謠言			0.35	
嘗試澄清謠言			0.33	
接觸到自己認識的反占中人士的言論			0.68	
接觸到自己不認識的反占中人士的言論			0.63	
回應自己認識的反占中人士的言論			0.70	
回應自己不認識的反占中人士的言論			0.48	
更改 profile picture 來表達對運動的支持				
發放自己在現場拍下的照片或影片				0.56
發放自己製作的圖片，改圖等				0.45
就運動的某些方面發表評論文章	0.30			
就運動發表簡短的個人感受	0.41			
轉發大眾媒體的相關新聞或評論	0.89			
轉發網絡上對運動的評論	0.93			
轉發朋友拍攝的照片，影片或改圖	0.52			
轉發朋友就運動而寫的文章	0.52			
向外國的朋友解釋運動和香港的狀況				0.52
向身在中國大陸的朋友解釋運動和香港的狀況				0.52
Unfriend 跟自己意見不一樣的人士				
通過手機程式傳送有關運動的訊息		0.73		
通過手機程式跟朋友討論占領運動		1.00		
建立專門討論占領運動的手機討論群組		0.56		
特徵值（eigenvalue）	6.84	1.83	1.43	1.24

表 2：運動期間網絡參與和傳播行為的因子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註：因子分析以斜交轉軸法進行。表中數值為型樣矩陣中的因子負荷量。為清晰起見，小於 0.30 的因子負荷量被隱藏。

目都頗為清晰地分別屬於 4 個因子[7]。只有 3 個題目在 4 個因子上都沒有高於 0.30 的負載值，分別是「更改 profile picture 來表達對運動的支持」、「發放自己在現場拍下的照片或影片」，和「unfriend 跟自己意見不一樣的人士」。另外，「就運動的某些方面發表評論文章」則在兩個因子上有高於 0.30 的負載值。

在因子一上有最高因子負載值的是「轉發大眾媒體的相關新聞或評論」以及

7　除了以特徵值高於 1.0 作為確認因子存在的標準外，作者亦在分析時參照了陡坡圖。陡坡圖顯示，在頭四個因子之後，由第五個因子開始，每個因子的解釋變異數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條直線。所以因子數量為 4 是一個對分析結果的合理詮釋。

「轉發網絡上對運動的評論」。另外，轉發朋友拍攝的照片或所寫的文章、發表簡短個人感受，和發表評論文章都屬於因子一。因此因子一可以被稱為網絡表達行為，它包括的主要的是一些通過網絡媒所進行的內容分享和單向個人表達。

因子二由三個跟手機群組使用直接相關的題目組成，所以可以簡單地被稱為手機溝通行為，意指運動參與者利用手機的各種網絡功能來跟別人進行關於運動的溝通。

共有 6 條題目在因子三上有高於 0.30 的負載值。其中有較高負載值的是幾個接觸或回應反占中人士言論的題目。同時，關於運動的謠言也多帶有反對運動的意味。所以，因子三涉及的是參與者對反對運動的聲音有多少接觸和回應。由於因子三同時擁有關於「接觸」和「回應」的題目，所以筆者將因子三稱為網絡辯論行為，它指向的是運動參與者有沒有在網絡上跟異議者進行溝通。

4 條題目在因子四上有高於 0.40 的負載值，包括「向外國的朋友解釋運動和香港的狀況」、「向身在中國大陸的朋友解釋運動和香港的狀況」、「發放自己製作的圖片或改圖」，以及「就運動的某方面發表評論文章」。筆者將這因子稱為網絡闡釋行為，因為四個題目中有三條都涉及被訪者向他人解釋或評論運動的狀況，而發放改圖也屬於這個因子，正可能代表著發放改圖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對運動作出某種闡釋。

根據因子分析的結果，筆者建構了網絡表達、網絡辯論、網絡闡釋，和手機溝通 4 個指標，但只有當一個題目在一個因子上的負載值超過 0.40，它才會被納入到指標中，所以接觸或澄清謠言沒有被納入網絡辨論指標中。每位被訪者在指標上的數值就是被訪者在屬於該因子的題目上的回答的平均值（網絡表達：M. = 1.11, S.D. = 0.61, α = .88；網絡辯論：M. = 1.08, S.D. = 0.51, α = .72；網絡闡釋：M. = 0.60, S.D. = 0.51, α = .67；手機溝通：M. = 1.02, S.D. = 0.62, α = .79）。四個指標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相關性最低的是網絡辯論和網絡闡釋 (Pearson $r = 0.33$, $p < .001$)，相關性最高的則是網絡闡釋和網絡表達 (Pearson $r = 0.56$, $p < .001$)。由於 4 個指標之間的相關程度並不低，若將 4 個指標同時放進一多變項分析之中，可能會引起多元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的問題，所以筆者取 4 個指標的平均值來代表整體網絡傳播和參與行為 (M. = 0.95, S.D. = 0.42, α = .74)，以方便在有需要時作更簡化的分析。

表 3 顯示了運動參與者的人口特徵及其網絡傳播和參與行為的關係。在多變項迴歸分析中，教育程度跟四個指標都沒有顯著關係，旺角和金鐘占領區的被訪者在網絡傳播和參與上也是同樣地活躍。性別則只跟網絡辯論有僅僅在統計上達

	網絡表達	網絡辯論	網絡闡釋	手機溝通
性別（2 = 女性）	- .03	- .06	- .09*	- .01
年齡	- .14***	- .18***	- .13**	- .25***
教育程度	- .01	- .01	- .04	- .02
社會階層	.05	- .02	.14**	.05
占領點（2 = 旺角）	- .02	.04	- .00	- .07
調整後的 R^2 值	.015***	.028***	.032***	.057***

表 3：人口特徵對四種網絡參與和傳播行為的影響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註：數字為標準化迴歸系數。變項中的缺失值由變項的平均值取代。有效樣本數為 569。
*$p < .05$; **$p < .01$; ***$p < .001$

顯著程度的關係。年齡是唯一跟 4 個依變項都有顯著相關的人口變項。年輕的參與者較年長的參與者在各種網絡參與和傳播行為上更加活躍。有趣的是，社會階層對網絡表達、網絡辯論，和手機溝通都沒有影響，但社會階層卻跟網絡闡釋行為有頗顯著的正相關。自認屬上層或中產階級的運動參與者，較自認為屬草根階層的運動參與者更多參與網絡闡釋行為。這大概是因為網絡闡釋行為包括了向身處香港以外的朋友解釋香港的狀況，而上層或中產階級應該較草根階層更可能在香港以外有認識的朋友或親戚，所以他們亦更有可能參與到網絡闡釋行為當中。

二、網絡傳播與參與、現場參與程度，和對撤退的態度

研究假設一至三提出了一些變項之間可能存在的關係。我們可用迴歸分析來檢測該些假設。檢測假設一的迴歸分析以參與者的現場參與程度作為依變項。現場參與程度以三個變項為測量，分別是被訪者到過占領區多少天（答案由 1 = 1 天至 6 = 每天都在占領區參與）、每次到占領區逗留的時間平均為多少（以小時計算），以及被訪者有沒有試過通宵留守在占領區內（答案為有或沒有）。為簡化分析，筆者將三個題目合併成一個指標，由於三個題目的量表不一樣，合併方法是先將三個題目的答案標準化，然後再取其平均值 (M. = 0.05, S.D. = 0.73, α = .67)。

迴歸分析的自變項分別為人口特徵、占領區地點，以及網絡參與和傳播行為。表 4 的第一欄顯示，女性比男性參與者的現場參與程度稍低一點。同時，教育程度越高，在占領區現場花的時間也較少。年齡和社會階層則和現場參與程度沒有統計學上顯著的關係。在控制掉人口變項之後，旺角占領區的參與者較金鐘占領區的參與者的現場參與程度稍高。

當四個網絡參與和傳播行為同時被加到迴歸分析時，只有手機溝通和網絡

	依變量：現場參與程度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性別（2 = 女性）	- .08*	- .09*	- .09*	- .08	- .09*	- .08*
年齡	- .05	- .10*	- .10*	- .10*	- .06	- .06
教育程度	- .14***	- .15***	- .15***	.15***	- .15***	- .15***
社會階層	- .07	- .06	- .05	- .07	- .06	- .07
占領點（2 = 旺角）	.09*	.08	.07	.07	.09*	.08
網絡表達	.03	.19***				
網絡辯論	- .02		.10*			
網絡闡釋	.11*			.19***		
手機溝通	.21***				.26***	
網絡參與和傳播（總體）						.25***
調整後的 R^2 值	.110***	.074***	.050***	.075***	.102***	.100***

表 4：網絡參與和傳播行為與現場參與程度的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註：數字為標準化迴歸系數。變項中的缺失值由變項的平均值取代。有效樣本數為 569。

*$p < .05$; ***$p < .001$

闡釋跟現場參與程度有正面和統計學上顯著的關係，其中手機溝通的迴歸系統明顯較大，統計學上的顯著程度亦更高。不過，如上一節提及，由於四個網絡傳播和參與行為指標之間有頗高度的相關性，當被放進同一個迴歸分析模型時，指標之間的多元共線性可能會影響個別指標的表現。所以，表 4 亦展示另外五個迴歸分析模型。模型二至模型五分別只用上了四個網絡傳播和參與行為指標的其中之一為自變項。結果顯示，當單獨成為自變項時，四個網絡傳播和參與行為指標都與現場參與程度有顯著的正相關。而模型六則用上了整體網絡傳播和參與行為（即四個指標的平均值）作為自變項，而這整體行為指標亦跟現場參與程度有顯著的相關。總括來說，表 4 的發現支持了研究假設一，而在四項網絡行為中，手機溝通的影響尤其顯著。

這裡需要先指出，調查是在單日進行的一個橫切面調查研究，並不能引證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明顯地，除了網絡媒體使用可能會加強參與者的現場參與程度之外，現場參與程度較高的參與者很可能會傾向更多使用網絡媒體。筆者會在結論部分再討論因果關係的問題。

餘下的研究假設會涉及運動參與者在 11 月初時對撤退的態度，以及他們是否願意在運動策略問題上考慮運動組織者的意見。表 5 先綜合相關問卷題目的描述性數據。問卷詢問被訪者是否願意在某些假設情況下撤退。問題是根據運動當時的實際狀況以及社會上的各種輿論而設計的。具體地說，在調查研究進行時，

	絕對不會／應該不會	應該會／肯定會	平均值
就個人而言，若以下情況出現，你會否撤離？			
特區政府不再有新回應，只承諾建設多方平臺和向港澳辦提交民情報告	72.0%	6.5%	1.78
特區政府再有新回應，同意向人大提交補充報告	48.0%	17.4%	2.46
特區政府再有新回應，承諾立法會在十年內循序漸進至完全取消功能組別	32.7%	32.4%	2.90
特區政府有新回應，承諾在提名委員會組成上取消公司票	31.2%	30.1%	2.88
	非常不願意／不願意	非常願意／願意	平均值
就個人而言，有關運動的發展和策略問題，除了你自己的意見外，你會有多願意聽取以下人士或組織的意見？			
學聯	8.8%	64.4%	3.82
學民思潮	8.2%	60.3%	3.74
占中三子／和平占中	35.2%	32.5%	2.89
自己支持的政黨或組織	19.6%	31.3%	3.15
大學校長	28.8%	23.6%	2.87
自己的朋友	11.3%	42.0%	3.36
家人	25.4%	26.0%	2.96
民意調查所反映的民意	16.7%	42.6%	3.35
報章社評	25.6%	29.9%	3.00
占中支持者發表的網絡評論	10.0%	48.3%	3.48
反占中者發表的網絡評論	47.6%	16.4%	2.42

表 5：參與者對撤退的態度以及是否願意考慮組織者的意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學聯和政府官員已經進行過公開對話，在對話中，政府官員承諾會向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提交民情報告，以及在未來建設多方平臺討論政改。運動支持者對政府的提案大都感到不滿意，認為根本不算有實質讓步。而調查數據亦指出，在一個 5 分量表（1 = 絕對不會，5 = 肯定會）上，超過七成的運動參與者表示絕對不會或應該不會就此撤退。

不過，運動參與者並非沒有妥協的準備和空間。如果特區政府同意向全國人大提交補充報告，進一步闡釋香港的實際情況和表達港人對真普選的訴求，絕對不會或應該不會撤退的被訪者比例會降至 48.0%，而肯定會或應該會撤退的被訪者比例則有 17.4%。如果政府承諾立法會於十年內循序漸進至完全取消功能組別議席的話，絕對不會或應該不會撤退的被訪者比例會再降至 32.7%，而肯定會或

應該會撤退的被訪者比例則會上升至 32.4%[8]。另外，若特區政府承諾在持首選舉提名委員會產生辦法上取消公司票制度，絕對不會或應該不會撤退的被訪者比例為 31.2%，而肯定會或應該會撤退的被訪者比例則有 30.1%[9]。總的來說，不少運動參與者都會願意在局部成果出現時先行撤退。當然，亦有為數不少的參與者堅持不會因政府的局部退讓而撤離。

運動參與者到最後願意撤離與否，一方面是個人決定，但另一方面亦可能會受到不同組織和人士的意見的左右。不過，不是每個參與者都願意在運動的發展和策略問題上聽取其他組織和群體的意見。表 5 的下半部分展示相關問卷題目所得的數據。需要指出的是，問卷題目用上了「聽取」而非「聽從」一詞，因為可能極少參與者會指自己願意「聽從」組織者。「聽取」較接近「考慮」的意思。但表 5 亦顯示，接近 10% 的運動參與者連「聽取」兩個主要學生組織的意見都不願意。當然，也有接近三分之二的被訪者表示願意在運動發展和策略上聽取兩個主要學生組織的意見。

相比學生組織，占中三子較不受運動參與者支持，超過三分之一的被訪者表示不願意聽取占中三子在運動發展和策略上的意見，比願意聽取占中三子意見的比例還要高出一點。

在三個主要組織之外，較多參與者願意聽取的有自己的朋友的意見，占中支持者發表的網絡評論的意見，以及民意調查所反映的民意。願意聽取自己支持的政黨或組織的意見的被訪者不足三分之一。我們可以說，表 5 的下半部分也間接展示運動參與者對自發動員的強調。除了兩個學生組織之外，參與者其實並不太願意考慮其他組織和團體的意見，他們較願意聆聽的是沒有組織背景的群體，如自己的朋友和網民等。

為方便檢測研究二至四，我們把表 5 列出的題目合併為三個指標。第一個指標是四題關於被訪者願不願意撤退的題目的平均值 (M. = 2.51, S.D. = 0.92, α = .80)。第二個指標是被訪者願不願意聽取三個運動主要組織者的意見的平均值 (M. = 3.41, S.D. = 0.89, α = .82)。第三個指標則是被訪者願不願意聽取其他組織、人物，或群體的意見的平均值 (M. = 3.07, S.D. = 0.74, α = .83)。

表 6 總括為檢測研究假設二和三而進行的迴歸分析的主要結果。從第一欄

8 2017 年特首選舉安排跟立法會的改革相連。在現制度下，如果 2017 年特首選舉改革方案不獲通過，立法會選舉方法的改動也不會開始。所以，對支持民主的香港市民而言，其中一個接納不完美特首普選方案的原因，就是為了啟動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改革。

9 在現制度中，特首選舉提名委員會內不少界別的代表是由公司或機構作為單位選出的，公司票制度幫助中國中央政府控制提名委員會的組成，若提名委員會的產生辦法中取消了公司票制度，中央政府將較難控制提名委員會，而提名委員會亦應該更能反映民意。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2 李立峰.indd 32 2016/1/12 下午 07:27:01

可見，在多變項分析中，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對參與者的撤退意願均沒有顯著影響，但社會階層較高的參與者的撤退意願較高，這可能是因為社會階層較高者，若持續參與運動，會有較高的機會成本。另外，相比金鐘的參與者，旺角的參與者較不願意因政府作出局部讓步而撤退。更重要的是分析結果支持研究假設二：參與者的現場參與程度越高，撤退意願就越低。

統計分析中，在控制現場參與程度後，四個網絡參與和傳播行為指標中，有兩個與撤退意願有顯著關係。有趣的是，兩個關係的方向是相反的。越多進行網絡表達的參與者，撤退意願越低，但越多進行網絡闡釋行為的參與者撤退意願則越高。前者可能顯示網絡表達行為除了可以令參與者花更多時間投入到現場的占領運動中，也可能直接令參與者的態度更堅定和不願在目標上妥協。至於網絡闡釋行為越多的參與者撤退意願越高，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網絡闡釋行為主要涉及與香港以外的人士溝通，這些國內或海外人士不一定支持運動，而且可能從旁觀者的角度為參與者提供不同的觀點，從而令參與者較願意考慮妥協的可能性。

表 6 的第二欄展示跟研究假設三相關的分析結果。女性和年齡較大的參與者比較願意在運動策略問題上聽取主要組織者的意見，而旺角占領區的參與者則較不願意聽取主要組織者的意見。如假設三所預期，現場參與程度越高的參與者，越不願意在運動的發展和策略問題上聽取主要組織者的意見。

	願意在政府局步讓步情況下撤退	願意在策略問題上聽取主要組織者的意見	願意在策略問題上聽取不同人士和組織的意見
性別（2 = 女性）	.01	.11**	.09*
年齡	- .05	.23***	- .12**
教育程度	.02	- .02	- .04
社會階層	.08*	.01	.02
占領區（2 = 旺角）	- .16***	- .15***	- .07
網絡表達	- .13*	.01	- .08
網絡辯論	.00	.01	- .01
網絡闡釋	.13*	.06	.14**
手機溝通	- .04	.04	.17**
現場參與程度	- .17***	- .13**	- .19***
調整後的 R^2 值	.070***	.100***	.088***

表 6：參與者撤退態度以及是否願意考慮組織者意見的迴歸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註：數字為標準化迴歸系數。變項中的缺失值由變項的平均值取代。有效樣本數為 569。

*$p < .05$; **$p < .01$; ***$p < .001$

在統計分析中控制現場參與程度之後，四個網絡參與和傳播行為指標對依變項都沒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影響。若我們用整體網絡參與和傳播行為來取代四個個別指標，然後再次進行迴歸分析，整體網絡參與和傳播行為跟依變項會有顯著的正相關。換句話說，整體網絡傳播越活躍的參與者，在撇除現場參與程度的影響後會較願意聽取主要組織者的意見，但其相關性較弱，迴歸系數亦只是僅達致統計學上的顯著水平而已 ($\beta = .09$, $p = .042$)。

表 6 第三欄顯示有甚麼因素會跟參與者是否願意在運動發展和策略問題上聽取其他人和組織的意見相關。跟第二欄結果相同的是女性被訪者較願意聽取其他人或組織的意見，有趣的是，年輕人雖然較不願意聽取運動組織者的意見，他們卻比年長者更願意聽取其他人和組織的意見。兩個占領區的參與者在願意聽取其他人和組織意見與否上沒有顯著的差異。

現場參與程度再次和依變項有顯著的負相關：花了越多時間投身占領運動現場的人，越不願意在策略問題上聽取他人或其他組織的意見。在現場參與程度被控制掉之後，四個網絡參與和傳播指標中，有兩個跟依變項有顯著的正相關，它們分別是網絡闡釋行為以及手機溝通。如上所述，多進行網絡闡釋的參與者可能從身處國內或海外的人士中得到一些值得思考的觀察和意見。至於手機群組本身主要就是使用者跟自己的朋友溝通的渠道，多用手機群組溝通的人，對朋友以至其他人的意見也可能會較為重視。

在對研究結果進行整體討論前，有一點需先作說明，表 3、表 4，和表 6 的迴歸分析結果的 R^2 值都較低。這表示一些會影響各依變項的重要因素並未被包括在迴歸模型之內。但本文的旨趣不在於為這些依變項提供完整的理論模型，而是在於通過檢視網絡媒體傳播行為跟一些依變項之間的關係，嘗試瞭解網絡媒體傳播和雨傘運動的動態發展的關聯。事實上，影響現場參與和撤退意欲的可能因素眾多，我們沒有強力的理由預期傳播行為對這些依變項可以有壓倒性的影響。將這點考慮在內的話，從結果來看，網絡媒體傳播的解釋力並不算弱。如表 4 顯示，網絡媒體傳播和現場參與程度之間的關係是高度顯著的。在模型六中，整體網絡媒體傳播的標準化迴歸系數為 0.24，其相應的 *t*-value 達 5.74。它亦是迴歸模型中解釋力最強的自變項，如教育程度的影響力也是高度顯著的，但與其迴歸系數相應的 *t*-value 也只是 3.64。另外，在表 6 的第一欄，現場參與程度對撤退意欲的影響也頗為顯著，與與其迴歸系數相應的 *t*-value 為 3.90，也是整個模型中最高的。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2 李立峰.indd 34 2016/1/12 下午 07:27:01

柒、討論和總結

本文旨在探討並存於雨傘運動之中的不同類型行動邏輯之間的矛盾和張力，並分析新媒體在其中的位置和影響。分析的起點，是雨傘運動原本是一個有中心組織的運動，而且由於有具體的政策要求，它需要跟運動的訴求對象——即香港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進行策略互動。在這些方面，雨傘運動算是一個傳統的集體行動。但同時，不少雨傘運動參與者對運動亦有高度個人化或小組化的參與。通過人際網絡和網絡媒體的傳播和溝通，原本只屬「一般參與者」的個人可以跟認識甚至不認識的其他參與者連繫起來，自行設計及進行活動。所以，雨傘運動亦有網絡社會運動 (Castells, 2012) 和連結型行動的特徵 (Bennett & Segerberg, 2013)。連結型行動非常依賴由網絡媒體構成的傳播基建。而數據分析就顯示，雨傘運動的參與者的確在網絡上非常活躍。這並不只是指他們常常使用互聯網或社交媒體，而是指他們通過網絡媒體頻繁地進行直接跟運動有關的傳播和行動。

相比起傳統的大型集體行動，連結型行動的力量在於它給予每位參與者更大的自由和發揮空間。參與者在參與形式和行為上有多種機會和選擇，這不但有助吸引更多市民參與到運動當中，在參與者之中，連結型行動的出現亦可以加強參與者對整個運動的投入程度。以上的數據分析正指出網絡參與和傳播行為的確跟現場參與程度有正面的關係。

之前已經指出，調查是一次性的橫切面研究，並不能證明兩個相關變項中那個是因，那個是果。一個對現場占領行動非常投入的參與者，當然亦很可能會參與更多網絡媒體上的傳播和行動。不過，在一場運動的動態發展中，不同變項之間的關係最有可能是互為因果的，亦即是說，對現場占領行動參與程度高的人會更積極進行網絡傳播，而積極的網絡傳播行為則會加強或至少協助保持人們對現場占領行動的參與，正如一些傳播學者指出，態度和行為強化（reinforcement）也是一種不可忽略的傳播效應 (Holbert, Garrett, & Gleason, 2010)。再者，無論因果關係的方向為何，網絡和社交媒體讓對現場參與程度最高的參與者有自我表達和跟別人溝通的空間，這本身就對運動的延續和發展起著一定的作用。同時，回應現時文獻中的一些討論，本研究的結果也代表跟雨傘運動相關的網絡傳播行動並不只是一種懶動主義 (Gladwell, 2010)。網絡傳播行為及線下的實際行動是相輔相成的。雖然本研究只分析參與者，數據沒有顯示網絡媒體使用會否令一般市民更可能成為參與者，但正如文章的概念部分指出，在一個長時間的占領運動中，不同參與者的現場參與程度可以有很大的差異。本文的分析正顯示，參與者不會

因為多了進行網絡傳播行動，就減少到現場的參與。相反，當參與者多進行網絡傳播行動時，他們會花更多時間在現場參與和支持占領。

不過，本文的另一重點，是連結型行動邏輯和傳統集體行動邏輯之間的差異，可能使運動內部產生張力和衝突。在雨傘運動中，連結型行動帶來非中心化的力量，使得參與者與主要組織者之間的關係變得較為疏離。數據分析就顯示，現場參與程度越高的參與者，在應否撤退的問題上顯得更不願意退讓。當然，不願意在撤退問題上退讓本身並不一定是一個問題。較為重要的問題，是現場參與程度越高的參與者越不願意在運動策略問題上聽取主要組織者的意見。這很可能是連結型行動和網絡社會運動的一個特點。在傳統的運動中，投入程度最高的參與者，通常都是跟中心組織關係最密切的參與者 (Passy, 2003; Passy & Giugni, 2000)，他們應該不會更不願意在重要問題上聽取主要組織者的意見。但在連結型行動中，現場參與並不建基於參與者與中心組織的關係。在這情況下，現場參與程度越高的參與者，越可能覺得自己是一個獨立的主體，所以在運動策略問題上比較不重視主要組織者的意見。事實上，數據分析顯示，他們亦較不重視其他人士和組織的意見。

正如在分析中提到，問卷的相關問題只用上「聽取」一詞，在字義上沒有言聽計從的意思。把這點考慮在內，只有三分之二的參與者願意聽取學聯或學民思潮的意見，比例算是頗小的，而只有約三分之一的參與者願意聽取占中三子的意見，更顯示不少參與者對占領行動原發起人的不滿。運動組織者缺乏高度和全面的支持，不支持中心組織的參與者又可以很容易地透過網絡媒體發聲。而且，正如剛剛提到，對現場占領行動投入程度最高，長期駐紮在占領區的參與者，偏偏又是最不願意聽從中心組織領導的參與者，這大大增加運動組織者作決定的難度。

具體地說，連結型行動邏輯帶來的非中心化力量，使得運動組織者難以跟政府談判和討價還價。在調查研究中，我們看到不少參與者其實願意在政府作出局部讓步時撤退，但在缺乏大部分參與者的全面支持下，運動組織者難以公開提出任何折衷方案，因為提出任何方案都可能惹來運動內部的批評甚至是背叛運動的指摘。

當然，特區政府由始到終都沒有作出調查問卷中提到的假設性讓步。也許，無論運動如何討價還價，特區政府都不會讓步。另外，從較激進或最強調非中心組織的運動參與者的角度看，跟政府談判和討價還價，也許正是他們要放棄的傳統社會行動邏輯。但不管個別行動邏輯在規範意義上的好與壞，連結型行動邏輯加大運動與政府之間討價還價的難度，應該是一個合符事實的陳述。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2 李立峰.indd 36 2016/1/12 下午 07:27:01

推而廣之，雨傘運動可以作為一個案列，顯示當連結型邏輯滲入到社會運動時可能產生的影響，以及網絡社會運動要面對的一些挑戰。現時的理論和研究文獻大都對新社運模式作正面的分析和評價，強調其優點和力量。例如在談論非中心化的傾向時，現時的文獻多強調非中心化令更多人可參與運動的策劃和發展，又或令當權者更難打壓運動 (Boler, MacDonald, Nitsou, & Harris, 2014; Castells, 2012)，但對非中心化帶來的挑戰則沒有太多具體分析。本文則是依據經驗數據及觀察，指出非中心化的運動要面對的困難。

進一步說，本研究也指出當網絡社會運動和連結型行動要取得實際成果時可能會出現的困難。Castells (2012) 在討論占領華爾街行動的成果時，強調網絡社會運動不是要在短期內爭取具體的政策目標，而是要長遠地改變社會文化。但不是每一場占領運動都是最典型的網絡社會運動。香港的雨傘運動就是有具體政策目標的，所以「成敗」不能只看長遠的文化轉變（雖然文化轉變也是運動的可能影響和成果之一）。而當雨傘運動在中國及特區政府沒有具體讓步之下結束時，很多運動參與者都不能否定運動在爭取目標上的確是「失敗」了。當然，正如文章之前已經指出，影響一場運動成敗的因素有很多，例如香港是一個特區，而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民主化和普選問題有強烈的看法。在威權體制下，香港的地區社會運動力量本來就難以撼動國家層次的決策，雨傘運動沒能取得成效，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機會結構本身的問題。但本文分析亦顯示，由網絡傳播行為及連結型行動邏輯帶動的非中心化傾向，也可能是妨礙網絡社會運動爭取實際目標和效果的因素之一。這也是本文對現時文獻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網絡社會運動可以如何應對非中心化傾向帶來的挑戰？雖然這問題超出本文的範圍，而且可能根本沒有單一的應對方式是適用於每一個網絡社會運動的，但筆者也可以在這裡提出兩點想法。首先，非中心化會否帶來運動的碎裂，還是要看運動中人對主要組織者以至對其他參加者的信任程度有多高，而這就要看組織者以至社會整體本身有多少「社會資本」。在一個人們基本上互相信任的社群中，非中心化的組織型態未必會嚴重影響運動的決策效率，但在一個容易產生和傳播不信任的環境中，非中心化帶出的問題就可以較為嚴重。這也代表著社會運動要做的工作，包括如何在平常的時間與其支持者建立互信、累積社會資本。第二，非中心化的網絡社會運動始終是較新的現象，運動組織者和參與者也應該是處於一個學習如何應對的過程中。要有效地面對非中心化和自發動員所帶來的挑戰，組織者和參與者首先要在肯定這些趨勢和現象的優點的同時，不要將這些現象有過份正面或浪漫化的詮釋。

最後，筆者亦應指出本研究的一些限制。第一是以上已提及的因果關係問題，在此不贅。第二，由於研究在運動發生期間即時設計和進行，目的是對具體的運動動態作出紀錄和分析，所以問卷設計較多使用由在地觀察出發而得出的題目。這使研究結果跟其他國家的網絡社會運動的研究結果較難直接比較（不過這並不排除研究結果被歸納到概念層次時的普遍性意義）。第三，本文只分析幾個依變項，如現場參與程度、對撤退的想法等，但仍有頗多跟參與方式和政治態度相關的變項未有涉及（如參與占領區內一些主要活動的程度、有沒有嘗試動員朋友到占領區、對政府的評價、對運動模式的評價等）。這部分也會在筆者未來的其他分析文章中處理。第四，本文的分析集中在網絡媒體傳播跟現場參與程度以及對撤退的想法的關係，但並未對影響現場參與程度和對撤退的想法的因素有更系統和全面的分析，因而迴歸分析的 R^2 值亦較低。第五，量化分析可以幫助我們尋找到一些雨傘運動當中人們使用網絡媒體的模式，但個別參與者如何發揮能動性，利用網絡媒體來建構自己個人化的參與行為，則需要通過深入訪談作補充。

作為結論，我們可以指出，在網絡媒體時代，網絡社會運動和連結型行動邏輯可能會越來越頻繁地出現。但接近理想型的純連結型行動可能並不多，更常出現的是傳統集體行動和連結型行動的混合物。連結型行動對社會運動無可否認地有所助益，但對組織者來說，如何將集體行動邏輯和連結型行動邏輯磨合起來，使運動聲勢得以壯大之餘，同時保留著在有需要時帶領運動走向以及跟運動的訴求對象互動的能力，是一個社運組織者需要面對的挑戰，也是運動的支持者和參與者需要思考的問題。

參考書目

Anduiza, E., Cristancho, C., & Sabucedo, J. M. (2014). Mobilization through online social networks: The political protest of the indignados in Spai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7*, 750-764.

Atkinson, J. D. (2010). *Alternative media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stance*. New York, NY: Peter Lang.

Bagdikian, B. (2004). *The new media monopoly*. Boston, MA: Beacon.

Bennett, W. L. (2008). Changing citizenship in the digital age. In W. L. Bennett (Ed.), *Civic life online: Learning how digital media can engage youth* (pp. 1-24).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Bennett, W. L., & Segerberg, A. (2013).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11).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4*, 770-799.

Bennett, W. L., Segerberg, A., & Walker, S. (2014). Organization in the crowd: Peer production in large-scale networked protest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7*, 232-260.

Boler, M., MacDonald, A., Nitsou, C., & Harris, A. (2014). Connective labor and social media: Women's roles in the "leaderless" Occupy movement. *Convergence*, *20*, 438-460.

Boykoff, J. (2006). *The suppression of dissent: How the state and mass media squelch US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 New York, NY: Routledge.

Brym, R., Godbout, M., Hoffbauer, A., Menard, G., & Zhang, T. H. (2014). Social media in the 2011 Egyptian uprising.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5*, 266-292.

Buechler, S. M. (2011). *Understanding social movements*. Boulder, CO: Paradigm.

Castells, M. (2012).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 Cambridge, UK: Polity.

-- (2009). *Communication power*.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1). *The Internet galaxy: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et, business, and societ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n, J. M., & Lee, C .C. (1984). Journalistic paradigms on civil protests: A case study of Hong Kong. In A. Arno & W. Dissanayake (Eds.), *The news media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pp. 249-276).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Coopman, T. M. (2011). Networks of dissent: Emergent forms in media based collective action.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28*, 153-172.

Earl, J., & Kimport, S. (2011). *Digitally enabled social change: Activism in the internet a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Earl, J., Kimport, K., Prieto, G., Rush, C., & Reynoso, K. (2010). Changing the world one webpage at a time: Conceptualizing and explaining Internet activism. *Mobilization*, *15*, 425-446.

Eltantawy, N., & Wiest, J. B. (2011). Social media in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Reconsidering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 1207-1224.

Ems, L. (2014). Twitter's place in the tussle: How old power struggles play out on a new stag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6*, 720-731.

Forde, S. (2011). *Challenging the news: The journalism of alternative and community media*. New York, NY: Palgrave McMillan.

Gitlin, T.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ladwell, M. (2010). Small change: Why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weeted. *The New Yorker*. Retrieved from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0/10/04/small-change-malcolm-gladwell

Hara, N., & Huang, B. Y. (2011). Online social movements. *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5*, 489-522.

Harlow, S. (2012). Social media and social movements: Facebook and an online Guatemalan justice movement that moved offline. *New Media & Society*, *14*, 225-243.

Holbert, R. L., Garrett, R. K., & Gleason, L. S. (2010). A minimal era of media effects? A response to Bennett and Iyenga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60*(1), 15-34.

Howard, P. N., & Hussain, M. M. (2013). *Democracy's fourth wave? Digital media and the Arab Spring*.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amel, S. H. (2014). Egypt's ongoing uprising and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Is there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20*, 78-91.

Kolb, F. (2007). *Protests and opportunities: The political outcomes of social movements*. Frankfurt, Germany: Campus Verlag.

Lee, F. L. F. (2015). Social movement as civic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and understanding of civil disobedience in the Umbrella Movement.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 393-411.

Lee, F. L. F., & Chan, J. M (2011). *Media,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mass protest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The power of a critical event (Media, 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 in Asia)*. London, UK: Routledge.

Leung, D. K. K., & Lee, F. L. F. (2014). Cultivating an active online counter-public: Examining usage and political impact of Internet alternative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9*, 340-359.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2 李立峰.indd 40 2016/1/12 下午 07:27:02

Lupia, A., & Sin, G. (2003). Which public goods are endangered? How evolving technologies affect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Choice*, *117*, 315-331.

Macafee, T., & de Simone, J. J. (2012). Killing the bill online? Pathways to young people's protest.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5*, 579-584.

McCarthy, J. D., & Zald, M. N.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1212-1241.

-- (1973). *The trends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 Morristown, NJ: General Learning.

McChesney, R. W. (1999). *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dubious times*. New York, NY: The New Press.

McLeod, D. M., & Hertog, J. K. (1998). Social control and the mass media's role in the regulation of protest groups: The communicative acts perspective. In D. Demers & K. Viswanath (Eds.), *Mass media, social control and social change* (pp. 305-330). Ames, IA: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Mercea, D. (2014). Towards a conceptualization of casual protest participation: Parsing a case from the Save Rosia Montana campaign.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28*, 386-410.

Milkman, R., Luce, S., & Lewis, P. (2013). Changing the subject: A bottom-up account of Occupy Wall Street in New York City. *CUNY School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Retrieved from http://sps.cuny.edu/filestore/1/5/7/1_a05051d2117901d/1571_92f562221b8041e.pdf

Olorunnisola, A. A., & Martin, B. L. (2014). Influences of media on social movements: Problematizing hyperbolic inferences about impacts.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30*, 275-288.

Passy, F. (2003). Social networks matter. But how? In M. Diani & D. McAdam (Eds.), *Social movements and networks*.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ssy, F., & Giugni, M. (2000). Life-spheres, networks, and sustained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to political commitment. *Sociological Forum*, *15*, 117-144.

Penney, J., & Dadas, C. (2013). (Re)Tweeting in the service of protest: Digital composition and circulation in the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New Media & Society*, *16*, 74-90.

Rohlinger, D. A. (2002). Framing the abortion debate: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media strategies, and movement-countermovement dynamic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3*, 479-507.

Ryan, C. (1991). *Prime time activism: Media strategies for grassroots organizing*. Boston, MA: South End.

Small, M. (1995). *Covering dissent: The media and the anti-vietnam war movement (perspectives on the sixties serie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Tang, G. (2015). Mobilization by images: TV screen and mediated instant grievances in the Umbrella Movement.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 338-355.

Tang, G., & Lee, F. L. F. (2013). Facebook us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impact of exposure to shared political information, connections with public political actors, and network structural heterogeneity.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31*, 763-773.

Theocharis, Y. (2013). The contribution of websites and blogs to the students' protest communication tactics during the 2010 UK university occupation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6*, 1477-1513.

Thorson, K., Driscoll, K., Ekdale, B., Edgerly, S., Thompson, L. G., Schrock, A., et al. (2013). YouTube, Twitter and the Occupy Movement: Connecting content and circulation practic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6*, 421-451.

Tremayne, M. (2014). Anatomy of protest in the digital era: A network analysis of Twitter and Occupy Wall Street.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3*, 110-126.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New York, NY: Free Press.

Tufekci, Z. (2013). "Not this one": Social movements, the attention economy, and microcelebrity networked activism.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7*, 848-870.

Tufekci, Z., & Wilson, C. (2012). Social media and the decision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protest: Observations from Tahrir Squar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2*, 363-379.

Valenzuela, S. (2013). Unpacking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for protest behavior: The roles of information, opinion expression, and activism.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7*, 920-942.

Valenzuela, S., Arriagada, A., & Scherman, A. (2014). Facebook, Twitter, and youth engagement: A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of social media use and protest behavior

using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 2046-2070.

van Dijck, J. (2009). Users like you? Theorizing agency in user-generated content.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1*, 41-60.

Walgrave, S., & Verhulst, J. (2011). Selection and response bias in protest surveys. *Mobilization*, *16*, 203-222.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6(1), pp. 11-44, January 2016

Power and Strength of Networked Media and Connective Action: The Case of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

Francis L. F. Lee*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The Umbrella Movement in late 2014 was not only the largest civil disobedience campaign in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but also exhibited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ed social movement" and "connective action," including the prevalence of digital media as a tool for mobil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This article contends that digital media and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can empower a movement through allowing wider participation, but simultaneously can lead to decentralization of a movement, increasing the difficulty of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by movement leaders. Analyzing data from an onsite survey of protesters, the article shows the extent of participant participation in digital media activities. Digital media activities are found to relate positively to involvement in the occupied site, which is related to lower willingness to listen to the movement leaders regarding questions of movement strategy. The study thus illustrates both the power and challenges brought to social movements by digital media and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Keywords: networked social movement, connective action, tendency of decentralization, digital media, the Umbrella Movement

* Email: b200152@mailserv.cuhk.edu.hk
Received: 2015.06.15
Accepted: 2015.10.17

JCRP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舒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2 李立峰.indd 44 2016/1/12 下午 07:27:02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6 卷 第 1 期．頁 45-77．2016 年 1 月
DOI: 10.6123/JCRP.2016.003

從定調到解釋性界限：占中運動、商業報紙與獨立媒體 *

張讚國 **

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教授

劉娜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講師

摘要

由啟動到結束，79 天的香港占領中環運動把文化、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各方面的矛盾，全搬到檯面。在整個過程中，從定調到解釋性包裝，新聞媒體的報導和評論，特別是商業報紙與獨立媒體，都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根據田野記錄和實證分析比對，由客觀現實到媒介現實，因為運動本身被相關的主要概念定位在不相容的層面上，特別是民族主義與植根的世界主義之間的衝突，後續發展大多局限在解釋己方的立場，並打擊對方的說辭。一方面，商業報紙受到市場競爭或政治立場的影響，在話語上都極盡聳動，以操作民粹；另一方面，獨立媒體儘管提供了另類管道，視野與傳統報紙似乎差異不大，往往在夾縫中，為公民社會的理性對話與傳播，發出一點來自邊緣的吶喊。

關鍵詞：占領中環、民族主義、植根的世界主義、定調、新聞媒體

---

* 部分內容根據第一作者於 2014 年 11 月 15 日臺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提出的專題報告，與 2015 年 5 月 8 日在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發表的論文改寫。在修改過程中，謝謝《傳播研究與實踐》的編輯與兩位評審提供的寶貴建議與意見。

** Email: tkchang@cityu.edu.hk

投稿日期：2015 年 7 月 27 日
接受日期：2015 年 10 月 8 日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成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壹、前言

香港行政長官 2017 年選舉辦法（政改），在 2015 年 6 月 18 日表決當天，由於 33 位建制派議員因故離席，導致以 28 票（泛民主派 27 票）反對、8 票贊成的懸殊比數被否決，輿論大嘩，認為是鬧劇一場。隔天，《文匯報》（2015 年 6 月 19 日，頁 A06）的社評「強烈譴責」泛民派「必須承擔扼殺普選的歷史責任」，因為「港人從來沒有如此接近**『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的夢想」（粗體字為作者附加）。這篇 1,656 字的社評堅持「一人一票」就是普選，完全不提篩選候選人的機制。如此話語無疑是 Goffman (1974) 所說的定調效應（keying），延續了 2014 年 9 月 28 日「占領中環」[1] 運動啟動後，香港特區政府、中國中央政府和建制派議員及親中報紙一再為政改推銷和辯護的基本旋律。

Goffman (1974: 43) 在 *Frame Analysis* 中指出，框架分析的一個中心概念是基調（the key）。雖然文獻中大量引用了框架的概念作為理論依據，他的定調論點其實更能說明占中期間的新聞話語以及各種解釋性包裝的運用，因為很多名詞都在占領區先後出現，成為一種調子，後續的新聞報導和評論都多少圍繞在定調後的主軸上。Goffman（同上引：45）說，定調是一種系統性的轉化（systematic transformation），對被轉化後的活動也許會有輕微改變，但卻足以更改參與者對事情的說辭；定調牽涉名詞的使用與作用，「一旦一個名詞被採用後，它便開始舉足輕重，不只關係到下文，也重彈同一章節裏的相關部分」（同上引：45）。也就是說，概念的形成和陳述是一種線性的呈現，具有邏輯秩序，環環相扣，不會雜亂無章。以 2017 年政改為例，只要「一人一票選特首」被接受是普選的唯一定義或標準，任何違背或挑戰這個概念的說辭（如篩選）就很難再與普選掛鈎，更不可能用來推翻基本調子。反之，如果民主普選是參與機會的公平，特首選舉便沒有道理限制候選人的資格。這是雙方在話語上格格不入的地方：調子一旦改變，演出就不可能一樣，評鑒結果自然有差異。

由新聞報導與評論看，在話語上，泛民派以真普選界定政改的概念本質，對抗建制派「一人一票選特首」的務實操作，雙方的定調出自不同層面的考量。前者在乎的是民主普選的實質內容，特別是候選人參與和選民投票機會的均等；後者則著重大圈子的選舉與候選人的條件。換句話說，對候選人與選民在特首選舉中的角色和重要性，泛民派和建制派採取了全然不同的立場，有關政改的解決辦

1 占中運動發起人之一的戴耀廷在 9 月 28 日晚上，於金鐘政府總部附近宣布「占領中環正式啟動」。儘管中環並未出現任何占領行動，「占領中環」成為「讓愛與和平占領中環」運動的簡稱。

法因此南轅北轍，彼此的攻防策略和民意動員也就脫離不了民粹的運用。一個值得探討的難題是：在政改引發的占中過程中，運動本身如何被定調，正反雙方的解釋性話語又如何區隔彼此間的調子差異？因為牽涉廣泛，本研究的基本主張圍繞一個理念：社會運動往往被認為會影響社會秩序或安定，而造成兩者之間有所相關的一個重要變數是新聞媒體，尤其是它們透過不同報導和評論包裝一個特定的社會現實。

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出發，並以「占領中環」為調查個案，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二：第一，透過田野記錄，再比對話語分析，檢驗占中過程中，商業報紙與獨立媒體如何競爭或互補，尤其是獨立媒體是否足以充當替代管道，提供另類視野；第二，根據新聞和評論，探討商業報紙在公民社會裏的演出與情境的關聯，特別是解釋性話語的界限，以及這個界限引發的抽象範疇。儘管占中早已結束，而 2017 年的政改也塵埃落定，即使香港本身是特例，這個中國特別行政區依然是研究政府、媒體與公民社會互動的理想場所。首先，它的內在矛盾為占中源起提供了一些參考背景。

貳、矛盾的香港社會

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與世界大都會，香港充滿矛盾。文化上，中國傳統文化（如天后廟）與西方文化（如皇后大道）的符號與象徵隨處可見，在街頭上同時共存。有形文化的不協調，大致容易解決，影響不大；無形文化的衝突，尤其是認同所造成的，就足以左右個人心理與社會集體的歸屬，很難在短時間內消弭。

從 1997 年回歸中國後，港人的身分定位開始出現對立，至少形成「香港與內地不同」的感受，在國家認同上也跟著搖擺不定。依 2014 年〈香港人的身分與國家認同〉調查，8.9% 的香港人認為自己是純粹「中國人」，遠低於 1997 年的 32.1%，更是歷年來最低。純粹是「香港人」的比例則由 2008 年最低的 16.8% 上升到 2014 年的 26.8%，僅次於 1998 年的 28.8%（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2014），顯示近年來香港人本土意識逐漸增強，對「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也相對下降。在中港文化差異指數方面，1996 年至 2002 年，雙方基本上沒有太大不同，但從 2010 年後，指數呈明顯上升趨勢，兩地文化差異有擴大的傾向。

其實，這種文化差別存在已久，一旦反映在話語或舉止上，雙方難免出現過度的非理性反應，如民族情結。2012 年 1 月 20 日，因為一個中國小孩在港鐵車廂吃麵引起的網路口角，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孔慶東在電視上辱罵港人是英國殖

民地的走狗，甚至是狗，無疑是民族主義作祟。2012 年 2 月 1 日，「香港人，忍夠了！」的全版廣告在《蘋果日報》刊登，用字遣詞極盡揶揄，更暗示中國人是「蝗蟲」，同樣是聳動的情緒宣洩，把街頭上的零星磨擦提升到公共領域，加深雙方的緊張關係。在占中期間，反對的一方也往往把話語提升到民族主義的層面（見下文）。

經濟上，香港極端自由，連續 21 年被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香港政府新聞網，2015 年 1 月 28 日）。儘管市場相當活絡，資本也自由流通，經濟發展的結果，並未帶來所得的合理分配，貧富懸殊極大。據香港 2011 年人口普查報告，堅尼係數（Gini Index）由 2001 年的 0.470 上升至 2011 年的 0.475； 2011 年，最高收入組別每月收入中位數為最低收入組別的 15.4 倍，比 2001 年的 12.9 倍高，十年間高低收入群體間的差距已逐年擴大（香港政府統計處，2012）。2012 年特首選舉期間，候選人唐英年因為 2,400 平方呎「地下皇宮」違建，鬧得全城沸沸揚揚。相對於有錢人富可敵國，低收入家庭只能居住在不到 200 平方呎的劏房。這種經濟上的不正義不免造成精英和普羅大眾的隔閡與疏離，時間久了，往往滋生不滿和怨恨，形成草根社會運動的動力之一 (Gamson, 1968)。

政治上，香港從未實施過民主。在港英時期，總督由殖民政府指派；主權移交後，特區行政長官由 1,200 人的選舉委員會選出，再由中央政府任命。這個小圈子由四大界別的代表組成：工商／金融界、專業界、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界，以及立法會議員／區議會議員代表／鄉議局代表／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代表。因為圈子小，政治操控的範圍就相當大，特別是來自北京的壓力。立法會議員的產生也非民主，現有 70 個議席中，35 席由功能界別選出，其餘由地方選區直接選舉。以 2015 年立法會為準，建制派有 43 席，泛民主派為 27 席，在政治議題上，大致左右對立，中間派根本沒有多少生存空間。因為分別計票，一般法案是否通過，取決於兩組議員過半數而定。泛民派在直選議員中占 18 席，足以否定任何不喜歡的議案。政改是重大議案，必須獲得全體議員三分之二的支持，才可通過。泛民派的 27 票已超過三分之一，政改被否決並不意外。

與貧富懸殊及代理政治有關，香港精英和普羅大眾分屬不同群體，社會等級劃分明顯。反映到其他社會階層，政治精英的態度不僅偏差，甚至傲慢。有關 2017 年政改，行政長官梁振英 2014 年 10 月 20 日接受《金融時報》、《紐約時報》及《華爾街日報》訪問時指出，若實行公民提名，政府政策將由每月收入低於 14,000 港元的一半勞動人口主導 (Bradsher, 2014, October 21)。如此論調顯示

統治階層對低產階級的不信任，以及政治精英對富豪和財團利益的極力維護。在占中運動中，公民提名是明顯的標語之一，梁振英成為眾矢之的，事出有因。

在媒體傳播方面，根據文獻和實證分析（李少南，2015；黃天賜，2013；蘇鑰機，2012），在保守親共和民主反共的政治光譜上，香港 18 家報紙的政治立場已逐漸朝北京傾斜，差別頂多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分（圖 1）。站在民主反共一端的媒體有《蘋果日報》、《am730》（免費報）和《明報》。最近幾年，《明報》一直是北京招降的對象。2014 年 1 月 6 日，《明報》總編輯劉進圖遭撤換，由馬來西亞人鍾天祥取代，引起內外極大震撼，很多人擔心《明報》終將失去捍衛香港新聞自由的立場，只剩《蘋果日報》獨撐自由派的場面（黃偉國，2014）。不過，在占中期間，《明報》的新聞和言論還不至於左傾，因為讀者對象又不同於《蘋果日報》的升斗小民，而以知識份子為主，《明報》在標題和內容上也未見嘩眾取寵，多少替香港報紙保持了一點尊嚴。

另一方面，從 1950 年起，《文匯報》和《大公報》是中共在香港的喉舌，與《香港商報》被合稱為「三大左報」。介於兩個極端之間的 12 家報紙則分屬中間偏左或偏右，但大部分已相當左傾，尤其是《東方日報》和《星島日報》。因為報紙遭受政治壓力或自我審查的情形嚴重，香港新聞自由的程度已相對萎縮。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2015）世界媒體自由度報告，香港名列 199 個國家／地區中的第 83 名，屬於半自由狀態；相比之下，臺灣列 48 名，處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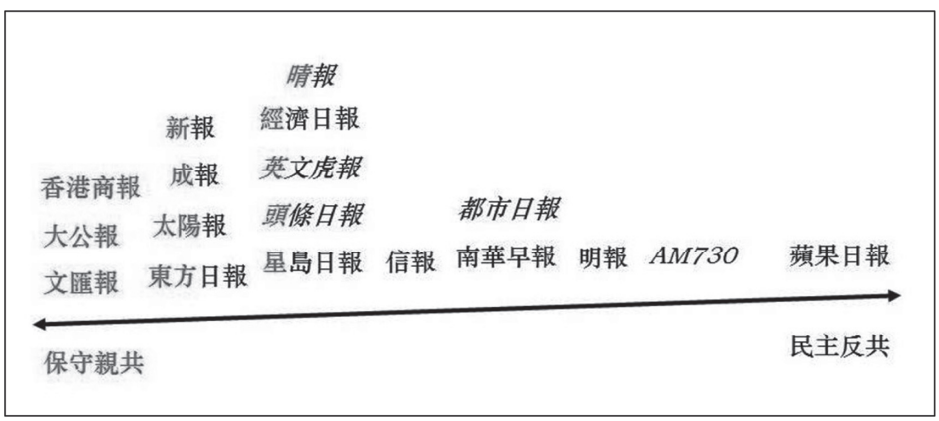


圖 1：香港主要商業報紙的政治光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李少南（2015）、蘇鑰機（2012）、黃天賜（2013）。
註：斜體字的報紙為免費報。《虎報》和《南華早報》為英文報紙。《新報》於 2015 年 7 月 12 日突然停刊。

由狀態，中國則位居第 186 名，幾乎殿后，毫無自由可言。無疆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的 2015 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也顯示相同結果：香港位列 180 個國家／地區中的第 70 名，臺灣第 51 名，中國第 176 名。

一般來說，大眾傳播媒介很少對社會運動友善，通常也不受運動本身的任何控制；社會運動想在媒體中曝光須要花費大量金錢和時間，除非做些聳動或愚蠢的事 (Stewart, Smith, & Denton, 1984)。2014 年 3 月臺灣立法院被太陽花運動衝占，驚動四方，新聞媒體也隨之起舞。2014 年 9 月香港占中運動癱瘓幾條主要街道，不僅讓媒體難以迴避，更使報紙的政治立場表露無遺。一個獨特的現象是，親共報紙除了指控占中引發各種街頭衝突外，還明目張膽打擊異己。最突出的是《蘋果日報》負責人黎智英，他帶頭發起抗爭，並在金鐘占領區設有帳篷[2]。親中報紙透過新聞報導和評論，指名道姓的咬定黎智英是「幕後黑手」和「最大金主」，從而抹黑《蘋果日報》的角色。據「壹傳媒股民」洩露的內部文件，黎智英提供幾百萬金援給參與占中的相關人士和政黨，（頭條日報，2014 年 10 月 7 日，第 P01 版）。儘管是事實，「幕後黑手」和「最大金主」的標籤卻是價值判斷與推論。《蘋果日報》絕口不提黎智英是否「幕後黑手」或「金主」，證實狗不咬主人的諺語；倒是《大公報》、《文匯報》、《香港商報》和《東方日報》用了不少篇幅批判。有關「幕後黑手」的 243 篇文章，《東方日報》就占了 91 篇（37.4%），而在「金主」方面的 238 篇報導中，有 110 篇（46.2%）出自三家左派報紙。從大眾報的市場來看，《東方日報》與《蘋果日報》顯然是競爭對手，激烈的讀者爭奪難免引起趁火打劫或落井下石的動機。

長期以來，香港在文化、經濟、政治、社會與媒體等方面都有明顯而廣泛的分歧。占中運動不過把這些衝突全搬到檯面上，更弄到國際舞臺。從遠因和近因看，占中並非突發事件。第一，自 1997 年以來，香港社會貧富不均，缺乏民主普選，而且官民對立，累積了不少民怨與不滿，如 2003 年 50 萬人走上街頭示威，反對基本法 23 條立法，以及每年六四的維多利亞公園燭光晚會和七一遊行等。在相當程度上，占中只是承繼過去一連串的社會運動，進而提升到公民不服從的抗爭層面。

2 作者之一在金鐘占領區兩度（2014 年 10 月 3 日與 12 月 9 日）訪問黎智英，他認為新聞媒體是香港社會撕裂的因素之一，包括《蘋果日報》。他在 12 月 9 日說，「……我可能覺得我們自己的媒體也走得太極端，也說不定。這個社會撕裂這麼大，其實作為媒體應該要比較溫和一點，現在要走向溫和一點，因為整個社會這麼撕裂，作為媒體不能夠把社會再推到更撕裂的方面去」。本研究有關前臺和後臺的主張，主要依據黎智英的說法和《蘋果日報》與其他報紙的相關觀點所做的推論。黎智英承認他是運動發起人之一，比對他的說法、作法和《蘋果日報》的實際操作，雖然缺乏直接證據，一個合理的推測是，黎智英的立場影響到新聞室的運作。同樣道理，如果沒有後臺管理階層的默許或支持，《東方日報》對黎智英的指名攻擊也就難以想像。

第二，占中構想始於 2013 年 1 月，利用公民抗命為手段，計劃占領香港金融區中環的交通要道，以爭取 2017 年行政長官普選。2014 年 8 月 31 日，中國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特首選舉辦法，決定由提名委員會先選出二、三人為候選人，再讓選民一人一票選出。這一篩選機制是中央的基調，一方面否決了候選人和選民參與機會的均等，另一方面也確定特首不會跟北京唱反調，亦即拒絕了泛民派所要求的民主普選，埋下開啟占中運動的導火線。占中發起人之一戴耀廷形容人大的決議結束了所有對話，宣稱香港正式進入「抗命時代」（明報，2014 年 9 月 1 日）。從 2014 年 9 月到 12 月，香港社會紛擾不已，即使在政改於 2015 年 6 月被否決後，餘波依然蕩漾。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占中的社會效應與意義仍有待在理論和實務上深入疏理，尤其是定調與各種解釋性包裝出現的脈絡過程。在這方面，知識社會學提供一個理論的出發點。

參、知識社會學

分析香港占中運動、商業報紙與獨立媒體之間的關係，因為涉及層面廣泛，許多理論視野可以提供對事實的解釋。這些視野看似各自獨立，其實都可以放到能動性（agency）和結構（structure）的互動過程中去剖析和探討。能動性屬於個人層面，結構往往與社會或制度的安排有關。

就結構來說，不提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占中的幾個占領區毫無疑問是前臺，人來人往，很多是看熱鬧的遊客。各種運籌帷幄無疑在後臺進行，能夠窺探占中內部決策的觀眾到底絕無僅有。正因為後臺深不可測，反對的人大多認為占中不是廣泛的社會問題，而是「占中三子」（戴耀廷、陳健民與朱耀明）策動的個人麻煩，畢竟這個名詞隱含一種定調：三人作亂於中環。《成報》（林翰觀，2014 年 12 月 5 日，第 A11 版）一篇讀者投書就指責他們「以代表民意為幌子興風作浪」，質疑他們能代表多少香港「600 萬同胞」。從 2014 年 9 月 29 日到 12 月 16 日，18 家報紙在 2,015 篇文章中使用了「占中三子」的稱呼，平均每家 112 篇，每天一篇多。同樣道理，特首梁振英帶頭指控占中與外國勢力勾結，除了彰顯民族主義外（見下文），更暗示運動是極少數人帶來的外在麻煩，並非內在結構出了問題。因為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受到威脅，解決之道是依法懲處帶頭示威的人，而非檢討現有政治結構剝奪港人公平參與機會的缺失。以法律解決政治不民主、不公平引起的社會問題，在一國兩制架構下，加上欠缺普選和民意監督，是香港集權傾向與公民社會不彰的主因。

占中是群眾力量的動員，以占據公共空間表達人民對政治改革的要求或直接參與，如公投。占中因此是民粹政治的街頭實踐，代表一種社會動員的形態與運作，不以法治或民主程序為依歸。不論概念或操作，民粹很難有放之四海皆準的共同定義與指標。基本上，它涉及人民、心理認同、民主與政治空間等相關理念及行動 (Laclau, 2005)。唯一確定的是，不同定義都以「人民」或「全民」（the people）為根本概念，任何以人民利益或福祉為出發點的主張都算是民粹，特別是針對建制或權力精英而提出的草根訴求，至於人民是誰，又如何界定，則是另外一回事 (Eco, 2007)。政治學理論家 Laclau (2005) 在《論民粹主義者理性》中指出，「民粹不可能以人民或全民（the people）為計算單位，它的對象永遠小於整體，因此勢必把社會一分為二：我們與你們的兩個不同陣營，或者朋友與敵人的區隔」（端木少華，2013 年 8 月 19 日）。民粹既然與人民有關，大眾傳播媒介又是動員群眾的有效管道，從發動，到擴散，終至結束，不管時間長短，社會運動的成敗，尤其是大型的抗爭，便都和新聞媒體不可須臾，包括定調、形象塑造與民意的把握及運用等 (Eco, 2007; Gitlin, 1980; Mazzoleni, Stewart, & Horsfield, 2003; Peri, 2004)。定調，依 Goffman (1974) 的論點，是一種創始的設置，為後續的相關發展提供一個特定的迴旋空間，也難怪在占中期間，無論支持或反對，香港報紙的新聞及評論儘管出現不同的解釋性話語，整個包裝其實都框限在固定的範圍內，以操弄民粹，企圖左右運動的發展與走向。

本研究的理論視野主要根基於知識社會學 (Mannheim, 1936) 和社會現實建構理念 (Berger & Luckmann, 1966) 的宣稱。理論上，知識社會學主張，不論是日常生活或科學領域，概念、觀念、看法和作法——亦即思考模式——不會自然發生或出現，而是特定時空的產物，受到情境的界限。具體說，指引一般人和專家如何看待與理解現實的獨特思想方式，通常都受到外在因素的塑造，尤其是他們所處的地理和社會位置，以及因而形成的個人經驗和知識。這些位置並非存在於真空，而是更大環境的一部分，它對一個社會的成員，在此時彼時或此地彼地的領會上，具有永久化和社會化的作用。從知識論的角度看，正因為知識社會學嘗試闡明文本與情境的互動，以及對知識產生的影響，它的理論體系會特意關注概念流通的代理機制或設置，以及當道的知識探查方法和表達渠道在社會中的自由程度如何 (Mannheim, 1936: xxix)。在現代社會的傳播過程中，代理機制或設置當然包括報紙和其他媒體，它們站在耳目的策略性地位，建構個人經驗的所見、所聞與所思，特別是未能親臨的場景。

社會現實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是知識社會學的一套理論視

野，基本宣稱是，儘管客觀現實先獨立存在於觀察者的見聞之前，也不取決於個人的主觀意願，縱然是可知的，但是因為缺乏一對一的明確文字，觀察者很難經由不偏不倚的方法進行觀察、描述和解釋，現實因此是建構後的一種呈現。透過經驗，人們對確定的事實會形成一種知識，成為日常生活中認識世界的共同基礎 (Berger & Luckmann, 1966)。知識社會學的貢獻在於區分哪些知識被認為是理所當然（taken for granted），從而被接受、儲存和傳承（同上引）。依據 Park (1940) 的分類，知識有相識或熟悉知識（acquaintance with）和深切知識（knowledge about）兩種。前者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獲得的親身或第一手知識，來自個人對外在世界的直接體驗與觀察，因此往往很難經由正式表述而推論到他人經歷，成為常識（common sense）（同上引）。後者則指「根據調查者的目的，對事實加以檢驗、標註、組編和透過某一框架界定」後 (Park, 1955: 74)，而形成的「正式的、理性的與系統的」知識 (Park, 1940: 672)。基於對客觀世界的實證和明確的觀察與分析，並經過檢驗，這種知識在效度上具有確定性，因此可以分享、流傳和延續。

新聞報導跟社會科學研究一樣，都屬於深切知識，因為新聞也選取事實，並透過某種視野（如旁觀者），對社會現實進行報導與分析。從客觀現實到媒介現實，再到主觀現實 (Altschull, 1995)，新聞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瞭解社會現實的結構與過程，被視為是社會知識的一種形式。新聞在社會中擴散和被討論的幅度及範圍，便決定社會成員參與政治行動的程度 (Park, 1940)。由於難以自外於地理、政治或商業情境，在占中期間，香港報紙的報導固然基於事實，但對事實的詮釋卻多少假借「港人」之名，從而為權勢與財團服務，話語遂不過是達成政治目的或維護商業利潤的工具。《東方日報》和《大公報》嚴詞批判《壹傳媒》老闆黎智英，或者《蘋果日報》由觀察者變成參與者，都是不爭的例證。

黎智英直接參與占中，不僅為 Goffman (1959) 的舞臺概念提供一個明確注腳，也為《蘋果日報》的報導和評論點出詮釋的取徑。就新聞分工來說，記者是前臺演員（採訪和報導通常由他們進行），編輯則是後臺導演（新聞刊登與否、版面位置和大小由他們決定），演員與導演各司其職，各占其位，而前臺和後臺必須密切搭配，同時遵循共同的遊戲規則（新聞室規範），一場戲才能順利演出。如果角色錯亂，或由後臺跑到前臺，演出將荒腔走板。在占中期間，從報導和評論的走向看，一個合理的推論是，管理階層多少不分前臺和後臺的界限，模糊了政治與新聞場域的不同。黎智英公開上臺，在金鐘占領區擁有一個帳篷，又接受各地媒體訪問，顯然是赤裸裸的表白，一般人都不難看出他演的是什麼角色。報

老闆粉墨登場，《蘋果日報》沒有任何負面報導，甚至在將軍澳的大樓懸掛「我要真普選」的巨幅標語，在在展示報社的立場，也就不足為奇。對媒體管理階層如何干預新聞報導的過程和手段，Breed (1955) 在「新聞室的社會控制」中有精辟的見解和分析，香港的媒體恐怕也若合符節。一旦後臺人物堂皇的走上前臺，公然進入大眾視線之內，媒體就不再是旁觀者，而是參與者，在意見的自由市場裏，具有雙重身分：裁判兼球員。在這方面，香港獨立媒體與《蘋果日報》差別不大。其他報紙固然不像《蘋果日報》在行動上採取實踐主義，它們的話語也相去不遠，如左派報紙和《東方日報》，這是香港公民社會的奇特現象。

占中既然是社會運動，就與公民社會息息相關。依 CIVICUS: World Alliance for Citizen Participation 的定義，「公民社會是機構、組織與個人的領域，介於家庭、國家和市場之間，在這個領域裏，人們自願結合，以促進共同利益」(CIVICUS, 2012: 8)。從 1993 年起，CIVICUS 致力於推動全球公民社會的發展與公民參與，在 2003 到 2006 年與 2008 到 2011 年間，分別針對社會結構、環境、價值及效果四方面，進行各國公民社會指數（Civil Society Index）調查，各項指標與總分越高，公民社會的發展就越健全，包括 2003 到 2006 年間中國、香港和臺灣的數據。

從公民社會指數看，臺灣的發展都高於香港和中國。在全部 49 個國家／地區中，臺灣排名第 7，香港第 21 名，中國第 38 名（張讚國，2013：76）。整體來說，中港臺三地的公民社會發展都有待在結構與環境方面加強，例如，增加組織成員數量及捐款，改善立法、政治、經濟及文化環境，以幫助公民組織成長等。以香港為例，港人參與政治活動的情況是，象徵性或口惠的多於實際行動。依香港警務處 2015 年統計，公眾遊行與集會活動的次數由 2005 年的 1,900 次增加到 2014 年的 6,818 次，升幅為 258.8%。不過，據香港公民教育委員會 2012 年發布的《2010 年公民意識研究》報告，政治參與人數儘管有所成長，但比率不高，最多占三分之一，而且以簽名活動為主；參加集會，甚至上街遊行或示威的只在百分之六上下，即使是參與政府咨詢活動的比率也很低（公民教育委員會，2012）。

公民社會的概念在香港流行，開始於 2003 年七一遊行之後，「那次遊行是社會一次總動員，民間團體、民主派政黨和媒體『名嘴』號召了 50 萬人上街，成功迫使政府擱置《基本法》二十三條（國家安全）的立法」（陳健民，2011：23）。從數量看，自發性的公民團體不少，但成員不多。就質來說，大部分都屬於宗教、社會服務、同鄉聯誼等活動，或關注具體利益和實際政策，未必牽涉廣泛的公共事務或政治議題。另外，由於網絡社會迅速發展，許多公民團體去中心

化或單一議題化，導致結構鬆散，會員人數難以穩定成長，而社會動員能力也有限。較為固定的社會活動主要是每年的六四和七一遊行，這些都已制度化或儀式化，但訴求主題卻包羅萬象，從維護人權、自由民主、到反對官商勾結等，不一而足。整體而言，香港公民社會還算蓬勃，但話語多於行動。

占中，是香港回歸 18 年來規模最大和時間最長的一次社會運動，成千上萬的人上街遊行、示威、靜坐、抗命，幾個地區（金鐘、銅鑼灣和旺角）的幾條街道被占領。從 9 月 28 日發動，警方以催淚彈和胡椒水武力驅逐示威者後，警民衝突不斷，運動名稱也演變為「雨傘運動」或「雨傘革命」，雨傘成為抗爭的象徵。以香港獨立媒體為例，在運動前 65 天，「占領中環」是主要的新聞標籤，從 12 月 3 日到清場的 12 月 16 日，「雨傘運動」則成為這 14 天的主要新聞標籤。跟其他媒體一樣，這種定調轉變與後續的話語邏輯是本研究分析的重點。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量化與質化方法並重，輔以田野調查材料，分析占中運動與媒體報導的關係。在占中期間，作者之一平均一星期便實地探訪金鐘、銅鑼灣和旺角三個占領區，除了觀察不同階段的運動形式與內容變化，還拍攝了大量照片與影像，記錄現場標語、海報、貼紙與其他文本等。受制於警方封鎖線與占領區突發事件難以掌握的狀況，我們的實地觀察儘管產生了某種熟悉知識（acquaintance with），卻頂多是街頭上眾多話語和行動的切片，不可能是完整現實。儘管如此，我們相信，從客觀現實到媒介現實，這些話語和現象多少可以作為一個基線。從田野記錄中，我們選取主要的標語代表現場所見的運動調子（如「雨傘革命」、「我要真普選」和「外國勢力」等）、抗爭的對象（如中國人大）、議題（如愛國愛港和基本法）或訴求（如公投）等，再加上實地觀察到的其他主要字眼，當作關鍵詞，搜尋媒體的相關報導，用來比對新聞和評論如何包裝和再呈現占中運動。這種連結的基本假定是，有關占中的許多概念都先出現在街頭的抗爭中，那是客觀現實，再由新聞報導與評論，轉化為媒介現實。後者的解釋性包裝（見下文）除了闡述事實，也可能產生反制的概念，從而影響到運動本身的回應、調整或防禦等行動。整個交互作用的過程雖然不易具體呈現，卻無疑在客觀事實與媒體的社會建構中不斷進行。

除了田野記錄，本研究的數據主要來自惠科新聞電子剪報資料庫（WiseNews）。資料庫收集了商業媒體（報紙、雜誌和網站）有關占中的文章，

包括新聞、社論、專欄、評論和讀者投書。本研究關注的並非文章類別的差異，而是整體趨勢，以及標語、符號、範例和聲明等設置，如何拼裝成一套相互結合的話語體系。首先，在量化方面，本研究以「占中」為關鍵詞搜索文章[3]，從2014年9月29日（占中啟動後第一天）開始，到12月16日（清場後隔天）結束，79天共有23,534篇報導和評論。其次，本研究分別以「雨傘運動」、「占領中環」與「雨傘革命」三個關鍵詞，在香港獨立媒體網[4]上檢閱有關報導，共計2,088篇。最後，本研究以「獨立媒體」為關鍵詞，收集被商業報紙引用的香港獨立媒體網的報導，剔除15篇不相關的文章後，共得51篇。雖然占中期間有少數網站和社交媒體參與報導，如《熱血時報》、《社會記錄頻道》和臉書等，多少發揮了資訊、傳播和號召的功用，它們往往以單一議題或突發事件為主，缺少整體、長期和系統化的報導，不像成立10多年的「獨立媒體（香港）」已經成為一種制度，在公民社會中多少形成氣候。

在商業媒體之外，獨立媒體是唯一不受財團控制或官方影響的公民新聞媒介，2004年起，依賴小額贊助運作，以香港獨立媒體網為操作平臺，主要內容包括文字和圖片，影像報導很少，目前每年的經費大約90萬港元，維持四個固定員工和其他必要開支。在占中期間，獨立媒體網每天平均的獨特訪客從2014年初的6,000人，增加到年底的50,000人，高峰時，則達到每天200,000人（葉蔭聰，通訊訪問，2015年9月6日）。這些數據說明，儘管獨立媒體的平常讀者並不多，有關占中的報導或許與商業媒體不相上下。

在質化方面，本研究採用Gamson & Modigliani (1989: 2)提出的「解釋性包裝」（interpretive package），以探討新聞話語的主題、相關用詞、內在結構及闡釋的邏輯關係等。一個解釋性包裝隱含一個整體的、中心的話語框架與幾個次包裝（sub-packages），用以顯示圍繞同一個故事主線的豐富話語變化 (Gamson & Stuart, 1992)。每一個解釋性包裝都牽涉框架設置（framing devices）和推理設置（reasoning devices），前者指示如何思考議題，後者則建議可能的後果和解決方案 (Gamson & Modigliani, 1989)。框架設置可以是隱喻、例證、標語、描述和視覺影像等方式，其作用大抵跟Goffman (1974: 45)所說的定調效應很類似：同樣

3 數據搜索時間為2015年2月2日與7月10日，以報紙為主，文章都不重覆。

4 香港獨立媒體網的官方網址：http://www.inmediahk.net/。由於獨立媒體網將占中報導以不同標籤歸類，本研究選取了與占中運動最為相關的三個標籤：「雨傘運動」、「占領中環」及「雨傘革命」。其中，「占領中環」是最常用的標籤，占總數的74%。以「雨傘運動」為標籤的報導為22%，且主要集中在12月3日至16日。以「雨傘革命」為標籤的報導只占4%。

的調子可以在不同場合演出；推理設置則涵蓋原因分析、結果及一系列的道德要求和應對辦法等 (Gamson & Modigliani, 1989)。本研究著重商業報紙有關占中報導的中心話語框架與相關的次話語包裝，涉及報導標題、關鍵詞、主題句、邏輯關係等方面的分析。這些都以特定文本和不同情境做整體建構，包括田野記錄。我們的主張是，在占中過程中，定調是一種宏觀敘述（master narrative）的設置，把複雜的社會現象濃縮到相當抽象的概念上，甚至是最高的層面。本研究借用了 Hayakawa (1964) 的抽象梯階（ladder of abstraction）概念，把最抽象的層面定義為「解釋性界限」，後續的各種話語難免受到這個概念的框限，都在較具體的層次企圖解釋定調的意義（解釋性包裝），或排斥其他可能的挑戰性概念，即使話語再多元，換湯不換藥的大原則並未動搖，從而形成一種各說各話的喧嘩局面，其間夾雜太多老調重彈。

伍、研究結果

根據田野記錄，在占中期間，整個占領區充滿各種聲、像、圖、文的情緒宣洩和主張，特別是針對人（如行政長官梁振英）、事（如警察暴力）、物（如雨傘、連儂牆）的大量符號或標籤。這些符號的出現具有不同作用，依 Bennett (1980) 分析，符號有兩種，一種是指示性的，直接了當，不帶任何情感或價值判斷，如金鐘的地點指示牌；另一種是濃縮性的，因個人感受或經驗，而引起不同想像或反應，如「革命」或「亂港」。無論是指示性或濃縮性，簡約的文字或圖像往往指示不同的基調。從金鐘、銅鑼灣到旺角，最常見的是與雨傘有關的貼紙、圖案或雕塑，不管是即興或有意創作，都相當具有想像力和渲染性。其中幾個突出的概念，尤其是真普選，都在運動期間於不同地區被大量傳單、貼紙和布條廣泛流傳。由此而引出的各種正反雙方的解釋性話語，也以辯證方式，從占領區的公共空間延伸到公共領域，由局外到局內，在支持和反對的陣營中，持續出現，用意不外把占中定位於符合本身目的基調上，並透過相關標籤的整體包裝，取得說服與推銷的社會效應。至少新聞媒介的報導和評論全受到定調效應的影響，脫離不了調子所界定的範圍。

一、街頭現實與媒介現實

有關「雨傘革命」和「我要真普選」的大型標語和布條是占中地區出現的客

觀事實。2014 年 9 月 28 日警方以催淚彈和胡椒水攻擊示威人士後[5]，雨傘成了抗爭和防護的象徵，西方的新聞報導最先使用「雨傘革命」一詞，在占領區，黃色雨傘更是公民抗命或不服從的標誌。不論支持或反對，從 9 月 30 日起，除了主要用語「占領中環」外，香港報紙開始使用「雨傘革命」字眼，到 12 月 16 日，共有 1,202 篇文章提到，平均每天 15 篇。新聞報導關鍵詞的使用變化，應驗了 Goffman 的定調效應，即一個概念被引介後，會影響相關文本的思路與後續發展，也透露可能的用意。在街道的公共空間，「雨傘革命」的布條高掛在醒目的地點，如行人天橋，更多的大小貼紙則散落在不同角落，為運動打氣；在新聞媒介的公共領域裏，「雨傘革命」的字眼取捨也反映出個別媒體對事實的價值判斷。《蘋果日報》無疑對革命的推理深感興趣，發布了 604 篇，占總數的 50.2%，遠高於其他個別報紙的總和（《明報》只有 72 篇）。由 10 月 2 日到 12 月 1 日，《蘋果日報》還特設「雨傘革命」專頁。10 月 1 日的頭版標題引用了中國國歌的開場白——「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一副革命即將爆發的聳動，更是觸目驚心。「雨傘革命」的用語源自發生在東歐和中東的「顏色革命」（1,084 篇），反映出一種由外而內的話語邏輯關聯。

另外，在金鐘政府總部附近的占領區，只要是牆壁，幾乎都貼滿了大小不一的紙張，特別是添美道上的「連儂牆」，由最早的零星貼紙到最後的密密麻麻，五顏六色，每一張貼紙都代表一個自發的心聲，大都是對自由民主的渴望或對占中的支持。其實，連儂牆的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效用，類似港人參加簽名活動一樣，表達了心意，卻未必導致實際參與占領街頭的行動。更多時候，這道牆是個「聖地」，成為許多港人朝聖或遊客拍照的地點。報紙在這方面著墨不多，只有 144 則報導或評論提到連儂牆，左派報紙——《大公報》、《文匯報》和《香港商報》——則避而不提。理由或許不難理解，跟 1970 年代末期北京的「西單民主牆」一樣，「連儂牆是一種民主的表述形式，人人都可參與」（朱虜穎，10 月 10 日，第 A07 版）。

人人可參與的民主表達方式也反映在街頭上，針對特首梁振英，各種謾罵、詛咒、譏諷、醜化和調侃的文字、符號和圖案，張貼在牆壁上，到處可見，尤其是「狼英」的形象，暗示梁振英的奸詐狡猾。與這些批判圖文相關的，是許多要求梁振英或 689（梁振英的得票數）下臺的標語和貼紙。這個街頭現實卻在媒介現實中被大部分報紙忽略，在 131 篇文章中，除了《蘋果日報》（125 篇，

5 除非特別註明，下文的所有日期都發生在 2014 年。

95.4%）、《信報》（3 篇）和《明報》（1 篇），沒有其他報紙使用「狼英」的標簽，倒是獨立媒體至少有 30 篇文章用了這個字眼。不過，「梁振英下臺」的用語出現在 700 篇文章裏，如此差別反映的是，在占中報導上，新聞媒體對濃縮性和指示性符號，有意取捨。「狼英」是頗為負面的評斷，《蘋果日報》和獨立媒體的表現一方面含有實踐主義的味道，另一方面則凸顯了民粹操作：民之所惡，惡之。反之，亦然。

放在知識社會學的範疇裏，上述幾個例子所顯示的比對差異——客觀現實與媒介現實的脫節——都跟研究者和新聞記者在不同時間與地點的觀察有關。占中是同一件事，卻因時空帶來的不同經驗，而有不同感受和意義。理由之一是，人都有立場，事都有角度。新聞很難忠實捕捉瞬間即逝的街頭現實，報導是記者透過某種視野，特別是新聞價值的判斷，經過取捨、編排、濃縮或誇大，對事件局部的再呈現，很多時候是根據二手資訊，不可能一對一的完整記錄。立場受到地理或心理位置的影響，記者站在高處往下看，與蹲坐在地面，不可能看到相同的景觀，新聞就有見林或見樹的分別。「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便是視野受地理位置的局限。心理上，意識形態（《蘋果日報》的記者和編輯不可能不知道黎智英的占中角色）多少會支配新聞記者的觀點，並折射在內容的選取與報導上。兩者交錯的結果，可從新聞文本的解釋性包裝看出大概，香港商業報紙和獨立媒體的新聞報導提供了另一套對比的數據。

二、商業報紙與獨立媒體的比較

在占中期間，商業報紙共刊登了 23,534 篇有關運動的文章，平均每家 1,470 篇，每天約 19 篇，次數相當高。獨立媒體則刊登 2,088 篇，平均每天 26 篇，數量遠高於個別的主流報紙，可見公民記者的辛勤。就平均數量與走向來說，商業報紙與獨立媒體的報導趨勢極為相似（$r = 0.66$，$p < .001$），獨立媒體似乎是另類的新聞管道。不過，從競爭或取代的角度看，獨立媒體的報導對商業報紙的影響似乎不大，被引用的頻率相當低，亦即公民記者並未發掘太多被商業媒體忽略的題材，說明獨立媒體在報紙高度商業化的環境中多少處於邊緣地位，還不足以構成威脅。

在 51 篇商業媒體引用的報導中，報紙占 41 篇（80.4%），其中《明報》14 篇（34.1%），《蘋果日報》10 篇（24.4%），《星島日報》和《信報財經新聞》各 4 篇，《大公報》3 篇，《都市日報》2 篇，《文匯報》、《新報》、《香港商報》和《am730》分別只有 1 篇。這些文章大都短暫提到獨立媒體，只有 7 篇

文章大幅度報導。這種現象與報紙的政治立場光譜大致吻合，民主派報紙的篇幅較大，且明確支持占中。其中《蘋果日報》有四篇文章以獨立媒體的獨家內容為主：戴耀廷女兒撰寫的「我的父親」（《蘋果日報》，2014 年 11 月 12 日）、岑敖暉分享發言（胡平，2014 年 11 月 17 日）、「網絡媒體公民大獎」（李八方，2014 年 11 月 14 日）與獨立媒體的「被遺忘權」主張（蘋果日報，2014 年 11 月 25 日）。這些文章都認可獨立媒體、公民記者與公民新聞。相比之下，保守親共的報紙不僅避免報導獨立媒體，還嚴厲批評和扣帽子。例如，《文匯報》指控，「成立時間最早的『獨立媒體』，與反對派更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根本就是**激進派的衛星組織**，與真正的傳媒相差十萬八千里，更**缺乏傳媒應有的操守和道德**」，更說這些網絡媒體已成為占領行動的宣傳工具，甚至是鼓舞示威者的平臺（粗體字為作者所加）（黎子珍，2014 年 12 月 11 日）。

儘管數量不多，在占中期間，跟《蘋果日報》一樣，獨立媒體同時充當觀察者與參與者，進而演變成商業報紙的報導對象，特別是對政府機構的挑戰與警察暴力的批判等內容，被民主派報紙大篇幅引用。不過，大部分建制派報紙即使報導有關事件，也不提獨立媒體的來源。這種有意省略是解釋性包裝的策略操作，執意把競爭對手的可能替代話語排斥在對比之外，如此界限可以從傳統報紙如何建構占中的前因後果與可能的意涵看出大概。

三、解釋性界限：民族主義與植根的世界主義

不管是刻意報導或有意省略，建制派報紙的話語與北京官方立場沒什麼兩樣，都強調維護現有體制（基本法架構和人大決定）與社會穩定，跟民主派報紙的民主化傾向和落實一國兩制的呼聲截然不同。在抽象層面上，本研究主張，在占中期間，雙方的話語大致可以歸類在民族主義（nationalism）或植根的世界主義（rooted cosmopolitanism）的理念之下。這兩個理念根本上相互排斥，但又有彼此牽動的相關概念，透過不相容的解釋性包裝推銷己方，或指責對方，企圖引起港人的共鳴。民族主義強調以國家為立足點，本國利益高於其他國家，在特定的地理、文化、語言和族群等範圍內，不容外國插手或干預涉及主權的任何事物（如宗教、人權、內政和族裔關係）(Anderson, 1983; Gellner, 2006)；國家認同不受挑戰，愛國，並支持國家決策和行動，是公民的社會職責 (Callahan, 2003)。依 Anderson (1983) 的論點，民族主義的興起與印刷資本主義的技術、成長及擴散息息相關，也就是說，經由各種概念的文字表達，報紙、雜誌和書籍製造與凝聚散

居各地的個人對民族的想像、意識與向心力。本研究的主張是，在占中期間，香港的報紙多少具有相同的作用。

植根的世界主義則主張，世界公民不屬於某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居民，個人認同也不受特定或單一文化、語言、宗教信仰或生活經驗等的框限，而是全世界的，各地人民具有均等的道德價值，沒有高下之分，亦即是多元的承擔與容忍。但是，世界公民並非無根的浮萍，飄浮於國與國之間，世界性的認同來自於與外在世界互動後的自覺，尤其是經由本土操作，運用當地資源，與其他社會、國家和國際制度發生關聯的一種知覺認同。這種認同其實植根於當地特殊制度與人民心理感受的複雜關係中，特別是牽涉正義和政治制度的安排 (Dwyer, 2009; Stanton, 2006)。

在民族主義與植根的世界主義的界限下，占中的各種解釋性話語大致可以從幾個角度分析。第一，政改本質圍繞民主派所說的「真普選」與建制派信誓旦旦的「一國兩制」，凸顯的是民主與民族理念的話語爭鬥，亦即香港地方自主和中國國家主權的矛盾。第二，占中引發外國勢力操縱和公民抗爭的辯證，把公民不服從的法律事件轉化成外國干預中國內政的政治問題。第三，占中的作用在亂港和愛與和平之間糾纏不清，把政治訴求（公民提名）辯解成法律案件（擾亂社會）。這些二分法的爭論主要圍繞占中的目的、手段與後果，利用解釋性包裝的框架和推理設置等策略而展開，涵蓋話語的符合／象徵、隱喻、榜樣、標語／描述、原則和它們之間的內在結構、詞句使用與邏輯關係（表 1），其中不同基調的組合為個別解釋性包裝提供一套建構的元素。

（一）占中前因：本土自主與國家主權

占中的發生直接與政改有關，運動期間的官方說辭、建制派和民主派之間的爭論、民意和新聞報導也都聚焦在政改上，最大的紛爭是民主普選的定義。在民主派看來，真普選沒有國界的差別，原則是候選人和選民都有公平參與的機會，因此先篩選候選人，再讓選民一人一票選出特首，無疑是假普選。對建制派來說，世界上沒有真正的普選，候選人都經過某種淘汰過程，只要 500 萬選民一人一票選特首，就是普選，比現有的小圈子選舉好很多。簡單說，雙方爭執的焦點其實是民主的定義與操作問題，泛民派堅持的是普世的民主價值，縱然香港歸屬於集權的中國政制，港人也配享有自主的權利，這是植根的世界主義；建制派則強調，中國國情不同於西方民主國家，普選必須因地制宜，這是國家主權不容侵犯的起

	解釋性界限			
	民族主義		植根的世界主義	
	外國勢力	國家主權	真普選	本土自主
框架	**顏色革命**	**一國兩制**	公平參與	公民抗命
推理	**港獨**	國情不同	民主理想	**雨傘革命**
	外國勢力	國家安全	**雨傘運動**	不合作運動
符號／象徵	茉莉花革命	外交部	黃色雨傘	**占領區**
		中聯辦	連儂牆	守護香港
		港澳辦		
隱喻	黑金	中國夢	獅子山精神	勿信左膠
	幕後黑手		民主開花	護我城
	臺獨			
榜樣	英美政府	**中國人大**	英美普選	立法會
			臺灣大選	**占中三子**
標語／描述	港版顏色革命	一錘定音	我要**真普選**	公民提名
			拒絕**假普選**	撤回政改
原則	顛覆中共	中央任命	核心價值	香港主場
		愛國愛港	愛與和平	**公投**
		基本法		港人治港
總篇數 *	2,557	6,525	5,367	7,926
左派／建制派 #	1,365（273）	3,695（739）	1,165（233）	3,015（603）
蘋果／明報	440（220）	1,222（611）	2,670（1,335）	2,320（1,160）

表 1：占領中環與報紙話語的解釋性界限，2014 年 9 月 29 日 ~ 12 月 16 日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註：* 總篇數以粗體的關鍵字數合計，包含所有報紙，文章可能重覆計算。

報紙以 5 家大眾化日報為主，包括《大公報》、《香港商報》、《文匯報》、《東方日報》和《星島日報》，排除其他發行量較小的日報（《新報》和《成報》）和專業性報紙（《信報》和《經濟日報》），《太陽報》為《東方日報》姐妹報。加上《蘋果日報》和《明報》，7 家報紙的合計篇數都超過總篇數一半以上，括號內數字為每報平均。

碼界限，也就是民族主義的臨界點。在國家主權的解釋性包裝下，有關一國兩制、中國人大、愛國愛港和基本法的說辭，左派和建制派報紙的文章（739 篇）平均高出泛民派報紙（611 篇）100 多篇。

以「真普選」為關鍵詞搜尋，香港報紙共刊登了 3,280 篇文章。從分配比率和內容看，「真普選」的用語因為文本與情境的交互作用，而有不同意義、指標及可能效應。支持占中的報紙以真普選為政改目的，反對派儘管使用了這個名詞，卻未必認可概念的內涵。《蘋果日報》發布最多（782 篇，23.8%），《明報》居次（681 篇，20.8%），左派報紙則落後許多，《大公報》有 203 篇（6.2%）、《文

匯報》198 篇（6.0%）和《香港商報》83 篇（2.5%），加起來還不如《蘋果日報》。建制派報紙如《東方日報》（7.2%）和《星島日報》（5.9%）也不多。再以「假普選」搜尋[6]，分配形態大致相同，在 220 篇中，《蘋果日報》占 28.6%，《明報》次之（20.5%），左派報紙——《大公報》（4.5%）、《文匯報》（5.0%）和《香港商報》（5.5%）——總計為 15.0%（33 篇）。如果以政改方案強調的「一人一票」和「占中」為關鍵詞搜尋，全部商業報紙有 536 篇，建制派和民主派報紙的分配正好相反：《大公報》以 120 篇（22.4%）領先，接著是《文匯報》（107 篇，20.0%）、《香港商報》（67 篇，12.5%），《明報》（51 篇，9.5%）和《蘋果日報》（29 篇，5.4%）。仔細檢視內容，「一人一票選特首」是左派報紙常用的話語，以民粹為訴求，如《文匯報》（2014 年 12 月 15 日，第 A04 版）社評宣稱：「2017 年一人一票選特首是**本港社會**的共同期望」（粗體字為作者所加）。《大公報》（鄒平學，2014 年 12 月 15 日，第 A07 版）更暗示主權受到威脅，直接把普選跟民族主義掛鈎，如鄒平學的「大公評論」：「此次政改之爭不是什麼要不要民主之爭，不是什麼『真普選』、『假普選』之爭，而是否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法治軌道上實現普選和推進民主之爭，是否承認和接受中央對政改具有主導權和決定權之爭」。簡單說，國家主權不容挑戰，民族高於民主。

新聞標題屬於解釋性包裝中框架設置之一的標語部分（catchphrase），有意使用特定字眼或故意略去，反映出符號操弄者對現實的某種看法，以及企圖指引文本解讀的話語操作 (Gitlin, 1980)。民主派報紙站在普世價值的道德高地，利用真、假普選標簽大做文章，也彰顯其他地區對香港選舉的關注。在真普選的 3,280 篇文章中，《蘋果日報》就占了 782 篇（23.8%），比三家左派報紙的總數 484 篇（14.7%）還多，也多於《明報》的 681 篇。有關世界主義的理念可以由一些標題看出，如〈英美日為港人真普選發聲〉（蘋果日報，2014 年 10 月 4 日，第 A06 版）、〈學聯五人周末上京／要求中央回應真普選訴求〉（蘋果日報，2014 年 11 月 4 日，第 A01 版）。《蘋果日報》（盧峯，2014 年 12 月 15 日，第 A06 版）的民粹手段也在占中清場當天的社評表露無遺：「北京這種以騙局取代真普選的做法讓**市民**從失望走向絕望，讓**市民**對透過政治對話、溝通爭取政改信心盡失，更讓**年輕人**感到自己未來參與香港事務的權利將被長期扼殺」（粗體字為作者所加）。

在整個真普選的解釋性包裝下，《蘋果日報》和《明報》平均各有 1,335 篇文章，左派和建制派報紙平均只有六分之一（233 篇）。左派報紙自然無法忽視

6　真普選和假普選及其它關鍵詞未必相互排除，一篇文章可能同時使用幾個相關的名詞。

「我要真普選」的街頭呼聲，卻不免在標題上採取守勢，故意略去標語內容，還以一些例證辯解真普選是假命題。除了零星文章，《大公報》、《文匯報》和《香港商報》在標題上完全不提真普選或假普選。諷刺的是，左派報紙一方面指控外國勢力勾結占中，另一方面又借用國外媒體和專家反駁真普選的主張，例如，〈歐洲時報：『真普選』是偽命題／『占中』者應回歸理性和現實〉（《大公報》，10 月 4 日，A08）、〈澳洲學者批『真普選』是偽命題〉（《文匯報》，10 月 26 日，A06）、〈『公民提名』能實現『真普選』嗎？〉（《大公報》，12 月 11 日，A12）。跟《蘋果日報》比較，左派報紙以括號引用真普選無非暗示內容的爭議性，甚至沒有正當性，就像占中運動是外來勢力引發一樣。

（二）占中啟動：外國勢力或公民抗命

在占中話語上，有關運動的目的，建制派和民主派報紙的根本分歧是民族主義與植根的世界主義之間的衝突：這是透過顏色革命以推翻中共政權，還是自發的公民抗爭以追求普世民主？顏色革命發生於 21 世紀初期的東歐和中東，如烏克蘭的橙色革命和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等。從顏色革命（1,084 篇）到雨傘革命（1,202 篇），改變的是次要概念（雨傘取代顏色），而非主要概念（革命），亦即兩者的本質不變，革命邏輯因此聯繫了外國勢力與本土抗爭的過程。隱含在外國勢力概念背後的是民族主義的情結，把占中定調為陰謀，企圖以香港為踏腳板，顛覆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公民抗爭的概念則是民主派為維護香港不受「他者」——中央或北京——的侵擾（如護我城或勿信左膠口號），並落實一國兩制的政治理想。在占中啟動後，《大公報》（2014 年 9 月 29 日，第 A04 版）的社評立即譴責「以『黑金教主』黎智英為首的反對派，勾結外國勢力」，企圖挑起反外的民族主義力量。從此，顏色革命和外國勢力的字眼不斷被使用，有 845 篇明確提到外國勢力，平均每天 11 篇；顏色革命有 1,084 篇，平均每天約 14 篇。整體來說，有關外國勢力的調子都出現在左派和建制派的報紙，每報平均（273 篇）比泛民派報紙（220 篇）多出 50 篇。面對民族主義的大旗，相關國家如美國和英國被迫表態，泛民派則急於辯解，並切割任何「賣國」的暗示或標簽。

1. 建制派報紙：占中是外國勢力引起

以《文匯報》（223 篇）和《大公報》（164 篇）為代表，建制派報紙極力將占中定性為美國支持下的顏色革命，意在奪取中央治港政權，甚至顛覆中共政權。《蘋果日報》（70 篇）和《明報》（130 篇）加起來都還比不上《文匯報》。

建制派報紙與北京官方話語如出一轍，10 月 10 日《人民日報》（海外版）頭版以〈美國對「顏色革命」為何樂此不疲？〉為題，指責美國勢力推波助瀾，包括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部分非政府組織和智庫、主流媒體（例如《美聯社》和《時代周刊》）和美國政府等各方力量，對占中運動提供支持與背書（華益文，2014 年 10 月 10 日）。《文匯報》亦步亦趨，10 月 28 日指控基金會充當美國政府代理人，廣泛支持香港反對派，並提供培訓，發動顏色革命，企圖利用香港作為顛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跳板（卓偉，2014 年 10 月 28 日），另外也攻擊《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收美國政府的錢，幫助策劃港版顏色革命，計劃將香港變成「反華橋頭堡」，最終搞垮中國（高天問，2014 年 10 月 17 日）。《文匯報》更指出，策動占中的外部勢力還有英國政府，包括前港督彭定康；而本土勢力主要為兩間大學的研究機構、民主黨主席李柱銘、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工黨主席李卓人、黎智英、「占中三子」與學民思潮黃之鋒（齊正之，2014 年 11 月 7 日）。許多濃縮性標題除了醜化當事人，更為運動的本質定調，隱藏在背後的是國家安全受到外來力量的威脅，如〈美媒吹捧黃之鋒居心叵測〉（《文匯報》，10 月 10 日，A16）和〈「三丑」自首仍想延續禍港行動〉（《文匯報》，12 月 3 日，A20）。

站在官方的立場，《文匯報》的解釋性包裝話語始終如一。12 月 15 日，警方開始清場，《文匯報》在《「占中」必敗是因為破壞法治不得人心》的文章中，總結 79 天的運動，用字遣詞極盡民粹，又兼具反外的革命術語：

> 銅鑼灣「占領區」昨日順利清場，港人從心底裡叫出「香港光復了」的喜悅。反對派策動的「占中」遭到徹底失敗。「占中」從策動的一刻開始，就走上了注定失敗的不歸路。因為反對派的策略，就是要挑戰香港基本法，要損害香港市民的利益，要投靠外國勢力，企圖製造暴力衝突、流血事件，發動一場顛覆中國的「顏色革命」。「占中」的本質是「反人民、反祖國、反法治、反民主」，讓廣大香港市民清楚他們勾結外部勢力、禍港殃民的真面目。因此，「占中」違背人心，不會獲得廣大香港市民支持，難逃失敗告終的命運（粗體字為作者所加）。（高天問，2014 年 12 月 16 日）

除《文匯報》外，《大公報》也出現類似話語，共有 164 篇提到顏色革命，標題之下，「外族」企圖染指「我國」的民族意識形態，躍然紙上：〈「雨傘革

命」背後的外國「保護傘」〉（《大公報》，10 月 8 日，A09）、〈造謠、抹黑政府是「顏色革命」慣用手法〉（《大公報》，10 月 10 日，A10）、〈李卓人「占中」收美援〉（《大公報》，10 月 14 日，A02）和〈反對外國勢力介入拒當反華反共基地〉（《大公報》，11 月 8 日，A02）等。《香港商報》也不遑多讓：〈顏色革命：西媒定性「占中」〉（《香港商報》，10 月 5 日，A01）、〈慎防港版顏色革命〉（《香港商報》，10 月 17 日，A02）、〈「港版顏色革命」無可抵賴〉（《香港商報》，11 月 1 日，A02）以及〈俄媒：美將『顏色革命』引向中國〉（《香港商報》，10 月 8 日，A07）等。像口號一樣，這些標題把一個複雜的社會抗爭定位成造反的革命，由外而內，以民族主義對抗世界主義的用意，也就不言可喻了。

從框架到推理設置，左派三報的集體思維除了以「三丑」字眼貶抑占中發起人，最聳動的話語莫過於挑起民族情感與國家安危：占中是以英美外來勢力為首的顏色革命，目的在推翻中共政權，宣揚香港獨立。儘管「占中三子」一再強調運動並非要顛覆中共政權，只是爭取在現有體制下落實基本法和中央許諾的普選權利，建制派報紙卻扣上革命和主權爭奪的大帽子，與占中劃清敵我關係。在民主派報紙看來，這是「莫須有」的罪名，占中不過是港人自發的公民抗命運動，為的是透過民主普選實踐港人治港的理念。

2. 民主派報紙：占中是公民抗爭

香港的民主派報紙只剩鳳毛麟角，最鮮明的是《蘋果日報》，一開始就將占中定位為港人自覺自發的抗議運動，堅持「香港主場」的原則，進行一場集權與民主的鬥爭，如雨傘革命（604 篇）和占領區（402 篇），（《明報》分別是 72 篇和 533 篇）。因為黎智英帶頭親身參與，《蘋果日報》的報導不改自由主義的色彩，不僅關照市井小民，更摻雜旁觀者與局內人的視野糾纏，直接支持運動本身，又間接與報老闆的信念唱和。例如，9 月 30 日的頭版頭條「民主占領香港」：

> 獨斷狂妄的特首梁振英出動武裝防暴隊，對付赤手空拳爭普選的平民百姓，港人會記住這一晚，歷史會記下這一章。催淚彈煙硝散後，和平占中席捲金鐘、中環、灣仔、銅鑼灣、旺角，以十萬計市民向暴力清場說不，創造香港民主發展最美麗的一幕。民心不可侮，街頭怒火一發不可收，中學生罷課，工人響應罷工，小商戶自發罷市，升級成為全民不合作運動（粗體字為作者所加）。（麥志榮，2014 年 9 月 30 日）

如此煽情話語，運用「全民」反對官方暴力，將港人與港府對立起來，成為日後《蘋果日報》的基調：以民主旗幟，煽動民心，鼓舞占中。10 月 1 日中國國慶日，頭版標題——〈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就是定調後必然的發展，尤其是要求梁振英下臺、撤回人大決議和升級占領行動（姚國雄、林社炳，2014 年 10 月 1 日）。10 月 7 日，《蘋果日報》發表〈傘子開燦爛／走過激昂 10 日〉，回顧主要參與者的行動，再次突出「港人自發抗強權、爭民主」的主軸：

> 從學子翻過極權高牆、重奪公民廣場開始，港人度過驚心動魄的 10 天。一群 90 後青年與三個叔父輩合力點燃藥引，無數傘子爆發，遍地怒放。學子夾在務實的「大人」和堅毅的群眾之間如履薄冰，恐懼中堅守陣地，紛亂中重啟對話。群眾緊握的和平抗命原則，是占中三子深耕年半的成果，成為刺向極權的利刃。學聯岑敖暉感謝群眾以堅毅擊潰政府的心理戰；學民思潮黃之鋒揚言人大「開閘」非不可能；占中三子樂於守在學生後方，盼政改重現生機。（白琳、呂浩然、佘錦洪，2014 年 10 月 7 日）

總之，在占中期間，民主派報紙堅持運動是港人自發的抗爭，面對威權體制，主張普世價值，爭取不打折扣的有效民主操作。儘管運動最終失敗，以占中三子為表率的公民抗爭模式和信念，頗符合獅子山下的香港打拼精神，也為日後泛民派議員否決政改奠下正當基礎。

（三）占中作用：亂港或護我城

除了占中目的，另一個話語爭論牽涉到運動的社會作用，特別是暗示社會動盪和國家安全。以「占中 + 亂港」搜索，共有 546 篇文章提到「亂港」，其中《文匯報》（27.1%）、《大公報》（23.6%）和《香港商報》（11.2%）就占了一半以上（338 篇，61.9%）；而《蘋果日報》僅有 5 篇（0.9%），《明報》也只有 12 篇（2.2%），比例相當小，「亂港」顯然不是常用的新聞詞彙。建制派報紙以「亂港」描述占中，一言以蔽之，就是違反基本法與中央主導的主權立場。民主派報紙看法不同，認為占中凝聚了草根力量，彰顯高度的公民素養，並強烈體現「自己香港自己救」的民主情操。從另一個角度看，以「占中 + 愛港」搜索，在 596 篇文章中，三家左派報紙共有 351 篇（58.9%），強調特首候選人必須愛

國愛港，亦即民族主義高於民主選舉。《蘋果日報》（40 篇）和《明報》（54 篇）合計有 94 篇（15.8%），論點卻是愛國愛港的概念沒有共同標準。兩者的分別在於，支持北京的報紙打著民族主義的旗幟，堅持特首候選人參選的先決條件；傾向泛民派的報紙則爭論在普世原則下，香港的未來治理機制，不應一錘定音，而應由港人公投決定。在占中期間，民族主義與植根的世界主義的各自要求顯然捍格不入。

1. 建制派報紙：占中擾亂社會秩序

既然是亂港，占中就十惡不赦。例如，《文匯報》（2014 年 10 月 14 日，第 A02、A23 版）發布的〈「占中」10 宗罪〉就充滿面面俱到的解釋性包裝話語，從民族主義的大義凜然，到訴諸民粹，未審先判：

> 一、挑戰人大決定，發動顏色革命；二、「港獨」「臺獨」合流，危害國家統一；三、破壞公共秩序，動搖法治基礎；四、栽贓抹黑警方，企圖打擊士氣；五、對立撕裂加劇，重創社會和諧；六、煽動學生犯法，荼毒香港未來；七、動搖金融基礎，港股失 5,000 億；八、包圍金鐘政總，阻礙政府施政；九、旺區道路封鎖，百業損失慘重；十、市區嚴重塞車，返工上學艱難。

這 10 項「罪名」中，除了第一、二條擺明威脅國家安全或顛覆中共政權，暗示民族主義的情結，其餘八條都指涉「占中」對社會、經濟秩序的擾亂和破壞，亦即亂港，與中央唱反調。同樣，《大公報》10 月 28 日在顯著位置（A02 版）發表〈占中有罪／香江無序〉，口吻跟《文匯報》大同小異，以港人福祉和社會安定為依歸，抨擊運動：

> 「占中」一個月，東方之珠黯淡無光！反對派由 9 月 28 日罔顧一切發動「占中」，持續一個月的「占中」行動令香港受到史無前例的衝擊，示威者無法無紀，無視法庭禁制令，堵路襲警，令學生失學，員工失業……香港人賴以自豪的一切法治文明、社會秩序以及安定的氛圍，正被「占中」無情摧毀。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形容「占中」已成為「一列失控的高危列車」，變得暴力、失控、擾亂秩序，令整個香港社會受到重創，對**市民**帶來痛苦及失望（粗體字為作者所加）（冼國強，2014 年 10 月 28 日）。

在同一天的社評（〈亂港滿一月『占中』露真容〉），《大公報》更直接在標題中使用亂港一詞，指責運動衝擊社會秩序與經濟命脈（大公報，2014 年 10 月 28 日）。不過，這些話語都屬於判斷與推理，缺乏具體證據或客觀數字佐證，與 12 月 13 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本報評論員」文章根本沒有什麼不同。以〈結束「占中」是人心所向〉為題，文章把社會對立歸咎於占中，指出：

> 「占中」實為香港一大禍害：導致沿途商戶關門，交通幹道阻塞；造成巨額經濟損失，破壞香港經濟發展良好勢頭；干擾政府運作，造成社會撕裂和分化。事實已經充分表明，違法行動曠日持久，已嚴重損害香港的社會秩序、經濟民生、民主發展和法治根基。（本報評論員，2014 年 12 月 13 日，第 4 版）。

從香港到北京，建制派報紙與黨國最高權威報紙《人民日報》口徑一致，都強調占中造成社會秩序與經濟發展的亂象，以亂港罪名，突出「敵我對立」的矛盾，羅織泛民派與港人為敵，企圖以民族主義爭取港人的認同。在「外國勢力介入」和「主權不容挑釁」的宣稱旁襯下，「亂港」是個反動的大帽子，民主派報紙除了避免使用這個名詞（《蘋果日報》，5 篇；《明報》，12 篇），更以其他話語為占中辯解。在某種程度上，概念的選擇反映出使用者的思考模式或所處立場。

2. 民主派報紙：港人治港理念

在植根的世界主義下，地方自主是響亮的解釋性包裝，以相關名詞統計（表 1），《蘋果日報》（1,265 篇）和《明報》（1,055 篇）的平均篇數（1,160），幾乎是左派和建制派報紙（平均 603 篇）的兩倍。從頭開始，《蘋果日報》就全力支持占中，包括黎智英親自在金鐘占領區坐守。對亂港的論調和指控，《蘋果日報》更以選擇性的具體事件報導回擊，並以標題彰顯各社會階層對占中的關懷：〈股民無懼跌市／只擔心人命〉（《蘋果日報》，9 月 30 日，A17）、〈黃金周商鋪關／內地客不介意〉（《蘋果日報》，10 月 1 日，A14）、〈四據點各有各特色／金鐘變身社區／整潔有秩序〉（《蘋果日報》，10 月 2 日）、〈自己旺角自己救／逼走暴徒〉（《蘋果日報》，10 月 4 日，A02）、〈開出 3 米路／讓公務員上班〉（《蘋果日報》，10 月 6 日，A02）、〈網民發起／幫襯占領區小商戶〉（《蘋果日報》，10 月 8 日，A10）、〈無懼占中／樓照賣股照炒／恆指三連升／快重返占中前〉（《蘋果日報》，10 月 8 日，B01）、〈長者出心出力

／支援占中青年／婆婆愛心「雨傘腸粉」連續派三個早晨〉（《蘋果日報》，10月17日，A10）、〈當局拆 Banner ／拆不走港人心願〉（《蘋果日報》，11月2日，A04）、〈市民斥轉移視線：占領因社會不公〉（《蘋果日報》，11月11日，A04）、〈逾50人舉報警員襲記者〉（《蘋果日報》，11月30日，A04）以及〈2000傘下爸媽遊行／抗警暴撐學生〉（《蘋果日報》，12月8日，A04）等。這些都彰顯守護香港的舉動與港人對前途的關切，也暗示一般人能自主判斷占中的社會作用。

也許是回應《文匯報》10月14日的指控，《蘋果日報》於隔天發表社評「世界上沒有任何社會運動不擾民」，以全民的觀點，提出合理化的辯解：

> 以香港爭取真普選來說，顯然有相當多著重近利而不及長遠的市民會反對占領運動，但占領者所爭取的是所有香港人的政治權利，是香港免於沉淪的未來。故即使不為許多人所認同，也不應放棄（粗體字為作者所加）。（李怡，2014年10月15日）

這篇社論以「擾民」化解「亂港」的罪名，以「所有香港人」的長遠利益高於「許多人」的暫時不便，隱射出占中守護香港的深切意義，亦即以未來的民主理想目的（真普選），辯護當前非常手段（打擾市民生活）的正當性，道德上站得住腳。《明報》（2014年10月5日）較早發表社評〈暴民作惡損國際形象／爭民主只需善意關心〉，也否認「亂港」現象，指出全世界都看到示威人士的克制、有禮和守秩序，反而是政府暴力和暴徒行為，損害了香港的國際形象（明報，2014年10月5日）。比起左派報紙的劍拔弩張或《蘋果日報》的唯恐天下不亂，《明報》的一些軟性或人情趣味的報導多少沖淡了占中的緊張氣氛：〈廣告人仿卡通創作／占中相關「小人物」萬人讚〉（《明報》，10月21日，A16）、〈占領藝術品成視藝教材：反映現實「逼」學生關心社會〉（《明報》，10月22日，A26）、〈雨傘馬拉松開跑／地圖畫出黃傘〉（《明報》，10月29日，A18）、〈科大生畢業禮備689黃傘〉（《明報》，10月31日，A26）、〈為吸一口自由空氣／推倒高墻〉（《明報》，11月2日，S07）、〈網民金鐘另設「公民講場」〉（《明報》，11月11日，A15）以及〈離開是為了更遠的未來〉（《明報》，11月20日，A40）。從抽象層面看，如此的解釋性包裝毫無疑問的把社會運動的嚴肅本質轉嫁到個人的能動性上。

陸、結論與討論

占中運動是公民不服從理念的街頭實踐，目的不外是放之四海皆準的民主普選，因此牽涉到許多相關概念的辯證與實際的操作手段。正因為占中概念、指標和執行的歧義，從 2014 年 9 月底到 12 月中，整個香港社會為之紛擾不已。由發生到結束，在 79 天內，運動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不論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傳播或科技等層面，都多少受到波及。社交或網路媒體固然是年輕人喜好的資訊渠道，占中的真正舞臺卻是在公共空間裏的幾個占領區，與公共領域中的商業媒體及公民社會的獨立媒體。運動期間，直接或間接參與演出的人物不少，幾乎囊括所有持份者，包括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官員、警察和消防部隊、立法會議員、政黨政客、專家學者、新聞記者和媒體負責人、學生、商家老闆與一般市民（含 500 萬選民），只是利益不同，涉及的程度有別。人多口雜，話語難免紛亂，更何況引起極大騷動的社會運動。

從社會現實建構的角度看，即使親臨現場，沒有任何人可以宏觀與微觀並具，從而理解由政府到個人之間，持份者如何在不同時空互動，或在什麼情境下彼此折衝，新聞記者也不例外。在占中期間，新聞報導和評論因此頂多是客觀事實的採擷或社會現實的橫切面，並非一對一的精確展示。它們都經過某種基調、視角或框架，把片段的事實以文字、圖案、符號、標語、數字和相關概念等，加以串聯、整合及編排後進行敘述或再呈現。這種由客觀現實到媒介現實的定調轉化過程有一定脈絡可尋，社會知識的生產也非隨機或毫無章法可言。在知識社會學的視野下，本研究透過田野記錄與實證分析，比對社會現實和媒介現實，探討香港商業媒體和獨立媒體在運動過程中的思考模式，包括基調、解釋性包裝的框架、推理設置與話語間的邏輯關係等。受制於數據與資料的局限，雖然量化和質化研究多少互補，我們無意，也無法主張本研究觀察周全或分析完整。儘管如此，在知識宣稱上，我們認為，在運動期間，因為定調效應，有關占中的各種後繼的解釋性話語，都可以歸類在民族主義或植根的世界主義之下，其間的辯證、修飾、商榷和貶抑等形式及內容，不過是界定範圍裏的多元聲音。本研究的發現如果有任何指標價值，以下幾點結論或許值得參考。

首先，從數量與趨勢看，在香港過度商業化的媒體環境中，獨立媒體固然提供了一個另類管道，內容卻未必能跟主流報紙做有效競爭或區隔。一方面，獨立媒體的報導走向與商業報紙亦步亦趨，話語也類似，尤其是濃縮性標簽的使用；另一方面，獨立媒體的獨特報導並不多，能夠引起主流報紙注目的新聞有限。這

些聲音或許為公民社會帶來多元化，卻頂多是邊緣的吶喊，恐怕難以撼動商業媒體的集體思維，特別是向霸權或市場利益低頭的報紙。

第二，由於「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結構安排，在新聞報導和評論的話語中，正反雙方都不難各取所需，以國家主權與地方自主的主張，合理化自己的立場，更指責對方破壞現有的政治體制。堅持民族主義高於一切的建制派，在解釋性包裝上，大多站在國家或中央的立場，以敵我不兩立的意識形態，打擊對手宣稱的普世價值與對主權的挑戰。泛民派的立足點則是，香港固然是中國的特區，「兩制」的承諾應包括港人享有追求民主的權利。不過，這是內部的緊張關係，最多延伸到中央與地方的矛盾。

第三，在推理設置上，與內部矛盾有關的話語是引進外國勢力的角色和作用，特別是動力和動機方面。占中是泛民派籌劃一段時間的社會運動，啟動前，正反雙方早已在街頭和報紙版面上，為金錢來源及終極目的，針鋒相對。啟動後，外國勢力企圖發起顏色革命的話語更是甚囂塵上。邏輯上，占中從「亂港」演變到「亂華」，由公民抗命到民主理想，交互攻防的辯解現象也就不難理解。隱藏在背後的是普世的自由民主（港人核心價值）和民族主義（中國人尊嚴）的取捨操弄。雖然各有所據，因為難以驗證，雙方的話語其實無法真正掌握整體港人的心思和行動，民粹傾向徒然加添香港社會的猜忌與分裂。

第四，在占中期間，新聞報導與評論的解釋性包裝都過度簡化社會現實，特別是透過不同事實的觀察與判斷，以濃縮性符號或概念，把原本相當複雜的社會運動，建構成魚與熊掌不可得兼的命題，整個過程反映的是非此即彼的選擇，毫無妥協或通融的餘地。從客觀現實到媒介現實，對那些從來不曾到過占中現場的人來說，相關的新聞與觀點便可能成為社會知識的來源，他們的主觀現實難免多少受到影響。這或許是香港報紙在「民主普選」與「國家至上」的衝突之間，極力闡釋差異和立場的主要原因，其他的話語不過是舞臺上的過場。

參考書目

大公報（2014 年 10 月 28 日）。〈亂港滿一月「占中」露真容〉，《大公報》，第 A04 版。

——（2014 年 9 月 29 日）。〈中央發聲　市民怒吼　警隊有力　堅決支持依法處置「占中」違法暴亂〉，《大公報》，第 A04 版。

公民教育委員會（2012）。〈二零一零年公民意識研究：主要報告〉。取自

http://www.cpce.gov.hk/common/doc/cas_main_report_tc2010.pdf

文匯報（2015 年 6 月 19 日）。〈反對派必須承擔扼殺普選的歷史責任〉，《文匯報》，第 A06 版。

———（2014 年 12 月 15 日）。〈「不合作運動」禍害港人必受抵制〉，《文匯報》，第 A04 版。

———（2014 年 10 月 14 日）。〈「占中」10 宗罪〉，《文匯報》，第 A02、A23 版。

本報評論員（2014 年 12 月 13 日）。〈結束「占中」是人心所向〉，《人民日報》，第 4 版。

白琳、呂浩然、佘錦洪（2014 年 10 月 7 日）。〈傘子開燦爛　走過激昂 10 日〉，《蘋果日報》，第 A02 版。

朱雋穎（2014 年 10 月 10 日）。〈一紙一心聲　香港人的連儂牆〉，《蘋果日報》，第 A07 版。

李八方（2014 年 11 月 14 日）。〈隔牆有耳：雨傘作品占領獨媒比賽〉，《蘋果日報》，第 A20 版。

李少南（2015）。《香港傳媒新世紀》（第 2 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李怡（2014 年 10 月 15 日）。〈蘋論：世界上沒有任何社會運動不擾民〉，《蘋果日報》，第 A06 版。

林翰觀（2014 年 12 月 5 日）。〈給占中三子的公開信〉，《成報》，第 A11 版。

冼國強（2014 年 10 月 28 日）。〈占中有罪 香江無序〉，《大公報》，第 A02 版。

卓偉（2014 年 10 月 28 日）。〈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在港版「顏色革命」的角色〉。《文匯報》，第 A12 版。

明報（2014 年 10 月 5 日）。〈暴民作惡損國際形象　爭民主只需善意關心〉，《明報》，第 A04 版。

———（2014 年 9 月 1 日）。〈人大落 3 閘　占中展抗命〉。《明報》。取自 http://specials.mingpao.com/cfm/News.cfm?SpecialsID=137&News=94a4642955680a1a9da4762b29c641921eaef2a9c96006da942c02adade12adad95424

姚國雄、林社炳（2014 年 10 月 1 日）。〈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蘋果日報》，第 A01 版。

胡平（2014 年 11 月 17 日）。〈退場不等於放棄抗爭〉，《蘋果日報》，第 A17 版。

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2014）。〈香港人的身分與國家認同：調查結果〉。取自 http://www.com.cuhk.edu.hk/ccpos/images/news/PressRelease_20141110_Identity.pdf

香港政府統計處（2012）。〈香港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 港二主題性報告 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取自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1200572012XXXXB0100.pdf

香港政府新聞網（2015 年 1 月 28 日）。〈港連續 21 年膺最自由經濟體〉。取自 http://www.news.gov.hk/tc/categories/finance/html/2015/01/20150128_101143.shtml

高天問（2014 年 12 月 16 日），〈「占中」必敗是因為破壞法治不得人心〉，《文匯報》，第 A19 版。

高天問（2014 年 10 月 17 日），〈《蘋果日報》認搞「顏色革命」 暴露黎智英黑心陰毒〉，《文匯報》，第 A15 版。

張讚國（2013）。《匆促的記者：公民新聞、媒體與社會》。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陳健民（2011）。〈香港的公民社會與民主發展〉，《二十一世紀評論》，128：23-31。

麥志榮（2014 年 9 月 30 日）。〈民主占領香港〉，《蘋果日報》，第 A01 版。

華益文（2014 年 10 月 10 日）。〈美國對「顏色革命」為何樂此不疲？（望海樓）〉，《人民日報（海外版）》，第 1 版。

黃天賜（2013）。《新聞已死？》。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黃偉國（2014）。〈香港觀察：《明報》撤換總編震動港媒〉，《BBC 中文網》。取自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hong_kong_review/2014/01/140114_hkreview_mingbao_editor

鄒平學（2014 年 12 月 15 日）。〈「占中」必敗的根本原因〉，《大公報》，第 A07 版。

端木少華（2013 年 8 月 19 日）。〈占中反占中的民粹對決〉，《蘋果日報》。取自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0819/18385007

齊正之（2014 年 11 月 7 日）。〈外部勢力策動港版顏色革命 證據確鑿 金錢策略訓練指導全面操控〉，《文匯報》，第 A02 版。

黎子珍（2014 年 12 月 11 日）。〈警惕《熱血時報》等激進分子「扮記者」暴力抗清場〉，《文匯報》，第 A19 版。

蘇鑰機（2012）。《特首選戰 • 傳媒 • 民意》。香港：天地圖書。

盧峯（2014 年 12 月 15 日）。〈蘋論：真正要反思、啟蒙的是京官〉，《蘋果日報》，第 A06 版。

頭條日報（2014 年 10 月 7 日）。〈機密電郵再外洩　黎智英幕後資助占中廣告〉，《頭條日報》，第 P01 版。

蘋果日報（2014 年 11 月 25 日）。〈促擱置引入被遺忘權〉，《蘋果日報》，第 A12 版。

——（2014 年 11 月 12 日）。〈戴耀廷女：父是英雄〉，《蘋果日報》，第 A02 版。

——（2014 年 11 月 4 日）。〈學聯五人周末上京　要求中央回應真普選訴求〉，《蘋果日報》，第 A01 版。

——（2014 年 10 月 4 日）。〈英美日為港人真普選發聲〉，《蘋果日報》，第 A06 版。

Altschull, J. H. (1995). *Agents of power: The media and public policy* (2nd ed.). New York, NY: Longman.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UK: Verso.

Bennett, L. W. (1980). *Public opin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Berger, P. L., & Luckmann, T.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NY: Anchor Books.

Bradsher, K. (2014, October 21). Hong Kong leader reaffirms unbending stance on elections.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nytimes.com/2014/10/21/world/asia/leung-chun-ying-hong-kong-china-protests.html

Breed, W. (1955). 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 A functional analysis. *Social Forces*, *33*, 326-335.

Callahan, W. A. (2003). Beyond 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ism: Diasporic Chinese and neo-nationalism in China and Thail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7*, 481-517.

CIVICUS. (2012). *State of civil society 2011*.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CIVICUS.

Dwyer, J. (2009). Reimagining the ethnic enclave: Gentrification, rooted cosmopolitanism, and ernesto quiñonez's "chango's fire". *MELUS*, *34*, 125-139.

Eco, U. (2007). *Turning back the clock: Hot wars and media populism* (A. McEwen, Trans.). Orlando, FL: Harcourt.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6)

Freedom House. (2015). *Freedom of the press 2015*. Washington, DC: Freedom House.

Gamson, W. A. (1968). *Power and discontent*. Homewood, IL: Dorsey Press.

Gamson, W. A., & Modigliani, A. (1989).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 1-37.

Gamson, W. A., & Stuart, D. (1992). Media discourse as a symbolic contest: The bomb in political cartoons. *Sociological Forum*, *7*, 55-86.

Gellner, E. (2006).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nd ed.). Oxford, UK: Blackwell.

Gitlin, T.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NY: Doubleday Anchor.

Hayakawa, S. I. (1964). *Language in thought and action* (2nd ed.).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 World.

Laclau, E. (2005).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UK: Verso.

Mannheim, K. (1936). *Ideology and utopi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San Diego, CA: Harvest.

Mazzoleni, G., Stewart, J., & Horsfield, B. (2003). *The media and neo-populism: A contemporary comparative analysis*. Westport, CT: Praeger.

Mills, C. W.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rk, R. E. (1955). *Society: Collective behavior, news and opinion, sociology and modern society*. Glencoe, IL: Free Press.

-- (1940). 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5*, 669-686.

Peri, Y. (2004). *Telepopulism: Media and politics in Israel*.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ewart, C. J., Smith, C. A., & Denton, R. E. J. (1984). *Persuas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Press.

Stanton, D. C. (2006). Presidential address 2005: On rooted cosmopolitanism. *PMLA*, *121*, 627-640.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3 張讚國.indd 76 2016/1/12 下午 07:30:13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6(1), pp. 45-77, January 2016

From Keying to Interpretative Boundaries: Occupy Central, Commercial Newspapers and Independent Media

Chang, Tsan-Kuo*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u, Na

Lecturer,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From its launch on September 28 until the movement ended on December 16, the 79-day Occupy Central movement of 2014 was the epitome of the profound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nflicts in Hong Kong, and thrust the city onto the world stage. From keying to interpretative packaging, the news and views of mass media, especially commercial newspapers and independent media, were important in the process of the movement. Based on field observa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news discourses, this study contends that the movement had been keyed one way or the other from the beginning that delimited the boundaries of various interpretative packages articulated by both the commercial and independent media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movement. From objective to mediated reality, the discursive boundaries in the news media oscillated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rooted cosmopolitanism. The common thread is their populist approach to catering to the sentiments of Hong Kong citizens via discursive practices that created a dichotomous or us-versus-them configuration to woo the citizens at large. Although somewhat competitive, independent media provided an alternative, albeit feeble, voice that had yet to challenge the dominant discourse articulated by the commercial newspapers.

Keywords: occupy central, nationalism, rooted cosmopolitanism, keying, news media

* Email: tkchang@cityu.edu.hk
Received: 2015.07.27
Accepted: 2015.10.08

JCRP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3 張讚國.indd 77 2016/1/12 下午 07:30:13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6 卷 第 1 期．頁 79-115．2016 年 1 月
DOI: 10.6123/JCRP.2016.004

作為「劇場」的新聞／紀實攝影與社運：以「太陽花運動」的照片為例 *

郭力昕 **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

摘要

本文對具代表性的「太陽花運動」攝影作品進行閱讀，分析長久存在於主流新聞攝影與紀實攝影裡的一些問題。臺灣主流傳播場域的攝影理念與實踐，承襲了西方新聞／紀實攝影的見證式古典傳統；而以普立茲得獎攝影作品為代表的實踐，強調捕捉畫面的感性效果，和事件的戲劇性氛圍。本文認為，見證式影像在臺灣 1980 年代的政治反對運動裡，有其階段性的必要作用，但是「太陽花運動」的影像仍複製見證式影像裡的感性與戲劇性概念，將使影像和社運的話語或政治意義都趨於單一。

關鍵詞：太陽化運動、新聞／紀實攝影、真實、社運、影像劇場

* 本文得以完成，需感謝以下人士的慷慨協助：兩位匿名評審給予具有價值的修訂意見；邱育南先生提供了《天光》攝影集，與他參與太陽花運動的親身經驗和觀察；《中國時報》攝影組主任黃子明先生和《蘋果日報》副總編輯林俊安先生，各自推薦了組內攝影記者；《中國時報》攝影記者方濬哲先生與《蘋果日報》攝影記者杭大鵬先生提供了新聞照片。另外，梁秋虹教授對本文初稿所回饋的一些犀利的問題或意見，於此特別致謝。

** Email: lixinwho@gmail.com

投稿日期：2015 年 8 月 21 日
接受日期：2015 年 10 月 12 日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4 郭力昕.indd 79 2016/1/12 下午 07:34:10

壹、前言

2014 年春天，由學運與社運人士率眾占領立法院以要求退回兩岸服貿協定的「太陽花運動」，在臺灣的民主化運動過程裡，很可能將占有一個重要的歷史位置，也值得仔細書寫、紀錄、評述。它在現實政治上，則已經創造了立即與持續的效應[1]。由於數位攝影工具的愈趨普遍，讓運動參與者已經全面地擁有手機或其他拍照器材，因此在「太陽花運動」期間由專業新聞攝影記者、運動參與者或旁觀者所生產的靜態影像，以及在運動落幕後，針對此社運陸續問世的「太陽花運動」影像與文字的相關出版品，數量之多，前所未見。面對這樣一種「影像的節慶」，本文將對具代表性的「太陽花運動」攝影作品進行閱讀，分析普遍存在於主流新聞攝影或紀實攝影[2]實踐裡的一些特質與問題。

由於新聞／紀實攝影的實踐，在西方工業國家有更長久的歷史，且這些實踐經驗，大抵被臺灣的媒體實務界和學界全面引介或複製到國內，深信不疑、少有討論，成為參照、模仿的專業標竿與實踐典範。另外，民間的一些商展經紀公司，從 2013 年的「瞬間的永恆：普立茲新聞攝影獎 70 年大展」獲得巨大觀展人潮與商機開始，加上同年的「國家地理 125 年經典影像大展」，與 2014 年的「看見生活——經典人生攝影展」等幾項來自美國老牌新聞／紀實攝影刊物或機構的作品展，紛至沓來，於臺灣北中南的文創園區或美術館、博物館，共同將美國主流媒介的新聞紀實攝影文化，推動到更廣大的民眾生活裡。

因此，本文希望追本溯源，回顧西方學界與批評界對新聞／紀實攝影能否回應「真實」的論辯，並先就最為國內專業及一般讀者熟悉的美國「普立茲新聞攝影獎」[3]頒發 70 餘年來的得獎作品，進行初步的內容分析，作為分析「太陽花運

1 2014 年底的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大敗，輿論咸認「太陽花運動」及其後續效應是其中一個主要因素。2015 年夏天，全國高中學運青年集結並一度攻占教育部的「反對課綱微調」行動，在行動方式以及某些政治訴求上，亦多所模仿「太陽花運動」。

2 本文同時分析作為新聞報導之媒體影像的新聞攝影，與作為深度專題記錄方式的紀實攝影等兩種攝影實踐。它們都建立在現實主義攝影（realist photography）的特質或美學基礎上，意即，它們都以見證式或目擊性的照片，作為攝影的意義或價值依據。這些名詞，在本文中也以上述的意涵交互運用。

3 國際最著名的年度新聞攝影比賽或實踐的機構，除了美國的「普立茲獎」，還有成立於 1955 年、總部在荷蘭的「世界新聞攝影大賽」（World Press Photo，簡稱「荷賽」），以及成立於 1947 年、總部分別在巴黎、紐約、倫敦與東京的「馬格蘭圖片社」（Magnum Photos）。「荷賽」的參與人數與獎項最多、競爭最激烈，「馬格蘭」圖片供應社的攝影家，則是由國際新聞紀實攝影界的菁英與知名好手組成，作品普遍較具「藝術性」。但最為臺灣讀者熟知的，則是設立於 1917 年的美國「普立茲獎」中，只占 20 餘種獎項之一的「普立茲新聞攝影獎」（攝影獎項於 1942 年開始頒發）。由於它的高知名度與影像力，本文遂以該獎項的得獎作品為分析對象。

動」攝影作品的立論起點和依據。本文接著回顧臺灣在 1970 年代後期到 1980 年代的民主運動與政治反抗影像，與西方工業國家的新聞／紀實攝影發展，在歷史脈絡與實踐經驗上的差異。本文最後展開分析的研究對象，包括了臺灣報紙專業新聞攝影記者的四組代表作品，以及一份由運動參與者或支持者通過募資方式，集體編輯出版的攝影書《天光：太陽花學運攝影集》（2014，以下簡稱《天光》）。

本文取樣的四組專業新聞攝影作品，分別來自《中國時報》方濬哲、陳振堂，與《蘋果日報》杭大鵬、張良一等四位攝影家，由他們自行挑選的各幾十幅具有代表性的運動現場的採訪照片[4]。而作為與專業新聞照片對照、並且也是本文研究分析重點的攝影文本《天光》，則是在此運動後一年內陸續面世的相關出版品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合適於本文之研究方向的材料[5]：作為一份集中編選此運動之影像再現的文本，《天光》是通過集資平臺，同時在網路上募集製作經費與照片的攝影集；製作團隊募得臺幣近 750 萬元的資金，以及來自 800 多位攝影師的 13,000 餘張照片（陳小剛，2014：295）。它的初版發行量是 30,000 冊，為其他相關出版品所不及。

通過對以上這些影像文本的分析，本文希望提出以下幾個主要論點。第一，臺灣主流傳播場域的攝影理念與實踐，總的說來，承襲了西方新聞／紀實攝影的理念和傳統；而以普立茲得獎攝影作品為代表的實踐，70 年來最主要的特色，即強調捕捉事件的感官性效果、和現場的戲劇性氛圍。就主流商業媒體而言，感性與戲劇性的新聞照片，不僅是新聞攝影的某種「本質」，也是因為它帶有吸引讀者以促銷報份的功能。第二，臺灣 1980 年代政治反對運動的影像記錄者，同時帶有民主化運動參與者、而非只是旁觀者／客觀記錄者的角色。他們的見證性新聞／紀實影像，在臺灣早期民主化過程裡，具有一定的階段性意義。

第三，太陽花運動現場的照片，報社記者與運動參與者的影像有不同之處，

4　選擇《中國時報》與《蘋果日報》的新聞照片為研究對象，是因為他們是臺灣目前幾份主要報紙裡，傳統以來比較重視新聞照片、攝影好手也相對較多的平面媒體；同時，這兩份報紙在處理涉及「中國因素」的社運新聞時，政治立場是相左的。而兩報的各兩位攝影記者，則是由兩報的攝影組主管：《中國時報》黃子明主任與《蘋果日報》林俊安副總編輯，推薦給筆者的名單。

5　其他幾份以攝影為主要內容的出版品，包括：《從我們的眼睛看見島嶼天光：太陽花運動，我來，我看見》（2014），一份以參與反服貿運動的幾位社運領袖拍攝的照片為主、輔以文字的紀錄，大致站在共體運動精神的影像紀錄角度；《革命的做法：從 318 太陽花看公民運動的創造性》（2015），日本攝影家／策展人港千尋在運動期間，以「空間詩學」的美學概念，對此運動進行的一項具政治性意涵的影像與論述創作（港千尋，2014／林暉鈞譯，2015）；《野生的太陽花：學運外場的海報與塗鴉》（黃恐龍，2014），一份相對完整的運動期間立院周邊的海報、塗鴉與各類視覺創作的影像蒐集；*Summer Vacation*（狢猏子，2014），一份包括太陽花運動現場的青年激情行動影像，攝影手法與風格獨樹一幟；《這不是太陽花學運：318 運動全紀錄》（2015），一份描述觀點相對多元的圖文書寫和運動經驗回顧。

但共同的特徵是，兩者大抵皆以描寫現場各種具有戲劇性或感性時刻的影像為主要內容。在這個現象上，《中時》與《蘋日》兩報雖然對服貿議題的政治立場不同，但並未太大的影響攝影記者的攝影取向。第四，《天光》攝影集的編輯，是一個「影像劇場」的設計。它簡化了此運動原本意義多元、層次豐富的現場經驗；在編選圖片的過程中，它訴說成一個語意單一、政治與道德黑白二分的圖片故事。本文認為，這也和立法院議場內外的主舞臺／主發言臺上之主張或形象的趨同與單面性不謀而合，它們都遮蔽了抗爭現場參與者及各種主張的高度異質性。

貳、新聞／紀實攝影與再現真實的論辯

新聞攝影與紀實攝影究竟能否再現真實、如何有效傳遞政治話語，在西方學界與批評界的爭論，已近一個世紀之久。這些論爭在西方開始得這麼早，是因為攝影的發明和它應用於新聞傳播媒介，始於西方工業國家；而這些論爭可以持續如此之久，說明「攝影」與「真實」這兩件事，都是非常複雜的事物或概念。在這一節裡，本文將一些相關的重要討論與爭辯，分成三個部分，做些基本的回顧和梳理。

一、對攝影與真實和政治話語之關係的論述

對現實主義攝影與「真實」和政治之複雜關係的批判性論述，主要源自西方唯物論的批評家。Walter Benjamin (1969) 是這個理論脈絡的開拓者之一，在 1930 年代論及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的著作中，考察了攝影及其見證功能的角色變化，並強調圖片說明是解讀照片的首要仲介。Benjamin 在後期的著作中，對攝影的客觀性和消費性格，提出更為複雜、強烈的質疑：借助「時髦的技巧」，攝影的「新客觀性」，能夠化名流或異鄉為消費品，將貧窮變成一種「有趣的事物」(Benjamin, 1982: 24-25)。Benjamin（同上引）強調，不僅是人類的苦難被篡改，而且攝影「已經把對苦難不幸的鬥爭，變成一種消費」。John Berger (1972, 1980)、Berger & Mohr (1982)、Susan Sontag (1978) 和 Martha Rosler (1989) 等批評家，都在各自的著作中，分別以唯物主義觀點，分析資本主義社會中紀實攝影的商品化和剝削性，並且認為人道悲憫式的紀實攝影，對政治產生不了認識或批判的作用[6]。

6 Sontag 在成為經典攝影論述的 *On Photography*（1978）裡，以班雅明對攝影的消費性與複製性等科技因素，批判社以作為物件的諸般問題。但是她在 25 年後出版的 *Regarding the Pain of*

然而，對於攝影做為一種觀看社會、再現真實、認識世界或介入政治的方式，最豐富而雄辯的批判論述，來自西方後結構主義和傅柯派攝影理論學者的書寫。Michel Foucault (1986) 發現醫病關係是一種觀察者（醫生）對被觀察者（病人）的單向凝視關係；在這種透過觀看／觀察，取得認識／診斷知識的過程裡，對「真實」的醫療知識秩序於焉建立。Foucault (1977) 也進一步對觀看／凝視進行研究，從圓形監獄發展出現代社會以觀看建立監控、規訓與正常化的視覺隱喻。從這些原創研究裡，Foucault (1980) 進一步發展出權力／知識的理論；放在攝影理論的應用上，也就是現實主義攝影乃真實世界之有效知識的建構，而每一個社會都有一套生產真實的繁複機制，Foucault 稱之為「真實政體」（regime of truth）的一種建構真實的權力機制。這種機制常通過細微精緻的操作，而通過「看見」來認知的一種話語建構，是核心的有效方法。Foucault 對話語分析的批判性理論，遂成為分析攝影與真實、政治之關係的一種有力方法 (McHoul & Grace, 1995)。

受到 Foucault 理論的激發，一些傅柯派後結構主義批評家重新評價現實主義攝影。John Tagg (1988) 始終關注西方紀實攝影與政治社會之間的聯繫，以及在這一關係中，照片如何被使用於監視、正常化，和對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的政治決策、或正當化意識形態控制的依據。他也針對「真相的社會生產過程」進行分析，研究 1930 年代美國羅斯福總統的「新政」政府推動的農業安全局（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FSA）照片中，對「苦難」和「社會問題」的話語生產，質疑以中產階級為中心的國家裡，關於再現「苦難」的攝影功能、以及由此攝影話語中產生的權力（同上引：171-175）。Tagg (2009) 在上述攝影論述出版 21 年後，繼續針對西方 19 世紀做為歷史檔案的照片、美國 1930 年代紀實攝影的現實主義與 Walker Evans 對意義的抗拒、以及攝影修辭裡所呈現的他稱之為「意義之暴力」（the violence of meaning）的話語建構，進行綿密的批判分析。另一位傅柯派理論重鎮是 Alan Sekula，攝影意義的建構及其政治作用，是他著述中持續關注的焦點。他闡述了攝影的普遍性語言的議題 (Sekula, 1983)，也以唯物主義分析方法和權力／知識理論，對攝影檔案中現存權力關係的合理化和正常化進行研究 (Sekula, 1986)。

Others（2003）裡，對新聞攝影裡的戰爭現場照片，是否能起認識世界和政治行動之的作用，做了自我修訂，也從唯物論的觀點，回轉到一種近似人道主義的論點。請參見第三小節。

二、對西方紀實攝影傳統的論爭與批判

由於經濟和物質條件的成熟，1930 年代起西方社會的紀實攝影實踐，被推到一個相當的高度，尤其是在英美兩國 (Morden, 1986; Price & Wells, 2004)。Derrick Price 指出，在主要西方國家，當時已出現大開本的圖片雜誌，這些出版品使攝影作品得以被委製和出版 (Price, 2004: 70)。它們包括英國的 *Weekly Illustrated* 和《圖片郵報》（*Picture Post*），美國的《生活》（*Life*）和 *Look*，法國的 *Vu* 和《巴黎競賽報》（*Paris Match*），以及德國的《明星》（*Stern*）等。這些印刷媒體的問世，促使新聞攝影和社會紀實攝影發生全新的變革運動。

1930 年代特定的社會歷史情境和政治背景，也推動紀實傳統的確立。當時的英國，正面臨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同時遭遇社會對抗和國內階級衝突，尤其是南北衝突 (Edwards, 1983)。愛國主義的集體情緒急需被激發以對付共同敵人，而英國社會也尋找著能產生「社會透明度」的新方法，力求減少階級衝突、建立社會穩定 (Hall, 1972: 89-91)。英國當時的社會紀實攝影，尤其是《圖片郵報》和「大眾觀察」（Mass Observation）運動中進行的那些攝影，在這一歷史脈絡上，提供能公開、不受蒙蔽地「客觀」看見現實的「社會之眼」(Taylor, 1994: 157)。Stuart Hall 把這本雜誌對普通人「共性」和「代表性」的強調，視為一種有效的社會修辭，一種「攝影對象的民主化」(Hall, 1972: 83)，並探討它最終是如何成為改良主義式攝影的陣地（同上引：109）。Terry Morden 則聚焦於分析這本雜誌協助建立英國共識政治和國家記憶的努力 (Morden, 1986: 171-172)。John Taylor 也檢視「大眾觀察」運動中的一個特徵：它充滿由中產階級觀察者先入為主的看待工人階級的「客觀」照片 (Taylor, 1994: 161)。

而美國此時正值大蕭條時期，「新政」政府用紀實攝影，來進行其農業復興政策的政府宣傳 (Eisinger, 1995: 87)。FSA 紀錄團隊的攝影，可謂美國 1930 年代最有影響力的紀實計畫，用 Tagg 的話說，它以一種對公眾生產和傳遞「真實」的有力方式，有效展開這項攝影計畫。對公眾來說，貧窮和苦難，就是由紀實攝影的實踐來界定的 (Tagg, 1988: 173-174)。FSA 攝影的豐厚影像遺產本身，也受到攝影批評者的許多檢視，包括對一些個別攝影者作品的爭論，並且挑戰 FSA 攝影所進行的意識形態與社會控制的集體而有計畫的工作。例如，這些照片中的「人道關懷情緒」和紀實攝影，如何創造出一種「改良效果」（ameliorative effect）(Stange, 1989: 107)；它如何將結構性問題個人化，使 FSA 攝影成為一個「紀實事業」(Solomon-Godeau, 1991: 76)；以及，它如何最終成為服務於「監視、改造和控制」的話語權力 (Tagg, 1988: 173-174)。P. Szto (2008) 則發現，美國自

1897 ~ 1943 的社會福利發展史裡，紀實攝影對於說服和推動社會福利政策，是一個非常有效的工具，它也協助宣傳政府的社會福利工作的成果。這與 FSA 攝影小組為羅斯福政府進行的對農業政策之確認的政治功能，是相當類似的。

因此，西方的紀實傳統自 1930 年代開始，呈現出一片鼎盛的發展。紀實攝影的社會、政治和文化效力影響深遠，在此後的連續幾十年裡，輪番展示著現實主義和人道主義攝影中蘊含的「有效論述」（discursive validity）。例如 W. Eugene Smith 和 Don McCullin 的作品，或是 1955 年於紐約現代美術館著名的「人類一家」（The Family of Man）大型攝影展。Sekula 批評這個展覽，是企圖「統一攝影話語」(Sekula, 1983: 140)。然而，即使到了 1990 年代、乃至進入 21 世紀，現實主義攝影中的人道主義和改良主義式（reformist）的實踐取徑，仍然行情可觀；西方紀實攝影的「通貨」（currency）價值，還是和從前一樣堅挺。

Sebastiao Salgado 的作品，即是最具代表性的當代例證。他的兩部聞名全球的紀實攝影巨著 Workers: an Archaeology of the Industrial Age（1993）和 Migrations: Humanity in Transition（2000），是西方這套「人類一家」式宏大影像論述，和統一攝影話語意義的顛峰之作 (Kuo, 2006)。作品中以美感化的（aestheticized）攝影語彙，所呈現的普遍化（universalized）的意義，掩蓋、抹除每位被攝對象背後高度差異化的在地背景與原因；與此同時，這些作品卻無視於造成苦難和不公義的真正罪魁禍首，即複雜卻「不可見」（也就是無法被「現場目擊」）的國際政治結構。

最近關於紀實攝影的一些研究，繼續對傳統紀實攝影的感性訴求與美感化的敘事手法進行反省，並試圖提出掙脫此紀實窠臼、又能讓攝影產生政治意義的方法。活躍於當代藝術的西班牙策展人 Jorge Ribalta (2015)，為馬德里「索菲亞王后國家藝術中心博物館」策展的《尚未：紀實的再創造與現代主義批判》專書裡，主張紀實攝影必須再造自我批判的面向與「新前衛」（neo-avant-garde）的表述能力，並克服攝影的透明性與普遍性意義這類現代神話（2015: Foreword）。阿根廷學者 Agustin Berti & Andrea Torrano (2015: 86) 通過對阿根廷攝影家 Seba Kurtis 以有瑕疵的或「非典型」（heterodox）的方式，呈現流離議題之作品的分析，認為 Kurtis 這種揉雜倫理、政治、美學、技術和主題於一爐的攝影作品，才能重新賦予攝影以「靈光」，並對抗傳統紀實攝影那種史詩腔調的、觸人情緒的、或美感化的影像，以及這些手法所產生的去政治性結果。Veronica Tello (2014: 556) 研究「劫後攝影」（aftermath photography）的美學與政治時，以澳洲攝影家 Rosemary Laing 的作品 Welcome to Australia 為例，強調災難或創傷之後的攝

影題材，若不能對事件或經驗之粗暴性本身，創造出具有直面衝撞意義的影像，那麼「劫後攝影」將容易落入一種不真實的、疏離的、具有奇特之劇場感的閱讀效果裡。

三、對西方新聞攝影問題的論爭

從影像內容的獲取方式和再現世界的概念而言，新聞攝影（photojournalism）與紀實攝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基本上是同一個籮筐裡的事物。它們同樣相信攝影的精神與獨特語言，在於現場見證、抓拍、不做其他的影像修飾竄改。Frank Webster (1980) 指出，一種觀看世界的特定社會／文化背景、角度、時間，成為新聞攝影的核心概念。報紙機構也許未必需要對這種觀看方式直接負責，但它卻強大有效的不斷鞏固這種觀看世界的成見與特殊性，並且透過照片的刊載，日復一日地傳送出去 (Webster, 1980: 236)。

他並指出，基於對維持經濟與社會現狀的高度承諾，新聞攝影媒介通常是一種保守的文化；以一般新聞媒體在社會上的主流地位，支持主流社會共識、將變革的需要最小化，是這類媒體的利益所在。要達到這樣的效果，一種有效的方法，就是透過新聞照片，支持、維護一種對政治與社會既有的觀看方式。由於大眾媒介「不僅是生意，而且是大生意」（同上引：237），新聞攝影在這裡就有兩重角色和功能：它既提供一種維繫現狀的觀看方式，本身又同時是一個消費性的視覺商品。

John Taylor (1991) 在他對英國報業於幾次主要戰爭（一戰、二戰、福克蘭戰役、和英國與愛爾蘭共和軍 IRA 的交戰）的新聞照片的研究裡，發現當涉及「國家安全」、尤其 IRA 恐怖主義議題時，平常看似監督國家的媒體，此時就會自動和國家站在同一觀點，即以官方觀點來呈現照片的訊息。Taylor 進一步研究戰爭與災難現場新聞照片所提供的幾種心理效果。這些效果，包括令人驚嚇、不忍的殘酷血腥畫面，以及它們創造的一種情緒上暫時「止痛」的短暫治療作用 (Taylor, 1998: 19)；而許多來自戰爭或災難現場的具有人道主義情懷的照片，例如紐約著名戰地攝影記者 James Nachtway 的攝自全球戰爭與災難現場的影像，只是不斷製造讀者的悲憫情緒，卻無法產生讓觀者進一步瞭解災難背後之全盤知識的動能，因為這樣的悲憫情緒，很快會形成「同情心疲乏」的效果（同上引：134-136）。

對於新聞攝影是否為事件現場的忠實紀錄，能否提供或繼續維持著讀者對新聞照片「真實性」的信賴，以及，新聞攝影究竟能否提供有價值的知識或認

識、從而激發讀者具政治意義的行動，一直是西方攝影論述中的一個焦點議題與爭論。Sontag 在《論攝影》（*On Photography*）裡，對此議題表達了毫無迴旋空間的否定與批判立場。她認為「照片不僅是在紀錄真實，更已經變成我們〔讀者〕該如何看待事物的標準方式，因此〔照片〕也已經改變真實和現實主義的概念本身」(Sontag, 1978: 87)。Sontag 對攝影與真實的高論與雄辯，在經過二十多年之後，卻被她自己懷疑起來。在《旁觀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她跟自己過往的攝影意見爭論起來。儘管 Sontag 對一些紀實攝影最新實踐的分析依然犀利，她對戰爭題材的新聞攝影能否產生政治意義與行動可能，做了很大的修正和自我顛覆。由於她親身體驗了 1990 年代前期在巴爾幹半島上的戰火、和塞拉耶佛城裡的戰地生活，使她認為描述戰爭的新聞照片還是需要的，對西方人知道戰爭和苦難存在的認知，仍然有幫助。

關於新聞攝影是否還能提供「複製真實」的「契約」（contract），以及這兩者之間長久以來的緊密連結或緊張關係，是許多批評者與研究者對攝影的一個集中的關切。一些研究指出，數位時代的全面降臨、應用於新聞照片的攝取與編輯，讓許多緊守新聞攝影傳統倫理的專業工作者，產生很大的焦慮，並且急於捍衛影像必須忠於真實、不可竄改的攝影倫理 (Becker, 1991; Ritchin, 1990, 1991; Walker, 1995)。Taylor 對於近年在西方報紙上大量刊出的美軍虐待伊拉克囚犯的照片，進行攝影與真實之連結的研究。他發現，這兩者之間的「契約」是脆弱的，因為許多虐囚照片都被電腦竄改過；當有些竄改必須拒絕，有另一些被竄改的照片則大約可被接受，只要沒有人發現，或被改過的照片符合人們的習慣性理解。另外還有一些被竄改的照片，則完全可被接受，因為它們全然符合了人們對攝影呈現哪些真實的既定期待 (Taylor, 2005: 39)。

對於新聞攝影對主流價值的再確認、與它跟國家的關係，A. Mendelson (2004) 對長期提供 *Saturday Evening Post* 之封面圖片的特寫新聞攝影家 Norman Rockwell 的作品進行分析，並發現這些照片提供著對美國美好舊日之傳統價值與神話的再確認 (Mendelson, 2004: 176)。L. Kennedy (2008) 則對美國主流新聞照片與另類媒體之數位照片在紀錄伊拉克戰爭的研究中，發現新聞攝影一方面支持國家的政治地理觀點，但也有挑戰這樣觀點的可能，但後者幾乎都存在於另類或小眾媒體中。Patrik Aker (2012) 在研究中，對比八年前與此時瑞典幾份質報的頭版照片，發現報紙頭版喜歡使用大尺寸的、視覺上愉悅的、甚至有時意義如謎般的照片，八年前後未見多少變化。Aker 進而指出，這種「藝術取向的新聞」（journalism-as-art）意味著對傳統概念的、客觀的新聞攝影漸行漸遠。他認為，如果大眾能

因此逐漸理解，照片是詮釋和建構現實的媒介，而非現實的部分配件時，專業新聞攝影的未來仍有希望。

另一些理論家對於攝影與現實世界的「契約」，則提出不同的思考與重新的評議。John Roberts (1998) 對於西方攝影理論界對現實主義攝影的批判，大不以為然；他對批判的攝影理論進行反駁，認為批評者把對西方實證主義的批判，與現實主義混同起來是誤謬的。性別研究學者 Judith Butler，近年也將研究關注放在對攝影的書寫上。她從心理分析的角度，研究伊拉克阿布拉比監獄美軍虐囚的照片，認為那些虐囚之荒謬殘暴行徑的照片，不能只產生麻木作用，而是讓第一世界的讀者檢視，為何西方人可以對這些殘酷不仁的行徑視而不見，因此照片仍有政治意義 (Butler, 2007: 966; 2009)。

以色列學者 Ariella Azoulay (2008) 也重新評價攝影與現實的連結，及其在政治的作用；她認為照片對於缺乏權力的人而言（例如在以色列境內沒有公民身分的巴勒斯坦人，或西方社會的婦女），可以使之成為一種「攝影公民」，也就是利用照片創造某種公民的權力。孟加拉新聞攝影家 Ismail Ferdous (2014)，以 2013 年自己拍攝達卡市一棟製衣工廠大廈倒蹋、死傷三千多人的災難事件為例，認為新聞攝影具有行動主義的精神，讓觀者思考核心信念並產生相互關切的責任，成為一種國際公民。他認為新聞攝影的力量，可以讓人們扭頭不看，或者提出問題，而後者正是他的攝影目的[7]。

Susie Linfield (2010) 是繼 John Roberts 之後，近年大聲捍衛新聞攝影價值的最主要的雄辯者之一。如同 Roberts，Linfield 在專著中先將批判觀點的攝影理論家／批評家，檢視並反駁一遭，從 Benjamin、Barthes、Berger 到 Sontag，無一倖免。論及 Robert Capa 的照片時，她提醒我們，不需要在對現實表象的天真輕信與對世界的虛無懷疑之間做出選擇，而是去辨識每一種見證和記錄形式，可以提供我們對世界怎樣的理解。這個說法固然聞之有理，但它並沒有回答，如果攝影的見證方式無法有效理解世界時，該怎麼辦 (Linfield, 2010: 201-202)。Linfield 討論著名戰禍攝影家 James Nachtwey 時，一方面批評攝影家無論拍攝「後九一一」或伊斯蘭世界的題材，總是關注自己影像的抽象造型與美感表現，除了戲劇性的、驚悚駭人的視覺趣味，所剩無幾；另一方面，她又說 Nachtwey 的照片能讓我們更貼近的看、仍有其價值（同上引：230-231）。這樣模稜兩可、自

7 Ferdous 提到，他所拍攝的製衣工廠建築大樓倒蹋的作品「時尚的致命代價」，要呈現的是孟加拉製衣血汗工廠和西方服飾消費者之間的鴻溝。不過，他理想主義的主觀願望，並不自動證明，這些現場災難照片的影像可以有效傳遞上述的訊息，或者讓西方的服飾消費者反省。

相矛盾的論述，充斥全書，似乎顯示了傳統新聞攝影的辯護者，固然有著淑世熱情與對傳播正義的堅持，但就攝影與真實和政治的思考，仍相對不足。

參、影像「劇場」的推動者：普立茲新聞攝影獎

當具有浪漫理想情操的傳統新聞／紀實攝影評論者，堅定捍衛這個傳統的價值與政治作用時，一些在新聞攝影實務線上的資深工作者，反而比較誠實、或者說比較務實的看待這個專業。在《目擊的力量：新聞攝影 150 年》（2012）一書裡，專業經驗豐富的作者 Reuel Golden[8]，站在認同新聞攝影價值的基本立場，也以一種理性持平的距離，指出新聞攝影向來的特質與問題：「自從相機這個媒介進入新聞報導領域之後，新聞攝影師幾乎就只拍那些人性在生存邊緣掙扎的題材，……戰爭、內亂、飢荒、天災、貧窮、無家可歸等，都是新聞攝影師在這一百五十多年來所講述的悲慘故事題材。」（Golden, 2012／鐘聖雄、莊璧綺譯，2012：14）

Golden 坦言，新聞攝影記者身處高度商業化的工作環境，負面題材的照片和故事的市場需求是不斷的，而「好消息對於報紙銷量向來沒什麼幫助」。在這個現實下，他看到新聞攝影的美學觀點，即是「要讓影像盡可能具有衝擊性，通常這意味著必須美化部分悲慘、苦難的場景」。Golden 指出，新聞攝影記者非常瞭解，「一張構圖精確、影調迷人、用光完美的照片」，才能引起讀者的注意；一種「戲劇性」的新聞事件被影像化之後，事件的戲劇性影像容易長留人們的記憶中（同上引：14-16）[9]。他在此書前言的最後，直白的總結了新聞攝影：「在不遠的未來，新聞攝影還能有什麼重要功能？……如果 21 世紀就像前面幾個世紀一樣充斥的血腥和暴力，那麼新聞攝影也仍將繼續扮演觀察者和目擊者的角色——這是個壞消息，也是好消息。」（同上引：17）。

《攝影的精神》作者 Gerry Badger 為《馬格蘭眼中的馬格蘭》（2015）寫的序言〈馬格蘭照片是什麼？〉裡，則認為「戰爭、政治鬥爭與災難，這類典型的馬格蘭題材，不幸仍舊維持著主流地位。……而徠卡相機與黑白底片（或是設定在黑白模式的數位相機）仍然是馬格蘭的標準配備。」（Lardinois, 2007／李

8 Golden 曾任《英國攝影雜誌》（*British Journal of Photography*）以及世界最大專業攝影雜誌《PDN》（*Photo District News*）的編輯。

9 但 Golden（2011／鐘聖雄、莊璧綺譯，2012: 16）也認為，純粹戲劇性新聞事件的照片，和著重與人互動的紀實攝影，界線並非十分清楚；他也強調，歷史並不只是呈現戲劇性事件那麼簡單。

永適、盧郁心、吳孟真、王敏穎、林潔盈，2015：9）儘管該書已納入不少馬格蘭攝影師的彩色作品，為何黑白底片或黑白模式的數位影像，仍是馬格蘭一向的「標準配備」？本文認為，新聞攝影師在彩色攝影早已被普遍使用的年代，仍偏好以黑白照片作為敘事與美學選擇，乃是因為去除了「彩色」的寫實成分後，黑白攝影得以更有效的凝練現實情境裡的視覺秩序、符號的抽象性，以及事件／場景的戲劇性。事件的戲劇性或劇場感，不僅來自攝影快門所凍結的瞬間，或它所產生的時間感，並且來自空間中被抽象化、符號化了的線條、光影與情緒；抽掉色彩元素之後的黑白照片，比較能夠達到這樣的視覺和心理效果。

回到最具全球知名度與影響力的「普立茲新聞攝影獎」[10]，主事者和輿論界看待或描述它的方式，也清楚的為這個專業新聞攝影競賽機制定了性。此展覽於臺灣首度展出的主辦者之一「時藝多媒體」的官網宣傳文字，稱此攝影獎為「新聞攝影界的奧斯卡」[11]。本文認為這個稱號和比喻是準確的。在地的另一位主辦者、臺灣文創發展公司董事長王榮文，在此展的專刊中描述他與其團隊經營「1914 華山文創園區」的理念，是「經營空間、經營時間、經營創意、經營故事、經營感動」；而他認為普立茲攝影獎的經典得獎作品，正是這五種經營的典範表現（Rubin & Newton, 2011 ／中國時報國際新聞中心譯，2013：xi）。

專刊裡對此展覽的策展人西瑪 • 魯賓（Cyma Rubin）的履歷介紹，精準的描述了這項望重國際的「專業新聞攝影大展」的意義，究竟該怎麼定位：魯賓女士是紐約「商業娛樂公司」（Business of Entertainment, Inc.）總裁，製作人、導演兼編劇，監製的作品包括獲得東尼獎的百老匯音樂劇、多部華納兄弟公司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電影、百事可樂的多媒體表演等。如果「奧斯卡獎」大抵是肯定美國主流商業娛樂電影之市場表現的比賽，而魯賓在商言商，視普立茲攝影得獎作品為具有高度戲劇性、娛樂性與商業價值的商品，不僅於 1999 年製作並導演特納電視網（Turner Network TV）特別節目《衝擊時刻：普立茲新聞攝影獎作品的故事》，更積極擔任「瞬間的永恆：普立茲新聞攝影獎作品展」巡迴展的策

10 「普立茲獎」（The Pulitzer Prizes）由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執行匈牙利裔紐約報人普立茲的遺願，成立於 1917 年。每年頒發 21 種獎項，包括詩歌、小說、戲劇、音樂等諸多領域；於 1942 起頒發的新聞攝影獎項，只是其中之一。此獎項從 1968 年起，分為「現場新聞攝影獎」與「特寫攝影獎」兩種；2000 年起，前者改稱「突發新聞攝影獎」。根據 2013 年「普立茲新聞攝影獎 70 年大展」的主辦者之一、旺旺中時媒體集團總經理蔡紹中，「普立茲新聞攝影獎」是媒體界視為最高殊榮的專業新聞攝影競賽。自 2000 年首度於紐約展出此競賽的全體得獎作品後，十多年來僅僅在美國各地博物館等機構的巡迴展出，參觀人數即已超過 300 萬人。見 Rubin & Newton（2011 ／中國時報國際新聞中心譯，2013：x）。

11 參見 www.mediasphere.com.tw/pulitzertw/photo-detail.aspx?id=2

展人，以獲取巨大商業利益。那麼稱普立茲攝影獎為「新聞攝影界的奧斯卡」，可算是恰如其份[12]。

此巡迴展與專刊版權的另一美方主辦者兼擁有者「新聞博物館」（NEWSEUM）的執行長 James C. Duff，在此專刊的序文最後，引述攝影記者 John White 的話：「我們有如坐在歷史舞臺前的第一排，經常會說：『沒錯，我還記得那件事。』普立茲獎的得獎作品，則是具有永恆價值的鏡子」（Rubin & Newton, 2011 ／中國時報國際新聞中心譯，2013：2）。這一面面「歷史的鏡子」，替人們對歷史與政治社會現實的理解，做了怎樣的照明，暫且不論；但「坐在舞臺前的第一排」這個意象，與王榮文認為普立茲得獎照片是在經營時空、創意、故事、感動的描述，綜而觀之，在在為這項專業新聞攝影作品的定位與特質，提供了相當真實的敘述。

坐在這個「歷史劇院」最靠近舞臺的位置，觀眾從 70 年來總共 164 幅展出的普立茲新聞攝影得獎作品裡，看到的歷史內容，主要是以下這些：一、意外、災難／飢荒、戰爭現場的影像，共 68 幅；二、衝突、刺殺現場的目擊影像，共 25 幅；三、溫馨、感性的時刻，或政治人物的正面形象，共 23 幅；四、救援危難的人性時刻，共 10 幅；五、美國國家主義／愛國情緒的影像（例如附錄一），共 8 幅。另外，有 16 幅的主題涉及社會議題、工農／底層階級，7 幅表現名人肖像，6 幅涉及黑人民權運動或種族衝突，1 幅描述日常生活。主要影像內容的前三種主題是意外、災難、戰亂、衝突、刺殺，和溫馨感性的瞬間，總共就有 116 幅，超過 70 年裡得獎作品數量的三分之二。

這些影像，充滿故事性與戲劇性，絕大多數刺激著觀者的視覺經驗與心理層面，觸動情緒，如同好萊塢讓人緊張凝神、觸目心驚或溫馨落淚的電影情節。從 1942 年首度頒發的新聞攝影得獎作品開始，那幅在底特律「汽車工人工會」罷工線上、八名工人捶打一名反對罷工者的照片（附錄二），就為普立茲獎以及新聞攝影的特色定了調：在具有臨場感的突發事件現場，以中景或近景／特寫（通常稍帶廣角的）鏡頭與鏡位，捕捉動作事件中的一個充滿戲劇張力的瞬間。翻閱歷年的獲獎作品，絕大部分是這樣的畫面，少有非劇情性、非動作性的遠景鏡頭。

無論坐在「歷史劇院」的前排或最後一排，觀眾通過普立茲新聞攝影得獎作品，看到的是照相機捕捉的題材不同但性質類似的視覺劇場，和意義被高度化約

12 在此專刊的版權頁顯示，「時藝多媒體」等本地主辦者，只是臺灣地區的展覽共同主辦者，並不擁有此專刊的版權；該出版物的版權僅屬於美國 Business of Entertainment, Inc. 與另一主辦方 Newseum Inc. 所有。或許這也間接反映了此展具有必須嚴格控制的商業利益（Rubin & Newton, 2011 ／中國時報國際新聞中心譯，2013：iv-v）。

的對特定事件的理解。它們刺激、震驚、觸動觀者的感官神經與好奇的眼睛，但如同 Frank Webster 所說，它們提供的是一種維繫現狀的觀看方式，本身又是一個消費性的視覺商品。世界上有很多意義重大的正面事件，但如 Golden 所說，好消息對報紙銷售沒有幫助；另一方面，歷史現實中其實也有太多比這些意外或衝突更重要的問題，或結構性的災難與危險，但是它們沒有畫面，無法「目擊」。目擊式的新聞攝影，最後大約只能是一種「劇場」。

肆、回顧臺灣 1980 年代的政治反抗影像

美國或西方的新聞／紀實攝影實踐，與臺灣現實主義攝影在社會運動／政治改革上的實踐經驗，在時代脈絡和歷史發展上有很大的差異。成熟於 1920 ~ 1930 年代、全盛於 1950 年代、至 1980 年代為止都是新聞／紀實攝影之黃金年代的西方工業國家（Lardinois, 2007 ／李永適等譯，2015：8-9），在這個影像媒介顛峰發展的年代裡，大致都早已擁有了相當充分的民主制度與言論自由。相對地，揭露現實或政治反抗的影像實踐，在 1970 年代以後的臺灣，或其他亞洲新興民主國家，普遍還是一種新生事物和陌生的經驗，如同民主化的經驗本身。臺灣在 1980 年代之前的那段為期已 30 年之久的戒嚴時期，並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政治反抗攝影，連比較自覺的現實主義攝影實踐都不多，王信、林柏樑、阮義忠、梁正居等人，算是比較知名的其中幾位開拓者。

1970 年代後期，有一些當年推動民主運動人士，在各類活動場合裡的人物合照或發言臺上的照片，收錄在《反抗的意志：1977-1979 美麗島民主運動影像史》（財團法人施明德文化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2014），但大約也僅止於這樣性質的照片。戒嚴時期最普遍的一種攝影實踐，是不碰現實的沙龍攝影。必須觸碰現實的新聞攝影，則被黨國政治宣傳喉舌的官方或官方化的制式新聞照片，包辦了生產和觀看的方式。由過去曾堅定反共的中國時報系所出版的《臺灣：戰後 50 年》（中國時報，1995）這本具有檔案價值的新聞攝影資料書裡，那些大量來自中央社與其他來源，突顯光明面、強化反共愛國意識型態的照片，清楚的說明了這件事。

臺灣的 1980 年代，是社會力大幅度釋放、政治反對運動高漲，而終至取得了民主化運動腳步加快、促成解嚴的時代。見證／控訴式的現實主義攝影，在那個狂飆年代裡，對協助推動政治反對運動、社會改革與民主化的進程，究竟發揮了怎樣的作用，或多大程度的加速了這些政治改革時間表，還需要更多仔細的探

討。如何準確評估攝影在當時產生的政治效果，可能也是一個相當困難的工作。即使重新對那個時代的人們，做抽樣的問卷調查等量化研究，可能許多人已不容易準確回憶或分辨，30 年前的那些社運照片或街頭衝突影像，對他們當時產生的政治認識上的影響，究竟占有怎樣的比重。

記憶可能逐漸模糊之外，評估的方法或許也成問題，因為在那個風起雲湧的政治抗爭年代裡，喚醒、鼓舞人們起而進行抗爭行動的因素或觸媒，不止一端，很難指認哪一個媒體形式、特定文本、甚至事件本身，絕對地開啟、引導了個人或集體的政治抗爭意志與行動。攝影之外，文字書寫、各類社會運動、政治受難家屬在街頭集會的悲情控訴、小劇場運動、家庭錄影帶的影像目擊……，凡此皆交互影響著人們的政治認識與抗爭意識。儘管如此，靜態影像在尤其是 1980 年代後期的臺灣政治反抗運動裡，所可能產生的效應，還是值得討論。翻閱那個時代的紀實影像，以及相應的文字書寫，本文發現這些影像需要再思考與再評估。簡單的說，作為民主化啟蒙時期政治反抗運動的影像，雖然它們的政治目的和話語意義是單一的，甚至常常簡化了人們對複雜現實政治的理解——這些理解必須參照對歷史的仔細梳理；但是，這些影像見證，放在臺灣 1980 年代首次有機會以影像揭露長期被遮蔽之現實的語境裡，仍然扮演了一個無法小覷的角色。

臺灣的 1980 年代，可以說是從 1979 年底的「美麗島事件」展開序幕的。在政治反對運動上，從民主運動人士在高雄街頭示威、國民黨政府隨即大規模逮捕的這個事件開始，刺激了黨外運動的風起雲湧，進而導致 1986 年民進黨的成立，與隔年的政治解嚴。期間，「黨外雜誌」這項在當年不斷被查禁、又不斷登記出版新刊物的奇特時代產物，前仆後繼的接力出刊，在文字媒介中也帶有影像訊息，雖然 1980 年代前幾年的黨外刊物，照片的內容和使用，並不特別積極有力。但後來也開始有比較善於使用街頭運動照片的刊物，例如鄭南榕的《創新時代》週刊，即曾以特刊方式，整本報導關於 1988 年的「五二〇農民運動」在臺北街頭的現場（附錄三），並佐以相當數量的照片[13]。

1987 年宣布解嚴之前，報紙是被官方監管的。1986 年 12 月 2 日的「中正機場事件」（附錄四），是解嚴前的一次主要警民衝突流血事件，前往迎接當年被禁止入境的許信良闖關回國的民眾，與軍警嚴重衝突，許多人被鎮暴警察打得滿臉是血，或拖到鎮暴車裡修理。隔天，當其他各報依然對此事件噤聲不語、或只片面報導軍警受傷的畫面時，當時的《自立晚報》，以二版的整版篇幅，獨家圖

13 《創新時代》週刊的〈「五二〇」農民血戰街頭 24 小時〉特刊號，以 8 頁銅板紙刊登農民運動街頭抗爭的彩色照片。

文報導了此事件的軍警暴力。那天的報導，也是臺灣報業、民主運動、與攝影實踐的一個轉捩點：它對接下來的選舉產生關鍵性影響，將《自立晚報》的民間聲望推到頂峰，同時衝破了見證性政治新聞照片不能上報的長期禁忌。

以《自立晚報》的攝影記者群為主力，旁及當時其他報紙與雜誌攝影記者的政治反抗影像，在 1980 年代後期到 1990 年代初期，蔚為臺灣新聞紀實攝影史上一段澎湃激昂的集體實踐。《自立晚報》的吳耀坤、許伯鑫、曾文邦、潘小俠、劉振祥、謝三泰，《自立早報》的陳國禎、楊永智，《首都早報》的許斌、蔡明德，中時報系的林少岩、許村旭、黃子明、葉清芳、蔡文祥，在政論雜誌發表照片的余岳叔、宋隆泉，《新新聞》的陳孔顧，《天下》雜誌的陳炳勳，等等，是那個時代裡一些代表性的攝影記者。他們對政治反抗運動的時代紀錄，有些被整理在幾份相關攝影集裡；較為人所知的，包括楊永智的《國會生態學》（1987）、宋隆泉（1992）的《見證：臺灣街頭運動影像錄，1986・519 ～ 1989・519》[14]，以及由劉振祥（1995）主編、民進黨中央黨部出版、選輯前述各媒體攝影記者代表作品的《給臺灣一個機會》[15]。

當時在國會裡或政治抗爭街頭，跟著衝鋒陷陣捕捉影像的這些攝影記者，多半並不是西方專業攝影記者的那種冷靜旁觀的紀錄者，而比較是政治反對運動或各類社會運動程度不同的支持者或參與者。他們一面見證了那個狂飆的年代，一面也成為情緒集體爆發的一個組成部分，希望通過手中的相機，協助政治反對運動，共同終止國民黨的長期執政狀態。在衝突抗爭的行動現場，攝影記者的人身安全，有一定程度的危險；他們常無法避免地同遭警棍與水柱之殃，或在警民相互推擠的拳腳或棍棒中，傷及身體或器材，甚至有時被誤認為親官方媒體的記者，而被抗爭民眾追打。

在這樣的身體處境、工作狀態和政治立場下，回顧 1980 年代後期起的新聞／紀實攝影所集體提供的影像見證，可以發現在那個時代語境裡，它們呈現了特定的話語特質或意義。扼要的說，這些影像讓關切政治現實的民眾，通過抗爭者被鎮壓的身體經驗的視覺化，看見了國家暴力的冷酷本質。同時，由於攝影者對揭露此面向之真實的強烈慾望，使得在政治道德的敘述和判斷上，也傾向一種簡

14 此攝影集於 2004 年由桂冠出版社重新出版，書名改為《另一種注目：見證臺灣民主風起雲湧的年代，1986・519 ~ 1989・519》（宋隆泉，2004）。

15 除了這三本攝影集，《攝影之聲》主編李威儀（2014）在〈抗議影像與臺灣：攝影書的觀點〉一文中，整理了其他幾份重要的民主運動的影像資料，包括：周本驥等編，《動盪，1986 ！》（1986）；「新臺灣文教基金會」編，《歷史的凝結：1977-79 臺灣民主運動像史》（1999）；張富忠、邱萬興編，《綠色年代——臺灣民主運動 25 年》（上、下）（2005）等。

化的二分概念：國民黨是萬惡的，而其反對者則都是正義、良善、受害的一方。在民主運動的理解上，從而變成只要推翻國民黨政權，就是臺灣社會的出頭天。

儘管見證式的照片，大抵難以提供對政治問題的層次複雜的認識，而這樣的簡化認識與二分概念，也讓臺灣民主化運動的過程，付出了不少代價，直至今日。但是，如果這些學步過程無法加速，民主化經驗不能便宜跳過的話，則那些目擊政治抗爭現場的照片，仍舊有它們在當時所起的階段性作用，和今日成為某種歷史檔案的價值。當時的主流媒體，仍無充分的言論自由，因此見證性的照片，辯證的看，在當年對民眾也許仍屬必要的政治啟蒙手段或過程。同時，如前所述《自立晚報》處理「中正機場事件」的創舉，也對言論自由的尺度做出了貢獻。

目擊性的照片，可以激勵弱勢者、被壓迫者或受剝削者，成為他們相互鼓舞和自我培力的一種催化劑，但是，它也可以形成政治神話。在《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行動思想家鄭南榕》（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2013）裡，鄭南榕拒絕統治者的拘捕、1989 年 4 月在雜誌社辦公室內自焚後的照片，5 月份規模空前盛大的出殯遊行照片，以及他的手稿、遺物、語錄，是一組鮮明的例子。雖然鄭南榕訴求的是臺獨建國，但無論支持此訴求與否，他悍然就義的殉道精神，對於當年不僅是對抗國民黨、且可能同時也對不滿於民進黨之現實性格的民主運動參與者而言，都提供了當時社會相當需要的一種道德典範或反省自身的鏡子；出殯照片中鄭南榕頭綁「新國家運動」布條的巨幅側面半身遺照，則成為人們逼視自己道德良心的視覺利刃（附錄五）。然而，25 年之後，在「太陽花運動」的抗爭靜坐現場，鄭南榕竟然成為反服貿議題的一個「精神圖騰」（張世倫，2014：31），毋寧是個有趣且值得分析的景象。本文在下一節，將回到這個運動景象裡。

1980 年代後期見證式的政治反抗影像，有當時的意義脈絡。1990 年起的 25 年來，大小社會運動不斷，而照片繼續成為它們的見證工具和傳播媒介。目擊的照片和它們的集體作用，對政治能夠繼續提供怎樣的認識與行動？本文對「太陽花運動」的照片分析，試圖回答這個問題。

伍、閱讀「太陽花運動」的新聞／紀實攝影

本文開頭提及，「太陽花運動」無論在學運／社運的規模、方式、影響等各方面，或者隨此運動生產出來的照片、塗鴉、插畫、海報等各類視覺圖像，涵蓋層面之廣、數量之大，在臺灣過去的民主化經驗中相當罕見，值得深入研究和論述。就此次運動本身，學運青年為了有效阻止兩岸服貿協議以不透明的協商過程

通過實施，率先衝進並占領立法院議場 24 天；他們同時在立法院周邊街道靜坐抗議，癱瘓了立法院的議事與周邊的交通，並曾一度短暫占領行政院，以及在占領立院期間，宣稱集結了 50 萬人於凱達格蘭大道四周的空間靜坐抗議等等。暫不論太陽花學運青年的運動訴求和方法上的爭議，他們通過行動所引發、調動的更大範圍的青年學生與民眾對國家政策的關切，獲得許多來自社會的肯定與支持。

至於此運動的紀錄者、參與者和觀察者集體生產的照片與各類視覺創作，除了本文前述的幾份分別由港千尋、Sarira Huang 等拍攝的攝影集，以及由黃恐龍拍攝記錄的立法院外靜坐現場的塗鴉海報 [16] 之外，影像評論者張世倫在〈試論「太陽花」運動的視覺政治〉（2014）裡，也提及藝術家陳敬元與袁廣鳴的畫作和錄像藝術作品，並特別分析了香港攝影記者林亦非與眾不同、角度獨特的報導攝影。這些形式或視角不同的作品，固然豐富了此運動視覺圖像再現的多元性，但如本文先前所提，最具普遍代表性的攝影記錄，並非那些視角或觀點獨特的影像，而仍然是報社攝影記者的新聞照片，以及以募資與募集照片的方式出版的攝影集《天光》。

1980 年代臺灣民主化運動裡的攝影記者，大多是政治反對運動程度不同的參與者；到了 2014 年，新聞攝影記者一般而言已成為冷靜記錄的專業新聞攝影記者了。在此同時，「太陽花運動」的參與者，因為人手一機，也成為政治反對運動裡的記錄者，進行著一種見證自身參與經驗下的記錄。無論專業的媒體攝影記者，或運動參與者的記錄，基本上都仍維持著見證／目擊式的影像概念。這些見證的影像，於今是否仍然具有對現實或真相的「啟蒙」作用？它們的意義如何看待？本文在這一節裡，將分別針對拍攝者不同的兩類照片進行分析。

一、報紙專業新聞攝影記者的採訪影像

如前所述，本文取樣的四組專業攝影作品，分別來自《中國時報》方濬哲、陳振堂，與《蘋果日報》的杭大鵬、張良一等四位新聞攝影記者自行挑選的事件現場採訪照片；前三位的作品是彩色照片，張良一則以黑白照片呈現。方濬哲的 50 幅影像、杭大鵬的 88 幅影像、與張良一的 48 幅黑白影像，基本上涵蓋立法院內外的占領與靜坐場景；陳振堂的 44 幅影像，則集中於學運青年占領行政院行動的當晚與次日，不過《蘋果日報》的兩位記者的作品，也都包括了占領行政院行動中警方強制驅離靜坐者的畫面。

16 參見註 4。

四組新聞照片的內容大同小異，多著眼於立法院內外學生和社運人士的占領與靜坐狀態，以及突襲行政院的行動。在立法院內的景象，包括集體靜坐議事廳，擋住議場入口的椅子與學生，議事臺上的各種標語、看板，和食品飲水等物資；占領學生的各種特寫、神情、休息、開會、作畫、疲憊、睡眠、相互按摩減壓、一些溫馨的時刻，和最後英雄式的出關隊伍。當然，少不了林飛帆和陳為廷兩位運動領袖的肖像。

在立法院外的街頭場景，包括了持向日葵花的靜坐人潮、以及大雨中的靜坐；各種支援團隊（醫療、法律、物資等），各種海報、看板、標語布條，各種街頭特寫或細節；運動參與者與反學運者的對峙、拉扯，強力驅離群眾的噴水柱，持手機集體發光的參與群眾，值勤警員的休息、用餐，免費香腸攤……等等。而在占領行政院的行動裡，則包括了人潮聚集行政院正門，運動者跨越鐵欄杆、由二樓窗戶闖入行政院大樓，院內空地的靜坐群眾，警察的驅離行動與肢體衝突，強制拖走靜坐學生，等等。四位攝影記者的照片都具有專業新聞攝影的水平，各自捕捉到運動現場的許多衝突的瞬間畫面，或者讓人感動的情景。《蘋果日報》的張良一，以黑白影像呈現了立法院占領區內一些饒富趣味的空景或安靜的時刻，獨樹一幟；而同報的杭大鵬則相對全面的涵蓋了運動過程的各個行動和場景。

仔細比對、分析來自兩份主要日報四位攝影記者的新聞照片，並對照稍後將進行分析的《天光》攝影集，本文有以下幾個發現。首先，無論《蘋果日報》或《中國時報》的新聞照片，都反映了今日臺灣的新聞攝影記者，已經能夠比較抽離的記錄一個充滿激情與戰鬥意味的政治反對運動；他們不再像 1980 年代的攝影記者，同時是運動的參與者，而是逐漸回歸西方傳統專業新聞攝影的位置，拉出一個冷靜的觀看和記錄距離。再者，雖然《蘋果日報》和《中國時報》對服貿議題和中國事務的政治立場很不相同[17]，這兩份報紙四位攝影記者的新聞攝影視點，則大抵上相當類似。對這項發現，本文提出兩個解釋：（一）面對衝突、抗爭性的新聞事件，專業新聞記者的訓練，首先仍要求捕捉事件現場具有戲劇性的瞬間和畫面；（二）《中國時報》的攝影記者在主觀意志上，仍然傾向正面看待「太陽花運動」的意義。

第一個解釋，根據本文先前以普立茲得獎作品為例、分析西方新聞攝影的特

17 臺灣《蘋果日報》屬於香港「壹傳媒」集團，此傳媒集團在香港的政治立場是不親中、傾向泛民主派陣營，在臺灣則不涉入藍綠矛盾，但是敢對中國政府或各路政治人物做出批評。參閱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壹傳媒。《中國時報》則屬於「旺旺中時媒體集團」，自從集團總裁蔡衍明入主《中時》之後，該報社的親中立場鮮明，其干預新聞自主的行徑，備受社會各界批評與抵制。參閱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中國時報。

質，並依此檢視四位攝影記者的照片訊息，從而得到的歸納。四組影像有類似的內容，也有不同的視覺材料或場合，但是大多數的作品，無論中長景或者近景／特寫鏡頭，總會選擇一個具有劇情性或情緒感染力的視覺焦點，成為引導或攫取觀者注目的方式。這個方式，經常會以（低調或特殊）光線的位置強調，或者淺景深（small depth-of-field）的表現，突出（highlighting）畫面中的亮點人物；經常可見的例子，是在靜坐或抗議群眾中，看到一位面貌姣好的年輕女學生，或手持向日葵、或眼眶泛著淚、或抬頭微笑、吶喊，在周遭一片相對失焦的人群裡，清晰的躍然紙上，在「舞臺」中心成為視覺焦點（附錄六）。

第二個解釋，則是筆者根據1980年代以來臺灣新聞攝影記者的某種政治「傳承」，所做的觀察與假設。本文對《中國時報》攝影組的觀察與假設是，雖然「旺旺集團」入主中時，立場明顯親中，但對於從1980年代一路走來、見證過臺灣民主化運動與各類抗爭現場的資深攝影記者黃子明主任，並不會因為報社的特定政治立場，而改變他以攝影見證政治反對運動和社會公義的政治倫理。這項政治倫理，早已根植在那個民主狂飆世代的新聞攝影人身上，不可能拔除或改變他們對政治改革與社會議題的熱情。這種熱情，筆者認為會某種程度的感染或傳承給新一代的新聞攝影記者。

這個假設，在筆者對《中國時報》攝影組主任黃子明的訪談裡，得到證實。[18] 根據黃子明的描述，作為攝影部門主管，他在組內攝影記者採訪「太陽花運動」的現場前，會清楚告訴他們，報社最後怎麼使用或取捨現場照片，固然從攝影組的位置他無法干預，但是在現場拍照取材時則不需要先自我設限。黃子明也發現，中時攝影組的年輕一代記者，對太陽花運動裡的學生作為，基本上是認同或支持的；報社的既定政治立場，對他們並不發生太大的影響。而由於臺灣的平面媒體，除了來自香港的壹傳媒所屬報紙或雜誌，長期以來並不真正重視或理解照片的訊息力量[19]；攝影記者既被視為生產圖片的工具，他們的某種自主性和相對較少受到干預，也在這樣的情境夾縫中得以一定程度的維繫。

二、《天光：太陽花學運攝影集》的「影像劇場」

本文稍早已指出，《天光》是「太陽花運動」的諸多攝影實踐中，最具代

18 筆者對黃子明主任的訪談，於2015年8月16日，通過電話訪問進行。

19 臺灣報紙的總編輯，一向從文字記者的訓練中產生；他們認為報社的重要訊息，是社論、新聞標題、或論壇版上的文章等等。對影像的話語力量與可能，這些媒體經營者和管理者既不熟悉也不重視，大抵只是將照片視為搭配版面或刺激銷售的工具。

表性的一份影像文本。依據此攝影集的說明，《天光》是通過集資平臺，同時在網路上募集製作經費與照片的攝影集；製作團隊在一個月的時間內，募得新臺幣 7,450,119 元，以及來自 800 多位攝影師的 13,000 餘張照片。此攝影集的核心編輯團隊也是通過網路召集組成的，一共 17 名成員，經過 4 個月的編輯，最後選用了 280 張照片，完成此書（陳小剛，2014：295）。此書印刷 3 萬冊，並且不做再製或者再版；因此，雖然首刷的印量在臺灣來說相當龐大，但此書一出版即成為絕版書，似乎也為此書創造了一種可以成為收藏品的紀念物與珍貴資料。

這份帶有典藏性質的歷史影像集結，徵集自非新聞攝影專業的運動參與者或旁觀者的記錄。800 多位攝影者超過 13,000 張的照片，除卻重複的內容或場景，應該會有手法甚至觀點上相當多元、異質的畫面；它們若散布在網路空間的各個角落，呈現出來的可能相對地也會是一種多元的視覺風景。然而，當這些照片被編輯團隊篩選成 280 張時，多元的景觀不見了。張世倫在他對「太陽花運動」之視覺政治的分析裡，認為這次運動的視覺生產，若與解嚴前後的紀實攝影相比，則「太陽花運動」的影像，生產了一種他稱之為「情感轉向」（affective turn）的參與式美學，成為政治抗爭影像的新的視覺典範（張世倫，2014：26）。但張世倫隨即指出，這種「典範」其實仍依賴著傳統紀實影像美學裡的一些原則，例如決定性瞬間的抓拍概念，但是「一種強調素人參與、感性優先、相機無所不在（omnipresent）的美學轉向，如今似已勢不可擋」（同上引：27）。

「情感轉向」的參與式攝影記錄作為臺灣新的政治抗爭影像取徑，是一個有價值的銳利觀察。固然，在本文先前對美國／西方新聞攝影實踐的經驗分析已經發現，無論從現實主義攝影的美學特性或市場經濟的功能考量，新聞／紀實攝影的訴求，主要即是依賴情感面向的。此外，從本文對臺灣 1980 年代政治反抗影像的回顧裡，也描述了當時新聞攝影記者多是以專業者和民主化運動參與者的雙重角色，以反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集體情緒為內在動力，進行攝影見證工作。

然而，根據張世倫的觀察，「太陽花運動」裡的影像生產所呈現的主動參與和情感涉入，儘管影像美學上與過去的實踐略同，也與解嚴前後新聞記者的紀錄心情多少有些相似之處，但這次運動的影像紀錄行動，在數量上與集體行為上的強度，卻是前所未見，因而成為一個新的現象與模式。張世倫指出，「社群網站的照片與影像分享一方面宛如日記，見證了事件過程那時而百無聊賴，時而劍拔弩張的起伏節奏，另方面亦可在公權力進行視覺監控時，能近乎即時地呼朋引伴，並不斷提出對抗性的影像策略……參與式的情感影像，亦展現在議場周遭數量龐大的民眾自製海報與抗議標語上。……〔它們〕比較向是情緒宣洩與個人抒

發的『我有話要說』」（同上引）。這些是「太陽花運動」裡與先前的實踐裡不同的一種情感表現內涵。

從張世倫對此運動影像之「情感轉向」的視覺政治分析出發，閱讀《天光》攝影集，本文進一步主張，這種情感轉向的美學，及它所建構的視覺政治效果，是通過《天光》的編輯工作有效創造出來的。一言以蔽之，《天光》的編輯團隊，打造了一座完美的「影像劇場」。這座以書的形式搭建的紙上劇場，文字訊息的使用，降到最低限的程度；只有開頭和結尾，各有一小段文字陳述，各不超過 300 字。連書的頁碼，都極度低調隱密的浮印在每一開頁的右下角，必須找到合適的角度，才能從反光中隱約浮現，充滿神秘趣味。這樣的設計，也讓全書的圖片盡量流暢連續一氣呵成，不必受到頁碼標示所產生的某種「資料感」而影響了視覺效果。

全書 280 張照片裡，使用了 139 張黑白照片，穿插編排，使彩色與黑白照片各占一半的篇幅與份量。在今日相機或手機的拍照功能早已全面彩色的條件下，選用這麼多黑白照片，若不是拍攝者在相機或手機上的刻意設定，就是編輯團隊將許多原本彩色的照片，刻意變更為黑白影像。本文分析馬格蘭攝影家喜歡以黑白攝影為創作標準模式時已指出，抽掉色彩元素之後的黑白照片，比較能夠達到抽象化事件／場景的視覺和情緒效果。這也說明了《天光》儘管是運動參與者的素人影像，但是無論拍攝或編輯，仍複製著西方傳統新聞／紀實攝影的古典美學概念。

而《天光》作為劇場的概念，最具引導性的設計，是此書的編排邏輯，和區分段落的標題文字。從目錄頁可以看到，《天光》裡的照片，被編輯成一齣類似古希臘劇場形式的「七幕劇」。這七幕的標題分別是：之前（Prologue）、入夜（Nightfall）、暗夜（Dead of Night）、拂曉（Darkest Hour Before Dawn）、破曉（Breaking Dawn）、起程（Departure）、然後（Epilogue）。從「之前」到「然後」，從 Prologue 到 Epilogue，《天光》的編輯群，將太陽花運動的照片，編織成一個意義封閉完整統一、有完美句點與喜劇收場的劇本：「之前」的部分沒有照片，只留兩張黑頁，依文字描述，那是「不知何時漫入島嶼的、深沈的闇夜」（陳小剛，2014：7）；而經過重重的黑夜與更暗黑的時刻之後，破曉了、啟程了，攝影書以占領議場者「出關播種」的凱旋隊伍、林飛帆與陳為廷的英姿帥照（附錄七）、坐滿濟南路迎接出關英雄們的支持人潮，和流下喜悅之淚的年輕女子的微笑臉龐（附錄八），是幾幅影像劇場的落幕之作。

這個意義一致、封閉自足的「太陽花運動」影像劇場，將所有篩選後的照片，

嵌入它設定的分幕劇本中。雖然圖片編排順序，約略依照事件發生的先後，但也有不少在影像紀錄的時序上往返穿插編輯者，以求故事與劇場感的統一。意義統一的故事線，陳述的是一個由學運青年帶頭占領立法院、衝破暗夜迎向光明（附錄九）的過程；齊一的劇場感，則來自編輯團隊所選擇的各種訴諸感性、激情或溫情的影像瞬間。在意義和情緒統一的編輯目標下，劇場化的影像書，排除了所有不合適納入既定故事劇本的其他影像材料，或抗爭現場的多元真實。

例如，《天光》並不關照立法院外濟南路臺大校友會館前「賤民解放區」的多元意見，或者議場內的異議角落「二樓奴工區」的聲音。在攝影集的第 176、177 頁，編輯群聊備一格的放入兩張來自這兩個運動區塊、但語意非常曖昧的照片：在「賤民解放區」的布條前，一個帶著面具的抗議者，對著畫外致舉手禮，語焉不詳，缺乏意義脈絡；由於圖片說明除了拍攝時間與籠統地點外沒有任何說明，這張圖片的意思遂可以任意解讀（陳小剛，2014：176）。而攝自議場二樓「奴工區」的照片，則是此區的占領青年一同舉臂高呼的畫面，他們是在為運動呼喊，還是在支持或抗議一樓的指揮中心，完全無法得知。在曖昧的影像中，兩張僅有的來自運動現場的多元聲音，畫面的意義被收編在這個影像劇場裡。

在《這不是太陽花學運：318 運動全記錄》（晏山農、羅慧雯、梁秋虹、江昺崙，2015）附錄中的〈賤民解放區宣言〉裡，該區的共同發起人不願意「促成一場權力核心者得以自我吹捧的和平理性園遊會，而非一場屬於群眾集體的積極抗爭」，遂明白表示：「這不只是一場學生運動，在現場其實有更多各行各業的參與者：工人、農民、商人、上班族，以及更多被視為沒有參與運動決策能力的各種面貌的人們。這群人，都聚集在賤民解放區裡，嘗試開展運動的進一步想像」（同上引：371）。另一篇〈二樓奴工退場聲明〉也強調，這場行動絕不只是一場學生運動，而是「一場人民的行動」，否則占領行動無法持續；而他們作為一群封閉在議場二樓負責維安與物資人流、卻「長期被流放於運動權力邊緣的奴工」，對決策中心不做充分溝通即決定退場的「製造共識」方式，深表不滿與抗議（同上引：401-402）[20]。這些人之中，有不少受到來自這場行動的「運動傷害」，但是這些聲音與影像，在《天光》的影像劇場中完全看不見，只有眾口一聲的歡慶。

這樣的影像劇場，建構了一個道德善惡黑白二分的故事，簡化了運動現場的複雜現實和多元聲音。如此的影像再現，也跟太陽花運動的某種現象不謀而合：

20 在此運動中被迫邊緣化或自我邊緣化的「賤民」與「奴工」，在提供運動者反省與批判的意義之際，是否也被賦予了他們邊緣戰鬥的過多道德意義，可能是另一個需要爭論的議題，本文則暫時不論。

當立法院內外周遭的運動參與者，對這場行動的議題、方法或基本理念，有著非常多元、異質性的討論或爭辯時，這些多元的意見，很難出現在立院內外的主舞臺或主發言臺上。受到雙重「運動傷害」的政大研究生邱育南[21]，與筆者論及運動現場的經驗時，以運動裡的反中情緒為例，觀察到上述的現象。他指出，「中國因素」與相關議題，在運動靜坐現場確實被廣泛的討論，觀點與意見的層面則相當多元而深入；但是到了主舞臺上，關於中國的議題就迅速簡化為反中的話語或情緒，與反馬、反國民黨等同起來。

在運動的後期，鄭南榕的遺照、畫像、和那句被反覆使用的名言「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被張貼在靜坐現場，並被運動參與者佈置出一個張世倫稱之為「迷你宗教祭壇」的燭光守夜攤位（附錄十）[22]；在立院議場內的主舞臺上，鄭南榕的遺照也被供奉在主發言臺上方、國父遺像下的最明顯位置（附錄十一）[23]。這樣儀式性的場景出現在太陽花運動中，並且被拍攝、收錄在《天光》中，對運動本身，或這座影像劇場，都具有政治性的指涉或象徵意味。於運動而言，反服貿的特定議題，被化約、引導到反中和臺獨建國運動上；對於影像劇場，這張照片裡的神聖宗教氣氛，則透露了運動青年以這類視覺意象，沈浸在太陽花運動「可歌可泣」的自我感動或自我神聖化的氣氛之中。

對於第一次被號召到街頭參與靜坐抗議行動的青年學生而言，在參與公民行動的撞擊性經驗裡陷入感動情緒，並集體記錄了這樣的情緒，原可理解，無可厚非。不過，《天光》的首尾短文，將服貿議題的問題與抗爭行動，上綱為「黑暗－光明」、「矇昧－啟明」等揉雜了大量文藝腔調的文字意象，本文認為其中同時反映了運動參與者／攝影書編輯群的某種單純、素樸但無知[24]的美好熱情，也再現了這個世代的熱血青年某種容易落入自我感動、自我慶祝的集體狀態。在影像或其他資訊的生產與流通都已極為普遍的今日，戲劇性的「二元對立視覺邏輯」，和參與式照片裡「過於廉價的詮釋框架」（張世倫，2014：33），已不再具有政治啟蒙的作用，因此並無必要性。《天光》呈現的主要是一個被影像節慶化了的

21 邱育南不屬於任何社運團體或運動決策中心成員，但深度參與此次行動。在他跟隨群眾進入行政院的當晚，於院外的靜坐區被執行強制驅離的警察群毆。同時，他在參與和觀察運動的經驗中，不滿學生領袖最後凱旋出關、明星化自己的行為，因此在參與過程中身心都受到傷害。邱育南與筆者的對談，在 2014 年 4 月進行。

22 見《天光》第 154 頁照片。

23 此影像為《蘋果日報》杭大鵬拍攝的一張照片：林飛帆手持麥克風，在發言臺前講話，陳為廷比肩而站，決策中心幹部一字站開；而他們背後掛著鄭南榕的照片，與那句名言。

24 所謂「無知」，是指運動參與者和攝影書編輯群缺乏對臺灣民主化運動歷史經驗的瞭解，因此覺得「太陽花學運」是臺灣社會打開政治黑箱的第一個啟蒙運動。

關於太陽花運動的敘事，和一個影像劇場。它反映著參與者某種被齊一化的情感和認識。

陸、結語：攝影、社運與現實政治

在〈賤民解放區宣言〉裡，有這樣一段話：

> 在行動現場，雖然我們積極現／獻身，我們卻沒有參與共同決議的權利／力，使得這場運動看似集體共享，實際上所有事情卻還是一如往常地透過少數決策者來領導、發落；運動中的話語權和管理方式複製了既有代議政治式運行體制，並同樣訴諸以所謂的理性、和平作為治理手段。這些複製都源自於位居權力核心的人缺乏對行動的想像，且與多元群眾的真實樣貌、渴望及參與動能脫節——正如同我們現在所反對的政治體制一樣。（晏山農等，2015：370）

此宣言的共同發起人之一謝碩元，在另一篇描述參與運動兩週後的觀察心得文字裡表示，於他而言，「社會運動的意義，不只在於議題有沒有達成，還得看他所『溢出』的理念為何」。他認為，在「反服貿」運動中若能通過由下而上的形式，「重新反思當前資本主義與體制的邏輯」，不再讓權力與資本宰制人們，可以讓運動不只顧及眼前成果，還能展開更長遠的想像（同上引：373-376）。

如果「太陽花運動」複製著現實政治體制、缺乏社運想像的話，這樣的描述是否也可以放在對「太陽花運動」影像實踐的批評與期待上？傳統模式的新聞／紀實攝影，以訴諸情緒、製造戲劇效果的概念，在每一個重要或不重要的事件裡，重複著類似的語言和效果，也從而複製、鞏固了主流新聞攝影的體制。「太陽花運動」裡代表性的影像實踐，大幅度的改變了影像生產與流通的傳統模式，但是對攝影再現社運或政治議題的概念或表現方式，並沒有多少改變或突破，依然在既有的窠臼之中操作。

本文回顧了西方理論與批評界對新聞／紀實攝影與「真實」之間的複雜關係之論辯，並以美國「普立茲新聞攝影獎」的得獎作品為例，指出這類具有代表性的新聞攝影，其最重要的核心元素之一，即為影像所製造的戲劇性效果。這種訴諸情緒的、捕捉事件之劇場感的所謂「新聞攝影」，歷七十多年來，主宰著全球主流傳播媒介對新聞影像實踐的操作模式，為了商業媒體的既存模式與固有利

益，不曾基進的反省和改變。紀實攝影從 1936 年的《生活》雜誌開始，也建立了同樣的影像表述概念。這些源於西方的現實主義攝影傳統，定義了人們對「真實」的觀看和理解方式，進而以再現「製造」了真實。當臺灣不假思索的複製這套西方新聞／紀實攝影的「專業義理」時，複製的不僅是攝影的模式，甚至也常常是類似的角度、內容、畫面、情緒。真實、再現，與模擬、表演之間的交互作用，需要細辨。

在特定的歷史語境裡，例如 1980 年代的臺灣社會，目擊、揭露、控訴等訴諸情緒的新聞／紀實影像生產，有其階段性的政治效用。然而，30 年後的今天，在媒體使用的靈活度上，已有空前巨大的變化與可能，而影像表達的多元美學，也早已有了諸多可供參照的創作典範。那麼，繼續以訴諸情感的傳統攝影語彙，複製簡化、單一化的新聞／紀實攝影，對社運的多元意義或政治的複雜面貌，能起怎樣的認識或反省作用，抑或是協助了對現實政治邏輯的重複與強化，是本文在分析太陽花運動影像之餘，希望思考與建議的事。

參考書目

中國時報國際新聞中心譯（2013）。《普立茲新聞攝影獎 70 年大展：瞬間的永恆》。臺北，臺灣：時藝多媒體。（原書 Rubin, C., & Newton, E. [2001]. Capture the moment: the Pulitzer Prize photographs. New York, NY: Norton.）

中國時報編（1995）。《臺灣：戰後 50 年——土地．人民．歲月》。臺北，臺灣：時報文化。

宋隆泉（2004）。《另一種注目：見證臺灣民主風起雲湧的年代，1986・519 ～ 1989・519》。臺北，臺灣：桂冠。

———（1992）。《見證：臺灣街頭運動影像錄，1986・519 ～ 1989・519》。臺北，臺灣：「將集團」大將宣傳企畫工作室。

李永適、盧郁心、吳孟真、王敏穎、林潔盈譯（2015）。《馬格蘭眼中的馬格蘭》。臺北，臺灣：大石文化。（原書 Lardinois, B. [2007]. *Magnum Magnum*. London, UK: Thames & Hudson.）

李威儀（2014）。〈抗議影像與臺灣：攝影書的觀點〉。《攝影之聲》，13：14-19。

林暉鈞譯（2015）。《革命的做法：從 318 太陽花看公民運動的創造性》。臺北，臺灣：心靈工坊。（原書港千尋 [2014]. 革命のつくり方 台湾ひまわり

運動——対抗運動の創造性。東京，日本：インスクリプト。）

晏山農、羅慧雯、梁秋虹、江昺崙（2015）。《這不是太陽花學運：318 運動全紀錄》。臺北，臺灣：允晨文化。

財團法人施明德文化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編（2014）。《反抗的意志：1977-1979 美麗島民主運動影像史》。臺北，臺灣：時報文化。

張世倫（2014）。〈試論「太陽花」運動的視覺政治〉。《攝影之聲》，13：24-33。

猞猁子（2014）。*Summer vacation*。臺中，臺灣：白象文化。

陳小剛（2014）。《天光：太陽花學運攝影集》。臺北，臺灣：太陽花學運攝影及製作團隊。

黃恐龍（2014）。《野生的太陽花：學運外場的海報與塗鴉》。臺北，臺灣：玉山社。

劉振祥編（1995）。《給臺灣一個機會》。臺北，臺灣：民進黨中央黨部。

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編（2013）。《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行動思想家鄭南榕》。臺北，臺灣：書林。

鐘聖雄、莊璧綺譯（2012）。《目擊的力量：新聞攝影 150 年》。臺北，臺灣：城邦文化。（原書 Golden, R. [2011]. *Photojournalism: 150 years of outstanding press photography*. London, UK: Carlton.）

Aker, P. (2012). Photography, objectivity and the modern newspaper: Back to the artist. *Journalism Studies*, *13*, 325-339.

Azoulay, A. (2008). *The civil contract of photography*. New York, UK: Zone Book.

Becker, K. (1991). To control our image: Photojournalists meeting new technology. In P. Wombell (Ed.), *Photovideo* (pp. 8-15). London, UK: River Oram.

Benjamin, W. (1982). The author as producer. In V. Burgin (Ed.), *Thinking photography* (pp. 15-31). London, UK: MacMillan.

-- (1969).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n H. Arendt (Ed.), *Illuminations* (pp. 102-114). New York, UK: Schocken Books.

Berger, J. (1980). *About looking*. New York, NY: Pantheon.

-- (1972). *Ways of seeing*. London, UK: BBC and Penguin.

Berger, J., & Mohr, J. (1982). *Another way of telling*. New York, NY: Pantheon Books.

Berti, A., & Torrano, A. (2015). Politics of (un) document: immigrants and photographic devices in Seba Kurtis's post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Interventions*, *17*, 82-112.

Butler, J. (2009). *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 London, UK: Verso.

-- (2007). Torture and the ethics of photograph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5*, 951-966.

Edwards, S. (1983). Disastrous documents. *Ten*. *8*, 15, 12-23.

Eisinger, J. (1995). *Trace and transformation: American criticism of photography in the modernist period*. Albuquerque, NM: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Ferdous, I. (2014). Photography as activism: The role of visual media in humanitarian crises.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36*(1), 22-25.

Foucault, M. (1986).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A. Sheridan, Trans.). *L*ondon, UK: Routled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3)

--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C. Gordon Trans.). New York, NY: Panthe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2)

--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A. Sheridan, Trans.). London, UK: Pengui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5)

Hall, S. (1972). The social eye of Picture Post.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2*, 71-120.

Kennedy, L. (2008). Securing vision: photography and US foreign polic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0*, 270-294.

Kuo, L. (2006). *Is a radical practice of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possible? Taiwan, 1985-1989: A critical analysi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Goldsmiths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UK.

Linfield, S. (2010). *The cruel radiance: Photography and political violenc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cHoul, A., & Grace, W. (1995). *A Foucault primer: Discourse, power and the subject*. London, UK: UCL Press.

Mendelson, A. (2004). Slice-of-life moments a visual "truth": Norman Rockwll, feature photography, and American values in pictorial journalism, *Journalism History*, *29*, 166-178.

Morden, T. (1986). Documentary. Past. Future? In P. Holland, J. Spence, & S. Watney (Eds.), *Photography/politics: Two* (pp. 169-175). London. UK: Comedia.

Price, D., & Wells, L. (2004). Thinking about photography: Debates, historically and now. In L. Wells (Ed.), *Photograph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p. 9-63, 3rd ed.).

London, UK: Routledge.

Ribalta, J. (Ed.). (2015). *Not yet: On the reinvention of documentary and the critique of modernism*. Madrid, Spain: 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ia.

Ritchin, F. (1991). The end of photography as we have known it. In P. Wombell (Ed.), *Photovideo: Photography in the age of the computer* (pp. 8-15). London, UK: Rivers Oram Press.

-- (1990). In our own image: The coming revolution in photography. New York, NY: Aperture.

Roberts, J. (1998). *The art of interruption: Realism, photography and the everyday*.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Rosler, M. (1989). In, around, and afterthoughts (on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In R. Bolton (Ed.), *The contest of meaning: Critical histories of photography* (pp. 303-342). Cambridge, MA: MIT Press.

Sekula, A. (1986). Reading an archive: Photography between labour and capital. In P. Holland, J. Spence, & S. Watney (Eds.), *Photography/politics: Two* (pp. 153-61). London, UK: Comedia.

-- (1983). The traffic in photographs. In B. H. D. Buchloh, S. Guilbaut, & D. H. Solkin (Eds.), *Modernism and modernity, the Vancouver conference papers* (pp. 121-159). Halifax, NS: The Press of Nova Scotia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Solomon-Godeau, A. (1991). *Photography at the dock: Essays on photographic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practice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ontag, S. (1978). *On photography*. New York, N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Stange, M. (1989). *Symbols of ideal life: Social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in America 1890-195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zto, P. (2008).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in American social welfare history: 1893-1943. *Journal of Sociology & Social Welfare*, *35*(2), 91-110.

Tagg, J. (2009). *The disciplinary frame: Photographic truths and the capture of meaning*.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988). *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 Essays on photographies and histories*.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Taylor, J. (2005). Iraqi torture photographs and documentary realism in the press. *Journalism Studies*, *6*, 39-49.

-- (1998). *Body horror: Photojournalism, catastrophe and war*. New York,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1994). *A dream of England: Landscape, photography and the tourist's imagination*.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1991). *War photography: Realism in the British press*. London, UK: Routledge.

Tello, V. (2014). The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of aftermath photography: Rosemary Laing's welcome to Australia. *Third Text*, *28*, 555-562.

Walker, I. (1995). Desert stories or faith in facts? In M. Lister (Ed.), *The photographic image in digital culture* (pp. 236-252). London, UK: Routledge.

Webster, F. (1980). *The new photography: Responsibility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London, UK: John Calder.

附錄一：2009 年普立茲「特寫攝影獎」得獎作品〈肩負使命的男人〉

註：美國總統候選人歐巴馬在大雨的賓州一個造勢晚會上演說，「眼神堅定」。

附錄二：1942 年首度頒發的普立茲新聞攝影得獎作品

註：底特律「汽車工人工會」罷工線上，8 名工人捶打 1 名反對罷工者。

附錄三：1988 年聲援「五二 」農民運動在忠孝西路靜坐的大學生

註：1988 年聲援「五二〇」農民運動在忠孝西路靜坐的大學生，被深夜展開驅離行動的鎮暴警察踩過頭頂（攝影：黃子明）。

附錄四：中正機場事件

註：1986 年 12 月 2 日許信良闖關回國的行動，造成「中正機場事件」，聲援許信良的民眾前往接機，與軍警發生流血衝突（攝影：宋隆泉）。

附錄五：1988 年 4 月，鄭南榕出殯的遊行隊伍

註：攝影：潘小俠。

附錄六：「太陽花運動」的參與群眾

註：攝影：《中國時報》，方濬哲。

附錄七：太陽花運動領袖林飛帆、陳為廷

註：摘自《天光》。

附錄八：《天光》攝影集的最後一張照片

附錄九：沿梯攀爬進入立法院的占領青年

註：此圖象徵突破黑暗邁向光亮，被選用為《天光》一書的封面照片。

附錄十：立法院外擺置的追思鄭南榕的燭光守夜攤位

註：摘自《天光》。

附錄十一：運動代表們召開記者會

註：占領立法院 515 小時後，運動代表們召開記者會，林飛帆發表聲明。背後放置著鄭南榕的遺照（攝影：《蘋果日報》，杭大鵬）。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6(1), pp. 79-115, January 2016

Photojournalism and Social Movement as "Theatre": A Critical Reading of "The Sunflower Movement" Photographs

Kuo, Li-Hsin*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reads selected photographic works of "The Sunflower Movement" and analyses some of the main problems that long existed in mainstream journalistic/documentary photographic practices, which inherited the eye-witness tradition that originated from the West. Photographs awarded the Pulitzer Prize are representative of such a tradition, stressing the emotional/affective effect of images that create a theatrical ambience. While it may be indispensable to apply the eyewitness function and emotional effect of political reform movements in 1980s Taiwa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duplicating such concepts in "The Sunflower Movement" could only simplify, if not nullify, either photographic discourse or social movements.

Keywords: The Sunflower Movement, photojournalism/documentary photography, reality, social movement, image theatre

* Email: lixinwho@gmail.com
Received: 2015.08.21
Accepted: 2015.10.12

JCRP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4 郭力昕.indd 115 2016/1/12 下午 07:34:23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6 卷 第 1 期．頁 117-150．2016 年 1 月
DOI: 10.6123/JCRP.2016.005

探索線上公眾即時參與網絡化社運——以臺灣 318 運動為例 *

鄭宇君 **

玄奘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

陳百齡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摘要

318 運動是臺灣社會罕見以占領國會議場表達訴求的抗爭運動，同時也是大規模群眾透過傳播科技的中介即時參與網絡化社運，包括在社交媒體分享即時新聞、上傳現場目擊照片、創作歌曲在 Youtube 流傳，甚至透過直播科技 24 小時不間斷地轉播占領現場狀況。

為了瞭解此一運動的樣貌，本研究選取 Twitter 做為資料收集平臺，藉由社交媒體鉅量資料的即時收集與事後分析，探討臺灣 318 運動期間 Twitter 各種語言相關推文（tweets）的趨勢變化，研究發現當運動發生直接衝突時，公民目擊及直播頻道會帶來瞬間大量的訊息擴散，另外透過超連結分析發現，公眾透過在社交媒體轉發或評論即時新聞，做為即時參與運動的另一種形式。

關鍵詞：網絡化社運、社交媒體、超連結、即時直播、公民參與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探索社交媒體之民意形成過程》（計畫編號：MOST 103-2410-H-364-004-MY2）與《尋找媒體創用者的數位足跡：社交媒體研究之新方法探索——社交媒體重大事件之傳播模式比較分析：鉅量資料數位人文分析取徑》（計畫編號：MOST 102-2420- H-004-048-MY3）合作研究之部分成果，作者特別感謝國立政治大學施旭峰先生、盧易詩小姐協助資料收集與分析，以及水火團隊成員參與討論與文獻閱讀之貢獻。

** Email: colisa@gmail.com

投稿日期：2015 年 8 月 25 日
接受日期：2015 年 11 月 8 日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5 鄭宇君.indd 117　2016/1/12 下午 07:36:35

壹、前言

2014 年 3 月 18 日臺灣社會發生了學生占領立法院事件，共計占領立法院議場長達二十多日。透過網路直播占領運動，國內外網友紛紛在社交媒體關注與表達意見。大規模線上公眾的分享與討論，不僅引起海內外新聞媒體的報導，也實際促成公民於線下實際參與運動。占領運動從國會議場延伸到立法院周邊，不分白晝黑夜，在占領期間每天有數百至數千人在議場四周靜坐支持運動，亦有許多大專院校學生以罷課方式聲援，教授則在街頭開設民主講堂聲援學生罷課行動。由 318 事件引發的社會運動被稱為 318 運動或是太陽花運動。

這場學生占領立院的抗爭事件起因於民間團體的反服貿運動，在 318 事件發生前已有數個民間團體反對總統馬英九強行推動《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但當時並未引起多數人關注。直到 3 月 17 日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國民黨籍召委張慶忠在排案討論《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時，僅用 30 秒宣布該協議送立法院審查已超過 3 個月期限，因此依法視為已經審查，送交立法院院會存查（晏山農、羅慧雯、梁秋虹、江昺崙，2015）。張慶忠 30 秒通過服貿協議成為 318 事件的引爆點，反服貿團體將「反服貿」訴求轉變為「反黑箱服貿」，抗議馬政府通過服貿程序不合法，藉由占領立院行動引起全國關注。

這是臺灣社會罕見以占領國會議場表達訴求的抗爭運動。3 月 18 日當晚學生衝入立院之後，有位同時跟著進入立法院的 longson 隨即透過 iPad 直播，將封閉議場內的情況轉播給場外的群眾，讓關心此事的人們可即時觀看並參與運動，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訊息與動員群眾到現場聲援。人們創造了各種解釋性文章、懶人包、口號（如：「自己的國家自己救」）、歌曲（如：「島嶼天光」）、專屬網站（如：「自己的服貿自己審」、4am.tw）等，透過社交媒體的快速擴散與分享，短時間內引發社交媒體上百萬人次的關注，最後帶動數十萬人於 3 月 30 日上街要求政府「退回黑箱服貿」。

從傳播的角度來看，這是臺灣少見的大規模群眾透過社交媒體即時參與運動，在最高峰時有高達十多個線上直播頻道轉播運動實況，包含大眾媒體或自主公民架設頻道，有些頻道是靜態直播、有些則穿插主持人說明、有些則讓線上群眾與現場占領者對話，無論是支持或反對的群眾，即使人不在立法院、也能在社交媒體關注立法院，社交媒體將全臺民眾及國外關心人士都捲進這場社運之中。

在這場網絡化的抗爭運動中，人們經常一邊行動、一邊使用社交媒體，無論是抗爭現場的群眾更新消息或拍照上傳，或是不在現場的人們在線上參與討論、

分享即時新聞、觀看實況轉播、甚至直接到線下參與，社交媒體串連了線上與線下公眾，讓人們以不同方式參與了這場社運。本研究關注的是公眾如何透過社交媒體即時參與這場抗爭運動，特別在這場抗爭時間長達數十日的占領運動中，公眾使用不同社交媒體參與的動態變化。

面對大規模群眾參與的網絡社會運動，許多公眾在線上公開討論並分享訊息，研究者如何迅速收集到廣泛的群眾公開意見，成為社交媒體資料收集上的一大挑戰。本研究團隊評估了幾個社交媒體平臺資料收集的可行性：其一是 Facebook，做為臺灣地區滲透率最高的社交媒體平臺，每月活躍用戶達 41%[1]，但 Facebook API 僅能以粉絲專頁（Facebook pages）做為資料收集單位，無法透過關鍵字收集貼文資料，亦即研究者必須事先取得所有參與運動的相關粉絲頁清單，才能依此收集相關粉絲頁內的討論貼文，由於 318 運動涉及層面太廣，研究者不易在第一時間內找出參與運動的粉絲專頁，需另外發展出一個系統性收集參與運動的粉絲頁清單方法，才能開始收集資料；另一個考量則是以 Twitter 做為資料收集平臺，Twitter API 可用關鍵字做為資料收集依據，方便在第一時間收集大規模公眾討論貼文，雖然 Twitter 在臺灣的滲透率為 9%，不到 Facebook 的四分之一，但 Twitter 平臺可在國際社群間快速交流即時訊息，得以瞭解不同語言社群對於臺灣 318 事件的關注程度。

基於上述理由，本文選取 Twitter 做為資料收集平臺，它具有以下二個特點，第一，Twitter 對突發事件的反應快速，即時消息最先在 Twitter 曝光後，不僅迅速擴散到更多用戶，也擴散到 Facebook 等其他社交媒體平臺，在突發事件發生時許多人傾向選擇 Twitter 追蹤即時訊息，根據 Spasojevic, Li, Rao, & Bhattacharyya (2015) 研究，Twitter 用戶在貼文 30 分鐘內，就會累積五成的用戶參與，Facebook 的反應時間較長，大約兩小時才會累積五成的用戶參與；第二，Twitter 平臺方便全球不同語言社群的用戶交換訊息 (Bruns, Highfield, & Burgess, 2013; Cheng & Chen, 2014)，臺灣的 318 抗爭獲得國內外媒體與網路社群的關注，透過 Twitter 資料分析，可比較國內外社群之間的訊息連結與交換。

本文目的在於探索臺灣 318 運動期間，線上公眾透過社交媒體即時參與情況，研究者藉由社交媒體鉅量資料的即時收集與事後分析，蒐集 Twitter 各種語系的相關推文（tweets），藉此瞭解此一抗爭事件發展中的各種動態過程。

1　根據 Statista (2015) 發布的最新統計數據，根據每月活躍用戶計算，臺灣地區 2014 年第四季的社交網站滲透率為 71%，亦即全國人口有 71% 的人有使用任何一個社交網絡服務，其中滲透率最高的為 Facebook 的 41%、其次為 Line 的 33%、Twitter 的滲透率為 9%。

貳、網絡化社運與線上公眾參與

一、網絡化社會運動的興起

在社交媒體普及之前，就有學者開始談論網絡化的社會運動（networked movement），典型的代表是 Manuel Castells，他看到資訊社會在網際網路崛起之後，產生的大眾自我傳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現象，它一方面是大眾傳播，透過點對點傳播及網際網路的連結，每個人播送的訊息都有潛能觸及更廣大的訊息，但另一方面，它又是多樣性的，它可能是任何內容、以任何形式，增加它在網際網路的擴散，因而它會自我生產內容、自我決定擴散方向、自我選擇以多對多的方式被接收 (Castells, 2007)。

Castells 當年指陳的現象體現在今日由社交媒體帶動的社會抗爭，一小群人抗爭的訊息被發布在社交媒體上，連當事人都無法事先預期它會捲動多少群眾參與其中，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中東的茉莉花革命、臺灣 318 抗爭亦如是。Castells (2012) 在占領華爾街運動發生之後，進一步提出網絡化社運的特徵包含以下幾點：網絡化的傳播科技（手機與網際網路）提供了社運動員的平臺，除了訊息連結，也包含線上線下的人際網絡連結、運動內部的網路、與其他社運連結的網絡，這些運動一開始是自發性生成的立即社群，YouTube 是運動早期最具潛能的動員工具，影像的力量在此很重要。這些具延展性的網絡改變了社運的實踐，可多對多進行協作、互動，不需要正式的領導人或垂直控制的組織（如：政黨），且參與人數眾多可降低被壓迫的威脅，他認為網路空間與實體空間的占領交織出第三空間——自主，自主空間是網絡化社運的空間型式。

政治學者 Bennett & Segerberg (2012) 提出網絡化運動中的連結性行動邏輯（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強調數位傳播促成抗爭政治的個人化（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由數位促成的行動網絡（digitally enabled action networks）產生了兩種社運組成的新型態，第一種是由議題宣導組織構成的網絡在幕後進行協調，利用互動性高的數位媒體將主題個人化，透過個人化網絡的方式將公民訊息傳播出去，號召更廣泛的公眾參與網絡，如：西班牙的「憤怒的人群」（Indignados）運動；另一種則是由技術平臺及應用取代了政治組織的角色，政治訴求與不滿以非常個人化方式在網際網路上被快速分享，如：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We are the 99 percent）的口號，夾雜個人故事和影像快速地在全世界的 Facebook、Twitter、Tumblr 分享。

相較傳統社運的集體性行動邏輯，以身分認同為號召，領導者由上而下動員

群眾參與，如：工會領導的社運，以工人階級的身分認同為號召，工會幹部扮演主要領導角色，組織群眾參與；Bennett & Segerberg 提出連結性行動邏輯的這二種型態都是沒有具體領導者、也沒有組建傳統組織。這二種連結性行動的差別在於第一種仍然由組織（或是組織的網絡）做為鬆散平臺倡導議題，將主題予以個人化，透過社交平臺擴散給更多公眾，放在臺灣脈絡的例子[2]像是 318 運動的「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和「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第二種則是完全沒有組織協助，由技術取代組織的角色，讓個人故事快速擴散，如：2013 年的洪仲丘事件，透過批踢踢 BBS 站喚起許多當過兵群眾的個人經驗及不滿，從網路聲援進而走上街頭。

318 運動前身可追溯至 2013 年起民間團體發起的「反服貿訴求」，在 2013 年 6 月底行政院院會通過「服貿協議」後，以賴中強律師為代表的「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持續批判馬政府的服貿協議，亦有學者專家及社會人士聲援其主張，「黑色島國青年陣線」則是以青年學生為主的社運團體，當中幾位主要成員如：魏揚、陳為廷、林飛帆曾參與「反媒體壟斷」、「反苗栗大埔農地徵收運動」，與許多公民團體皆保持良好互動關係，他們聲援「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的訴求，並共同組織多次抗議行動，但自 2013 年 6 月以來這二個團體倡儀的反服貿主張除了在社運圈及公民團體間獲到重視外，並未引起社會大眾的普遍關注；直到 2014 年的 318 占領立院行動之後，才開始獲得廣泛公眾關注為何行動者以占領手段來表達訴求，甚至有不少公眾自發性參與行動。透過這二個社團的粉絲專頁做為訊息擴散與連結平臺，行動者喊出「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做為個人化的行動框架，號召更多人聲援占領國會的行動，並引起更多公眾關注黑箱服貿協議可能對臺灣社會造成的問題，因而在 3 月 18 日之後參與的大量群眾並非是由這些組織動員而來，而是透過社交平臺的訊息擴散吸引更多自主參與的公眾，他們未必隸屬於特定組織，也不完全受這些組織指揮，至於其他理念相近的 NGO 團體則是透過組織間的網絡協助占領運動的進行。

Castells (2012) 強調網絡化社運與傳統社運的不同在於個體化（individuation）與自主性（autonomy），個體化強調個體做為引導行為的原則，個體的投射是朝向集體行動與共享價值；自主性指的則是社會行動者有能力變成一個主體，根據社會行動者的價值與興趣，定義其行動目標是獨立於社會體制之

2　在 318 運動之前，更早的 2012 年士林文林苑都更事件及 2013 年苗栗大埔徵地事件亦屬於此類型，前者由「臺灣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協助議題倡議與擴散，後者由「農村陣線聯盟」和「捍衛苗栗青年聯盟」協助倡議與串連線上與線下群眾。

外；由個體化過度到自主性是經由網絡化的操作，網際網路做為組織化的溝通平臺，內含了自由與去中心化的精神，它允許個別行動者在其選擇的網絡中相對於連結的他人，建立他們的自主性。換言之，參與社會運動的每一個個體仍保有其自主性，他們對運動方向有不同意見，沒有領導者可以由上而下決定方向，必須透過協商由下而上產生共識；因此在共識凝聚的過程中，會有多方意見出現，這在 318 運動中也可見到議場派、社科院派、賤民解放區等不同主張的衝突。

二、線上公眾的即時參與

網絡化社運的參與者向來不是單一、同質性的組合，而是多樣、變化性高的群體，加上科技的介入，提供許多雲端協作工具，讓個別參與者可用不同方式參與運動。Rheingold (2012) 提出了網絡化運動參與的冪次法則（power law of participation），他認為網絡社運參與的群眾，每個人貢獻程度不一，經常由少數人負責領導、協調、協作、編寫網站內容等高投入的工作，多數人則以分享、留言、標籤、閱讀等低投入方式參與，這當中是一個參與者由少而多的歷程，亦是由「協作智慧」（collaborative intelligence）轉變為「集體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318 運動中亦發現類似現象，少數人撰寫的解釋性內容透過多數人分享而擴散。

Meikle (2010) 指出行動者使用網路聲援抗爭運動有四種主要方式：（一）相互創造的文類（intercreative texts），意指對既有文本改造與重新想像，如：改造執政者的頭像；（二）相互創造的戰術（intercreative tactics），透過既有抗議戰術的變異以時間換取空間，如：數位公民不服從，再次詮釋政府文本；（三）相互創造的策略（intercreative strategies），建置更為開放、使用者為中心的空間，例如：建置受害者的臉書粉絲頁、探討服貿對各行各業影響的網站；（四）相互創造的網絡（intercreative networks）創造出新的媒體網絡模式，利用開放原始碼進行線上媒體運動，例如：海地災難的開放街道計劃。在 318 事件中「g0v 零時政府」帶動的群眾參與及線上共筆即是第四種，屬於這四種當中困難度最高、參與共同創造的使用者最多。

在這個過程中，網路上可能產生無窮的訊息量，誰來決定哪些訊息該流傳？Bruns (2005) 認為網路的群眾參與使傳統新聞的守門機制（gate-keeping）變成集體監看（gate-watching）；Singer (2014) 則稱為「使用者產製的可見度」（user-generated visibility），也就是網路公眾做為再次傳播（re-dissemination）的監看者，他們進行內容評價的審議，把有價值的資訊透過自己的人際網絡擴散出去，這些

訊息被擴散的新聞價值是由產製者們（原作者、傳播者、評價者）的互動所決定，觀眾不再是傳統媒體中的被動接收者，而是個性化（personalizing）且能重新分配（redistributing）內容的傳遞者，人們透過交換連結分享社會經驗，並推薦社交網絡中的文化流動形式；他指出，在這當中使用者偏好的經常是新聞網站，其中一個因素是分享新聞網站的內容很方便，對於小型媒體而言，愈多分享更可以創造流量。

過去社會運動的衝突必須透過新聞媒體的拍攝與報導才能傳遞給大眾，但近年來，年輕人在抗爭事件採取「目擊戰略」（witnessing strategies）愈加普及。Allan (2013) 稱它為「公民目擊」（citizen witnessing），年輕公眾利用智慧型手機見證並產製經典影像（iconic images），以象徵出抗爭事件之意義，並透過社交媒體擴散出去，與當局控制的官方媒體產生抗衡，如：希臘抗議、新疆暴動、倫敦暴動，及占領華爾街運動，這是年輕世代作為數位公民浮現的形式，這些年輕人（通常少有公民議題的經驗）主動將社交媒體作為可能性的互動資源，既維持個人參與的形式，又能透過公民目擊的多元策略將聲音傳給了無聲大眾。

Andén-Papadopoulos (2014) 認為攝影手機提供承載見證的新展演儀式（new performative rituals of bearing witness），例如政治異議群眾的肉體迫害紀錄，透過全球無線傳播網絡，有效地把這些素材動員成可製造政治團結感受的影像式見證（graphic testimony）。一般人透過手機這個可攜帶的自我延伸工具，把自己連結到全球數位網絡，有機會避開主流媒體既有的編採與審查流程，將自己對某事件之紀錄轉化為一種大眾證言（testimony），擾亂那些精心打造、專門提供給大眾新聞媒體的「官方」觀點，享有一種前所未有的網絡組建能力（networking power）。這種「公民攝影見證」打破公與私、自我與他人、身體與機器、在地與全球、公民與記者之間的界線，也改造了我們以往對「再現」之認知。

對於新世代來說，以手機拍照／影片與即時分享已成為他們經歷事情的方式之一，攝影手機的廣泛使用讓人們重新形塑自我，並進行即時傳播 (van Dijck, 2007)。社交媒體在社運中扮演即時協作與群眾動員的角色，例如：得知警察部署位置、或是標籤街道的最新情況等，它同時是替代性連結的資源，讓新聞記者有不同的連結，除了現場照片之外，社交媒體平臺也有抗議的卡通漫畫、剪輯抗爭的影片 (Allan, 2013)。

除了攝影手機的目擊見證，近年興起的網路直播科技也在社運中扮演重要角色。Thorburn (2014) 探討即時影像直播（live streaming video）對占領運動的重要性，她以 2012 年加拿大魁北克學生罷課運動為例，原本是校園與社區影音

頻道的 CUTV 在運動期間成為網路直播頻道，持續播放學生的占領行動。它描述政治行動者與數位科技在此形成特殊的組合，它運作雙重的權力機制，對警方而言，它是監視的科技，但它同時開啟了反對力量的節點，破壞了國家監看，反而用來監看警方自己，它提供了街頭政治行動者一個建構主體性的位置。她認為，線上直播科技在社運中產生了革命性影響，參與者和觀察者在多樣化的行動中，透過監看與被監看形成了反霸權的監看組合（counter-hegemonic surveillance assemblage）之可能性。

三、社交媒體與線上新聞的關係

在社交媒體普及之後，新聞傳布與社交媒體產生密切關係。社交媒體中的新聞傳布主要透過用戶主動與新聞記者或媒體組織成為「朋友」（friending），建立自身與外部媒體環境連結，社交媒體用戶的新聞接收（reception）便是自動地曝露與消費這些由新聞記者「朋友」所發送的內容，再經由用戶個人社交網絡進行分享，產生新聞傳布的過程 (Weeks & Holbert, 2013)。根據 Pew Research Center 於 2015 年 7 月發布的最新報告，有 63% 的美國人使用 Facebook 與 Twitter 收看新聞，特別當突發事件發生時，有 59% 人會用 Twitter、31% 的人用 Facebook 追蹤事件的最新發展，主因是 Twitter 在即時訊息的傳遞比 Facebook 更快，以時序而非演算法來篩選訊息 (Pew Research Center, 2015)。

因此，當前的線上新聞成為一種網絡化新聞（networked journalism），它是全天候、即時、無處不在的新聞，新聞內容可增加或刪減、頭條可更換、可增加或更改照片及其他多媒體素材，新聞變得更加液態與流動，線上新聞的即時性在於它是持續並不斷變換，創造了飄忽不定的資訊流 (Beckett & Mansell, 2008; Karlsoon, 2012)。

這樣的新聞產製過程形成了新聞液態性的特色。將社會學者 Bauman 提出的液態性（liquid）概念引至新聞學領域，可追溯至 Deuze (2008) 在「液態新聞學與監視的公民參與」（liquid journalism and monitorial citizenship）這篇文章中指出新聞工作的脈絡改變了，愈來愈受到使用者與產製者之間的互動所決定，因而新聞工作必須持續的編輯（continuous edits），也就是新聞內容必須更液態與流動才能應付當今使用者對即時（in real time）接收新聞之期望。

Karlsoon (2012) 討論線上新聞的液態性，認為超連結（hyperlink）是構成新聞液態性的另一個重要元素。Matheson (2004) 描述，以往的新聞報導將「知識作為產品」（knowledge-as-product），線上新聞則是將「知識作為過程」；傳統新

聞是把事情固定下來（pinning down），線上新聞則是連結的新聞學。Singer (2008) 認為，透過即時的超連結與使用者參與，記者所報導的新聞故事成為流動、不間斷、參與式和相互連結的新聞媒體世界之一部分；新聞故事的持續發展已是無法控制的集體過程，超連結讓使用者能無限、自由地瀏覽，儘管可能仍在某種架構之中（如：從一則新聞到另一則新聞，一個網站連到另外一個網站），但總是打破了原本是分割事物之間的關係。

Papacharissi & de Fatima Oliveira (2012) 分析中東茉莉花革命中，社交媒體 Twitter 上的新聞表現型式，浮現了四個特徵：（一）即時性（instantaneity）：社交媒體的新聞比主流媒體更即時且不受限制，但可能和傳統新聞價值不相容，如：未經查證的訊息在網上流傳，且每秒都在更新狀態，一直重覆出現的內容可使更多人看見訊息；（二）參與群眾外包的菁英（crowdsourced elites）：由新聞記者、菁英和事件中特殊意見領袖身負傳布訊息的重要使命，後兩者雖不符合傳統新聞價值（如：夾敘夾議），但他們的意見會溢散到主流媒體，事件中往往出現特殊的「有機意見領袖」，他們通常是親身參與，也較注重情感訴求，相形之下，記者則試圖在主客觀價值中找到平衡；（三）團結 （solidarity）：這類訊息由於情感性濃厚，難以分殊事實陳述與情感呼籲，他們會多重發布、參照、協調，目的是希望能團結群眾，以對抗當局；（四）環境氛圍（ambience）：社交媒體的特性使人們得以不分晝夜、無時差地發布訊息。

簡言之，社交媒體使得新聞價值產生了混雜，同時也浮現了新文類—情感新聞（affective news）。Papacharissi & de Fatima Oliveira (2012) 認為，由於參與者多半在事件中具有近身性，因此融合客觀事實、自身經驗、情感與意見表述的文類即是情感新聞。這些參與者可以是記者、意見領袖、目擊者等，當政權控制媒體時，Twitter 提供一個有效率、具能動性的發聲管道，使人們可以跳過傳統守門機制來發布訊息。情感新聞出現的進程，原本是普通的訊息公告，當意見領袖出現對訊息公告加以註解，主流媒體跟進，進而可能造成世界各地響應，這使得情感新聞的內容經常主客觀並陳、夾敘夾議，在故事中找到自己的定位，雖然這些訊息常常重複或模仿主流媒體訊息，但最受歡迎的 tweets 通常都是情緒性的，也因此事件可能沒有多少進展，情感積累卻很濃厚。

Meraz & Papacharissi (2013) 進而分析 Twitter 促成的網絡化守門及框架過程，Twitter 上的群眾容易透過分享轉推（retweet 或 RT）、指定對話對象（mention）來幫忙宣傳、傳布菁英的影響力，群眾藉由過濾、協作、分享資訊進行網絡守門，並由不同的人不斷協商、對話和參與形成訊息框架，有助進一步闡釋成為互為主

體的對話，使資訊蒐集的實踐更加合理與可信，因此網絡框架與守門是並行的，既維持了資訊流，亦不斷重組新聞實踐。

在抗爭運動期間，群眾在社交媒體上藉由分享新聞參與運動，他們參與對話、在不斷互動協商中形塑新聞的意義，並將新聞透過人際網絡擴散出去，因而社交媒體的新聞傳布不單取決於新聞機構或記者的個別意圖，亦包含訊息接收者與傳遞者如何改寫、重新定義新聞的意涵。

參、研究設計與資料收集

本文目的在於瞭解網路社群對於臺灣 318 運動的關注情況，及線上公眾即時參與的動態變化。研究者選擇 Twitter 做為社交媒體平臺資料收集來源，參考國外大型抗爭的 Twitter 資料收集方式，透過 Twitter Search API 以中文、日文、英文關鍵字收集 318 運動期間的相關推文，經過資料清洗後[3]，比較不同語言社群的傳播模式與推文類型，並找出在整體社群中具有影響力的用戶與超連結引用（鄭宇君、施旭峰，出版中；鄭宇君，陳百齡，2014；Bruns et al., 2013; Choudhary, Hendrix, Lee, Palsetia, & Liao, 2012）。

318 運動在學生占領立法院之後，隨著抗爭運動的發展，隨時有一些新概念或重要人物浮現，研究者在收集資料時，必須隨著事件變化不斷新增資料收集的關鍵字，因而本研究在 318 運動所使用的關鍵字依序為：服貿、立法院、立院、CongressOccupied、サービス貿易、国会、台湾　国会、太陽花、學運、學潮、國會、馬英九、行政院、罷課、ExecutiveOccupied、taiwanoccupy、#sunflower、sunflowermovement、318 學運、318、林飛帆、陳為廷、黃國昌、仰寧，共 24 個關鍵字。資料收集開始時間為 3 月 18 日晚上 8 點，實際收到的推文內容為 2014 年 3 月 11 日到 4 月 29 日的推文，共計收集到 705,628 筆推文，以及 155,470 不重複的發文者[4]。

透過本研究團隊開發的語言辨識軟體[5]標示每則推文所使用的主要語言，將整

3 本研究原本收集資料總筆數 828,473 筆貼文，然而在 4 月 8 日到 10 日間，日本發生國會議員的爭議事件，故關鍵字「国会」收集到與 318 事件無關的貼文，研究者利用這幾位日本國會議員姓名為關鍵字，清除日文雜訊。

4 根據 Twitter Search API 的限制，透過關鍵字搜尋可以收集到前七日以內的 tweets，Twitter 會提供約 1% 的 tweets。

5 本研究團隊經人工檢視後發現，Twitter 官方使用的語言辨識工具對於拉丁語系（例：英文、法文）的判斷準確，但對於亞洲語系，如：中文、日文、韓文等辨斷並不準確，被 Twitter 標示為中文、日文、韓文的推文可能都會混雜中文，因此吳君孝（2014）根據東亞語言的特性開發了語言辨識工具，可進一步辨識為繁體中文、簡體中文、廣東話、日文、韓文等，本研究即是使用該工具進行推文語言辨識。

體推文區分為不同語言的子資料集，結果發現多數推文集中在繁體中文、簡體中文、日文、英文這四種主要語言，這四個子資料集的推文數量及所占比例如表 1。

就 Twitter 全球用戶發文使用各種語言的比例而言，根據 Semiocast 於 2013 年的分析數據顯示，全球 tweets 使用語言比例最高的是英文占 34%，其次為日文占 16%，第三為西班牙語占 12%，中文推文則未進入排名前十名的語言；另一份 GNIP 的調查資料則顯示，在 2012 年 Twitter 使用的語言中，簡體中文排名第 17、繁體中文排名第 19，兩種中文語言的發文量皆不到全球推文量的 1% (Lehman, 2014; MIT Technology Review, 2013)。因而，就全球用戶的使用人口而言，日文用戶的數量遠多於使用繁體中文及簡體中文的用戶數量，這點是日文推文的發文數量遠高於繁體中文與簡體中文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則是日本社會確實相當關切臺灣的國會占領行動[6]。

此外，本研究也透過短網址還原技術（unshorten URL）將大量推文中帶有的超連結還原為原始網址，進行超連結分析。由於 Twitter 每篇發文有 140 字元限制的特性，字串很長的網址必須要縮減其長度才適合放置於貼文中，縮短網址（URL shortening）即成為網路上一個能符合限制的新技術與網路服務，以一個簡短的網址代替原來的長網址，當使用者點選縮短網址時，會被導向原來網址。

本研究採取的短網址還原技術，即是利用資訊程式逆向操作，將原來縮短網址還原為原始連結的方法，此技術可用於社交媒體的內容分析上，特別是大量的 Twitter 推文分析，使用網址還原技術取得每一則短網址的原始連結，進行網域分析（domain-based analysis），計算每個網域名稱的出現頻率，並可將探勘

語系	代碼	Tweets 數量	百分比
日文	Ja	518,097	73.42%
繁體中文	zh-tw	151,087	21.41%
簡體中文	zh-cn	17,983	2.55%
英文	En	16,625	2.36%
其他	others	1,836	0.26%

表 1：臺灣 318 運動 Twitter 資料的使用語言分布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6　在 2014 年秋天發生的香港雨傘運動，本研究團隊也以同樣方式收集了香港雨傘運動的 Twitter 資料，結果發現香港雨傘運動 Twitter 推文中只有 7.77% 是日文推文，而英文推文則高達 53.18%（鄭宇君、陳百齡，2016 年 1 月），這個結果顯示並非是因為 Twitter 日文用戶多，使得它在臺港兩地占領運動的 Twitter 討論量就會占高比例，而是日本社會對於臺灣事件格外關心的緣故，相較之下，日本社群對於雨傘運動關注較少。

（mining）技術與人工編碼結合，找出特定網域在資料集中的出現頻率（鄭宇君、施旭峰，出版中；Suh, Hong, Pirolli, & Chi, 2010）。本研究透過短網址還原技術結合超連結分析，探討 318 運動期間 Twitter 社群分享不同社交媒體的情況，並比較臺灣新聞媒體被社群所引用的情況。

肆、資料分析與討論

經由上述的資料收集與分析流程，以下將從時間趨勢變化分析、推文類型分析及超連結分析進行四個面向的探討：第一、不同語言社群在 318 運動期間的社群聲量變化，二、各語言社群參與討論及推文趨勢分析，三、社交媒體之超連結分析，四、臺灣新聞媒體被社群引用情況。

一、318 運動期間的社群聲量變化

透過時間趨勢分析呈現整體推文、繁體中文、簡體中文、日文、英文推文在 318 運動期間的時間變化趨勢，藉以比較各語言社群與整體社群之社群聲量高峰之差異。

從圖 1 來看，在 318 運動期間有幾波社群聲量高峰，第一個高峰 3 月 18 日深夜學生衝入立法院到隔天 3 月 19 日成功占領立法院，單單 3 月 19 日的推文量高達 10,000 則以上，主要是繁體中文推文，來自臺灣社群的發文，此時尚未獲國際社群關注；隨著學生占領國會期間拉長，自 3 月 21 日開始引起國際社群關注，國際媒體的大幅報導，特別是日本新聞媒體以速報來報導臺灣學生占領國會情況，日本網路社群亦大量參與轉發訊息，包括同步直播臺灣國會占領實況，讓推文量快速升高，這點從超連結分析可以看到許多日本新聞媒體網站及日本直播頻道的超連結成為網路社群發送推文的主要內容；反觀臺灣社群，在 3 月 20 日到 22 日，由於占領學生「退回服貿」的訴求未獲馬政府具體回應，學生不願撤離立院議場，警方也未強制驅離，沒有新的進展，占領情況膠著，新聞媒體失去了報導的焦點，使繁體中文社群聲量略為下滑。

第二個高峰則是 3 月 24 日的行政院衝突，當學生占領國會情況陷入膠著，部分行動者於 3 月 23 日晚間突襲進入行政院，希望拉高抗爭層級，卻在 3 月 24 日清晨遭到警方以強力水柱、警棍驅離群眾，衝突中有不少民眾濺血、遭警方暴力對待，現場目擊者以手機拍下照片或影片即時上傳社交媒體，這些影像在社交媒體上快速流傳，不僅提醒在現場的其他群眾小心安全，號召更多人關注此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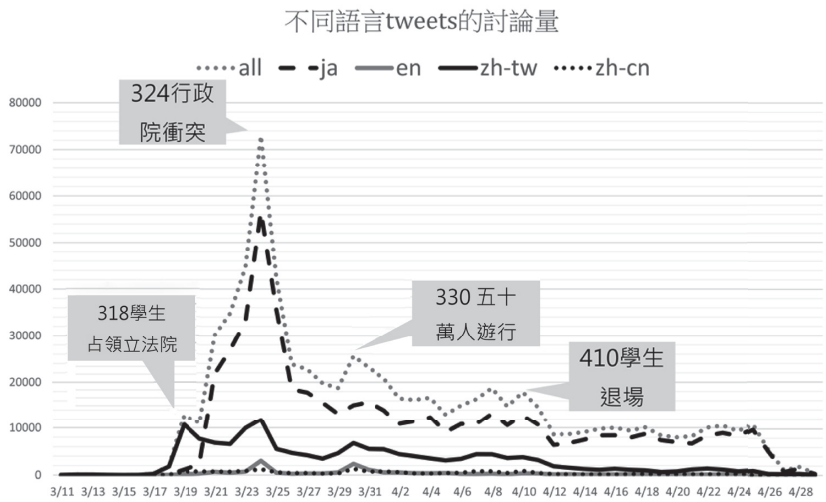


圖 1：不同語言推文的討論聲量變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行政院的暴力衝突引起國外媒體報導與社群關注，因此 3 月 24 日的日文與英文社群聲量都達到最高峰。

第三個社群聲量高峰是 3 月 30 日群眾在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遊行，聲援反服貿運動，施壓馬政府，主辦單位估計近 50 萬人參加，參與人數多於占領者及政府預期，很多群眾在現場上傳照片或打卡，不僅引起國內外媒體報導，亦引發不同語言社群關注，使當天成為另一波社群聲量高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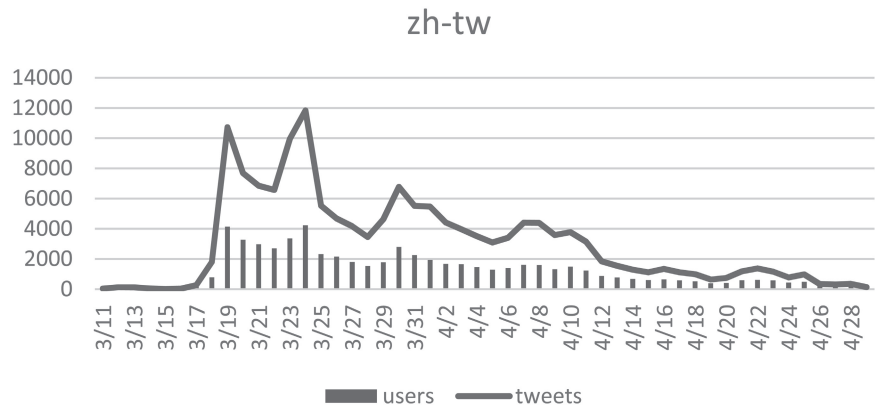
最後一波社群聲量高峰在於 4 月 7 日與 10 日兩天，黑島青等公民團體及學生代表陳為廷、林飛帆在 4 月 7 日宣布占領立法院行動已完成階段性任務，占領者將於 4 月 10 日全部退出議場。這二個時間點都引發了一波討論或訊息轉發，4 月 10 日退場當天更有許多支持者到現場聲援，使得這二天引發了一小波社群媒體聲量高峰。在學生退出議場之後，儘管服貿爭議未歇，馬政府與立法院並未明確宣布其後續處置方案，但整個社群對於 318 運動引起的討論聲量已逐漸消退。

二、各語言社群參與討論與推文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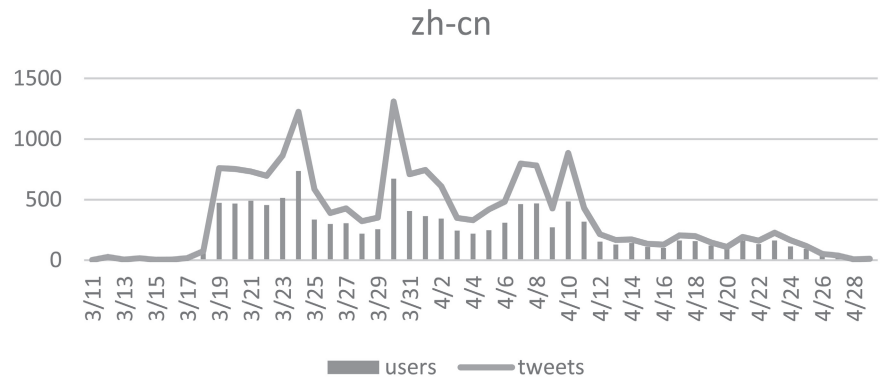
從圖 1 的推文變化中，研究者發現不同語言社群的傳播模式有所差異，因此進一步統計各語言社群的每日推文量與不重複發文人數，以及每人單日平均發文量，透過這幾個指標的變化來比較繁體中文、簡體中文、日文、英文四個主要語

言社群之間的差異。圖 2(a) (b) (c) (d) 四個子圖，分別代表離事件發生所在地由近而遠的四個社群：繁體中文社群（臺灣）、簡體中文社群（中國或海外華人）、日文社群、英文社群，在 318 運動爆發前一周到爆發後一個月的每日發文量及發文人數。

圖 2(a) 繁體中文社群（臺灣）做為抗爭的在地社群，最早關注此事，發文量高峰從 3 月 18 日起一直維持高聲量直到 4 月 10 日學生退出立法院議場，每日在 4,000 則到 12,000 則發文間，高低相差三倍。在事件的幾波高潮，特別是占領立法院、衝進行政院這二個時間點是發文量最多與參與發文人數最多的時候，3 月 18 日深夜學生衝入議場，3 月 19 日的發文量達 10,722 則，共有 4,172 不重複用戶發文，每人平均發文 2.59 則；第二個衝突點是 3 月 24 日行政院與警方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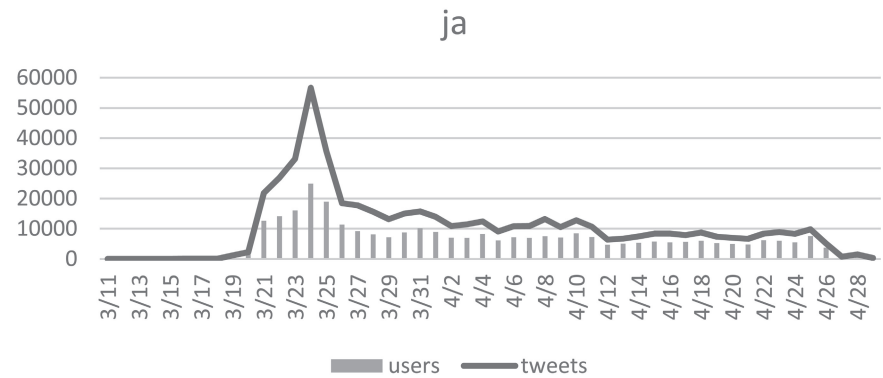
(a)：繁體中文社群（臺灣）之每日發文量與發文人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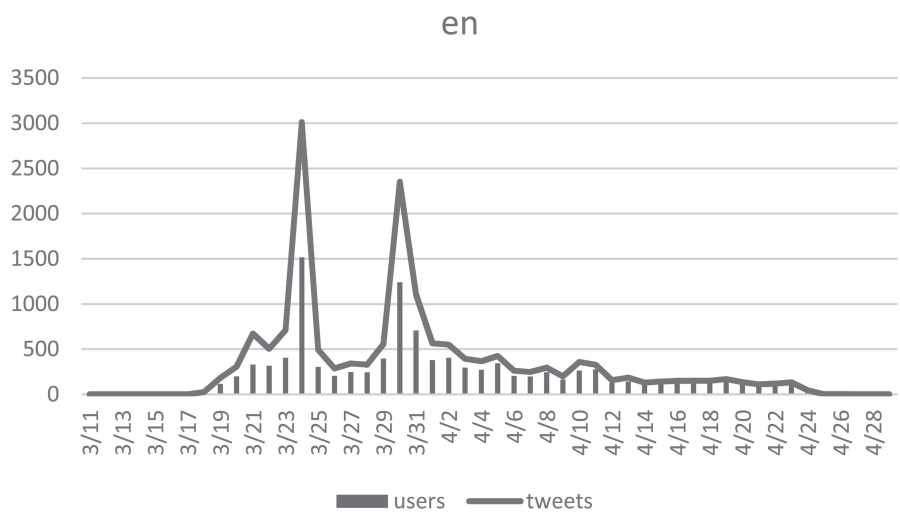
(b)：簡體中文社群（中國）之每日發文量與發文人數

峙的衝突中，3 月 23 日深夜有 9,959 則發文，3,363 位不重複用戶發言，每人日均發文量是 2.96，很多都是更新現場最新狀況，並召喚支持者到場聲援，3 月 24 日則是 11,830 則發文，4,231 位發出，平均發文為 2.8 則，多屬於情緒激動且重複發言的情況。

圖 2(b) 代表的是簡體中文社群，包括中國網友翻牆使用 Twitter 或是海外中國人，他們對於 318 事件的討論，數量雖然不多，但卻持續在高原期一段時間。簡體中文的社群聲量自 3 月 19 日起維持每日 800 則左右的熱度，直到 3 月 24 日



(c)：日文社群之每日發文量與發文人數



(d)：英文社群之每日發文量與發文人數

圖 2：各語言社群每日發文量與發文人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行政院衝突事件達到 1,200 則的高點，之後討論的熱度略為下降到 400 則，到 3 月 30 日遊行時發文量達 1,300 則，又是另一波高點。對於簡體中文社群來說，顯然 50 萬人上街抗議比起數十人被警方暴力對待更具討論性。整體而言，簡體中文社群雖然沒有明顯的特別高峰，但討論熱度延續頗長的一段時間。

圖 2(c) 代表著日文社群的討論，他們對 318 運動的討論高峰始於 3 月 21 日，數量快速攀升，到 3 月 24 日達到單日 57,000 則的高峰，24,906 人發文，日均發文量為 2.29。在學生占領議場期間，日文直播頻道亦同步轉播議場內實況，不僅有許多日本網友關注，他們也與臺灣或日本網友對話並擴散訊息，加上日本 Twitter 用戶遠比中文社群為多，這使得日文推文量位居整體社群中的最大量，共占 73.4%。

圖 2(d) 代表了英文社群的討論，有一小個小高峰及二波大高峰。第一個小高峰出現在 3 月 21 日，較繁體中文、簡體中文的第一波高峰皆出現在 3 月 19 日慢了二天，顯示英語世界對臺灣學生占領立院的關注晚了二天，直到學生占領立院成為確定事實後，有外媒跟進報導。第一個大高峰則是在 3 月 24 日行政院衝突當天，抗爭群眾流血照片成為外媒報導焦點；第二個大高峰出現在 3 月 30 日凱道遊行當天，外媒報導重點在於此事背後隱含的臺灣與中國關係。英文社群相較前三個語言社群的最大差別在於，每天的每人日均發文量皆為三個社群中最低，顯示英文社群對於臺灣 318 社運的傳播模式僅為關心，每日每人轉發一則推文，而非實質參與討論。

整體而言，同時比較繁體中文社群（臺灣）、簡體中文社群（中國）、日文社群、英文社群這四個語言社群的時間變化趨勢，可以發現討論聲量的高峰有遞延效果，本地社群最早進入討論高峰，地域愈遠的語言社群則是直到 3 月 24 日抗爭及衝突規模擴大，新聞媒體報導及國外社群也同時加入討論；在 3 月 19、23、24 日這幾天抗爭激烈抗爭時，每個語言社群的日均發文量皆比其餘日高，特別是抗爭所在地的臺灣社群，3 月 23 日的日均發文量接近 2.96，顯示遇到衝突現場狀況不明時，線上公眾將不斷更新狀況、轉發訊息做為參與行動的另一種方式。

三、社交媒體之超連結分析

除了時間趨勢分析之外，本研究接下來進行推文類型分析，Twitter 使用者發文可分為四種類型：（一）原創推文（original tweets）：用戶自己發文，不帶任何標記；（二）轉發推文（retweet, RT）：用戶轉發其他人推文，推文最前方

為 RT；（三）轉發推文並加個人註解（retweet with comments）：用戶轉發他人推文，並在 RT 前加註個人意見；（四）與特定人對話（mention/reply）：用戶發送推文與特定人對話，推文內不含 RT，且出現 @user。每一種推文類型代表不同類型的用戶互動，研究可透過資訊程式分辨並計算大量推文中是否出現 RT 或 @user 符號 (Cheng & Chen, 2014)。因此，本研究計算整體資料集及各語系推文中不同類型推文所占比率，如表 2。

透過推文類型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在整體推文中，使用者最常轉發他人推文來參與行動，整體比率超過一半以上，其餘則是原創推文的比率達四成，原創推文可能是使用者自己發文，也可能是從其他網站貼上網址並加註意見。研究者進一步進行超連結分析，在整體資料集 70.56 萬筆貼文中，有 396,690 筆推文帶有超連結，占整體數量的 56.22%。若比較各語系推文所帶有的超連結比率，則可發現繁體中文推文帶有超連結的比率為 68.55%、簡體中文為 56.68%、日文為 51.85%、英文則為 77.93%，各語系推文皆有超過一半比率推文帶有超連結，因此進一步分析這些超連結指向哪一類型網域（domain URL），以探討不同社交媒體被引用情況。

研究者透過計算機程式，從帶有超連結的推文中，共計抽取出 448,849 個超連結，按照網路的冪次分布定律，為了找出最常被分享的網域為何，因此篩選出超過整體超連結數量 0.5% 的網域，意即分享次數超過 2,244 次的網域，共計 24 個網域。研究者進行人工編碼逐一標示其網站名稱、所屬國別、網站類型等，扣除其中一個網域與 318 運動無關，剩餘 23 個網域的詳細資訊如表 3。

根據表 3 結果，可以發現 23 個網域主要可分為二大類：第一類是社交媒體，在此意指可促進社群分享之各種網路平臺，共計 9 個；第二類為新聞網站，包含專業新聞機構及入口網站新聞，共計 10 個；其餘 4 個為個別的內容網站，如：綜合型網站的個人部落格、獨立記者的個人網站中。以下研究者分別針對社交媒體及新聞網站的引用進行討論。

推文類型	all	ja	zh-tw	zh-cn	en
original tweets 原創推文	40.10%	35.10%	56.80%	46.50%	35.60%
retweet 純粹轉推	53.70%	59.10%	36.40%	42.70%	55.00%
retweet with comments 轉推加註解	0.60%	0.50%	0.50%	2.90%	0.30%
mention or reply 與某人對話	5.70%	5.30%	6.20%	7.90%	9.20%

表 2：318 運動各語系推文類型比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排名	Domain URL	次數	網站名稱	國別	類型	備註
1	twitter.com	50,346	Twitter	global	社交媒體	社交網絡服務
2	youtube.com	28,372	Youtube	global	社交媒體	影音分享平臺
3	t.co	26,730	Twitter 短網址	global	社交媒體	社交網絡服務
4	facebook.com	12,339	Facebook	global	社交媒體	社交網絡服務
5	plurk.com	10,148	Plurk	global	社交媒體	社交網絡服務
6	***appledaily.com.tw***	***9,711***	***臺灣蘋果日報***	***TW***	***新聞***	
7	hosyusokuhou.jp	8,909	保守速報	JA	新聞	
8	sankei.jp.msn.com	7,106	MSN 產經新聞	JA	新聞	
9	instagram.com	5,850	Instagram	global	社交媒體	圖像分享平臺
10	47news.jp	5,842	47news	JA	新聞	
11	***news.ltn.com.tw***	***3,610***	***自由時報***	***TW***	***新聞***	
12	live.nicovideo.jp	3,467	niconico 生放送	JA	社交媒體	影音直播平臺
13	taiwannohannou.com	3,444	taiwannohannou	JA	內容網站	介紹臺灣
14	asahi.com	3,293	朝日新聞	JA	新聞	
15	ameblo.jp	3,075	Ameda	JA	內容網站	綜合型網站
16	xinwennews.wordpress.com	2,975	中國新聞	CN	新聞	
17	ustream.tv	2,775	Ustream	gobal	社交媒體	影音直播平臺
18	***tw.news.yahoo.com***	***2,751***	***雅虎臺灣新聞***	***TW***	***新聞***	***入口網站新聞***
19	matome.naver.jp	2,707	Naver	JA	內容網站	綜合型網站
20	iwj.co.jp	2,360	岩上安身責任編輯	JA	內容網站	獨立記者
21	***ettoday.net***	***2,347***	***東森新聞雲***	***TW***	***新聞***	
22	***chinatimes.com***	***2,235***	***中國時報***	***TW***	***新聞***	
23	slideshare.net	2,203	Slideshare	global	社交媒體	簡報分享平臺

表 3：318 運動中最常被 Twitter 社群引用的網域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註：斜體字加粗表示為臺灣的新聞網站。

隨著網路工具更加多元，社群在 318 運動期間使用不同社交媒體工具進行社會運動的即時參與，在表 3 的 9 種社交媒體平臺網域中，最大宗是 Twitter 平臺本身的引用（含 twitter.com 與 t.co 二個網域）[7]，這表示 Twitter 社群轉發其他 Twitter 用戶內容，這是最方便的引用，因此數量也最大，所呈現的波段高峰接近

7 t.co 為 Twitter 本身的短網址服務，在正常情況下，透過網址還原工具，每一則 t.co 的網域應被還原為 twitter.com 網域下的單一網址，但因每則推文有 140 字元的限制，當用戶在轉推（Retweet）時加上自己的註解後，若總長度超過 140 字元，則原推文末端的超連結可能被截去部分字元，成為不完整的 t.co，無法經由網址還序找出特定的單一網址。

圖 1 的結果，但社群分享其他社交媒體連結的引用情況則更令人好奇。因此，圖 3 先扣除掉 Twitter 平臺本身的引用，方便觀察其餘 7 個社交媒體平臺被引用次數之時間變化。

綜合表 3 與圖 3，我們可以歸納出社群最常使用的社交媒體工具為以下四種類型：

1. 社交網絡服務（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以人際網絡做為訊息擴散的基礎，包括 Twitter、Plurk、Facebook。圖 3 顯示的 Facebook、Plurk 曲線代表的是 Twitter 社群引用來自 Facebook 與 Plurk 的內容，包含意見、圖片、超連結等。雖然 Twitter、Plurk 臺灣用戶遠不及大眾化的 Facebook，但這些用戶多為社交媒體早期採用者，且多半同時擁有 Facebook 帳號，遇到 318 這類重大事件時，這些使用多重社交媒體的用戶會傾向在不同社交媒體平臺上收集最新消息或重要資訊，並積極把相關訊息透過各種平臺擴散出去，造成跨媒體平臺的相互引用行為。
2. 影音分享平臺（visual social media）：此類別包含一般大眾普遍採用的 YouTube，社群透過 YouTube 分享行政院衝突警察打人的目擊影片（特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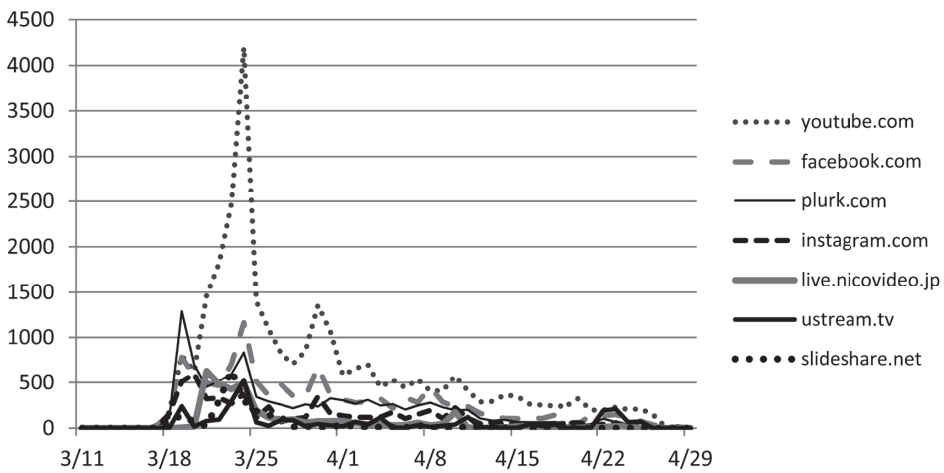


圖 3：不同社交媒體在 Twitter 社群中被引用之情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是在 324 暴力衝突當晚，有二則影片被廣泛流傳[8]，使得 YouTube 分享次數在當天遠高於其他社交媒體）、新聞報導影片、歌曲 MV（最經典的是滅火器樂團為太陽花學運創作歌曲「島嶼天光」，這首歌曲 MV 在 3 月 30 日凱道集結的前一晚上線，共被分享了 618 次，成為本次學運的藝術創作代表，也讓 YouTube 被引用次數在 3 月 30 日那天達到另一波高峰）；另外，在年輕族群裡盛行的圖像社群平臺 Instagram，也成為參與者分享現場目擊照片的主要管道，從 Instagram 被分享的數量來看，數量雖然沒有其他社交媒體多，但高峰集中於 3 月 19 日、3 月 20 日二天，推論可能是在 3 月 18 日第一波學生占領之後，後續二天有更多學生前往現場聲援並拍照上傳。

3. 影音直播平臺（live streaming video）：本次學運的最大特點之一在於直播平臺的運用，第一時間隨學生進入立院的網友 longson 用 ipad 架起了 Ustream.tv 直播頻道，這個未中斷的直播平臺使外界可隨時監看議場內情況；日本 niconico 生放送（live.nicovideo.jp）也在 3 月 21 日加入直播臺灣國會占領現場[9]。這類直播平臺不僅可以讓群眾透過網路觀看實況，也提供聊天室功能，讓同時上線的數百人或千人可即時在聊天室中針對現場實況進行互動。除了上述這二個網路直播頻道外，後來進入議場報導的各家新聞媒體，也都在網站開設直播畫面供網友觀看，只是被引用次數不若前二者來得多。
4. 簡報分享平臺（slide sharing）：另一個被引用次數較多的社交媒體工具則是簡報分享平臺 Slideshare，主要用於解釋性目的，在 318 立法院占領事件發生後，引發許多公眾對服貿議題感到好奇，不解抗爭者為何採取這種手段來阻擋該條例的通過，人們會尋求並分享解釋性的資訊。特別是臺大經濟系鄭秀玲教授的簡報「兩岸服貿協議對我國的衝擊分析」（http://www.slideshare.net/hungchengtu/ss-24730814 ），被引用 187 次，另一個日文簡報解釋臺灣國會占領事件（http://www.slideshare.net/noexcuse/ss-

8 民眾上傳壹電視現場畫面「警察驅離民眾　打很兇」，被分享 815 次，網址為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YiKKd8bVjA&feature=youtu.be；民眾上傳三立電視現場畫面「警察用盾打人跟學生踢警盾的誰對誰錯請自行判斷……」，被分享 751 次，網址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gXYrkShwJs&feature=youtu.be

9 網友 longson 透過 http://www.ustream.tv/ channel/longson3000 網址對外直播立法院內的實況，這個網址共被分享 374 次。日本 niconico 生放送（live.nicovideo.jp）直播頻道的網址為 http://live.nicovideo.jp/watch/lv173117558，共被分享 3,027 次。

32581194），被分享 1,762 次。Slideshare 的高峰只出現在 3 月 23 日，當多數人都瞭解此事件緣由後，便不再繼續分享。

除了透過超連結的網域分析之外，研究者同時進行單一網址的分析，發現最常被社群引用的單一網址除了新聞、直播頻道與影片外，經常是手繪或改作的圖像，在最常被引用的前十名網址中即有三張圖片，如圖 4(a) (b) (c)。

這三張圖片都出於一般用戶的手繪插畫或對現有的相片改造，4(a) (b) 以溫馨、可愛方式表達聲援與支持學生的訴求，4(c) 則以反諷方式表達支持之意。這也是近年網絡化社運常見的視覺表達方式，將抗爭訴求以淺顯明白口號或諷刺方式繪製成圖像，更易於在社交媒體流傳。

公眾除了利用現有社交媒體平臺透過分享擴散來參與社會運動之外，亦會架設專屬網站做為社運資訊彙整及宣傳之用，典型例子像是太陽花運動國際組架設的 4am.tw 網站及 Twitter 帳號，藉由英文報導及圖片呈現占領者訴求，向國際社群發聲，此一網域及 Twitter 帳號被引用了 903 次，在英語系推文中具有影響力。另外，「g0v 零時政府」社群架設的多人共筆[10] 也協助社群將有用的資訊彙整，甚至有志工協助將立法院實況轉播內容過錄為文字版，供群眾觀看。

四、臺灣新聞媒體被 Twitter 社群引用情況

表 3 中最常被網路社群引用的 10 個新聞網站中，有 4 個是日本新聞網站、一個是海外的中國新聞網站，其餘 5 個為臺灣新聞網站，依照被引用次數依序為：臺灣蘋果日報、自由時報、雅虎臺灣新聞、東森新聞報、中國時報。圖 5 顯示這 5 個新聞媒體在 318 運動期間，每日被引用的數量變化。

在這 5 個新聞網站中，除了雅虎臺灣新聞為入口網站新聞外，其餘 4 個皆為原生新聞網站，東森新聞報是純粹的網路新聞，其餘的臺灣《蘋果日報》、《自由時報》、《中國時報》為臺灣 4 大主要紙本新聞媒體的其中 3 家。從時間趨勢來看 5 家新聞媒體在學運各個階段被引述的情況，可以發現臺灣《蘋果日報》是最常被引述的新聞來源，它在 318 服貿抗爭中，不僅立場鮮明站在抗爭者這一方（晏山農等，2015），更以大量即時新聞搶占網路族群的眼球，整體被 Twitter 社群引用的次數也高居國內外新聞媒體之冠，達 9,711 次，是第二名的 2.69 倍，

10 在 318 運動期間，g0v 零時政府開設的多人共筆達數十個，面向包含科技線路、媒體報導、服貿資訊彙整、實況轉報等，事後將各個共筆清單彙整於以下網址 https://g0v.hackpad.com/ep/pad/static/4AKHvZRwM59

(a)：日本網友 mamalolly 製圖聲援臺灣服貿運動（4,447 次引用）

(b)：日本網友繪製「吼吼熊要求退回服貿」（1,156 次引用）

(c)：網友改圖諷刺「以往臺灣國會混亂，今日學生占領國會井然有序」（2 個網址合計 1,156 次引用）

圖 4：318 運動期間 Twitter 常被引用之三張圖片

註：(a) 圖引用網址請參 https://twitter.com/malalolly/status/448065250655363072/photo/1。(b) 圖引用網址請參 http://hamusoku.com/archives/8299207.html。(c) 圖引用網址請參：日文網址共引用 952 次；https://twitter.com/TanTaiP/status/448059797720424450/photo/1。繁體中文網址共引用 204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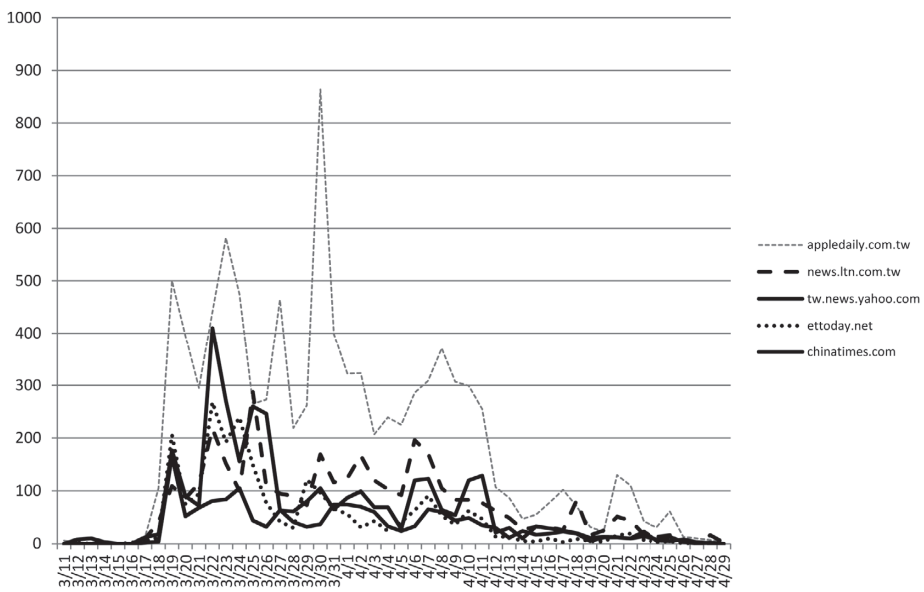


圖 5：臺灣新聞媒體在 Twitter 社群中被引用之情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提供。

臺灣《蘋果日報》的報導在不同階段亦製造了幾波的新聞高潮，例如：被引用次數最高二則的臺灣新聞就是學生攻占行政院長辦公室及 330 凱道 50 萬聚集[11]。

被引用次數第二名的是《自由時報》，立場偏向支持學運的一方，同樣製造了好幾波新聞被引用的高潮；第三是雅虎奇摩新聞，由於它是入口網站，本身不產製新聞，僅匯總各家新聞於該網站供網友閱讀；第四是東森新聞報，為純粹的網路媒體，沒有特別突顯的高潮，被引用的次數較平均出現在 3 月 19 日到 4 月 11 日間，與該網路媒體較注重事件周邊花絮相關，如：學運領袖的個人新聞會引起一定聲量討論，但不一定會有大波段的起伏；第五位則是《中國時報》，它被視為立場偏向政府的新聞媒體，亦有一定的引用數量，但未達到很大的高潮。

進一步比較這 5 家新聞媒體被引用的情況（圖 5）與社群討論的聲量變化（圖 1），可發現社群討論的聲量變化緊密扣連著運動的發展，當抗爭事件有具體行動時才會出現社群發言的高潮，主要集中在 4 個時間點：3 月 18 日占領立院、3 月 24 日行政院衝突、3 月 30 日凱道集結、4 月 10 日學生退出議場，即使不同語系社群的討論起伏不同，但亦集中在上述 4 個時間點。

然而，新聞媒體在被社群引用的高峰卻未必等同社群聲量的變化，這 5 家新聞媒體被引用的高點皆不盡相同，因而本研究推論新聞引用的變化趨勢，除了與事件進展情況相關，亦與新聞媒體的議題設定相關，在學生占領立法院的數周期間，當抗爭者與政府間的對峙無明顯進展時，新聞媒體為了營造報導焦點，會設定不同的報導議題，希望獲得網路社群討論或引用，以擴大其新聞媒體在社交媒體的能見度與影響力。

以臺灣《蘋果日報》為例，它被引用的波段高峰多達 5 次，除了前述抗爭事件的 4 個時間點之外，另有一波高點發生在 3 月 27 日，其他新聞媒體在同一時間並未呈現引用高峰，唯獨《蘋果日報》有此波高潮。研究者檢視當日的新聞事件為：上午 9:30「朝野協商三度破局　王金平說『方法我來想』」，下午 3:00「學運代表林飛帆宣布 330 凱道大集結」（晏山農等，2015：337），抗爭者在當天並未與警方發生具體衝突，故研究者推論當天蘋果日報被引用數量升高，是新聞媒體的報導數量增加，及被網友引用量二者加總的效果，亦即蘋果日報在當中成

11 臺灣單一新聞被引用次數最多的二則皆是蘋果日報的即時新聞，第一則是 2014 月 3 日 23 日 21:30 發布「行政院長辦公室　遭學生攻占」，（http://m.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politics/20140323/365582），這則即時新聞在 Twitter 社群被引用 322 次，在蘋果日報網站上顯示有 5275 人在 Facebook 按讚。。第二則是 2014 年 3 月 30 日 15:42 發布「凱道湧 50 萬人　林飛帆：馬總統立即出面回應」（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politics/20140330/369857/1/），這則即時新聞在 Twitter 社群被引用 316 次，在蘋果日報網站上顯示有 5,649 人在 Facebook 按讚（以上 Facebook 按讚數據截取時間為 2015 年 8 月 15 日）。

功發揮了議題設定的效果，帶動網路社群關注「立法院協商破局、學運社團號召社會大眾上街抗議」之議題。

伍、結語

一、研究發現

根據上述資料分析與討論，我們瞭解網絡化社運中公民的即時參與，實際上是透過各種傳播科技的中介得以完成，總結本文共有三項主要研究發現。

（一）網絡化社運不同階段的社群參與情況

網絡化社會運動的開端，經常是少數人先採取行動，透過社交媒體倡議及擴散訊息，帶動關心此議題的線上社群與線下社群連結；這些訊息擴散會引起第二波參與者關注原先的參與者為什麼要進行抗議，因而主動尋求資訊，無論他們支持或反對，這些主動的資訊尋求活動會使更多人加入社運的參與和討論。然而，成功的網絡化社運必然是線上與線下社群的連結，不僅需要線上公眾的發言與轉發訊息，以衝高社交媒體討論聲量，同時需要線下公眾以身體占領實體空間，犧牲部分的行動自由，以對抗當局，並號召更多人參與。

倘若抗爭的另一方政府當局，不願回應抗爭者訴求，抗爭者可能採取更激烈舉動，若發生現場衝突，這些衝突促使行動者頻繁地重複發文，表達情緒或動員更多群眾，同時創造更多現場目擊影像在社交媒體流傳，其傳播模式接近重大災難的瞬間鉅量。然而，長期的占領行動不可能一直維持在高強度的社會抗爭，在平緩期可以有較多的對話與討論，但可能由於社交媒體上的群體極化效應（polarization），事件的參與者慢慢形成兩極化的群眾，如：反服貿 vs. 反反服貿，最終未必能達成真正的對話與共識。

對於網絡化運動而言，跨國社群的參與亦十分重要。大規模占領運動的出現與持續，經常起因於政府當局不願回應抗爭者的訴求，因此抗爭者除了引起國內社群的討論，亦希望引起國際社會關注。正如在 318 運動期間，運動團體透過群眾募資購買紐約時報廣告，並由專業設計師協力完成 4am.tw 網站，用英語向國際社群表達訴求，在超連結分析中發現白宮請願網站的連結獲得很多群眾分享[12]。這些行動目的一方面透過外國媒體報導擴大社群認同，並正當化自身行動，另一方面也希望藉由跨國網路社群影響外國政府，進而對本地政府產生壓力。

12 反服貿群眾於 3 月 18 日在美國白宮網站請願，獲得 18.7 萬人連署，白宮官方亦在網站回應，該網址（https://petitions.whitehouse.gov/petition/oppose-trade-agreement-between-taiwan-and-china）在 Twitter 社群獲得 450 次分享。

然而，根據 Bruns et al. (2013) 對阿拉伯之春的跨語系使用者研究發現，在抗爭事件發生初期，英語推文所占比例相當高，但事件中後期則是阿拉伯語推文所占比例較高，這意謂重大社會抗爭在短時間內可吸引大量外國媒體報導及國外社群關注，但隨著抗爭時間拉長，國外媒體及社群的關注消退，只剩在地社群持續關注與討論此事件。因而，在地抗爭者如何持續吸引全球社群關注，值得進一步思考。

（二）公民目擊（citizen witness）與直播科技（live streaming video）對網絡化社運的影響

網絡化社運的另一個特徵就是公眾可透過各種傳播科技即時參與，個體化又使每個人會選擇自己熟悉且擅用的工具，而非由組織統一命令使用某一特定平臺擴散訊息。因此，在探討網絡化社運時，必須考量社交媒體的多種應用，除了 Twitter、Facebook、Plurk 等社交網絡服務將訊息透過個人社交網絡擴散，參與者也使用 Instagram、Flickr 散播抗爭中的圖像，用 YouTube 分享影音報導、目擊影片或創作歌曲，透過 Ustream.tv 直播頻道同步監看抗爭現場狀況，利用簡報分享平臺或專屬網站提供解釋性與彙整性資訊，如：Slideshare、g0v 零時政府的多人共筆、運動英文網站（4am.tw）等。

公民目擊意指一般人在衝突當下所拍攝的影像，儘管照片會受到當事人主觀意識的影響，但當抗爭者、記者、軍警各自透過目擊影像或直播頻道呈現現場畫面，各方都希望掌控線上敘事的話語權，以影響更大範圍的群眾。Allan (2013) 認為公民目擊的出現，對新聞記者是個挑戰，他們在不同媒介形式中游離（包含目擊證人、視覺影像、推文等），必須要重新定位「目擊」，如何有特殊視角並選擇其範圍進行報導，以維持他們的專業。

進一步來看，即時直播科技相較於現場目擊影像，更有機會使社運關注者（無論是支持或反對）成為社運的行動者。透過即時互動的傳播科技中介，公眾擁有即時參與社運（real-time civic engagement）的可能，這正是大眾自我傳播與網絡化社運連結性行動邏輯結合之具體展現。在臺灣 318 運動長達數十天的占領立法院行動，一開始透過 longson 的 iPad 直播封閉議場內的占領情況，場外觀眾監看議場內警方會不會對占領學生採取暴力行動。隨著占領時間的拉長，後來新聞機構也加入直播行列，其他行動者亦在立院外其他角落利用簡易手持裝置進行直播，同一時間最多有十幾個頻道直播社運相關畫面，線上有上百至千人在觀看與討論。直播科技使得行動者不必依賴主流媒體，便能進行大眾自我傳播，其他

公眾即使未到現場也能即時參與，他們在網路直播頻道的聊天室討論、監看直播現場狀況並轉發即時動態，現場行動者亦可透過直播頻道跟螢幕另一端參與者對話。運動的關注者正如 Anstead & O'Loughlin (2010) 指出的「浮現觀眾」（emerging viewertariat），他們一面監看即時頻道轉播的社運場景，一面群集在各個社交媒體平臺評論，遇到特殊狀況也能隨時衝到現場，從線上參與轉變為線下行動。

直播科技對網絡化社運形成多重的監看（surveillance），一方面讓抗爭現場訊息透明化，警方不敢在直播鏡頭前公然施暴，也避免新聞媒體刻意剪接畫面扭曲現場情況，但它也對抗爭者形成壓力，他們必須兼顧直播螢幕的另一端有無數群眾關心他們的一舉一動，於是占領議場學生不敢任意嬉笑或獨斷行動，他們在鏡頭前實施民主體制與公民審議，這些畫面透過社交媒體傳散亦是另一種形式的展演。

（三）即時新聞與社交媒體的相互滲透

公民目擊影像與直播科技的出現，挑戰了傳統新聞記者在抗爭中的角色。新聞機構採用公民拍攝影像做為新聞素材，公眾在社交媒體協助分享新聞機構的即時報導，這些情況雖然不只出現在社會抗爭的場景，在災難或社會事件中，新聞媒體引用一般民眾偶然拍到的影像亦有所聞，但大規模社運促使更多公眾採用策略性拍攝與分享訊息，使得社交媒體與即時新聞的相互滲透情況更為顯著。

Facebook 與 Twitter 成為近年來人們收看新聞的主要管道，透過社交媒體訂閱新聞，用戶更容易獲得自己想看的新聞，並方便轉發給自己的人際網絡。本研究透過超連結分析探索 318 運動期間 Twitter 社群分享的新聞連結為何，找出最常被分享的 5 個臺灣新聞媒體為：臺灣《蘋果日報》、《自由時報》、雅虎奇摩新聞、東森新聞報、《中國時報》，令研究者訝異的是臺灣 4 家主要報紙中唯有《聯合報》未上榜。

臺灣《蘋果日報》、《自由時報》、《聯合報》、《中國時報》這 4 大報在臺灣社會的政治新聞與社會抗爭中經常扮演影響輿論的重要角色，在政治傳播領域中，也經常以這 4 家報紙做為主要研究對象。然而，《聯合報》的線上新聞——聯合新聞網（UDN）在 318 事件中的引用程度遠較其他三報偏低，未進入前五大主要被引用的臺灣媒體。研究者特別追蹤 UDN 的相關網址在整體資料集中的引用情況，結果發現在各語系推文前 500 名被引用的網域中，UDN 整體網域合計

被引用 907 次[13]，僅是被引用次數最多的《蘋果日報》的十分之一，離第 5 名中國時報 2,235 次也有一段距離。

「聯合新聞網」（www.udn.com 或 udn.com）在 2012 年臺灣總統大選期間，是 Twitter 社群最常引用的新聞來源（鄭宇君、施旭峰，出版中）；在 2014 年 318 學運中，被引用最多的臺灣新聞媒體為《蘋果日報》，UDN 反而掉出前五大臺灣新聞媒體之外。為何從 2012 年到 2014 年短短 2 年間有這麼大變化？本研究推論有 2 個可能原因：一是世代因素，蘋果日報長期經營社交媒體，方便年輕網友大量訂閱與引用，318 運動正好是許多年輕人關注的運動，他們會引用自己最常看的媒體；二是蘋果日報較其他傳統媒體更著重即時新聞的發布，在 318 運動前，蘋果日報就發送大量即時新聞，儘管充斥著娛樂八卦與社會新聞等瑣碎消息，內容未必被多數閱聽人欣賞，但它藉此操兵建立即時新聞的發稿與播送流程，等到 318 運動這種重大事件發生時，它便透過即時新聞的發送在社群間發揮影響力。

本文同時比較了社群聲量與新聞引用在時間趨勢的變化，發現二者的高峰並不一致，社群聲量高峰經常伴隨社運的具體行動出現，如：占領、衝突、遊行、退場，但新聞引用有更多高峰出現，且各家新聞的高峰點也不一致（圖 5）。研究者認為這正是新聞媒體滲透到社交媒體，在社群間發揮議題設定的作用。當抗爭者與政府的對峙進入僵持，事件沒有任何進展，但仍有許多群眾關注（新聞網站可透過點閱率獲知此資訊），新聞媒體必須「創造」出更多的新聞，如：《蘋果日報》報導許多政治人物私下奔走的小道消息、東森新聞報則是著重在學運領袖的個人衣著、生活習慣等花絮。這些新聞跟運動的實質進展無關，只是用來吸收這些群眾過度關注的目光，倘若這些新聞在社群被引用頻率偏高，某種程度證明了新聞媒體對於社交媒體的議題設定效果。

簡言之，社交媒體使抗爭現場訊息得以不斷更新或轉播，公眾可從線上或線下參與運動，社運參與者不必然要將身體固著在一時一地的占領空間，行動者可進行一般日常活動（如：上班、上課），透過社交媒體或直播頻道即時監看抗爭現場狀況並參與互動；一旦抗爭現場有需求，透過線上動員，不在現場的參與者可隨時由上班或上課狀態衝到現場聲援。這種機動的社運參與模式，不僅可擴大

13 UDN 的整體網域合計被引用有 907 次，依照引用次數多寡排列，包含 tv.udn.com（直播立法院占領現場）、m.udn.com（行動版新聞）、forum.udn.com（論壇）、udn.com（PC 版新聞）、blog.udn.com（個人部落格）、mag.udn.com（書報攤），後二者其實未必是新聞，可能是一般個人意見或專欄。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5 鄭宇君.indd 144 2016/1/12 下午 07:36:44

參與抗爭的群眾人數，允許上班族或學生以「剩餘時間」[14] 參與抗爭，亦能有效地緩解占領現場抗爭者的身心疲憊，有人可以輪替，並可延長占領運動的時間。

然而，這些參與者可隨時加入，亦可能隨時離開，這是網絡化社運的特點，它是由下而上形成，沒有人能事先預期一場抗爭運動的規模可以有多大，這不僅是分散式的公民參與，也是公眾以「剩餘時間」進行的社運參與。

二、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主要的限制來自於社交媒體即時資料收集的挑戰，運動進行的狀況隨時有變化，研究者難以有明確關鍵字可以收集完整的推文資料。相較政治選舉有明確的候選人姓名做為關鍵字，且可預知時間，方便研究者提早規劃資料收集方向；但網絡化社運往往突然爆發，從一小群人的行動突然轉變為社交媒體的討論焦點，且 Twitter 資料必須要立刻收集，不然容易佚失，加上中文使用者又不常使用 #hashtag 做為事件標籤，僅能使用「關鍵字」做為資料收集依據。

研究者在 318 事件發生當晚，立刻啟動 Twitter 資料收集程式，一開始僅以「服貿」、「立法院」為關鍵字，隨著運動進展新增關鍵字，但為了避免將運動焦點過度集中於個人，研究者選用占領運動本身或地點為主要關鍵字，而不以個別行動者姓名做為關鍵字，僅在 4 月 7 日陳為廷、林飛帆、黃國昌代表占領團體發表退場宣言時，用三人姓名收集短暫幾天資料。然而，這種關鍵字收集方式仍有限制，例如：「国会」這個關鍵字就收集到日本國會在 4 月 7 ~ 10 日發生了爭議事件，必須事後排除這些日文雜訊。此外，利用關鍵字進行推文資料收集，許多僅分享網址連結而未加註解的推文無法收集到，這些推文往往直接轉為短網址出現在 Twitter 上，這使得本研究計算特定 URL 的分享數，會比實際在 Twitter 世界的分享數少。

另一個資料分析的限制主要來自本地社群使用 Twitter 的人數較少，造成本文分析可能無法全面掌握臺灣網路社群的樣態。在 Twitter 上所收集的日文推文比預期中來得多，遠高於本地社會使用的繁體中文，從全球社交媒體社群的互動來看，這顯現了日本社群對於臺灣社會運動的格外關心，遠高於對於香港雨傘運動的關注（鄭宇君、陳百齡，2016 年 1 月）。為了彌補此一研究限制，研究者

14 「剩餘時間」借用自 Clay Shirky（2010／吳國卿譯，2011）《下班時間扭轉未來：休閒時間 × 網路連結 = 改變世界的決勝點》（*Cognitive surplus: Creativity and generosity in a connected age*）一書中的概念，意指人們運用閒暇時間與認知剩餘，在社交媒體時代可發揮無限創意與無償付出來改變現場，正好適合用來描述 318 運動的眾多參與者。

在後續研究方向將針對另一個臺灣社會廣泛使用的社交媒體 Facebook 進行 318 運動的資料收集與分析。

318 事件做為臺灣社會數十年來之重要運動，儘管 Twitter 與 Facebook 的臺灣用戶人數差距甚多，二個平臺的使用族群與互動方式亦不相同，但在規模這麼大的運動中，研究者觀察到最常被引用或討論的訊息內容十分相近，可推論為當整個社會都在關注此事時，一個平臺重要訊息很快被擴散到另一個平臺，研究團隊正在發展一套系統性方法，收集 318 運動 Facebook 上參與討論的網路社群資料，未來將進一步比較 Twitter 與 Facebook 社群對於 318 運動的討論是否有類似趨勢。

318 運動所收集的推文資料數量龐大，本文僅針對推文資料的形式與時間趨勢變化進行探討，並從中篩選出部分內容進行說明。研究者後續將針對推文內容進行分析，除了推文的文字內容外，也希望針對社交媒體影像與文字的關聯性進行探討，以瞭解影像社交媒體對網絡化社運的影響。目前各國研究者對於社交媒體鉅量圖像資料的分析仍在起步階段，但它將是這領域未來的研究重心。

參考書目

吳君孝（2014）。《社群感測器：社群媒體分析工具之設計》，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碩士論文。

吳國卿譯（2011）。《下班時間扭轉未來：休閒時間 × 網路連結 = 改變世界的決勝點》，臺北，臺灣：行人。（原書 Shirky, C. [2010]. *Cognitive surplus: Creativity and generosity in a connected age*. New York, NY: Penguin.）

晏山農、羅慧雯、梁秋虹、江昺崙（2015）。《這不是太陽花學運：318 運動全記錄》。臺北，臺灣：允農文化。

鄭宇君、施旭峰（出版中）。〈探索 2012 臺灣總統大選社交媒體之新聞來源引用〉，《中華傳播學刊》，29。

鄭宇君、陳百齡（2016 年 1 月）。〈香港雨傘運動的眾聲喧嘩：探討 Twitter 社群的多語系貼文〉，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第九屆傳播學訪問學者計劃及『傳播科技與新媒體事件』工作坊」論文，香港。

——（2014）。〈探索 2012 臺灣總統大選之社交媒體浮現社群：鉅量資料分析取徑〉。《新聞學研究》，120：121-165。

Allan, S. (2013). *Citizen Witnessing*.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Andén-Papadopoulos, K. (2014). Citizen camera-witnessing: Embodied political dissent in the age of 'mediated mass self-communication'. *New Media & Society*, *16*, 753-769

Anstead, N., & O'Loughlin, B. (2010). *The emerging viewertariat: Twitter responses to Nick Griffin's appearance on BBC Question Time*. Retrieved from http://www.uea.ac.uk/polopoly_fs/1.147340!Anstead_OLoughlin_BBCQT_Twitter_Final.pdf

Beckett, C., & Mansell, R. (2008). Crossing boundaries: New media and networked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Culture & Critique*, *1*(1), 92-104.

Bennett, W. L., & Segerberg, A. (2012).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 739-768.

Bruns, A. (2005). *Gatewatching: Collaborative online news production*. New York, NY: Peter Lane.

Bruns, A., Highfield, T., & Burgess, J. (2013). The Arab Spring and social media audiences: English and Arabic Twitter users and their network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7*, 871-898.

Castells, M. (2012).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Social movement in the Internet age*. Cambridge, UK: polity.

-- (2007).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counter-power in the network soc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 238-266.

Cheng, Y.-C., & Chen, P.-L. (2014). Global social media, local context: A case study of Chinese-language tweets about the 2012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aiwan. *Aslib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66*, 342-356.

Choudhary, A., Hendrix, W., Lee, K., Palsetia, D., & Liao, W.-K. (2012). Social media evolution of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55*(5), 74-80.

Deuze, M. (2008). The changing context of news work: Liquid journalism and monitorial citizen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 848-865.

Karlsoon, M. (2012). Charting the liquidity of online new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4*, 385-402.

Lehman, B., (2014). *From A to B: Visualizing language for the entire history of Twitter, GNIP*. Retrieved from https://blog.gnip.com/data-visualization

Matheson, D. (2004) Weblogs and the epistemology of news: Some trends in online

journalism. *New Media and Society*, *6*, 443-468.

Meikle, G. (2010). Intercreativity: Mapping online activism. In J. Hunsinger, L. Klastrup, & M. Allen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Internet Research* (pp. 363-377). Dordrecht, Netherlands: Springer.

Meraz, S., & Papacharissi, Z. (2013). Networked gatekeeping and networked framing on #Egypt.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8*, 138-166.

MIT Technology Review. (2013). *Language data reveals Twitter's global reach*. Retrieved from http://www.technologyreview.com/graphiti/522376/the-many-tongues-of-twitter/

Papacharissi, Z., & de Fatima Oliveira, M. (2012). Affective news and networked publics: The rhythms of news storytelling on #Egyp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2*, 266-282.

Pew Research Center. (2015). *The evolving role of news on twitter and facebook*. Retrieved from http://www.journalism.org/files/2015/07/Twitter-and-News-Survey-Report-FINAL2.pdf

Rheingold, H. (2012). *Net smart: How to thrive onlin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Singer, J. B. (2014). User-generated visibility: Secondary gatekeeping in a shared media space. *New Media & Society*, *16*, 55-73.

-- (2008). The journalist in the network: A shifting rationale for the gatekeeping role and the objectivity norm. *Tri'podos*, *23*, 61-76.

Spasojevic, N., Li, Z., Rao, A., & Bhattacharyya, P. (2015). When-to-post on social networks. 21st ACM SIGKDD Knowledge Discover and Data Mining, Sydney, Australia. Retrieved from http://dl.acm.org/citation.cfm?doid=2783258.2788584

Statista. (2015). *Penetration of leading social networks in Taiwan as of 4th quarter 2014*. Retrieved from http://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95611/taiwan-social-network-penetration/

Suh, B., Hong, L., Pirolli, P., & Chi, E. H. (2010). *Want to be retweeted? Large scale analytics on factors impacting retweet in Twitter network*. Paper presented at 2010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Computing (Social Com), Minneapolis, MN.

Thorburn, E. D. (2014). Social media, subjectivity, and surveillance: Moving on from

occupy, the rise of live streaming video.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 Cultural Studies*, *11*, 52-63.

van Dijck, J. (2007). *Mediated Memories in the Digital 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eeks, B. E., & Holbert, R. L. (2013). Predicting dissemination of news content in social media: A focus on reception, friending, and partisanship.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90*, 212-232.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6(1), pp. 117-150, January 2016

Online Real-Time Civic Engagement in A Networked Movement: A Case Study of Taiwan's 318 Movement

Cheng, Yu-Chu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Chen, Pai-Li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318 movement is a rare case of large-scale occupy movement in Taiwan. It is also a highly networked movement as its participants were mobilized and coordinated by the use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cluding instant sharing of eyewitness photos and news as well as live streaming videos of the occupied sites on social media. To better understand this movement, this study analyzes tweeting extracts from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movement on Twitter. It was found that when clashes between the protesters and the opposing forces took place, eyewitness accounts and live streaming instantly brought about a massive diffusion of information. Furthermore, the hyperlink analysis conducted in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spreading or commenting on the instant news is an alternative way for the public to participate in the movement.

Keywords: networked movement, social media, hyperlink, live streaming video, civic engagement

* Email: colisa@gmail.com
Received: 2015.08.25
Accepted: 2015.11.08

JCRP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5 鄭宇君.indd 150 2016/1/12 下午 07:36:44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6 卷 第 1 期．頁 151-167．2016 年 1 月
DOI: 10.6123/JCRP.2016.006

從野草莓學運到太陽花運動的媒體與社會運動

2014 年舍我紀念館學術工作坊暨「媒體與社會運動」圓桌論壇

論壇時間：2014 年 6 月 13 日（五）13:30 ~ 16:00
地點：世新大學舍我樓 12 樓 S1204 會議室
主辦單位：世新舍我紀念館
主持人：賴鼎銘（時任世新大學校長）
與談人：
1. 管中祥（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負責人）
2. 何明修（臺灣大學社會系教授）
3. 蔡培慧（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臺灣農村陣線發言人）
4. 黃孫權（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5. 鄭國威（臺灣數位文化協會與潮網科技內容中心主任）

近年臺灣社會運動蓬勃，從野草莓學運、大埔事件、反媒體壟斷、文林苑事件、洪仲丘事件到太陽花運動等，引起社會許多討論與後續效應。在這些社會運動中，其運作方式與策略思考似乎和過去有些差異，媒體在其中的角色也相當不同，應有更細緻的理解與探究。例如：近幾年臺灣的社會運動出現什麼新特質？太陽花運動為何能動員大量青年參與和駐守？它如何蓄積巨大能量？這些運動如何透過各種傳播方式和媒介進行動員？在太陽花運動中，新媒介在發聲與動員上和以往有何不同？國家機器對媒體的操控失效了嗎？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賴鼎銘：

今天很榮幸能夠參與這次盛會，太陽花這場運動已經對臺灣造成很大的挑戰，第一個挑戰是對傳統媒體。學生在立法院的時候，一雙夾腳拖、一臺 iPad，就自己報導起來，對主流媒體、傳統媒體造成很大的衝擊。傳播學院已經開始探討，我們現在的教育模式是不是有問題？是不是應該改變？這對我們世新大學是很大的震撼。第二個挑戰是教育、傳播教育。現在的年輕人整個的想法已經跟我們這代不同了，未來的教育該怎麼辦，這是第二個挑戰。第三個挑戰是對政治的挑戰。占領立法院基本上已經在解構立法院的權力，學生不願意立法院的代理，這個對臺灣政治的影響，值得我們去思考。

從許多方面來看，這次的太陽花運動，我覺得不該小看它。但遺憾的是，運動結束後大家好像又恢復常態，官方還是依照以前的傳統模式辦事。這場運動其實提出很多問題，照理應該要好好討論，但是都沒有。今天舍我紀念館蠻有勇氣的，邀請五位當時參與或觀察運動的人士，一起討論思考這場運動的影響。今天我把自己定位成是來學習的，因為我想聽聽他們怎麼看未來。第一位是鄭國威，他是臺灣數位文化協會與潮網科技內容中心主任，然後第二個是蔡培慧，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她也是臺灣農村陣線發言人，像大埔案好幾個案子她都有參與，因為參與太頻繁還發生車禍，我還跑到醫院看她，然後第三位是何明修，臺灣大學社會系教授，他的文章我常常看到，第四個是我們黃孫權，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我們還可以瞭解他在南部有什麼收穫，第五個是管中祥，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他也是「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負責人，他是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第一個博士生。今天的主題是：「從野草莓學運到太陽花運動的媒體與社會運動」，大家聽一聽，有什麼問題提出來討論，我想我們要記住，不分男女、不分南北、不分左派右派，有話就說，像世新大學創辦人成舍我先生所講：「我要說話」，第一個我們請鄭國威。

鄭國威：

各位大家好，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參加這次的圓桌論壇。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太陽花運動中，新媒介在動員上發生哪些作用，和過往有哪些差異。我想從幾個層次討論，首先，第一個層次是參與者，我大致上會把這次的參與者分成三類：第一種就是實際參與學運的人，第二種是長期或過往曾經使用科技介入社會的改革者，第三種是外圍的網路工作者。另外如果以時間的層次區分：可以分成

前期就是剛占據立法院，以及中期大概兩周之後到結束，然後再來是後期就是結束之後到現在。關於反應的部分，又可以分成過往媒體的反應、過往民眾的反應、這次媒體的反應，以及這次民眾的反應。這些不同的層次，有蠻多的差異性。

首先就參與者以及傳播者的差異來說，我們在這次事件開始的時候，我和我的同事，因為辦公室離立法院非常近，在這個蠻近的距離中觀察到很多事，另外也有很多同事實際參與進去，所以其實觀察到蠻多現象。不過我要坦承，我其實沒有進入議場，也沒有睡在抗爭現場，我是睡在辦公室。在學運參與者以兩個夾腳拖、一臺 iPad 的現場直播，那個影像的渲染力跟新科技的感覺是非常衝突的。過去我們都認為要維持 24 小時連續不間斷的直播，需要很大的成本，但現在我們知道這是很簡單的事。

在 2008 年的野草莓運動時，就有大量的直播，但為什麼要做直播？大家也都很清楚原因在於抗議者認為他們所面對的是一個黑箱，所以非常強調所有行動都要透明，特別是在運動初期的時候。同時，抗議者認為主流媒體或民眾，初期對事件並沒有很大的關注與認同，所以必須持續提供可以被消費的內容而被傳播。我認為一開始的目的的確有達到，後來整個傳播的脈絡和技術的精進，其實是仰賴許多長期以科技介入社會改革的這群人，他們提供非常多的資源。我很多朋友都是在這個時候加入的，他們不是一開始衝進立法院的人，他們是後來到現場提供各種可能需要的資源：架設網路專線、設定分流系統等等。

過去臺灣「開源社群」（Open Source Community，開放原始碼科技社群）是非常強大的，他們是一群組織鬆散，但試圖以科技去改變政府的一群人，這群科技社會改革者透過過去累積的經驗不斷磨練。外圍的網路工作者他們可能平時不太關注這些議題，不太討論政治或服貿這些議題，但是他們參與的非常熱烈。許多網站都把這次事件做為工具，一方面趁著大家關注的熱潮去推自己的產品，但盡量避免炒作；另一方面，這群業界的人可能是最受服貿影響的人。

大家都看到現在媒體環境是每況愈下，年輕人愈來愈少看電視、報紙，即使是消費這些媒體內容，也都是在網路上閱讀、收看這些內容。這些訊息跟任何一則在 Facebook 上轉貼的新聞，它的價值或曝光力量其實是一樣的，並沒有說特別的強大。在這次事件上很明顯的，群眾已經習慣透過行動網路、不同的媒介去接收資訊，所以說我們對待不同品牌出現內容的那種差異性已經降低。在這次事件中也和跟過去的事件相同，有許多集中揪錯的管道以及自我揪錯的事件出現，包括臺大和許多大學生參與的「臺大新聞 e 論壇」，都扮演著糾正及查驗正確資訊的角色。

在前期、中期、後期的差異。前期就是運用網路科技將訊息大量地傳播出去；到中期開始出現更多的討論，大家開始討論到底要怎麼做、為什麼反對服貿，很多正反意見在這時候被提出來；後期討論的重點是如何監督，我們該用什麼樣的工具監督政府，如果我們不想要繼續出現黑箱、不想要 30 秒通過，我們該用什麼樣的工具去瞭解？過去主流媒體掌握主要的傳播資源，即便抗爭者知道媒體對抗爭者不太友善，但抗爭者沒有能力去反駁，甚至是立即糾正，但在這次的行動中我們卻看到抗爭者對主流媒體的反駁與糾正。最後我想談過往媒體的反應，以及過往民眾的反應，跟這次媒體的反應。這應該是最讓媒體工作者感到衝擊的事情。最後要補充的是以意識形態為主以及以挑動情緒為訴求的媒體，已經在網路媒體及傳統媒體上成為主流。我們都認為說現在是個亂世，但是我們發現許多體制內的主流媒體甚至是網路媒體，他們都漸漸放棄原則，以激烈的情緒性字眼、圖片，去挑動讀者的想法，這也是為何社群網路傳播重視標題、斷句所造成的後果，我現在非常期待自我糾正機制的出現。

蔡培慧：

在社會運動的過程中，我們對社會的認識和想像是什麼，怎麼重新去體認我們的社會。社會運動絕對不只是單一的行動、不只是人民對國家提出的一些爭議，而是我們對結構、歷史特質的認識與思考。正因為這樣，我想先請大家看彰化二林相思寮的阿伯在曬花生，他一天至少兩次用腳翻轉花生，讓花生日曬充足，這是順應節氣、品種、地域的農耕勞動與農法經驗銘刻於身體的默會知識。當讓我思考我們對知識對專業的定義，往往直接認定在學校的教育層級所受的訓練，當我們被教育要好好的認真的念大學、考研究所，往往也直接忽略了經驗知識、默會致知。當我們再次反思對社會結構、歷史特質、與運動主體的體認之際，或許農民個體勞動、環境互動、農耕體認，以及所採取的鄉民言說及其指涉意義與對象正可以提醒我們——若不反思，知識專業反倒形成某些障礙。運動並不在於知識專業，而在於組織過程、行動實踐、主體團結、與明確的對象及其互動互惠角力之間的真實撞擊。

其次，線性發展，特別是經濟發展至上，在臺灣往往忽略農業，政商結構多數認為只要發展工商業、貿易自由化為主。然而，僅以農業、糧食自給率看來，即使是第一個發生工業革命的國家——英國，2012 年糧食自給率是 64%，甚或重工業國家——德國，2012 年糧食自給率是 90%，聯合國的統計數據指出，歐

盟的農業生產者，68% 為家庭農場。聯合國並且宣告 2014 年為「國際家庭農業年」，強調家庭農業方能解決糧食問題。事實上，姑且不論臺灣的糧食自給率在 30% ~ 32% 之間，為已開發國家之低標，及其造成的社會問題。況且各式大宗雜糧（黃豆、小麥、玉米）上百萬至數百萬噸依賴進口，2008 年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在立法院的報告指出，因為國際石油跟糧食價格上漲，臺灣進入「輸入型的通貨膨脹」。臺灣長期為線性經濟發展，把生產資源、勞動力投入工商業生產，同時營利事業所得稅率調降，最終獲取利潤為資本家。是以線性發展問題、再分配問題、石化工業造成的外部成本問題、環境問題，以及承擔困局的世代差異問題，往往都是社會運動的結構層面。

且讓我以臺灣農村陣線（以下簡稱農陣）過去幾年的經驗談起。農陣行動大致為：一、建立草根組織，例如土地被徵收的地區成立自救會，並集結為「捍衛農鄉聯盟」。建立組織的過程，往往也是農陣「從土地出發，向農民學習」的過程。不管是哪個法案，我們通常到各地辦說明會、串連各地的組織。農民跟我講的話，對我來說就是重新認識社會的過程。記得針對《農再》，有位農民說，農村又黑又瘦，政府只想擦脂抹粉。直指政府治標不治本，沒做結構、體制的調整與改變。農民與我們語言未必一致，可是針對農業問題，或是農業問題牽扯到國家角色，農民的語言更加貼切與生活。透過說明會、以及農民對農民的討論與互動，地方組織日漸成形。

二、運動深耕，當意識到關心農村議題的多是三十來歲的人，換句話說，曾經有農村生活經驗，但是，在都會長大的年輕人往往不理解農村，因此透過「夏耘訪調」、「青年進鄉」，擴展年輕人認識農村的腳步，讓年輕人先理解農村，透過勞動去親近土地，透過訪談書寫認識農業議題，也有年輕人把自己的生涯規劃與農村工作加以連結，形成青年進鄉的隊伍，直言之也建立起實踐基地。

三、不可諱言必需進行立法遊說，社會運動必然牽扯某些結構議題，比如說農陣初步集結所關注的《農村再生條例》，當時《農村再生條例》草案由行政院送立法院之際，開言名義寫著：要打造一個讓都市人流連忘返的新農村，此條例草案忽略了農業產銷、忽略了支持青年務農、忽略了農村文化。在此過程中，除了農陣之外，不同黨籍的立委也加以反對，因此，農陣提出民間版本，很努力地進行跨黨派遊說。最終，雖然無法擋下此條例，然而其暗藏的土地活化（土地炒作）條款被刪除，同時置入產銷及支持青年等相關內容。

四、社會傳播，僅管再三強調「農陣」不只關注問題，也會透過網路、社會宣傳、各式媒體讓關注議題一波波的擴散，加強社會參與，並且在適當時機，展

現人民集體團結的力量。人民力量的興起，是持續的討論與擴展，不論是個人行動、懶人包、潑漆、占領，如何將社會運動之成因、問題、概念及所受的壓力與權力之來源，運用各種型態加以討論，不論是投書、紀錄片、短文、評論、研究及各種型態傳播，都是社會運動思維擴展的成因。

五、集體行動，社會傳播在於把議題擴散，然而若要扭轉整個社會認知或國家權力運作，需要集體行動。當 2013 年 7 月 18 日大埔四戶被拆之際。除了憤憤不平，我們也不禁感到對公權力的失望與無奈，因為在 2010 年 8 月 17 日的公文明示，時任行政院院長吳敦義已經公開承諾：原屋保留、劃地還農。然而，苗栗縣縣長劉政鴻最後仍然拆大埔四戶。中央縱容地方濫權，因為農陣提出：「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並且持續的加以訴訟。當然，我們清楚意識到政府只是一個透過選票而形成的委託體制；當我們進行拆政府行動之際，也應該思考整個國家為人民服務，因此，我們提出另一個口號：「把國家還給人民」。任何一位參與運動的人都可以從自己的經驗出發，想想何以委託政府執權，究竟政府是站在人民立場？還是站在權貴與資本家的立場？

從 2010 年 717「土地正義、圈地惡法、立即停止」3,000 多人走上街頭、2011 年「堅持土地正義、力抗搶水圈地」5,000 多人凱道夜宿、2013 年 818「把國家還給人民」20,000 多人齊聚凱道，會後 4,000 多人包圍內政部阻斷一天公務，運用集體行動，提醒內政部所有官員，你所蓋的一個章，你所轉的一份公文，都是影響人民的生存權益。必須強調，集體行動絕對不是看多少人走上街頭，更重要的是參與者對社會議題，重新認識的論述過程。這樣的過程方能解決過去政府推動政策時的不當思維，或是在此過程中是否有所官商勾結。

針對農業議題，社會大眾可能比較在意大埔事件，然而此波新圈地運動有其錯綜複雜的力量。比如資本浮濫。資本浮濫指的是國際資本成為流動的、虛擬的資本與臺灣地方派系結合，今年不管是桃園、新北市或是苗栗，顯然都是派系主義、侍從主義、地產霸權以開發至上的觀念，不斷地在上空迴盪。此一迴盪何以在臺灣如此橫行，因為臺灣線性發展對農業並不重視，縱容資本家將無法再生的土地資源變成一把又一把的鈔票落入他們的口袋。

如同政府針對服務貿易協議永遠只講「利多於弊」，那麼弊的「嚴重性為何？」、「影響層面為何？」、「如何調整與面對？」都未具體說明，並且黑箱作業，30 秒不當闖關。2014 年 3 月 17 日與幾位伙伴討論如何占領立法院，以突顯人民的力量，並且直指黑箱作業的荒謬，同時建立協議簽訂的監督機制，318 在許多伙伴協力前行的努力中，終於開展了 23 天人民意志的堅強團結之力與美，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6 賴鼎銘.indd 156 2016/1/12 下午 10:52:27

當然此一展現也是 2014 年的 3 月 23 日，攻占行政院的那天，飽受國家暴力摧殘地血淚斑斑。當人民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何以政府運用警棍直接粗暴對待，臺灣所潛藏的國家暴力必須加以深究。

還記得退出議場時寫了一個聲明稿，聲明稿中強調我們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反對橫跨臺灣與中國的壟斷資本，正在剝奪臺灣與中國青年世代對未來的選擇。當我們起身行動、團結互助，或許也應該深化認識，瞭解權力集結之權力行使，使壞在誰身上？奪取誰的權益？

想來，社會運動並不只是在媒體看到的畫面，而是在此過程中一步步前進行、行動、周折、實踐的路徑。在此過程中，不管你是知識份子、農民、勞工、弱勢，運動的相對主體應該彼此認識，讓我們有所承擔，好好向前走。我相信，在這個線性發展的臺灣，裂解的政黨政治，都有太多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不管怎麼說，行動是改變的起點，讓我們一起打造更好的未來。

何明修：

謝謝世新大學的邀請。我自己沒有參與學生運動，我是一個觀察者，之前我有寫幾篇文章講 2008 年後，一些新的力量如何促成學生運動。我覺得大家都認為 318 應該是臺灣有史以來最大的學生運動，但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在太陽花學運這個場域裡面，雖然參與的不只是大學生，高中生也蠻多的，因為我覺得在這個場域裡面，只有學生有正當性，所以我覺得他某種程度是一種學生運動，是大學生領導運動啦，不是說只有學生參加的運動。

所以我就要談他的社會基礎就是說，臺灣是個非常保守的地方，對激進的公民不服從，其實是非常的不寬容。去年 8 月 18 號占領內政部時就被別人罵，你們去那邊種花幹嘛的，小屁孩亂搞。江宜樺說公民要守法，很多人也那樣認為，大家會覺得占領立法院是非常激進的公民不服從的運動。可是問題是，如果看這 24 天占領立法院的民意調查，始終有七成的人是贊成退回服貿，也就是支持學運的第一個訴求，也有五成以上的人贊成占領立法院。臺灣是很保守的但是為什麼有這麼多人支持？因為馬英九已經把自己搞成 9%。第二個就是因為立法院形象很差。

臺灣社會學界一直有一個「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從 1980 年代中期開始，到現在已經有 30 年，「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比教育學、政治學固定的調查都要早一點，效度也非常高。他會派訪員到家裡口訪，剛好去年底 9 月到 12 月那時候，服貿還在立法院做很多場公聽會。那個時候主要反對服貿的團體，

比如說賴中強律師當召集人的「民主陣線」，包括學生團體「黑島青」，都不是獲得那麼多人重視。因為「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剛好涉及到一般人民對兩岸關係、經濟開放的看法，重要的是我覺得服貿所涉及的議題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看成臺灣民眾認為服貿所涉及到兩個中國因素，第二個，經濟不平等的問題。所以可以理解他為什麼會搞這麼大，我試著從這裡面來探討，抓幾點來看。

第一點、國家認同的臺灣化。直接問受訪者說你是臺灣人、中國人，還是兩者都是。這個問題其實很多單位都在做，之前陸委會也有做，而政大選研中心是每個月都做電話訪問。從 1992、1998、2003、2013 年幾次調查顯示，本土化現象是非常明顯的，認同臺灣的比例從二十幾年前的 23% 到現在的 73%，相對於此，中國認同就跌到只剩百分之一，我覺得是非常明顯的。1% 的認同中國。在學運之前也有一個課綱有爭議，反對者就認為，這些太陽花世代被教改教壞。但是這是錯誤的看法，認同的變化其實在 1998 年之前就已經出現，包括李遠哲的教改審議委員會，都沒有談到認同的問題，1997 年認識臺灣課綱開始才開始出現。其實 1998 年開始的時候方向已經出現轉變，不是誰執政都沒有什麼關係，不管是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都沒什麼關係，這都是一個既有生活方式的認同。

這個調查還問說，你的祖國在哪裡？ 76%、18% 會認為是臺灣跟中華民國，只有 2.1% 會回答中國。你對臺灣是不是有情感？ 2003 ~ 2013 年是有變化，之前說不太有情感跟完全有情感是 17%，到去年只有 5.2%。接下來還有一個問題比較有趣，認定我國的土地範圍包括中國大陸的，2003 年有 14%，2013 年就掉到 6.8%，這個講法很有趣。因為馬英九的講法是說中華民國有固有疆域，所以我們還有一個大陸地區，另外還有一題是，「為了和中國大陸建立經濟往來，請問你是否能夠接受一個中國的部分？」3/4 不同意，這就是九二共識啊！馬英九在 2012 年透過九二共識很多企業家跳出來挺，打敗蔡英文那個講不清楚的臺灣共識，事實上大部分臺灣人民是不接受的。臺灣人認同是很有趣的，這個問卷有兩百多題，我覺得這個臺灣認同並不是排斥中華文化，這跟扁政府時期的激進去中國化是完全相悖離的，比如說像 2003 年的時候，原來有 9 成，現在只有 7.9% 了。那接下來兩題是跟中華民國的論述最為有關，2013 年有五成七的人士認為，臺灣人的祖先就是黃帝，所謂炎黃子孫，就是中華民族論述的核心元素。接下來八成人認為說，做為華夏子孫，我們要在國際上盡力將中華文化發揚光大，政治認同是非常明顯，但在文化認同上其實是沒有排斥的。

還有一個問題，小清新的國家，什麼東西是我們國家的光榮或不光榮，我把它整理上，最多：運動上的表現，好像我們國家是運動之光，再來是科學、技

術與我國歷史文化，那這是比較高的，最低的就是軍事力量，經濟成就是非常低的。我覺得某種程度的反應就我們對自己的經濟評價不是那麼的高。我們就被韓國三星打趴的，htc 掰掰了。民主政治運作評價也不太高，雖然我們是整個華人地區裡面唯一還可以運作的民主，但他評價不是很高。大家想到民主就想到在立法院打來打去，所以學生占領立法院時不打，我們還覺得很哀怨。軍事跟外交是這樣，傳統上定義的國家就是硬實力，可是臺灣完全是相反過來的，我們反而認為是我們的軟實力。所以我們國家形象是很軟的。我會覺得比較有趣的是說，對岸在講的是中國夢，習近平上臺講的中華民族的偉大的復興，人家有航空母艦、衛星、辦過奧運，我覺得跟我們的想像是差很多。鄭南榕之前講的我們雖然是小國小民，但是好國好民，很符合我們的風格。我們臺灣人講好聽就是愛好和平，講難聽就是沒志氣，我覺得很蠻符合現在學生所呈現的特質。

對中國的想像是在兩種想像之間被綁，一個叫機會論，一個叫威脅論。機會論者認為，10 年前我們在臺灣請一個人，可以去大陸請 10 個人，現在只能請 2 個人。產業競爭發展，馬英九也是拿 85° C 來講，對岸的高階服務業要開放給我們，為什麼不去呢？這當然是好的一面。但威脅論的看法就相反，像我們以前高科技產業鏈被挖過去，臺灣接單大陸生產，沒有反應對臺灣有好處。服貿裡面也有很多國家安全對產業的衝擊，服貿其實就是威脅跟機會。你問一般民眾，因為兩岸經貿，中國是臺灣最大的經濟貿易國，臺灣出口四成。很多臺幹臺商，住在中國人口大概有 100 萬，鴻海有 70 萬人，很可怕，鴻海就這樣。經濟上其實就有一半的臺灣不在臺灣裡面了，那我們來問問題。你認為大陸的經濟進步對你家庭造成什麼影響？好的 16%，不好的 19%，大部分是覺得沒有影響。你認為臺灣人到中國大陸去工作？不好的 53%。你認為中國大陸來臺灣投資不好的 39%，所以比較好一點，也許也可以增加工作機會等。最反對的就是中國人來臺灣工作，我們連 22k 都沒有，人家 15k 就可以，最引人擔心的是這個，服貿其實也有開放這個，就說你只要投資 600 萬你就可以，再請 3 個人來 3 年的簽證，其實大家會怕，怕中國人也怕中資。一般認為臺灣人才跟資金外移不是一件好事，臺灣不反對中資，但是很可惜是帶來工作機會。

所以服貿議題很多拉出來的就是說，國家安全啦、情資控制啦！跟一般民眾生活比較遠。問你贊成中國和平統一的民意增加，就四種情況，有近五成五的人會認為當臺灣跟中國大陸的經濟越來越密切，所以經貿合作，帶來政治統一。這其實就是國民黨在推的利大於弊正好相反，一般民眾就擔心啦。臺灣人民怕的就是這個，所以最能感受的就是利大於弊這句。那另外幾點就是我覺得說，其實我

覺得我們大家感受的到就是，實質薪資退步，因為我們感覺到的其實是因為我們出現很多保護主義的心態，這個測量裡面也有看到，越來越多人會反對外國財團購買土地。所以臺灣的國家認同是非常軟性的，那剛好跟中國因素有關，中國崛起後，我們國家的認同越來越明確，可是也越來越多擔心在這裡面。

黃孫權：

大多歷史上的人都說是革命的前緣，可是很多時候他其實只是歷史的反覆而已，所以我們要問的不是野草莓或是太陽花到底是反映了什麼，而是他們創造了什麼？我要先講一個簡短的故事。1999 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簽訂後，墨西哥有一大部分民族，他們原本可以種植糧食的土地，被政府簽約賣啊，收走啊，改種美國玉米田，這個故事非常有名。1996 年馬可仕（Subcomdante Marcos）他們進行長征，帶一大批隊伍，直接到墨西哥的首都和軍政府談判，他們發 e-mail 跟各國說，軍政府是王八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怎麼樣侵害了墨西哥居民的土地。這大概是第一波反對自由貿易的先驅，這就是墨西哥原住民的運動。很多人說馬可仕不是原住民，他會很多語言，但不會原住民話。那個時候馬可仕寫封 e-mail 非常重要的宣言，那個宣言影響了 1999 年的反全球化運動。

大部分主流媒體都在報導王公貴族的婚紗緋聞，不報導日常人民的生活。1999 年反對西雅圖的運動開始的時候，那群示威群眾都在現場發送報紙，後來覺得報紙實在太貴了。所以 2000 年之後他們就成立了 Independent Media Center（IMC），這個東西基本上是一個宣傳型、對抗型的媒體運動。IMC 在 2000 年開始，全球的 120 個城市做 indymedia，indymedia 大概是史上第一個用 open source 軟體進行的。讓人可以沒有任何限制的上傳文字與圖片影音，那時在臺灣如果你讓人家沒有任何限制地上傳，只有一種後果，就是全部都是色情廣告。從 2000 年開始他們用這種方法，很簡單去做，串聯 120 個城市，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媒體。當時在網路上 indymedia 是足以和 CNN 相抗衡的。也就是說，透過 indymedia，群眾創造自己的網路，讓它的流量與新聞產生巨大的影響力，這大概就是我們可以想像的運動媒體現象。但從「阿拉伯之春」之後，運動媒體這個概念有些轉變，運動者創造媒體的概念，慢慢變成人民自發媒體的轉換。阿拉伯之春之後到 2010 年占領華爾街，有個非常大的不同就是不再是一堆人聚集在一個網站寫東西，而是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媒體的節點，透過臉書、推特還有很多的媒體，可以不斷地寫。

2010 年有很多書討論網際網路時代的社會運動，這些運動者並不是要告訴別人要幹嘛，而是透過這些媒體認識自己、組織自己，從而肯定自己的文化。他們是從行動中做媒體，從媒體中認識自己行動的意義，這跟之前是完全不一樣的狀況。所以 Castelle 下了一個結語：他們自己收穫自己，一邊做運動一邊做媒體。從 1996 年墨西哥的馬可仕寫了那封 e-mail，到 2010 年的十多年，媒體其實發生很大的變化。從一個集體力量，為一個共同的理想目標而創造一個媒體的概念，慢慢地由網路上不同的粉絲頁所取代，也就是慢慢由以往那種集體性的媒體，逐漸被社會的商業媒體所創造的個體性媒體所取代。

那時我遇到《想像共同體》的作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他和我說一個故事。有一次他到印度聽演講，演講完後有很多印度女學生要與他合照。Anderson 很高興地說好，我們大家一起來拍照。但結果不是，每個印度女學生都要跟她單獨拍照。因為，例如他們拍了以後可以上傳到臉書，說我和賴校長拍過照。每個人都想要接近明星的位置，只有我可以享受跟賴校長拍照的權力，而每一個人都是節點，這種以個人為方式發出的訊息，取代過去那種很多人在一起協作的能力，這就是為什麼 Facebook 興起以後，indymedia 就整個下滑，如果各位去看一下 indymedia，從 2007 年後幾乎都消失了。沒有人願意在 indymedia 的集體平臺努力寫作。在亞洲狀況也很糟，日本、韓國的獨立媒體都很慘，現在只有香港的一個平臺可以撐起。或像「苦勞網」，「苦勞網」也不是一堆人，是幾個一起寫的，全球大概都是這樣子。原本的 collective media 慢慢被瓦解，那世代是個非常大的轉變，從 1996 年到 2015 年，這都跟社會運動有關，每一個都是社會運動產生的變化，

就太陽花來說，我覺得直播並不是一個太激進的事，很多年前我們就在直播了。那麼，那個主持到臺灣很少人知道的團體，他們做了一個對抗性的客觀公開，老實說也不像一個媒體的概念，他們只是把以前隱藏的東西全部公開，不是嗎？臺大新聞所組成的「臺大新聞 e 論壇」，比較像是太陽花運動的「中央社」嘛！基本上，比較像是我前面舉的那個例子，也就是這些人其實並不是要真的對抗甚麼，而是透過「臺大新聞 e 論壇」的報導，讓自家人看到自己人。或者當然也可以說，讓外面的人看到自己人，可是我懷疑一般大眾會看 ptt 或 facebook 上的那些新聞。因為臉書基本上是個社會網路的構成，這種自己人看自己人，大概是我們最近的主要問題。我為什麼說這是一個問題的原因是，主流媒體人在罵主流媒體人，獨立媒體人在說自己的榮耀，這兩件事情好像不太有關係。

最後一點，我老是覺得媒體可以改變一些東西，或是社會運動可以改變一些

東西，可是我看一看之後，覺得有點悲傷。就是在太陽花運動的前後，我的一些好朋友，太陽花之前是吃飯自拍，太陽花運動之後還是吃飯自拍，並沒有甚麼太大的轉變。有些事情當然也讓我很傷心，譬如陳為廷的T恤，充滿汗臭味的T恤，在網路上拍賣可以拍賣到很高的價格，我想他那個到最終沒有那麼多錢，後來又被人抬高價錢，我一直想我應該多賣一點T恤。或者是，在臺灣歷史上有兩次非常成功的市民集資活動，第一次是樂生運動，各位不知道在幾年前，他們花一個晚上就募了一個《蘋果日報》半版廣告講樂生運動。再來就是這次的太陽花，我一直在想說這種靠主流媒體的廣告來打擊政策，或是宣揚政策的不公平，是一件合理的事情嗎？

我其實不太能確定合不合理，現在《蘋果日報》又恢復成以前的樣子，對不對？《蘋果日報》就還是腥羶色，大家繼續罵他。從頭到尾我們都知道《蘋果日報》就是這樣，為什麼需要他的影響力時就幫他賺錢，不需要它的影響力時就罵它？然後所有臺灣的獨立媒體都跟它聯播，我們臺灣現在的獨立媒體都幻想著可以跟《蘋果日報》聯播，增加他們自己的宣傳力，到底誰增加誰的宣傳力？這跟我們買廣告意思是一樣的，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到目前為止還如此依靠著主流媒體的廣告，那意味著甚麼？你想想看同樣這些廣告，如果在《立報》跟《破報》裡面，又可以多活一陣子。從以前的抗爭到現在為止，臺灣並沒有一個非常好的處理運動與媒體關係的看法，要嘛把媒體當作運動的展示或宣傳，要嘛就把社會運動給內部媒體化，說給我們自己人聽。我覺得這需要更好的媒體運動研究者來告訴我們，給我們一個答案。

最後一點是，我想講的是我們都從 1989 年的三月學運開始，我們不是在臺上的那些大咖，特別是我們這種私校聯盟的，跟臺大根本是兩掛的，臺大是那種菁英民主路線，我們是人民民主路線，是不一樣的。而且我們在東海，私校的那個東海那些人，我們的人民民主路線跟臺大實在是很不一樣，在一個非常不民主的狀態下，我們在廣場上至少好幾千個學生，真正體會到甚麼叫做民主。讓臺上那些人，那些大咖出來向我們宣布與李登輝有個協議後，要求我們在廣場很快的決定，結果我們很快就否決了嘛。後來 12 小組人又總辭對不對？你看我們那時候就逼他們總辭，可是我們都還沒有機會要求 9 人小組總辭，他就告訴我們要退場。野草莓是另外一波運動，太陽花又是另外一波運動，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一個民主的運動，我們連民主最基本的體驗都還沒有得到，我覺得有點可惜。

第二個是，如果太陽花運動只在媒體上重複的一次，或反映了某種特殊的媒體現象，而這種媒體現象跟阿拉伯之春後那種由商業所打造的社交媒體，所反映

的能見度跟能量一樣，我覺得也很可惜。第三個可惜是，我參加過這麼多社會運動，從野草莓到寶藏巖，到 2005 年在香港教書的時候，帶一堆香港的學生去看 WTO 會議，警方的催淚彈就直接掉在我旁邊，鎮暴警察直接對著我們和韓國農民的眼睛直接噴胡椒槍，是直接這樣幹的。所以，我覺得暴力是應該的事情，沒甚麼好哭的，要不然他怎麼找警察呢？不服從的意思是我不主動打，不代表我要屈服。我只是不挑釁，可是我要抱著犧牲的決心，這才叫不服從。要不然哪有天下那麼好的不服從？你去那邊晚上還有手沖咖啡可以喝，還有牛肉麵，我那天晚上吃了好多人民的心血捐款，有點愧咎。

最後一個可惜的是，太陽花是那麼多運動中，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工整、顏色統一，沒有其他標語的運動，這讓我有點驚恐。搞運動大家都在講串聯，就是我們大家的目的與訴求都不一樣，例如說反全球化運動，或是反自由貿易運動，你不可能讓印度農民的訴求跟韓國公民的訴求一樣，不可能。但是會有共同點，就是每個人有自己的標語、自己的訴求。可是 330 那天，50 萬黑壓壓一片，是看不到任何標語的，沒有任何其他聲音，這就是後期太陽花會有「賤民解放區」是一樣道理。我覺得這個東西恰恰好就是那種模糊對抗的概念已經慢慢消散，大概只是個模糊的聚集，而這個模糊的聚集在太陽花。很可惜的被……。

我不是怪運動本身，也不是怪 9 人決策小組，我只是提出我的困惑，我從來沒有看過那麼安靜的運動，那麼乖巧的運動。330 那天「農村武裝青年」在上面唱歌，我認識阿達這麼久，那是他唱歌唱最不好聽的一次。他在臺上罵幹拎娘，然後臺下一群很乖的學生，舉著花和手機，一起罵幹拎娘！我非常的困惑，你怎麼可以那麼乖，又那麼的那個……。也許就教於各位，謝謝。

管中祥：

其實我只有去一天，去一天是因為，那天我從青島沿著糾察隊的線，然後就不知不覺地走出現場，完全無法走到徐州路，這讓我感覺很怪，再加上人在嘉義，也較難參加。

那天上網很難，然而我在嘉義得到的資訊比在現場得到的多，所以我對這些事情有一些比較有趣的觀察。因為我沒有參加很多，只參加一天，因為距離還有我對運動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剛剛所講的獨立媒體其實也談蠻多，或者是討論運動的一些基礎。也許我可以把那個焦點稍微拉回到主流媒體的身上來看。3 月 17 號發生張慶忠的 30 秒，3 月 18 號剛好我有一堂課是「媒介與社會」。我問同學知道張慶忠 30 秒這件事嗎？班上幾乎沒有甚麼人知道。我接下來問他們：你知

道甚麼是服貿嗎，也沒有人知道甚麼是服貿。當然那天下午大家都是非常非常陌生的，那天晚上後學生就進入到立法院。立法院一開始是一片漆黑的，甚麼都看不到，因為主流媒體也沒甚麼太大的播出。突然間，就出現了 iPad 這個東西，似乎就點燃了亮光，iPad 是有多麼的重要。

隔天，班上有些同學就沒有來上課，有兩個人在現場直播，過了一個月才回來。我覺得還蠻感動，或者說他們做了件還不錯的事情。可是在現場，不只有獨立媒體，攝影機愈架愈多。我要談的是其實主流媒體並沒有那麼不喜歡太陽花學運，有關太陽花的報導其實非常非常多，不過有些媒體的角度跟立場不被運動者所認同。例如說，主流媒體在這個運動中主要是個獲利的角色，在太陽花學運發生，每一個主流媒體的收視率都是在上升的，我們看到成長最大的比例就是中間那條就是主流媒體，其他大家都是維持著平盤，或是沒有甚麼太大的改變，所以可以看的到很多人從主流媒體中獲取這樣的資訊，或是瞭解他的訊息來源。

當然主流媒體的報導很多部分也引起民眾的反感。譬如說像 TVBS 跟「中天」大概是最典型的例子，這當然跟他們長期以來的媒體表現，或是和他們的政治立場有很大的關聯。這裡有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群眾在記者採訪時，站在旁邊舉牌，我覺得這很正常，因為你就是不爽他報導、干擾他報導。可是我發現有些很有趣的現象，例如說，3 月 23 號晚上，行政院占領後，警察第一批驅走的就是媒體，他所驅離的第一批就是媒體，所以不管是主流媒體或是獨立媒體，都是被趕走的。那時候我覺得很奇怪，警察你做的是好事、做的是公務啊、你執行的是公權力啊，有甚麼好害羞的呢？或是做了甚麼見不得人的事情嗎？為什麼要把媒體趕走？

我其實不太認同警察驅離媒體這件事，但是我同樣也不認同運動者驅離媒體，即使這個媒體跟你關係是不對盤的，或是即使這個媒體和你的立場是不相同的。媒體可能亂報，你也可以去干擾他。但是把媒體趕走，我覺得和警察是沒甚麼兩樣的。出來混就是要還的，你說所謂公共事務被監督、被拍也是應該的，你可以有別的方法去事後抗議或採取其他行動，但是從一個媒體學者的角度來講，這是我比較無法認同的部分。

當然在媒體對太陽花報導的過程中，可以看到媒體一開始是不聞不問的，突然間出現爆量報導的狀態，爆量報導裏頭還發現很有趣的現象，就是立場鮮明。特別像是「中天」、《蘋果》、「壹電視」就是兩極的立場的報導。報導的量是一個非常大，但卻是流水帳的報導方式。譬如說：幾點幾分誰幹了甚麼，幾乎是完全不整理的資訊，最有趣的例如說「壹電視」在晚上都已經收棚，但是不收播，

因為它將攝影機架在立法院裡面，在做 24 小時的直播。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要直播？所以你可以看到主流媒體有多麼愛這場運動，但是是流水帳、瑣碎化的報導。另外一種是英雄式的報導，只看到英雄，看不到組織；看到帆廷二人組，但是看不到幕後付出的 NGO 工作者。

當然這裡有很有趣，他其實很多媒體是不愛，但是他其實是用恨的，他們老闆可能愛，因為對收視有幫助，可是很多記者是不愛的喔。但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現象，我自己做了個簡單的分析。

第一是臺灣主流媒體對社會運動長期的忽視或是漠視。主流媒體對社會運動基本上存在一種無知或是誤認，因為媒體平常不報導社會運動。如果是熟悉社會運動圈子的人，你會發現在這場社會運動中，平常可能不是甚麼咖，突然間變成一個大咖。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事情，這些人過去可能有爭議，但是透過媒體報導，卻成為非常重要的人。為什麼媒體平時不報導社會運動，社會運動的議題太複雜，不是三言兩語能做得出來的報導，特別是電子媒體。

第二個是爆量的勞動。很多媒體例如《蘋果日報》他可能派了 10 組人在現場：青島東路、濟南路、議場內、議場外。很多記者在現場，他們幾乎是不休息的，所以當警察驅離媒體時他們很開心，因為可以下班了。我的意思是說，很多時候我們要去考量到媒體勞動的狀態，在過勞的情況之下他會喜歡學運嗎？或者他還能抱持著客觀的角度去報導嗎？從一個勞動的角度來看，我覺得這是值得去思考的部分。

最後是記者的社會關係。你會發現有很多的媒體或是很多記者的報導對於所謂的學運，即使他沒寫老闆是希望比較正面的報導，可是他其實是很討厭學運，或有時候為了去捅他一刀，為什麼呢？因為，其實你仔細看喔，跑外面的那一群記者有很多是跑社會線的。也就是說他平常跟警察是好朋友，所以他當然會站在警察的角度去看問題，或站在警察的立場去想事情。當然記者本身的價值或立場，或是記者所屬媒體特別保守的立場，是有很大的關聯性的喔。

雖然我們對主流媒體有很多抱怨，認為他們做出很多我們不喜歡的報導，可是他背後的原因恐怕需要我們花多一點時間去瞭解，不然其實很難找出問題的焦點。而且，所謂干擾記者採訪，不是現在才有。臺灣先前的社會運動，包括以前 1989 年的三月學運，或者是反扁紅衫軍時，我記得綠營的名嘴包括鄭弘儀，他們的人形立牌也在紅衫軍的現場被砸。他們的照片也是被民眾攻擊，綠營的名嘴照片也是被攻擊。

在香港包括像 TVB 的採訪，就經常會出現有人拿著反對 TVB，或者稱他們

是 CCTVB，去干擾記者的採訪，甚至要求大家不去看 TVB。有一個最經典的一件事情，就是香港的反高鐵運動，後來拍了一部紀錄片，叫做《反高鐵運動之傳媒透視》。裡面有一段訪談很有趣，在香港有很多媒體學者發現，香港媒體對大型社會運動，在過去例如七零遊行或是六四遊行，其實會報的比較多，相對之下也比較正面。可是對「反天星碼頭」、「反高鐵運動」、「皇后碼頭」或「菜園村」等等運動，香港媒體其實報導的很少，而且都是負面的。那個紀錄片去研究為什麼會產生這種現象，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很多的記者其實是贊成高鐵的興建。也就是認為香港跟中國建立高鐵後，會使香港更繁榮、帶來更多的人。

所以有些時候，記者本身就是一個都會中產階級，他會和很多主流的社會價值相近。所以記者作出反對太陽花運動的報導，說不定記者本身就是支持服貿的。所以在這個社會裡面，我們可以看到記者本身或主流媒體，本來就存在著一定的保守性，他們對重大的社會變革通常是抗拒的。所以在《反高鐵運動之傳媒透視》當中有個很有趣的例子，就是一個主流媒體的記者利用下班、收假的時候，跑去和反高鐵的學生一起做六步一跪。參與之後，這位記者開始支持這些學生、支持反高鐵運動。所以價值在裡面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前面幾位談到的獨立媒體或是網路媒體的重要性，簡單來說就是直播的後勤部隊，包括 g0v 等等。可是就像剛剛黃孫權講的，這很特別嗎？我覺得沒有很特別啊！例如說，直播野草莓、買廣告、樂生保留運動，這些都是基本的原型，我並不覺得很特別。更早例如說黨外雜誌、另類錄影帶、地下電臺或者是這幾年看到獨立的報導，或是所謂的公民新聞，會發現其實早就已經在做了。只不過這次是更快速、更精練、更便利、更好的方式去呈現整合。所以有趣的是說，當媒體報導那麼多，不管是獨立媒體報導或主流媒體報導，在 330 之後的一個禮拜，我去嘉義大學演講，我問同學說你們看很多主流媒體的報導，也看很多獨立媒體的報導，可以告訴我甚麼是服貿嗎？沒有人知道，又問可不可以告訴我服貿的內容是甚麼？服貿對臺灣正面跟負面的影響是甚麼？大家只能講利大於弊、弊大於利。回答方法跟馬英九是差不多的，這時候就想說媒體報那麼多幹嘛？報那麼多跟沒有報之間的差別到底是甚麼？

所以我們就出現一種只看到當下，看不到成因；看到衝突、看不到議題本身的新聞報導。我覺得包括獨立媒體或網路媒體，都有類似的這種情形，就像剛剛黃孫權提到的，到底這些所謂的獨立媒體、網路媒體是「社運的媒體」，還是「社運工作者的媒體」？我覺得這是所有從事獨立媒體工作的人必須時時謹記，或是反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們做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麼。是社會運動的「中央社」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6 賴鼎銘.indd 166 2016/1/12 下午 10:52:28

嗎？還是回過頭來從社會運動的角度出發，但是可以跟社會運動者，保持特定的距離甚至是一種監督的關係。我是回到一個傳播、媒體學者的角度去看，我們「公民行動影音記錄資料庫」在做報導的時候，也一直思考這個問題。這些運動時常發一個祕密的簡訊，說只發給你們這幾家媒體，要你們要來報導，然後我們就一定要去？還是可以回過頭來以某種距離監督？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大概只有看到「苦勞網」是比較詳盡去討論服貿的議題，或是像「公民行動影音記錄資料庫」試著去登幾篇批判社會運動的文章，我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思考或更多的反省。

今天的主題還與新媒體有關，可是網路的力量真的很大，我覺得這是我最後跟大家做的一個簡單的報告，他說網路力量第一個談的大概就是所謂新科技，新科技就是所謂的手機啊、臉書啊、直播啊等等。這些好像很厲害的功能，可是一個運動能不能成功恐怕跟他的議題有很大的關係。譬如說，我從頭到尾不認為洪仲丘是網路媒體動員出來的，我覺得洪仲丘是曹金生、國防部動員、洪姊姊動員出來的。如果沒有這麼多可愛的人、荒謬的人、荒謬的事情，或許沒有這麼多人關心。而且更重要的是洪仲丘為什麼有這麼多人關心，因為洪仲丘可能跟我們的關係是更密切的，因為有些人的男朋友可能會去當兵，有些人的小孩可能會去當兵，有些人的哥哥可能會去當兵，有些人他自己可能就要去當兵。所以這些議題和我們之間的切身性是甚麼，恐怕是談科技、網路與社會運動之間，必須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我覺得這網路用得很厲害包括大埔事件，都用得蠻厲害的，可是他其實沒有那麼多人，因為大埔對很多人來講相對比較遙遠，可是他有一個悲情的故事發生之後，有一個粗暴的鏟農地的事情發生之後，大家可能比較在意。

另外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是主流媒體，洪仲丘也是主流媒體動員出來的，這個所謂的 318 主流媒體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另外我們不要忘記了，在整個運動裡面，組織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管是黑島青也好，或者是在裏頭的像農陣也好，或者是包括地球公民基金會也好，那其實都是非常重要的組織角色。而且這個組織長期以來，不管是從樂生保留運動，或是野草莓運動，他就開始慢慢開始累積組織的型態，這才是一個運動能夠維持長久，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力量，當然他還有個更神秘的力量，這神秘力量其實就是呼應何明修所講的。欸，我剛好作結論，例如說好了，野草莓的事情，事情沒解決，原諒不可能嘛齁？野草莓的事情都沒解決嘛，就是國家暴力的事情都沒解決，所以對國家暴力的不滿或是所謂的恨，傳流到 2014 年。這個東西一直在累積，對中國的恐懼，或者對兩岸關係的這種不穩定，他也一直是存在的。所以這個神祕的力量，恐怕才是一個社會運動能不能被動員的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6 卷 第 1 期．頁 169-197．2016 年 1 月
DOI: 10.6123/JCRP.2016.007

臺灣「國防部發言人」臉書訊息策略之議題設定與預示效果研究

傅文成 *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新聞系助理教授

摘要

臉書（Facebook）是國防部門廣泛運用的新媒體平臺，是軍隊執行政策溝通、爭取民意支持的重要管道，本實驗採 3 × 2 組間設計，檢視臺灣國防部發言人的臉書發文策略對閱聽人之議題設定及預示效果之影響。本研究亦探討媒體使用依賴程度與議題設定效果的關聯性，結果發現，使用社群媒體時間越多的閱聽人，受臉書的議題設定效果影響越顯著。

關鍵詞：社群媒體、訊息策略、國防事務、預示效果、議題設定

* Email: uiucfuwencheng@gmail.com
投稿日期：2014 年 12 月 1 日
接受日期：2015 年 4 月 27 日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壹、前言

截至 2014 年 7 月，臉書（Facebook）的全球使用人數已經突破 15 億，其中 83% 的使用者來自於非美國地區，並且有 93% 的使用者年齡介於 18 至 24 歲 (Pallegedara & Lei , 2014)；而在臺灣至 2013 年底為止，一共有 1,500 萬人註冊臉書帳號，經換算後，約全臺有 65% 的上網用戶擁有臉書帳號，其比率為全世界第 1 位（楊喻斐，2014 年 2 月 28 日）。以臉書為主的社群媒體正在世界各地的年輕族群之間快速蔓延，在此一新媒體傳播平臺的運用方面，許多政府組織開始運用臉書來幫助自己建立形象，維持良好公共關係乃至於將臉書視為危機處理與政策溝通的主要管道 (Briones, Kuch, Liu, & Jin, 2011)。

以國防事務而言，當代民主國家的國防事務需要民意為支撐基石 (U.S. DoD, 2013)，社群媒體的興起與運用，成為當代民主國家國防部門與民眾及利害關係人溝通的重要管道，例如英國、美國、法國、芬蘭、南韓等國家軍隊，均自 2007 年起陸續成立國防部，或是軍種專屬的臉書專頁，在此一國防事務類型的臉書專頁中，發文的類型包含了軍隊訓練近況、官兵與眷屬互動情形以及當前國防政策的施政要點。

以美國陸軍為例，自 2010 年 2 月份開始成立臉書專頁，在其《社群媒體管理手冊》（*Army Social Media Handbook*）(U.S. DoD, 2013) 中即揭示，臉書以及社群媒體的運用在當代的國家戰略溝通（strategic communications）中有著重要的意義，在平時的軍隊公共事務運用方面，美陸軍各軍團級以上組織不僅已運用社群媒體傳達重要的陸軍訊息，亦於危機期間將社群媒體用作為傳播工具。例如珊迪颶風（Hurricane Sandy）之危機處理過程，即為有效的運用社群媒體，即時發送資訊以協助處境困難的人，同時亦詳細說明美陸軍如何支援救援作為的實例。

而在戰時之戰略傳播運用方面，美軍認為，當重大新聞或是戰事發生時，因為社群媒體快速且無遠弗屆傳播的特性，社群媒體可能就是人們最先訴諸的資訊尋求工具 (U.S. DoD, 2013)。美國陸軍要求媒體操作人員，必須能善用社群媒體平臺，報導最新且正確的資訊 (U.S. DoD, 2013)，並與民眾、國際友邦乃至於我方戰略的目標受眾保持雙向對等的溝通關係。

我國國防部則是在基於此一思維下，為掌握民意動態與凝聚國防共識，於 2011 年 5 月在臉書開闢「國防部發言人」粉絲專頁，作為與民溝通、建立關係的互動管道，期藉由提供最新的國防資訊，讓大眾充分討論交流，使大眾對國防

事務有更深入的瞭解（孫懋嘉，2012 年 8 月），舉例而言，國防部於 2013 年 8 月份派遣軍用運輸機前往菲律賓執行颱風災後救援任務時，即時透過其臉書專頁發布消息，並在全程救援過程，透過臉書即時的訊息揭露（國防部發言人，2013 年 11 月 14 日）；其次，以往是透過例行記者會，作為募兵制人力資源報告以及透過廣告購買的方式，作為募兵宣傳的人力資源相關政策，國防部也透過臉書專頁，作為政策溝通與施政成果報告的平臺；再者，國軍於災害發生後，亦將救災兵力配置以及救災實況透過臉書即時向民眾溝通（國防部發言人，2014 年 8 月 4 日），據此可知，我國國防部目前的施政政策說明與民眾溝通的方式，有相當程度的重心移往新媒體的臉書專頁，如何有效運用此一與民眾高度互動的媒體平臺，達成充分溝通的效果，是本研究關心的核心課題。

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相關研究長期以來，被用於檢驗媒體相關報導是否能夠贏得社會大眾的注意 (Ali, Seuc, Rahimi, Festin, & Temmerman, 2014; Guo, Vu, & McCombs, 2012; Marsh, 2013)，並且進一步探討這些被設定的議題是否能夠影響目標群眾的態度與評價 (Ashikali & Dittmar, 2012; Bilali & Vollhardt, 2013; van der Brug, Semetko, & Valkenburg, 2007)。前者探討影響閱聽人注意力轉移的研究取向為「議題設定」研究，認為媒體對於特定議題報導的篇幅大小以及強調的程度，有可能會影響閱聽人對於該議題重要性的認知。而後者探討影響閱聽人態度研究取徑則為「預示效果」（priming effect）研究，過去的議題設定研究，大多關注於政治廣告以及政治新聞報導是否能對於閱聽人造成議題設定效果，以影響其對於政治議題重要性的認知，並且多數研究將媒體暴露環境設定為電視以及報紙等傳統與電子媒體 (Amankwah, Ginn, & Ahenkora, 2012; Bekkers, Beunders, Edwards, & Moody, 2011)。

目前專注於檢驗新媒體及社群媒體環境下，議題設定以及預示效果相關研究已開始受到關注，例如 Fernando, Suganthi, & Sivakumaran (2014) 的研究檢驗部落格的文章發表與閱聽人及利害關係人之議題設定效果關係，渠等發現，在網路媒體的環境下，議題設定的效果出現與否，取決於該消息來源或是網站的可信度。而本研究除聚焦於新媒體環境下議題設定效果外，亦期望提供國防部臉書的發文政策建議。過去國防部發言人臉書相關研究多為內容分析法以及調查法（周力行，2013；孫懋嘉，2012 年 8 月），單純從組織端探究目前國防部的臉書專頁發文策略，並無研究以更有預測力的方式，探究閱聽人對於國防部發文策略的反應，其中周力行（2013）以調查法輔以深度訪談的研究發現，國防部雖試圖透過社群媒體作為政策溝通以及形象建構的管道之一，然而，原有的軍中媒體運作模

式，亦即將高級軍官的行程作為發文主軸的方式，卻難以獲得閱聽人的認同與共鳴。而本研究試圖以實驗的方式，檢驗閱聽人使用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後，對於國防事務議題重要性的認知變動情形，亦即國防部發言人臉書的發文策略下的議題設定效果為何，本研究可進一步檢驗「臉書」，這一個被國防部用來對社會大眾做政策說明以及形象建立的重要平臺之議題設定效果。

在預示效果研究方面，近年的議題設定研究除了檢驗閱聽人接觸議題後，對於議題重要性的認知變動情形外，也將關注的觸角延伸到是否能夠影響閱聽人心中，對於特定議題評價 (Ashikali & Dittmar, 2012; Guo & McCombs, 2011.08; Lovejoy & Saxton, 2012; Sheafer & Weimann, 2005）。Krosnick & Kinder (1990) 的研究也揭示，當選民不停重複暴露在特定的媒體論述下，對於該候選人的評價及態度也會趨近於媒體的論述主軸。本研究亦檢驗閱聽人使用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後，是否可以藉由臉書的發言策略預測其對於國軍的評價之改變。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目的為探討國防部發言人的臉書發文，能有助抑或是有礙於閱聽人對於國防事務重要性的認知，以及影響社會大眾對國防施政的評價與態度。故議題設定與預示效果的理論框架，可支持研究者驗證國防部發言人臉書發文策略的媒體效果，並提供實質之政策建言。再者，本研究在議題設定與預示效果的理論延伸方面，也提供不一樣的視角，原有議題設定效果第一層，其主軸為探討媒介議題報導的篇幅大小如何影響閱聽人對於特定議題重要性認知；而議題設定第二層之預示效果，則是關注於檢驗媒體報導的方向如何引導閱聽人對於該議題的評價 (Guo & McCombs, 2011.06)。本研究期望將議題設定影響的檢驗範圍，從原有理論僅是檢驗閱聽人對於單一議題的看法與態度，擴展到檢驗閱聽人對於涉及議題相關組織與單位整體之評價。

貳、文獻探討

一、議題設定

Lippmann 在 1922 年的著作《民意》（*Public opinion*）中認為，媒體正在為我們的認知建構一個「虛假的世界」（pseudo-environment），此一說法隱含了議題設定理論中所假設，閱聽人容易被外在的媒體影響其認知的概念 (Lippmann, 1922)。Sheafer & Weimann (2005) 則進一步提出了媒體報導的強度之所以會影響閱聽人的大腦認知機制，主因是閱聽人將日常所接觸媒體的內容自動分類儲存至大腦，而人類大腦認知的規則又是以越新接觸以及越顯著的內容，越容易被閱聽

人回憶（memory），所以當媒體不斷重複地將類似訊息傳送給閱聽人，則閱聽人將會對此一訊息投以較高的注意力。再者，如果某一議題在媒體報導中占有較顯著的地位（例如放置於頭版），也可以讓該訊息從腦中被提取（retrieved）的機會增高 (Weaver, 1990)，此一研究發現也證實了閱聽人對於媒體內容回憶能力與議題設定效果之間的關係。

Fahmy, Sooyoung, Wanta, & Yonghoi (2006) 的研究則進一步驗證此種記憶提取的概念，證實議題設定效果閱聽人的回憶能力呈現正面相關，亦即，議題設定的顯著與否，經常伴隨著閱聽人是否能夠對於該議題產生相對應的記憶能力有關。而 Guo et al. (2012) 的研究則檢視了閱聽人對於新聞內容、圖片主題等描述能力與議題設定效果的關係，發現閱聽人回憶能力越好的議題，通常是在議題設定的效果檢測中，越顯得重要的議題。

Cohen (1963) 則提出媒體議題設定理論較完整的雛型，他認為媒體除了告訴人們該想什麼（What to think）外，也成功的告訴人們應該怎麼想（What to think about），此一假說在 McCombs & Shaw (1972) 的研究得到證實，認為閱聽人會透過媒體的強調後，改變其對於特定社會議題的重要性評估。進而言之，媒體對於特定議題的報導強度增加後，會改變社會大眾對此一議題的重要性程度之認知，自此，議題設定相關實證研究吸引許多關注 (Bekkers et al., 2011; Hong Nga Nguyen & Gehrau, 2010; Strömbäck & Kiousis, 2010)，以大量的實證數據，累積預測閱聽人議題設定的效果，而以媒體議題影響閱聽人重要性認知排名之議題設定效果，亦稱之為第一層的議題設定 (Guo & McCombs, 2011.06)。

議題設定效果理論被提出後，學者開始認知到，個人涉入感、人口變項 (Ali et al., 2014; Ogata Jones, Denham, & Springston, 2006)、媒體議題本身的影響 (Hunter, Van Wassenhove, Besiou, & Van Halderen, 2013; Mucundorfeanu & Vana, 2012)、人際溝通的習慣 (Hong Nga Nguyen & Gehrau, 2010) 等因素，都是可能造成議題設定效果顯著與否的主要原因。舉例而言，Mucundorfeanu & Vana (2012) 的研究認為，當新聞的議題種類偏向於以提供資訊為報導主軸之硬性新聞，例如公共政策、財經政策等議題時，議題設定的效果比提供生活及娛樂報導為主的軟性新聞來的顯著；而 Hong Nga Nguyen & Gehrau (2010) 研究則指出，個人日常的資訊主要來源以及媒體使用時間的多寡，亦會影響傳播媒體議題設定效果形成的機會。而另一個重要的研究取向則是，檢驗議題設定在政治傳播乃至於公共議題的研究 (Camj, 2014; Marsh, 2013; Van Dalen & Van Aelst, 2014)。此一研究取向多是關注政治廣告或是政治新聞報導，是否會對於特定閱聽人造成議題設定效果的

影響。舉例而言，陳憶寧（2004）檢驗 2002 年臺北市長選舉期間，媒體議題設定與預示效果，並以發行量排名前三大的報紙之內容分析，輔以二次的電話調查後發現，平面媒體政治新聞的報導篇幅與數量，確實影響閱聽人對於議題重要性的認知以及對於特定議題支持與否的態度；再者，左宗宏（2008）針對報紙議題、網路議題與公民對於議題的重要性認知等三方面進行比較分析，結果發現，報紙的議題設定效果除了影響一般民眾對議題重要性的認知外，對於網路的電子布告欄系統上的言論，亦有顯著程度的影響。

綜上所述，議題設定效果運用範圍廣泛，除探討媒體與閱聽人之間議題設定效果外，亦包含媒體機構間的議題設定，可見議題設定理論本身的發展已非探討單一種類以及單一機構的傳播現象，而本研究則是期望探討在新媒體環境下，結合上述的媒體暴露因素，是否依然對閱聽人產生議題設定效果；再者，過去的議題設定研究中，大多是專注於傳統的印刷媒體或是電子媒體為研究架構，藉以檢驗議題設定的效果 (Bekkers et al., 2011; Hänggli, 2012; Malhotra & Krosnick, 2007)，目前並沒有研究是聚焦於檢驗國防事務相關的媒體議題設定效果；此外，隨著新傳播科技的發展，許多研究顯示，社群媒體現今已經改變了閱聽人的資訊接收及媒體使用習慣 (Beuker & Abbing, 2010; Briscoe & Aboud, 2012; Rudat, Buder, & Hesse, 2014)，在社群媒體傳播環境中，國防事務相關的議題設定效果如何影響閱聽人，閱聽人對於國防事務臉書發文訊息的反應又有何不同，實為一個值得關注的研究範圍。

二、預示效果

媒體的預示效果又可稱為議題設定的第二層效果 (Guo & McCombs, 2011.06)，主要關注閱聽人重複暴露在特定的媒體訊息下，本身的態度乃至於行為傾向有可能會趨近於媒體所持的立場及論調 (Brewer, Nakamura, & Bolt, 1984)。預示效果的主要特色為，閱聽人的態度有可能被媒體內容所呈現的觀點所影響，並且，如果媒體內容對於閱聽人而言，越容易被回憶，則閱聽人在腦中「再現」（representation）出該媒體的觀點的機會也越高 (Bilali & Vollhardt, 2013)。此一論點也呼應 Cohen 所說的媒體影響閱聽人「應該怎麼想」，進而言之，媒體所引導的議題設定效果將不再只侷限於改變閱聽人對議題本身重要程度的認知，更甚者，已影響到閱聽人長期對於該議題的「評價」（evaluations）(Ashikali & Dittmar, 2012)，進一步而言，第一層的議題設定研究的基本假設在於，閱聽人對媒體版面上顯著報導或是報導次數較頻繁的議題，會認知此一議題相較於同時段

的其他新聞而言，較為重要且值得關注；而預示效果的假設則是認為，媒體報導的篇幅不僅影響閱聽人對於特定議題重要性的認知，媒體報導的方向，也引導閱聽人對於該議題的評價及態度。

預示效果研究源自於認知心理學，認為閱聽人的大腦的自動分類功能可以加速閱聽人對於所接收資訊的處理，而此一資訊分類處理的成果，將影響閱聽人對於資訊內容態度的評價與判斷，並且，此一資訊處理過程容易為媒體所觸發（trigger）與影響 (Bilali & Vollhardt, 2013)。Meyer & Schvaneveldt (1971) 針對閱聽人對於接觸特定詞彙後，檢驗閱聽人對於其他相似辭彙的連結能力所設計的「辭彙判斷」（lexical decision）實驗，為預示效果研究的雛形，舉例而言，研究預示效果的實驗操作過程通常給受試者一個概念（如：漢堡），然後要求受試者將腦中所想到可以與該念連結起來的概念描述出來（如：薯條、可樂），然後要求受試者接觸跟實驗概念有連結但不相關的媒體內容，最後再要求受試者針對第一個概念重新評估，如果受試者最後的答案與第一次不同，表示受試者有受媒體預示效果影響，換句話說，預示效果扮演著人腦記憶以及評估的「觸發者」的角色。而 Meyer & Schvaneveldt (1976) 的研究則進一步探究此連結的強度與時間的關係，結果發現，雖然預示效果消散的時間暫無法有一系統性的解釋，但可以確立預示效果是一種相對短時間的（short duration）記憶能力連結。Malhotra & Krosnick (2007) 則認為這種預示效果觸發的記憶，通常與最常接觸的媒體訊息內容最接近，媒體預示效果將會影響閱聽人對於特定議題的態度及評價。

與傳播研究相關之預示效果研究方面，Iyengar & Kinder (1987) 提出了媒體預示效果的重要假設，認為閱聽人接觸媒體的時間越久以及次數越頻繁，則閱聽人對於特定議題的評價將會越趨近於該媒體。近來預示效果的研究則是被廣泛的運用在政治競選的媒體論述中 (Kelleher & Wolak, 2006; Malhotra & Krosnick, 2007; van der Brug, Semetko, & Valkenburg, 2007)，主要原因是選民的投票意向以及對於特定政黨或是候選人的評價及態度，是決定是否以投票行為支持特定團體以及候選人的重要指標。而張卿卿、羅文輝（2009）針對臺灣政論節目對閱聽人的影響研究中則發現，本身政黨傾向較為明顯的閱聽人，對於同樣政黨傾向政論節目中的議題探討的角度認同感較高，同時，對於節目內針對臺灣未來前途的討論，亦影響閱聽人對臺灣未來前途的信心；左宗宏（2009）則是針對 2004 年臺灣總統大選的「公民投票議題」之媒體報導與民眾態度進行研究，結果發現，民眾的看法與媒體框架的觀點高度相關，從上述研究可知，臺灣的媒體報導方向，對臺灣民眾確有可能產生預示效果。

而近年來的預示效果研究也開始關注閱聽人對於特定議題對其涉入程度 (Ha, 2011)、閱聽人的媒體使用習慣 (Ashikali & Dittmar, 2012) 以及預示議題的媒體呈現方式 (Bilali &Vollhardt, 2013) 的影響，舉例而言，Ashikali & Dittmar (2012) 的研究即認為，媒體對閱聽人的預示效果成效很大的影響來自於閱聽人對於該媒體的使用依賴程度，以及信賴感，對於特定媒體使用時間越長的閱聽人，預示效果的形成機會也越高；而 Bilali & Vollhardt (2013) 的研究則發現廣播節目中，戲劇類並且以第一人稱為主要敘事聲音的節目，較易使聽眾產生同理心，其論述方向也較能影響閱聽人的態度，並且產生預示效果。

綜上所述，本研究亦檢視國防部發言人臉書粉絲專頁的媒體呈現方式，以及閱聽人本身對於國防事務議題的熟悉程度等因素，作為研究的變項之一，藉以檢視國防部發言人臉書的策略如何影響閱聽人對於國防事務的評價與態度。本研究聚焦於此，除可累積國防政策與新媒體運用的理論基礎外，亦希冀能在實質上，對國防部運用新媒體的文宣溝通策略提出建議。

三、網路議題設定、社群媒體運用與國防部發言人臉書發言策略

網路與社群媒體的影響力，已不是只有體現於網路產業本身，影響更深遠的，是散布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層面的傳布能力，甚至是當代許多人「認識」這個世界的重要來源之一 (Hanneman & Riddle, 2005)。新媒體同時也是許多人蒐集相關資訊，甚至取代傳統媒體，成為閱讀新聞與感知外在意見的來源，例如 2008 年埃及阿拉伯之春運動，是透過臉書以及推特（Twitter）社團「4 月 6 日青年運動」（April 6 Youth Movement）串聯，讓多個阿拉伯國家政府如推骨牌般傾倒，引發一連串政治改革。阿拉伯之春運動透過社群網站的串聯，以「病毒式」的訊息傳播方式，穿透所有中東國家對於網路電信的管制，2 個星期內有 500 萬次網友響應相關推文，2,000 萬次網友轉貼，導致 80 個國家以及 1,600 家媒體大量報導，形成國際輿論壓力，並藉這一股勢力，以類似的方式串聯起 270 場大規模的社會抗爭活動，以至於 1 個月內促使已經執政 23 年的突尼西亞總統阿里班流亡海外，瓦解政權 (Hassanpour, 2011.09)，此一現象也揭示社群媒體對於閱聽人媒體使用行為的影響相較於傳統媒體而言，更快速，同時跨越國界的傳播特色也更明顯。

閱聽人的媒體使用行為及效果研究，長期來都是媒體及傳播相關研究的核心議題之一，而在新傳播科技發展快速的今日，新媒體與社群媒體的議題設定效果是否有所差異，實為一值得探究之取向。Guo & McCombs (2011.08) 則認為社群媒

體與傳統媒體議題設定研究中，最顯著的差異在於閱聽人的媒體使用的主動性，具體而言，過去在傳統大眾媒體的「中心化」（centralized）傳播的邏輯下，閱聽人接觸訊息較被動接觸媒介訊息，然而當代網路「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的傳播邏輯，訊息可以更低成本與快速的方式執行，而閱聽人也開始主動選擇媒體。

國內對於國防部發言人臉書發文策略的研究，目前只有孫懋嘉（2012 年 8 月）針對發文策略以公共關係雙向互動模式分析（two-way symmetrical theory），以及周力行（2013）針對國防部發言人近 4,000 則發文內容進行內容分析，並歸納整合其中的論述策略，此一研究以普測的方式，對於目前國防部發言人臉書發文策略進行內容分析及編碼，企圖擘劃整體說服及論述策略，研究者對於國防部發言人臉書的發文策略分析，以目前國防部發言人臉書發文的策略而言，大致可以分成活動紀實、長官視導、戰力展示、好人好事、組織聲明、一般留言、資訊提供等，而其中活動紀實、長官視導、戰力展示三項則占國防部發言人臉書發文的 89%（孫懋嘉，2012 年 8 月）。本研究將擷取國防部發言人臉書主要發文策略做為實驗的變項，檢驗在臉書的專業的媒體環境下，發文策略對於閱聽人的議題設定與預示效果影響。

其中各變項的分類如次，「活動紀實」：包含國軍一般性的會議及活動，如檢討會、學術會議等例行會議，以及勞軍、營區開放、媒體參訪等軟性活動；而「長官視導」：包含政府官員、國軍長官至部隊視導及慰問；「戰力展示」：包含演習、人員訓練、武器裝備、戰力展示等資訊。

本研究將檢驗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專頁中，最主要的發文策略是否能夠改變國防施政議題在閱聽人心目中重要性的認知，以及透過臉書這種新的社群傳播媒體是否能影響閱聽人對於國軍整體形象的評價。

換而言之，本研究的目的是檢驗國防部發言人臉書的主要發文策略是否有議題設定以及預示效果，為了控制多數議題設定研究的侷限，也就是對於閱聽人的媒體使用行為的不一致，故本研究採取實驗法以排除其他媒體使行為所產生的混淆效果（confounding effect）。

並經文獻檢閱後，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問題及研究假設：議題設定的基本認知機制，如文獻探討所分析，媒體對於特定的議題重複報導以及放置於顯著報導位置，會使閱聽人比較容易在認知系統中「提取」，因此會使閱聽人認為這樣的議題較為顯著，而議題重要性也較高 (Mucundorfeanu & Vana, 2012)，過去雖然沒有相關研究檢視國防事務議題對於閱聽人議題設定的關聯性，卻有關注於相對讓閱聽人印象深刻的媒體報導，能否使閱聽人比較容易從腦中存取相關記憶之研

究，認為出現次數頻繁而使閱聽人容易回憶起報導內容的媒體議題，會使閱聽人認為該議題較其他議題重要 (Besiou, Hunter, & Van Wassenhove, 2013; Guo et al., 2012)。本研究聚焦於國防部發言人臉書粉絲專業中，最常被使用的發言策略，包含活動紀實、長官視導、戰力展示等，檢驗其是否會產生議題設定的效果。

研究問題 1a：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專頁的發文策略是否能改變閱聽人對於國防事務議題重要性的認知程度？

研究問題 1b：活動紀實、長官視導、戰力展示等 3 種發文策略比較下，對改變閱聽人對於國防事務重要性之認知程度的效果之否有所差異？

在傳播媒體與預示效果的研究方面，Ashikali & Dittmar (2012) 的研究認為，媒體對於特定議題報導的方向，將引導閱聽人對於該議題的評價及態度；Iyengar & Kinder (1987) 則認為閱聽人接觸媒體的時間越久以及次數越頻繁，則閱聽人對於特定議題的評價將會越趨近於該媒體，雖然上述研究檢驗了媒體暴露與預示效果之間關連性，但在社群媒體此一閱聽人互動模式與傳統媒體迥異的環境下，預示效果是否依然能夠成立，實為一值得探究之現象。

研究問題 2：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專頁是否能對閱聽人產生預示效果？

社群媒體臉書的特性是包含圖片以及只有文字發文等，2 種不同的呈現方式，以往的議題設定研究顯示，圖片以及文字的議題設定效果對於閱聽人的衝擊（impact）是有顯著的差異性 (e.g., Amankwah et al., 2012; Kiousis & Dimitrova, 2004.08; Thesen, 2013)，進而言之，Kiousis & Dimitrova (2004.08) 檢視網路媒體內容與閱聽人暴露後回憶能力的關聯性發現，圖片的呈現方式可以顯著增進閱聽人對於網站內容記憶能力；而 Amankwah et al. (2012) 則認為包含圖片與文字的網路媒體內容，連帶著也會增加閱聽人對於圖片週遭文字的注意力與回憶能力，而前述的議題設定文獻分析，則是呈現了閱聽人對於媒體議題內容的回憶能力之強弱，與議題設定的效果呈現顯著的關聯性，惟此一研究變項涉及閱聽人對於特定議題的看法，不同媒體之間議題呈現方式的差異等，以往的研究並無法提供一個有系統的解釋，本研究將檢驗在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專頁中，圖片以及文字呈現方式對於閱聽人議題設定程度是否存有差異性。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7 傅文成.indd 178 2016/1/12 下午 10:53:38

研究假設 1：包含圖片與文字發文策略與單純文字發文策略比較，在議題設定方面的效果將有顯著差異。

Williams & And (1982) 的研究指出，議題設定的研究亦關注於閱聽人對於個別媒體使用習慣，例如閱聽人的媒體依賴性亦會造成不同程度的議題設定效果，多數的研究結果發現，對於特定媒體依賴性高以及使用頻率越頻繁的閱聽人，越容易產生議題設定的效果 (Hänggli, 2012; Sill, Metzgar, & Rouse, 2013; Williams & And, 1982)，本研究將探索不同社群媒體依賴程度的閱聽人，是否對於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專頁的議題設定程度有所差異。

研究假設 2：社群媒體使用頻率較高的閱聽眾，較易受到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專頁的議題設定影響。

參、研究方法

一、實驗設計

本研究採 3 × 2 組間實驗設計（between-subjects design），合計操弄 2 個自變數，分別為「國防部發言人臉書粉絲團主要展現之 3 種發言策略」變項，包含活動紀實、長官視導、戰力展示等；而「國防部發言人臉書粉絲團之發文態樣」變項，包含圖片發文以及單有文字發文等 2 種發文呈現方式，合計 6 個小組（cell），每個小組受試者為 21 人，組間設計情形如表 1。

	活動紀實	長官視導	戰力展示
單有文字發文	單有文字之國防活動紀實	單有文字之長官視導	單有文字之戰力展示
包含圖片與文字發文	包含圖片與文字之國防活動紀實	包含圖片與文字之長官視導	包含圖片與文字之戰力展示

表 1：組間實驗設計分配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一）變項定義與測量

1. 自變項

(1) 國防部發言人主要發文策略：活動紀實、長官視導、戰力展示

如前文獻探討所述，目前針對國防部發言人臉書發言策略研究有限，綜合各項研究內容分析的成果，目前國防部發言人臉書的發言策略可以區分為動紀實、長官視導、戰力展示、好人好事、組織聲明、一般留言、資訊提供等 6 大類。為顧及實驗的可行性，故本研究作者選擇國防部發言人臉書發言最常使用的 3 種策略為研究架構，此 3 類的發文策略，占整體國防部臉書粉絲專頁的 89%，而這 3 種發言策略的界定範圍區分為「活動紀實」：包含國軍一般性的會議及活動，如檢討會、學術會議等例行會議，以及勞軍、營區開放、媒體參訪等軟性活動；而「長官視導」：包含政府官員、國軍長官至部隊視導及慰問；「戰力展示」：包含演習、人員訓練、武器裝備、戰力展示等資訊，此一變項之評估方式，以 6 點李克量表（likert Scale）詢問受試者，選項 1 代表非常不重要；選項 6 代表非常重要。

(2) 圖片與文字／單純文字的發文型態

社群媒體以及臉書的媒體內容呈現非常豐富，但呈現型態基本上是由文字與圖片組合而成，鑒於圖片與文字在傳統媒體上對於閱聽人所造成議題設定效果有所區別，本研究將檢驗此一現象是否存在於社群媒體的發文環境。

而在人口統計變項中，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以及文獻探討，納入閱聽人的學歷、家庭收入、國防事務知識高低，原有對於國防施政的評估，以下針對非人口統計變項之自變項提出說明定義。

2. 依變項

(1) 對國防及其他議題重要性認知：受試者在政治、社會、經濟、外交、與國防事務等 5 項議題中，以 6 點李克量表詢問受試者各項議題的重要性，選項 1 代表非常不重要；選項 6 代表非常重要，其中國防議題為實驗操控之變項。

(2) 對國防事務重要性認知：受試者在活動紀實、長官視導、戰力展示等 3 項議題中，將其依重要性程度排名，選項 1 代表非常不重要；選項 6 代表非常重要。

(3) 受試者對於國防施政的態度：以 2 項 Osgood 6 點語意差異量表測量閱聽人對

於整體國防施政的態度，分別為好／不好；喜歡／不喜歡，並將兩者得分加總，成為受使者對於國防施政態度。

(4) 原有對國防事務之議題重要性認知（應變項之前測）：受試者在政治、社會、經濟、外交與國防事務等 5 項議題中，以 6 點李克量表詢問受試者，選項 1 代表非常不重要；選項 6 代表非常重要。

(5) 國防事務知識之高低（應變項之前測）：Thomas (2011) 以及 Mandel (2011) 的研究認為國防事務知識高低可以區分為 3 個方面，包含對於「國防事務的興趣」、「國防事務相關之新聞媒體閱讀情形」，以及對於「國防建軍備戰事實的瞭解」。其中「國防事務的興趣」問項是以 6 點李克量表評量，選項 1 代表非常沒興趣瞭解；選項 6 代表非常有興趣瞭解；「國防事務相關之新聞媒體閱讀情形」則是詢問受試者對於國防相關議題的媒體接觸的頻率，選項 1 代表非常不常接觸；選項 6 代表非常接觸；「國防建軍備戰事實的瞭解」以測量 6 個難易程度不同的國防施政相關是非題做為評量標準，並援以「102 年國防四年總檢討」（QDR）為判斷基礎（國防部，2013），其中最易題目為：國防部軍種包含：陸、海、空軍以及憲兵；最困難題目為：國軍與美軍交流僅限於陸軍之陸威專案。以上題項加總後，即為受試者之「國防事務知識之高低」分數。

3. 實驗材料臉書專頁刺激

將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專頁設定為本研究主要實驗材料，並配合對照材料，亦即相關政府機關臉書專頁中選取政治、經濟、社會以及外交等，合計 5 類之臉書發文（國防部 3 種主要發文策略 × 2 種不同圖文呈現方式等合計 6 則；另有非國防相關之政治、經濟、社會、外交等其他政府機構臉書專頁發文 6 則），其中國防事務相關 3 種發文策略以及 2 種不同發文型態（只有文字，同時有圖片及文字），均取自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專頁，研究者將相關 6 則發文依照實驗組別的不同，選擇性將圖片保留亦或是只呈現文字部分；而 5 種不同議題中的政治、社會、經濟、外交等議題則改取自文化部與臺北市政府臉書粉絲專頁。

4. 受試者

本研究受試者為招募臺北市國立大學商管學院之大學生 126 員，年齡介於 18 至 25 歲，每位受試者篩選標準均為具有臉書帳號，每位受試者在學期末均可以得

到課堂加分，其中性別為女性占 75 員，男性 51 員，比例約為 6：4。值得關注的是，本研究為研究國防事務相關議題之媒體議題設定效果，為避免樣本結構上的誤差，故排除招募軍校學生作為受試者，雖然受試者依然是以學生為主，但考量目前新媒體使用情形還是以青年學子為主流，在樣本的選擇上有其合理性。

5. 實驗過程

126 員參與者被隨機分派至 6 個組合，每組參與者被告知，目前研究員針對有關於年輕學子新媒體運用的習慣進行調查，因為同時施做 2 個研究案，所以要請受試者填寫 2 次問卷，其中的問項可能有些相似。此一研究說明目的，在檢驗參與者目前的社群媒體使用習慣與對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專頁的建議，做此一說明之目的為避免受試者有先入為主猜測研究目的，而影響本研究之效度，故實驗前做此一說明，以保持在整體實驗過程中受試者保持「單盲」（single blind）狀態。

研究者說明完實驗程序後，發放第 1 回合問卷，請參與者針對人口統計變項、對於 5 種時事議題重要性的評估、原有對國防事務重要性認知、對於國防議題的偏好、以及對於國防施政知識的高低作答，每位受試者有 10 分鐘完成第一回合問卷，受試者完成回答後，研究員邀請受試者打開電腦桌面「受試者」的資料夾，其中有 12 張由研究者擷取自國防部發言人臉書的各種發文策略影像，其中各種發文策略影像的暴露順序亦是隨機分派。每一位參與者在受試過程將接觸包含 6 張國防議題相關之臉書貼文，以及 6 張非關國防事務之公共政策臉書專頁，每組受試人員所接觸的實驗材料如表 1「組間實驗設計分配表」，各組分別接觸議題與發文類型不同之實驗材料，每位受試者針對每一則發文有 2 分鐘的暴露時間，而後有 2 分鐘的時間填寫填答一份簡短的問卷，詢問其對臉書發文內容議題的態度、其重要性的評估以及發文內容的可讀性。此一簡答問卷在於確保每位受試者對於每則實驗材料均有足夠程度的暴露，同時為了預防同一場地同時播放不同影片造成干擾，電腦皆備有耳機，受試者以配戴耳機方式觀看實驗材料，同時以一機一人為原則。

每位受試者所暴露的 12 則臉書訊息中，有 6 則是國防相關的議題，另外 6 則訊息則是從外交、政治、社會、經濟議題中隨機分配，此一精神符合議題設定理論中，對於報導次數越多以及越顯著的議題，閱聽人會認為其越重要的假設驗證精神。以上的實驗過程亦可以避免暴露的先後順序造成結構性的偏誤。其中，受試者接觸之國防議題專頁內容包含了漢光演習火力展示，國防部長視導工作檢討會以及國軍舉辦營區開放活動情形、海軍陸戰隊天堂路以及菲律賓風災支援任

務等；而非國防議題的粉絲專頁受試材料，則是包含文化部長接待外賓、臺北市政府公共住宅建設現況以及市政府未來 5 年經濟建設的白皮書，故本研究的受試者所暴露的實驗操作合理多元且符合研究設計。

研究者要求受試者在看完整體約 48 分鐘的臉書專頁之實驗暴露後，對於受試實施 10 分鐘之「國防議題重要性評估」，以及對於「整體國防施政態度與評價」實施問卷，以檢驗其議題設定以及預示效果。

肆、研究分析

一、操弄檢核

本研究針對國防部發言人臉書 3 種主要發文策略，包含活動紀實、長官視導、戰力展示等發文各 2 則，由 25 位大學生實施前測，以確定受試者是否能夠分辨每種發文策略的差異性，結果顯示多數受試者針對於本研究所選定之材料，均能夠清楚分別其中差異，*t*-tests 檢定也顯示，可以清楚辨別的發文主題樣本相對於無法分辨的發文主題次數之間均呈現顯著的差異（$p < .001$），詳細數據請見表 2。

二、量表信、效度

評測參與者對於國防施政總體態度量表以好／不好；喜歡／不喜歡等 2 種指標組成，故本研究須檢驗此一量表之內在一致性，本研究量表之 Cronbach's α coefficients 值為 .89，評斷本量表信度良好。另受測者對於國防施政態度表示好與喜歡兩題的相關性達顯著，Pearson's $r = .82$，$p < .01$，因此將兩題加總平均作為「對於國防施態度政持正面評價」的指標；而受測者對於國防施政態度表示不好與不喜歡兩題的相關性亦達顯著，Pearson's $r = .93$，$p < .01$，因此將兩題加總

發文策略	專頁	正確百分比	標準差	*t*	顯著性
活動紀實	專頁 1	92%	1.40	16.79	< .001
	專頁 2	89%	0.89		
長官視導	專頁 1	87%	1.42	12.78	< .001
	專頁 2	85%	0.82		
戰力展示	專頁 1	94%	1.28	18.39	< .001
	專頁 2	90%	1.09		

表 2：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專頁發文策略辨識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平均作為「對於國防施政態度持負面評價」的指標據，此評斷本量表信、效度可以接受並進行下一階段之分析。

三、研究問題分析與假設驗證

（一）研究問題分析

研究問題 1a 檢視閱聽人在暴露於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專頁後，是否改變其對於國防事務重要性的排名，研究者將受試者在「政治」、「社會」、「經濟」、「外交」與「國防事務」重要性的評分加權計分，並以配對樣本 *t* 檢定（Paired sample *t*-test）分析受試者媒體暴露前後對於國防事務重要性認知的平均分數差異，結果顯示，暴露於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專頁後，對於國防事務重要性的認知在使用媒體前後有顯著的差異（$t(4) = 5.75, p < .001$），發現「國防事務」的重要性指標，在受試者瀏覽國防部發言人專頁後，有顯著的提升。

具體而言，在閱聽人使用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專頁前，對於議題重要性的排名由重要到不重要分別是「經濟」、「社會」、「政治」、「國防事務」、「外交」，而在使用臉書後，由重要到不重要排名則變更為「經濟」、「國防事務」、「社會」、「政治」、「外交」，顯見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專頁會對於民眾產生議題設定的效果，亦即經過較多量的國防事務臉書暴露後，閱聽人對於國防事務重要性的認知程度已呈現顯現議題設定效果，詳細資訊請見表 3。

研究問題 1b 則進一步檢視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專頁不同的發文策略，包含「活動紀實」、「長官視導」以及「戰力展示」，配對樣本 *t* 檢定分析受試者暴露上述發文策略前後，對於國防事務重要性認知的平均分數差異，以檢驗國防部發言人臉書粉絲專頁之策略對參與者所產生的議題設定效果是否有所差異，配對樣本 t 檢定顯示，以「戰力展示」，相關發文最能夠造成議題設定效果（$t(2) = 5.97,$

排名	臉書專頁使用前		臉書專頁使用後		*t*
	議題	平均值（Mean）	議題	平均值（Mean）	
1	經濟	5.59	經濟	5.57	0.69
2	社會	5.21	國防事務	5.41	5.75***
3	政治	4.37	社會	5.19	0.44
4	國防事務	3.02	政治	4.53	0.98
5	外交	2.41	外交	2.12	0.37

表 3：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專頁使用前後，議題重要性排名指數變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p < .001$

$p < .001$），其次為「活動紀實」相關議題（$t(2) = 5.51, p < .01$），然而在「長官視導」相關議題，則無法使閱聽人對國防事務重要性產生排名認知上的改變，故研究問題 1b 部分成立，國防部發言人不同發文策略確實會造成部分議題設定效果之差異，詳細分析資訊請見表 4。

整合研究問題 1a 與 1b，可以明顯發現，國防部的發言人臉書之發文策略，對於閱聽人的議題設定效果有顯著的影響，而更進一步的檢視每種發文策略與議題設定效果之間的關聯性後，發現僅有關於軍隊活動紀實以及戰力展示相關的臉書發文，有顯著的機會影響閱聽人對於整體國防事務重要性的認知。

研究問題 2 則是檢驗國防部發言人的臉書專頁之主要發文策略，除了影響閱聽人對於國防事務相關議題重要性排名的高低之外，是否能更進一步影響其對於國軍的整體態度及評價之「預示效果」，研究者以以不同發文策略（長官視導、活動紀實、戰力展示）及發文態樣（僅有文字發文與包含圖片與文字發文）為自變項，對於國防施政的態度為應變項，採二因子變異數（two-way ANOVA）分析加以檢驗上述二個自變項對於受試者的預示效果之影響；若交互作用有顯著則進行單純主要效果（Simple main effect）考驗。

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國防部發言人臉書粉絲團之發文策略（$F(2, 756) = 81.96, p < .001$）與發文態樣（$F(1, 756) = 72.15.96, p < .01$），均呈現顯著影響受試者對於國防施政態度之主要效果；然而，上述二個自變數亦呈現交互作用顯著的成果（$F(2, 756) = 9.31.96, p < .001$），故須進行「單純主要效果」檢定，以釐清在何種狀況下，國防部發言人臉書的發文最有可能造成預示效果，詳細分析情形請見表 5。

經單純主要效果分析後可知，單只有文字之發文型態狀況下，不同的發文策略對於受試者之整體國防施政的態度影響有顯著的差異（$F(2, 262) = 141.54, p < .01, \eta^2 = .45$）；進一步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分析比較後發現，國防部發言人臉書的純文字「戰力展示」發文（M = 5.74）對於整體國防施政的態度分數高於「活

議題	臉書專頁使用前	臉書專頁使用後	t
	平均值（Mean）	平均值（Mean）	
活動紀實	3.11	4.36	4.98**
長官視導	1.75	1.93	2.11
戰力展示	3.95	5.94	5.97***

表 4：國防部發言人臉書主要發文策略議題設定效果變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p < .001$; **$p < .01$

來源	依變數	型 III 平方和（Type III Sum of Squares）	自由度（*df*）	平均平方和（Mean Square）	*F* 檢定	顯著性
發文策略	對於國防施政態度	856.36	2	436.03	81.96	< .001***
發文態樣	對於國防施政態度	431.54	1	221.65	72.15	.01**
發文策略 × 發文態樣	對於國防施政態度	79.03	2	73.97	9.31	< .001***
誤差值	對於國防施政態度	455.31	756	7.04		

表 5：國防部發言人臉書主要發文策略與發文態樣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p < .001$; **$p < .01$

動紀實」發文（M = 4.87），而前述發文策略對國防施政態度影響又高於「長官視導」發文（M = 2.61），顯見在單只有文字的情形下，戰力展示類型的發文最能夠影響閱聽人對於國防施政的態度。

在包含圖片與文字的發文方面，不同的發文策略對於受試者之整體國防施政的態度影響亦有顯著的差異（$F(2, 262) = 174.32$, $p < .001$, $\eta^2 = .67$）；經由 Scheffe 事後分析比較後發現，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包含圖片與文字「戰力展示」發文（M = 5.95）以及「活動紀實」發文（M = 5.68）對國防施政態度影響顯著高於「長官視導」發文（M = 2.63），經上述分析比較後發現，包含圖片之發文在影響受試者對於整體國防施政之態度方面，有較好的效果，然而在「長官視導」發文策略方面，則是呈現不論何種發文態樣，均無法有效影響受試者對於國防施政的態度，詳細分析情形請見表 6。

發文態樣	發文策略	國防施政態度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Scheffe 事後檢定
僅有文字發文	長官視導	2.61	0.84	141.54**	戰力展示 > 活動紀實 > 長官視導
	活動紀實	4.87	1.07		
	戰力展示	5.74	0.88		
包含圖片與文自發文	長官視導	2.63	0.95	173.32***	戰力展示、活動紀實 > 長官視導
	活動紀實	5.68	1.21		
	戰力展示	5.95	1.01		

表 6：單純主要效果分析摘要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p < .001$; **$p < .01$

（二）研究假設驗證

研究假設 1 假定，只有文字的發文與包含圖片的圖文並呈發文，對於閱聽人能夠造成不同程度的議題設定效果。以單因子變異量（one-way ANOVA）檢定不同發文策略之圖文結構所造成受試者對於整體國防施政重要性認知程度的差異，分析結果顯示，以「包含圖片的發文」（$F(1, 6) = 6.062$, $p < .001$）以及「只有文字」（$F(1, 6) = 4.41$, $p < .05$）的發文策略均能夠造成議題設定效果，換而言之，只有文字的發文與包含圖片的圖文並呈發文，2 種策略均能提升受試者對於國防事務重要性的認知程度。然而值得關注的是，在重要性評估的平均值上，以「包含圖片的發文」較佳（Mean = 5.77; $p < .001$）。從研究假設 1 的分析結果得到證實，雖然二種主要存在於臉書粉絲專頁的發文型態（modality）均能夠對參與者產生議題設定的效果，但 2 者在顯著程度以及重要性認知上有所差異，以圖文併呈的發文策略所展現的議題重要性平均值為最高。

研究假設 2 則嘗試檢視對於網路媒體依賴性較高，也就是以網路媒體使用作為日常獲取資訊主要來源的閱聽人，是否比較容易受到國防部發言人的臉書專頁的議題設定影響。研究者將參與人員分為其自我評估「使用網路媒體時間多於傳統廣電媒體」、「網路媒體與傳統廣電媒體使用時間大致相等」、「使用傳統廣電媒體多於網路媒體時間」3 組，並觀察其使用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專頁前後，對於國防施政議題的重要性排名（見表 7）。單因子變異量檢定不同媒體依賴程度下，經過實驗刺激後，在對於國防事務重要性的議題設定效果之差異，分析結果顯示，以「使用網路媒體時間多於傳統廣電媒體」（$F(1, 4) = 7.25$, $p < .001$），以及「網路媒體與傳統廣電媒體使用時間大致相等」（$F(1, 4) = 5.40$, $p < .01$）的受試者較容易受到國防部發言人臉書粉絲專頁之議題設定效果，換而言之，不同媒體依賴習慣的閱聽人，在暴露於國防事務相關社群媒體訊息較多後，本身對於國防事務重要性的認知呈現顯著的差異。

進一步檢視分析結果發現，「使用網路媒體時間最多」之受試者，在暴露於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專頁後，對於國防事務重要性的排名從第 4 名上升至第 1 名之水準，其認同國防事務重要與否的平均值，也由暴露實驗刺激前的 2.52 進步到實驗刺激後的 5.58，而「網路媒體與傳統廣電媒體使用時間大致相等」之受試者則是對於所有議題的重要性指數都增加，其中對於國防議題的重要性認知亦顯著增加，但國防事務排名維持第 3 名，並沒有顯著變化，但認同國防事務重要性的平均值從受試前的 3.42 進步到受試後的 5.40，另「使用傳統廣電媒體多於網路媒體時間」之受試者對於國防事務議題的重要性以及排名並無顯著變化，顯見

於就議題設定效果而言，長時間使用社群媒體的閱聽人相較於使用傳統廣電媒體多於網路媒體時間之閱聽人，比較容易受到國防部發言人臉書的議題設定影響，進而認為國防事務相較於其他議題而言比較重要，此一分析結果展現了，日常使用社群媒體時間越多的閱聽人，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專頁對其議題設定的影響越顯著，其次為使用網路媒體與傳統媒體時間相等的閱聽人。

伍、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以實驗法，檢驗國防部發言人臉書粉絲專頁發文策略的議題設定以及預示效果。在本研究設定中，所有受試者均是以隨機分派的方式接觸國防部發言人以及其他重要社會議題的臉書粉絲專頁，並且受試者針對每一則內容均須填寫態度量表，此一作法可確保參與實驗者對於實驗內容有足夠的暴露程度，亦較為接近日常使用社群媒體的情境，避免情境抽離（out of context）而影響研究效度。

	臉書專頁使用前			臉書專頁使用後		
	議題重要性		平均數（Mean）	議題重要性		平均數（Mean）
使用網路媒體時間多於傳統廣電媒體	1	經濟	5.21	1	國防事務 ***	5.58
	2	社會	5.19	2	社會	5.55
	3	政治	4.85	3	經濟	5.33
	4	國防事務	2.52	4	政治	4.81
	5	外交	2.43	5	外交	2.96
網路媒體與傳統廣電媒體使用時間大致相等	1	經濟	5.82	1	經濟	5.91
	2	社會	5.01	2	社會	5.62
	3	國防事務	3.42	3	國防事務 **	5.40
	4	政治	3.42	4	政治	4.31
	5	外交	1.89	5	外交	2.00
使用傳統廣電媒體多於網路媒體時間	1	經濟	5.74	1	經濟	5.47
	2	社會	5.43	2	社會	5.25
	3	政治	4.84	3	政治	4.47
	4	國防事務	3.12	4	國防事務	3.40
	5	外交	2.91	5	外交	3.11

表 7：不同社群媒體依賴之參與者國防部發言人臉書使用前後議題重要性排名變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p < .001$; $^{**}p < .01$

本研究成果支持文獻探討中關於議題設定之論點，即議題設定的效果是存在於社群媒體中 (Bekkers et al., 2011)，具體而言，受試者暴露於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專頁後，發現相較於其他種類之社會重要議題（經濟、社會、政治、外交），其對於國防施政相關議題的重要性認知有顯著的提升，整體重要性認知從未接觸發言人臉書前的第 4 名，到接觸臉書專頁後的第 2 名，顯見國防部發言人可以透過臉書的適切的發文策略影響閱聽人對於中華民國整體國防事務的重要性認知。而本研究更進一步選擇目前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專頁的主要發文訴求內容以及圖片與文字相關運用策略實施交叉比對，分析結果顯示「戰力展示」以及「活動紀實」2 種發文策略比較容易產生議題設定的效果。

探究其主要原因，可能的解釋為「戰力展示」以及「活動紀實」兩種發文策略，符合於社會大眾對於國家整體國防武力的期待，Eighmey (2006) 即認為，社會大眾對於軍人形象認同程度，是國家軍隊的評價高低及支持與否的主要決定關鍵，而軍隊是否能展現帶給民眾安全與犧牲奉獻的特質亦是全民所期待軍隊的主要功能，以這個角度觀之，「戰力展示」以及「活動紀實」所展示的先進武器以及軍隊演習訓練活動的畫面，較容易使閱聽人對於粉絲專頁的內容，與其心目中所設想國軍應有的價值觀互相連結，進而改變其對於國防施政議題重要性的評估結果。

另以圖片配合文字以及單純文字發文等二種型態之臉書粉絲專業內容策略之議題設定效果方面，顯示除了依文獻探討所述，包含圖片的發文對於閱聽人對於媒體內容回憶能力以及注意力的獲得比較顯著的效果之外 (Amankwah et al., 2012; Kiousis & Dimitrova, 2004.08)，包含圖片的國防部臉書粉絲專頁發文策略有較顯著的議題設定效果。

探究其原因，Sheafer & Weimann (2005) 的研究提供了可能的解釋，渠等認為，閱聽人接觸單一媒體訊息的次數或是頻率越高，則越容易從記憶庫中被汲取與回憶。Amankwah et al. (2012) 則是強調，包含圖片的媒體內容，將較於單只有文字的媒體而言，較容易讓閱聽人有較佳的回憶能力，換而言之，單一媒體議題的圖文呈現方式均會影響閱聽人對於該議題的回憶能力；而 Guo et al. (2012) 則認為，閱聽人回憶能力越好的議題，通常是在議題設定的效果中，越顯得重要的議題，綜此觀之，本研究的檢驗也證實了此一假設，在新媒體的環境中，發文類型是否包含圖片，將可影響閱聽人對於該議題重要性認知的程度高低。

研究亦發現，閱聽人對於新媒體的依賴程度，會影響其對於國防部發言人議題設定效果的程度。分析結果顯示，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對於「使用網路媒體時

間多於傳統媒體」之媒體使用習慣傾向之閱聽人的議題設定效果較好，並且，其對於國防事務議題之重要性評估程度，也從暴露臉書訊息前的第 4 名，到暴露訊息後的第 1 名，次之，為自述為平常使用網路媒體與傳統媒體時間概略相等族群之閱聽人，此一種類閱聽人則是呈現，對國防事務的重要性認知增加，惟其排名並無明顯的改變，再次之，為自述平日媒體使用習慣是以傳統廣電媒體為主的族群，在實驗暴露前後，對於國防事務議題的重要性評估以及重要性排名均無顯著差異。

由上述的研究驗證中可以得知，接觸網路媒體時間越多的閱聽人，於網路媒體議題暴露後，所呈現的議題設定效果也隨之增強。Williams & And (1982) 所提出的媒體依賴性與議題設定的關係，也在此研究得到驗證，Williams & And（同上引）的研究中檢視了，閱聽人對於媒體的依賴程度，將會影響該媒體對於特定閱聽人的效果，本研究則提出，此一媒體依賴性與議題設定的關係在網路環境中依然成立，使用網路媒體時間越多的閱聽人，在本研究的實驗暴露後，對於國防相關事務議題的重要性的認知，相較於其餘二組閱聽人，產生顯著的差異。

在預示效果方面，本研究結果呈現在國防部發言人臉書之發文策略與發文態樣之間，存在相互影響的效果，並影響受試者對於整體國防事務的態度評價的高低，整體而言，包含圖片的發文在「活動紀實」與「戰力展示」的發文策略中，對於閱聽人產生較佳的預示效果；而有關於「長官視導」的發文策略方面，不論是包含圖片抑或是單純文字發文臉書訊息態樣，均無法對閱聽人的態度產生正向的影響。值得一提的是，此一預示效果的檢驗結果，與前述議題設定的檢驗結果，呈現同步的現象，在前述議題設定檢驗中，「活動紀實」與「戰力展示」等發文策略亦呈現了議題設定效果較佳的成果，從此比較可知，就臺灣國防部發言人的臉書專頁中之發文策略而言，能夠影響閱聽人對於國防事務重要性評估的議題，同時也有可能是改變其對於整體國防施政愛好程度的議題。然而，目前沒有研究證明，在網路的環境中，議題設定與預示效果呈現同步的必然性，需在後續的研究加入媒體暴露時間與暴露環境選擇等主要因素加以檢視。

如同本研究開宗所述，議題設定效果不只影響閱聽人對於媒體內容如何想外，也可能告訴閱聽人應該怎麼想，國防部發言人臉書專頁的特定發文策略確實可以對於閱聽人產生議題設定以及預示效果。本研究對於政策應用的建議在於，國防部發言人的臉書專頁目前的經營模式，在「戰力展示」以及「活動紀實」的發文策略中可以影響閱聽人對於國防事務整體重要性的認知，亦有機會改變民眾對於整體國軍的好感程度。目前國防部的臉書粉絲專頁的人數已近 10 萬人，對

於一般社會大眾、軍眷社群乃至於媒體記者而言，此一平臺提供瞭解國軍動態、重要國防施政與國軍新聞發布的重要互動平臺，依本研究成果觀之，此一平臺亦可扮演引導公民對於國防議題的關注程度與國防施政之評價之角色，國防部如能謹慎選擇臉書經營方式與發文策略，將可漸進發揮社群媒體這一個溝通政策、瞭解民意以及即時互動的多元溝通平臺之綜效。

陸、研究限制

本研究發現閱聽人對於網路媒體的依賴程度不同，將會使其在議題設定的認知效果上有顯著差異，惟本研究並無法從現有之實驗操弄證明，此一差異是否與預示效果有必然之同步關係。其次，議題設定之過程應為一個中、長期影響過程，而本研究則是採用組間實驗設計，並無法直接認定媒體議題設定的長期影響效果，未來的研究方向如果能增長議題設定研究的時間軸，採長期重複追蹤的方式，將可提供更加有力的社群媒體中議題設定效果推斷。再者，預示效果會影響閱聽人對於整體國軍的評價態度，但本研究的實驗操作並不足以測量預示效果的淡出消散之時間（faded timing），與其對於議題設定效果之間的交互影響情形。最後，雖然臉書使用族群之主要年齡分布為青年學子，與本研究參與者大致相符，但能建議後續研究可依臺灣目前臉書使用者之人口統計特徵為招募研究參與者之基礎，以增進研究之外在效度。

參考書目

左宗宏（2009）。〈Agenda-setting analysis of referendum issue during 2004's Taiwan presidential campaign〉。《高應科大人文社會科學學報》，6：103-116。

———（2008）。〈2004 年臺灣總統大選傳統媒體、公眾與網路討論議題之關聯分析〉，《傳播與管理研究》，7（2）：73-106。

周力行（2013）。《國軍運用社群網站塑造軍人形象之策略研究——以國防部發言人臉書粉絲專頁為例》。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孫懋嘉（2012 年 8 月）。〈「國防部發言人」臉書粉絲專頁公關策略之探析〉，國防大學「101 年度軍事新聞研討會」論文。臺灣，臺北。

國防部（2013）。《中華民國 102 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臺北，臺灣：國防部整合評估室。

國防部發言人（2014 年 8 月 4 日）。〈國軍支援高雄氣爆意外事件救援任

務〉，《國防部發言人臉書粉絲專頁》。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MilitarySpokesman/photos/a.748026045260716.1073744275.160144950715498/748026048594049/

———（2013 年 11 月 14 日）。〈中華民國空軍執行菲律賓人道救援任務〉，《國防部發言人臉書粉絲專頁》。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613217115408277.1073742759.160144950715498&type=1

張卿卿、羅文輝（2009）。〈政論性談話節目影響之探討〉，《新聞學研究》，98：47-91。

陳憶寧（2004）。〈媒體議題與公眾議題演化過程之探討：以 2002 年臺北市長選舉為例〉。《新聞學研究》，81：125-162。

楊喻斐（2014 年 2 月 28 日）。〈臺灣臉書滲透率冠全球活躍用戶續增　每日平均 1100 萬人登入〉，《蘋果日報》，第 4 版。

Ali, M., Seuc, A., Rahimi, A., Festin, M., &Temmerman, M. (2014). A global research agenda for family planning: results of an exercise for setting research priorities.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92*(2), 93-98.

Amankwah, A. S., Ginn, A., & Ahenkora, K. (2012). Gendering the agenda: A look at front page photographs of a national newspap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 Economic Research*, *3*, 641-645.

Ashikali, E., & Dittmar, H. (2012). The effect of priming materialism on women's responses to thin-ideal media.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1*, 514-533.

Bekkers, V., Beunders, H., Edwards, A., & Moody, R. (2011). New media, micro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agenda setting: Crossover effects in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media usage. *Information Society*, *27*, 209-219.

Besiou, M., Hunter, M. L., & Van Wassenhove, L. N. (2013). A web of watchdogs: Stakeholder media networks and agenda-setting in response to corporate initiative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18*, 709-729.

Beuker, R., & Abbing, E. R. (2010). Two faces of social media: Brand communication and brand research. *Design Management Review*, *21*(1), 54-60.

Bilali, R., & Vollhardt, J. R. (2013). Priming effects of a reconciliation radio drama on historical perspective-taking in the aftermath of mass violence in Rwanda.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9*, 144-151.

Brewer, W. F., Nakamura, G. V., & Bolt, B. A. (1984). The nature and functions of

schemas. *ERIC*. Retrieve from http://files.eric.ed.gov/fulltext/ED248491.pdf

Briones, R. L., Kuch, B., Liu, B. F., & Jin, Y. (2011). Keeping up with the digital age: How the American red cross uses social media to build relationships.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7*, 37-43.

Briscoe, C., & Aboud, F. (2012). Behaviour change communication targeting four health behaviou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review of change technique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75*, 612-621.

Camj, L. (2014).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trust in an emerging democracy: Setting the institutional trust agenda in Kosov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 187-209.

Cohen, B. C. (1963). *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ighmey, J. (2006). Why Do Youth Enlist? *Armed Forces & Society*, *32*, 307-328.

Fahmy, S., Sooyoung, C., Wanta, W., & Yonghoi, S. (2006). Visual agenda-setting after 9/11: Individuals' emotions, image recall, and concern with terrorism. *Visual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13*, 4-15.

Fernando, A.G., Suganthi, L., & Sivakumaran, B. (2014). If you blog, will they follow? Using online media to set the agenda for consumer concerns on "greenwashed" environmental claims. *Journal of Advertising*, *43*, 167-180.

Guo, L., & McCombs, M. (2011.08). *Toward the third level of agenda setting theory: A network agenda setting mode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EJMC, St. Louis, MO.

-- (2011.06). *Network agenda setting: A third level of media effec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Boston, MA.

Guo, L., Vu, H. T., & McCombs, M. (2012). An expanded perspective on agenda-setting effects: Exploring the third level of agenda setting. *Revista de Comunicación*, *11*, 51-68.

Ha, S. (2011). Attribute priming effects and presidential candidate evaluation: The conditionality of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4*, 315-342.

Hänggli, R. (2012). Key factors in frame building: How strategic political actors shape news media coverag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6*, 300-317.

Hanneman, R. A., & Riddle, M. (2005). *Introduction to social network methods*. Riverside,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Hassanpour, N. (2011.09). *Media disruption exacerbates revolutionary unrest: Evidence from Mubarak's natural experi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eattle, WA.

Hong Nga Nguyen, V., & Gehrau, V. (2010). Agenda diffusion: An integrated model of agenda setting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7*, 100-116.

Hunter, M. L., van Wassenhove, L. N., Besiou, M., & van Halderen, M. (2013). The agenda-setting power of stakeholder media.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56*(1), 24-49.

Iyengar, S., & Kinder, D. (1987). *News that matters: Television and American opin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elleher, C. A., & Wolak, J. (2006). Priming presidential approval: The conditionality of issue effects. *Political Behavior*, *28*, 193-210.

Kiousis, S., & Dimitrova, D. (2004.08).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web site content: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source (public relations vs. news), modality, & participation on audience percep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Boston, MA.

Krosnick, J. A., & Kinder, D. R. (1990). Alte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upport for the president through prim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 497-512.

Lippmann, W. (1922).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NY: Macmillan.

Lovejoy, K., & Saxton, G. D. (2012). Information, community, and action: How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use social media.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7*, 337-353.

Malhotra, N., & Krosnick, J. (2007).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performance assessments during the 2004 election campaign: Tests of mediation and news media priming. *Political Behavior*, *29*, 249-278.

Mandel, D. R. (2011). Military social influence. *Analyses of Social Issues & Public Policy*, *11*(1), 39-42.

Marsh, I. (2013). Setting the post war Australian policy agenda -- Causes and content.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72*, 473-480.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7 傳文成.indd 194 2016/1/12 下午 10:53:39

McCombs, M. E., & Shaw, D. L. (1972).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6*, 176-187.

Meyer, D. E., & Schvaneveldt, R. W. (1976). Meaning, memory structure, and mental processes. *Science*, *192*, 27-33.

-- (1971). Facilitation in recognizing pairs of words: Evidence of a dependence between retrieval opera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90*, 227-234.

Mucundorfeanu, M., & Vana, D. (2012). Agenda setting, framing, printing: Analyze the effects on mass media in Română. *Review of Management & Economic Engineering*, *11*, 189-200.

Ogata Jones, K., Denham, B. E., & Springston, J. K. (2006). Effects of mass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on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Advancing agenda-setting theory in health contexts.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4*, 94-113.

Pallegedara, D., & Lei, P. (2014). Investigating Facebook groups through a random graph model. *Journal of Multimedia*, *9*, 25-34.

Rudat, A., Buder, J., & Hesse, F. W. (2014). Audience design in Twitter: Retweeting behavior between informational value and followers' interest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35*, 132-139.

Sheafer, T., & Weimann, G. (2005). Agenda building, agenda setting, priming, individual voting intentions, and the aggregate results: An analysis of four Israeli election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5*, 347-65.

Sill, K. L., Metzgar, E. T., & Rouse, S. M. (2013). Media coverage of the U.S. Supreme Court: How do journalists assess the importance of court decision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30*, 58-80.

Strömbäck, J., & Kiousis, S. (2010). A new look at agenda-setting effects -- Comparing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overall political news consumption and specific news media consumption: A cross different media channels and media typ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0*, 271-292.

Thesen, G. (2013). When good news is scarce and bad news is good: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ies and opposition possibilities in political agenda-setting.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52*, 364-389.

Thomas, R. M. (2011). *Military deployments: Evaluating teacher knowledge*.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S. DoD. (2013). *The Army Social Media Handbook*. Washington, DC: Author.

Van Dalen, A., & Van Aelst, P. (2014). The Media as political agenda-setters: Journalists' perceptions of media power in eight west European countrie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37*, 42-64.

van der Brug, W., Semetko, H. A., & Valkenburg, P. M. (2007). Media priming in a multi-party context: A controlled naturalistic study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Behavior*, *29*(1), 115-141.

Weaver, D. H. (1990). Setting political priorities: what role for the pres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7*, 201-211.

Williams, W., & And, O. (1982). *Political framing and agenda setting in the 1980 presidential campaig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6(1), pp. 169-197, January 2016

The Agenda Setting and Priming Effects of the SMND Facebook Content Strategies

Fu, Wen Che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Widely used by national defense sectors, Facebook is a significant new media platform for communicating policies with publics and gaining supports from them. To better understand media agenda setting and priming effects derived from the Facebook's fan page of spokesman of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SMND), a 3 × 2 between-subjects experiment design was conducted. This study also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dience's habits of media use and agenda setting effec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eavier social media dependency that the audience exerts, the more salient agenda setting effect exhibits on exposure of SMND's Facebook fan page. Implications are also subsequently discussed.

Keywords: social media, content strategies, national defense affairs, priming effects, agenda setting effects

* Email: uiucfuwencheng@gmail.com
Received: 2014.12.01
Accepted: 2015.04.27

JCRP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7 傅文成.indd 197 2016/1/12 下午 10:53:40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7 傅文成.indd 198 2016/1/12 下午 10:53:40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6 卷 第 1 期．頁 199-227．2016 年 1 月
DOI: 10.6123/JCRP.2016.008

更民主的科學溝通：科學類博物館實踐公眾參與科學之角色初探 *

江淑琳 **
中國文化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張瑜倩
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試圖從傳播研究（communication studies）、科學與科技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以及博物館研究（museum research）等領域出發，從跨領域研究取徑思考科學類博物館在公眾參與科學（public engagement of science）時，可以扮演的公共性角色以及可以提供的溝通模式。本文以國外科學類博物館正在進行中的與奈米科學、科技相關活動，以及「公民科學聯盟」為例，希冀透過此一跨領域之理解與實踐，突顯過去在 STS、傳播，以及博物館研究文獻中，相對被忽略的科學類博物館在科學傳播中可以扮演之重要角色。

關鍵詞：傳播研究、科學類博物館、科學與科技研究、公眾理解科學、公眾參與科學

* 作者感謝兩位匿名評審的寶貴建議，以及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溫肇東教授對於論文初稿之意見回饋。最後感謝接受本論文訪談的三位博物館專業工作者。
** Email: cshulin@googlemail.com
投稿日期：2014 年 12 月 4 日
接受日期：2015 年 3 月 15 日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壹、前言

本文源自於批判性地思考科學與公眾之關係，體認到公眾參與科學（public engagement of science, PES）有助於揭開科學與科學治理（governance）的面紗，制定民主的科學政策 (Stilgoe, Lock, & Wilsdon, 2014)；同時受到傳播研究、科學與科技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以及博物館學研究領域轉向互動、參與、公共性之啟發，試圖結合此 3 個領域的相關討論，透過文獻探討以歸納科學類博物館的科學傳播角色，並透過個案之深度訪談與次級文獻，借鏡國外科學類博物館的最新發展，建議未來臺灣的科學類博物館促進公眾參與科學的可能實踐方式。

首先，在傳播研究領域上，當媒體不斷被賦予提供科學資訊、扮演科學傳播的重要角色時，傳播研究對於科學類博物館[1]扮演科學專家與公眾溝通橋樑的「公共性」（publicity）角色著墨甚少；其次，在 STS 領域上，科學與科技研究在論及公眾參與科學時，也偏重媒體的角色，普遍忽略科學類博物館作為公眾參與科學的可能角色；第三，在博物館領域上，博物館研究近年來重返「公共性」的討論，希冀找回博物館作為公民集會討論、在觀看的同時並提供對話的實踐空間（dialogic practices of seeing），以呈現多元看法 (Bennett, 2007)。

近年來，博物館轉為以公眾為主（public-centered）做為營運目標，而傳播／溝通（communication）雖被列為博物館的功能之一，不過，對於公眾的討論對象仍多側重於文化或藝術博物館及相關治理與文化政策，本文認為，科學類博物館扮演公眾參與科學的角色與功能也值得討論，原因如後。

先從科學生產者的傳播向度觀之，黃俊儒、簡妙如（2010）將之區分為科學內部的傳播以及科學外部的傳播，科學內部的傳播對象主要是科學家社群，科學外部的傳播對象主要則是非科學社群／公眾，採用的方式包括科學社群對外部的直接傳播、科學社群透過媒體中介的對外傳播。過去文獻所探討的對象聚焦在大眾傳播媒介，若採取廣泛的媒介定義，將媒介視為一個訊息中介的角色，超越狹義的大眾傳播媒體之定義，科學類博物館在此定義下即可被視為一種媒介，也扮演溝通科學與公眾的中介角色，值得關注與研究。

繼從 STS 與博物館研究的角度觀之，科學類博物館作為一種中介的媒體

1 美國博物館協會（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將博物館分成下列幾種類型：藝術、歷史、一般、歷史遺跡、自然科學／人類學、特別類型（如：鐵路、音樂等）、科學／科技類（含天文館）、植物園、兒童館、動物園、自然中心、水族館 (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2014)。本文「科學類博物館」在此泛指科學博物館、科技工藝博物館。

(Hopper-Greenhill, 1999a, 1999b)，同時也是展示科學與科技知識的場所，在促進公眾參與科學與科技上，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科學類博物館在將科學與科技的知識透過靜態的展示或動態的互動傳遞給閱聽眾的同時，也在建構科學與科技的知識體系；另一方面，科學類博物館提供觀展者具備相關科學素養，有助於觀展者在面對科學與科技相關的風險或災難事件時，能夠判斷或評論專家所提出的知識，參與科學與科技政策制定，讓科學與科技政策的制定過程，可以更朝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方向發展。科學類博物館的角色因而不容小覷，也不應該被遺忘於主流科學傳播之外。

有鑑於認知到上述 3 個不同領域的研究或實踐，在促進公眾參與科學的討論上，應可有更多的互補空間及整合性，本文因而試圖從傳播研究、科學與科技研究以及博物館研究等 3 個領域出發，採取跨領域研究取徑，以促進民主社會中的公眾參與科學與科技為主要關懷，在既有國內外文獻基礎與博物館實證經驗上，突顯科學類博物館能否／如何扮演此一重要角色。

本文寫作架構如下：除第壹部分前言外，第貳部分討論在 STS 文獻中，公眾與科學之關係的兩個主要取徑的傳播意涵：公眾理解科學以及公眾參與科學；第參部分討論博物館角色的轉變，從線性到互動的傳播方式，乃至扮演公眾參與科學科技的重要角色；第肆部分從文獻以及研究者親身經驗與訪談資料，提供國外實例說明科學類博物館如何提供扮演公眾參與科學的角色，並訪談臺灣科學類博物館從事科學教育及策展的工作人員，瞭解臺灣狀況，與國外經驗對話；第伍部分總結本文並提出建議。

貳、科學與公眾的關係

STS 領域開始討論並發展科學與公眾的關係之相關研究，為時不遠，迄今累積 20 餘年 (Burgess, 2014; Stilgoe et al., 2014)。這 20 年間，科學與公眾的關係持續轉變中，由認為公眾需要被教育以信任科學與科學政策的制定，轉向承認公眾擁有重要的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公眾有足夠的能力理解科學資訊以參與政策制定 (Burgess, 2014)。本節提供此轉變過程，以公眾理解科學（缺陷模式）與公眾參與科學（對話模式）簡要說明兩種取徑的內涵。

一、公眾理解科學：缺陷模式

「公眾理解科學」（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PUS）模式背後的假設立

基在「缺陷模式」（deficit model）上，認為一般公眾或相對於科學專家的常民缺乏科學知識，需要透過教育及科學傳播等方式將科學知識傳遞並教導給一般公眾，也有學者稱之為「普及模式」（popularization model）(Väliverronen, 1993)，認為社會中存在一群沒有意願理解科學的公眾，這些公眾的科學素養不足，必須透過由上而下的科學傳播方式來普及科學知識，使這群公眾被說服，以接受某項已經被科學專家認定為有益的科技或科技發展 (Jones, 2014)。

在「公眾理解科學」的脈絡下，科學家被認為比社會科學家或一般公眾擁有科學知識，科學家是科學與科技知識的產製者，具有專業權威，所以自然也有絕對的權力決定科學與科技政策。然而，這樣的政策制定並不民主，傳播被定義為資訊傳遞的過程 (Nisbet & Scheufele, 2009)，科學傳播為單向式（one-way communication），專家知識（expertise）具有崇敬的地位，科學或科技爭議並不存在，一切由專家與專家知識主導並決定，最終遵循科技發展與經濟發展制定優先性。

社會科學學者認為「公眾理解科學」的模式忽視了科學與科技知識產製的文化意義 (McCallie et al., 2009)，因此，科學與社會科學學門之間的關係因而緊張，科學家對社會學者抱有敵意，認為社會學者漠視自然科學又喜歡挑戰自然科學，社會學者則反駁科學家錯誤地以為公眾具有「同質性」（homogeneous）(Irwin, 2014)，忽略公眾具有獨特性及異質性，以及公眾也具有常民知識及不同的科學意識形態。

近年來，科學專家、政策制定者、社會科學學者以及公眾參與科學的執行者都體認到「缺陷模式」或「普及模式」下的科學與公眾關係之不足，轉而提倡從「缺陷到對話」（deficit to dialogue）(Stilgoe et al., 2014: 5) 的科學與公眾之關係，強調公眾參與科學應該從狹隘的實驗層次轉向更大的政治脈絡，公眾參與科學的正當性不僅在於理解科學的發展過程與相關風險，也包括影響最終的政策治理。

二、公眾參與科學：互相學習與對話模式

由上述可知，「公眾理解科學」受到不少批評，1990 年代開始、過去 20 年間，具有民主精神的「公眾參與科學」運動在英國與歐洲國家展開 (Irwin, 2014)，成為 21 世紀科學科技政策制定的必要條件之一 (Chittenden, 2011)。「公眾參與科學」的優點與達成的共識包括：公共參與有助於制訂有效的科學政策；有必要發展更多成功及容易近用的公眾參與機會，以達到更大功效；透過公共參與，以觸及更多元、更廣泛的公眾（同上引）。

根據美國「非正式科學教育發展中心」（Center for Advancement of Informal Science Education, CAISE）(McCallie et al., 2009) 的報告指出，「公眾參與科學」的定義因學門而異，為方便與前文中的「公眾理解科學」對話，本文採用 STS 領域的理解。在 STS 的脈絡中，「公眾參與科學」的「公眾」，英文中的概念意涵是複數的 “publics”，非僅是單數的 “public”（公眾）或 “general public”（一般大眾）（同上引：11），而是包括科學家、常民以及政策制定者等各種類型的公眾，這些不同類型的公眾，具有參與科學與科技的興趣及動機，互相學習（mutual learning）（同上引：23），共同建構科學與科技知識，達成共同制定科學與科技政策的目標。

因而，在「公眾參與科學」的模式中，專家與常民的權力關係對等。在公眾參與科學的計畫中，科學專家與常民公眾是互相學習且對等的關係，這種互相學習的模式假定常民具有常民知識（lay knowledge），與科學社群同樣具備重要的知識與觀點，可貢獻於科學與科技的發展，扮演公民科學家（citizen scientist）的角色，並關心科學與科技以甚麼樣的方式、如何在社會中被應用，理想狀況為每位參與者被公平對待、有平衡的權力關係 (Chittenden, 2011)。以美國最具有代表性的博物館群史密森尼（Smithsonian Institution）為例，其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 project），藉由公眾參與科學，讓公眾也成為研究人員，公眾透過參與除了可以學習相關科學與科技知識之外，更可以對科學與科技知識有所貢獻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2014)。

在對等的關係中，傳播者也不再侷限於有科學專業知識的科學家或專家，常民也是傳播者，科學專家與常民雙方都具備傳播者與接收者的身分及角色，科學專家、政策制定者以及公眾等更多元的參與者進入此傳播過程中。社會政經文化脈絡不只是科學與科技發展時，靜態的背景因素，也成為理解影響科學與科技發展的權力要素。

誠如 Stilgoe et al. (2014) 在期刊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14 年專題論文的大哉問：「我們為什麼要提倡公眾參與科學？」，這 3 位學者認為，如果我們可以回答為什麼，才可以接著問，該怎麼做。文中提供的解答簡潔有力，提倡公眾參與科學是為了揭開科學與科學治理（governance）的面紗，制定民主的科學政策。

那麼，該如何實踐？另一位學者 Jones (2014) 先以英國過去 15 年以來，提倡公眾參與科學的發展實踐為例，所謂的「參與」（engagement），是將制定科學或科技政策的權力真正由下而上（upstream）交給各個領域的多元社會團體，

包括科學或科技發展的最終使用者、可能獲利者，認真看待這些團體的想法，使其能夠參與整個科學或科技的發展過程，在科學或科技已經發展固定（locked）之前即參與，解決在科學、科技發展的過程中選擇優先順序時，過度傾向以科技發展、經濟發展為中心的思考，而能帶入更以公眾為中心、社會為中心的思考模式。至於公眾參與科學要發展到何等樣的境界，Jones (2014) 認為，提供各種科技發展的想像、或是在既有的選項中做出選擇都不夠，應該要發展社會可欲的科學與科技，尤其像是目前爭議性較高的奈米科學科技與環境議題。

參、科學類博物館作為科學與公眾的中介角色

公眾參與科學的另外一項特色，是透過非正式科學教育組織來達成，包括科學中心、科學咖啡館、科學類博物館、平面與電子媒體之大眾傳播工具，近年來還涵括網際網路所提供的線上學習與互動 (McCallie et al., 2009)。其中，科學類博物館近來逐漸受到重視，然科學類博物館在公眾參與科學上所扮演的角色，在傳播研究、STS 以及博物館研究這 3 個學術領域，尚有持續累積相關文獻的空間。

因應社會發展的變遷，博物館的角色隨之轉變，轉變的趨勢及內涵，與上述 STS 討論科學與公眾的關係，在時間上頗為相近。1980 年代以前，博物館的角色以展示物件為導向（object-oriented），其存在的目的在徵集和保存物件；1980 年代開始以公眾教育為主（education-focused），與我們上一節提到 STS 領域所談論的「公眾理解科學」概念相近；一直到 21 世紀初，博物館開始轉型為以公眾為中心（public-centered），強調觀眾與展覽之間的互動、參與和公共性，STS 領域亦開始談及「公共參與科學」(Chang, 2011; Knell, 2007)。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的「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ICOM）於 2007 年大會中提出新時代博物館的功能有：徵集、研究、保存、展示、教育、溝通以及休閒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2007)。其中，「溝通」與「休閒」被認定為新的博物館功能，在新時代來臨時，博物館應該要與公眾溝通，不再是以前單向傳遞資訊的角色；除此之外，以往被認為呆板無趣的博物館，也可成為公眾休閒時的好去處。

「展覽」被視為博物館最重要的產品／服務之一 (McLean, 1997)，科學類博物館通常被視為推廣某一特定科學知識的場所 (Butler, 1992)。學者 Macdonald (2002) 表示，對科學類博物館而言，展覽本身即是傳播媒介，博物館利用展覽讓更多不同類型的觀眾瞭解科學內容。此外，亦有博物館教育學者強調，科學類博

物館本身即是吸取知識以及建構科學知識的媒介，其特色在於利用互動式設計，讓觀眾進行詮釋，並連結觀眾的日常生活，進而產生科學知識 (Hooper-Greenhill, 1999a, 1999b)。由此觀點視之，科學類博物館可視為傳播科學的媒介，透過展示，將科學知識傳達給觀眾，觀眾詮釋之後，再將其想法反饋給博物館，形成一種雙向的溝通（two-way communication）。

有趣的是，博物館與其他媒體最大的差別，源於博物館閱聽眾的多元背景，成人及兒童因不同目的至博物館參觀，其存在目的也是讓多元的觀眾能夠參與、創造使其能夠更易於接近博物館的環境、開放各種參與博物館經驗的機會；尤其近年來，博物館更被視為能夠回應各種與多樣性、正當性以及社會正義相關議題的機構 (Nightingale & Sandell, 2012)，因而科學類博物館無論在促進公眾參與科學、或提供建構知識的空間上，都有其重要性。除此之外，科學的工具和方法隨著時代不斷變遷，發展快速，公眾也開始能夠透過不同管道取得科學知識，但是公眾對於科學與科技的理解仍停留在傳統的思維，被動地接受科學專家所提供的既定知識。因此，如何運用創新方式與公眾溝通並建構科學，是十分重要的公眾參與課題。

以下分別簡述科學類博物館的傳播角色之轉變過程，不過這樣的分類不具互斥性（exclusiveness），科學類博物館可同時提供非正式科學教育以及促進公眾參與科學的功能 (McCallie et al., 2009)。

一、博物館扮演從單向傳播到互動式傳播的角色

博物館一詞來自拉丁語，意指學習的空間，我們通常想像為一個包含各種展品的大型建築物，策展人提供展品給參觀者。然而在過去，並非人人均可成為觀展者。17 世紀時，博物館是科學家內部展示科學過程與成果的空間，被視為「知識殿堂」，或是單純展示作品的長廊，抑或是保留給具有智識的學者的空間。傳播者與接收者在這個階段多半是科學社群內部成員或學者專家，階級與性別被用來區分可參觀者與非參觀者的身分 (Bennett, 2007)。這時的博物館，被視為「象牙塔」，唯有菁英方能進入使用。

之後，基於啟蒙時代的理性要求，國家希望透過科學與科技的展示，讓公眾擁有理性的科學觀，因此科學類博物館發展出兩種主要功能：保存與教育，為了教育而展示值得被保存的東西。科學類博物館提供教育功能的初期，以展示性的單向傳播為主，之後漸漸轉向與參觀者互動，讓觀展者（尤其是兒童）藉由動手操作、探索與實驗，徜徉在可供其自由探索的空間（張美珍，2009），公眾在沒

有壓力下擁有非正式學習經驗 (Xanthoudaki, 2013)，尤其在與整體社會息息相關的主題 (Chun, 2014) 上，從觀展中得到啟發。Falk & Dierking (2000) 解釋，博物館是一個提供「自由選擇學習」（free-choice learning）的機構，觀眾自行選擇欲學習的東西，進而形塑出其特殊博物館經驗 （museum experience），這種經驗尤其以強調「動手做」（hands-on）的科學類博物館最為明顯。而科學類博物館經驗更可被視為是一種「經驗教育」（experiential education），讓觀眾透過參與展覽，產生在問題解決過程中未曾出現的解決方案，「公眾參與科學」計畫被認為是可能達到經驗教育的方式 (Brossard, Lewenstein, & Bonney, 2005)。

科學類博物館所提供的「經驗教育」主要來自「經驗理論」（experiential theory），與過去傳統式的課堂教育不同。「經驗教育」以學習者為中心，讓學習者在實際的脈絡中，透過自身參與的經驗，找出各種解決問題的方法，並充分理解各種方法所可能造成的結果後，整合出最佳的解決方式，進一步試著將該解決方式概推到更大範圍的脈絡中 (Brossard et al., 2005; Tuss, 1996)。

儘管參觀者能夠與展品互動，接收者也擴展到非專家或社群之外，博物館的科學傳播功能在這個階段仍著重於普及科學與科技知識，透過劇場、多媒體以及虛擬實境等方式進行互動傳播，目的是希望公眾從互動當中學習到科學與科技知識，提高公眾的科學與科技素養（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teracy），以打造一個具有科學識讀能力的公民社會。在這種脈絡下，有研究者認為（例如 Heath & vom Lehn, 2008），博物館的互動性展示，某種程度上僵化了互動的模式，偏好以電腦為中介的使用者，反而侷限了觀展者的參與經驗。

博物館在此階段雖然落實了空間上的「公共性」（publicity），將展示品從過去君王私人蒐藏轉變為眾人都可觀賞、進而互動，但博物館展示的背後仍是由一個「具有知識的主體」（knowledgeable subject）來決定展示與互動的方式，觀展者的「觀看」以及與展品的「互動」，雖然不再與展品完全疏離，然而，策展人或科學社群依然決定了觀展者的觀看角度，一種對展品或藝術品展示的「專制」模式（Barrett, 2012 ／邱家宜譯，2012）；策展者與觀看者之間是一種階級化的關係，這樣的階級化關係同時具有社會的與知識論上的影響，策展人與參觀者被置放在線性的兩端，策展人是訓練有素的專家，為沒有受過訓練的參觀者提供觀看的秩序 (Bennett, 2007)。這樣的互動方式，我們認為還是處於公眾理解科學的層次，距離下一節我們將論及的理想之公眾參與科學，仍有相當發展空間。

二、博物館作為參與式溝通的中介

「後博物館」（post-museum）概念指陳博物館已經從文化物品的陳列室，轉變為以經驗為基礎的知識取得及生產過程 (Watermeyer, 2012)，意即博物館創造了一個流動的空間、公共的領域，讓觀展者「參與」（engagement）並融入在科學與科技中。觀展者從被動的資訊接收者，轉為在科學知識延續過程中的編輯者、轉譯者與創新者。本文認為，這是除了「空間的公共性」之外，博物館具有的另一種公共性，即「參與的公共性」。

然而，從「後博物館」的概念觀之，上一小節論及之博物館所扮演的公眾參與科學角色，在兩個面向上缺乏了「參與的公共性」精神，亦即民主精神以及公眾參與科學的精神。首先，科學或科技成品的展示，忽略了科學或科技成品是知識權力關係建構下的產物，因此，科學類博物館「除了『啟蒙』與『普及』之外，也許可以嘗試呈現科技與社會的動態關係」（陳恒安，2010：84。雙引號為原作者所加），也就是說，博物館除了展示科學知識的發展之外，也應同時展示科學家認識科學知識的演化過程。其次，僅是藉展示成品傳播科學與科技知識或教育非科學家的一般公眾，也無法實踐公眾參與產製中的科學或科技發展之民主精神。有鑑於此，科學類博物館或許可以提供以議題為導向的展示（issue-oriented exhibits），而非以成品為導向的展示，以作為科學專家與常民溝通的交會場所（meeting ground）(Bell, 2008)。

上述兩點考量尚無法作為科學類博物館促進公眾參與科學之充分條件，但有助於本文進一步思考科學類博物館的可能發展方向。本文基於上述兩點考量，接著就應然面思考科學類博物館在理想上還可以如何進一步扮演公眾參與科學的角色。

（一）提供公眾科學與科技發展的脈絡

Barrett（2012／邱家宜譯，2012）在論及博物館的公共性、以及其作為公共空間的討論時曾反思，博物館究竟該扮演權威性角色，解決相關的爭議與衝突，抑或僅成為容納各種異質辯論的空間即可。本文認為就博物館的公共性角色言之，除了提供公眾參與科學科技的空間之外，也應同時提供某項科學科技的知識產製過程與社會脈絡，以及其對社會的貢獻與可能帶來之風險。因此，在本文中，我們暫且將前者定義為空間上的公共性，後者在本文中則定義為參與上的公共性。本文並接著論述科學類博物館提供參與上的公共性之內涵與方式。

STS 質疑科技決定論，認為科技的發展與社會政治經濟等脈絡息息相關，科

學或科技物本身具有政治性，科學知識是權力角力下的結果，例如某種症狀在某個時代被視為疾病，在其他時代可能並不如此，由此可知定義科學知識便是一種權力的展現。科學類博物館被視為說故事的記憶空間（Barrett, 2012／邱家宜譯，2012），博物館在展示某個科學知識的演進或科技物的發展時，如能同時提供科學專家對於科學知識的認知演化過程，融合當時的社會脈絡，讓觀展者除了接受科學新知之外，也能理解科學知識作為一種知識的權力本質，有助於提供觀展公眾對科學與科技的批判理解能力，這是結合 STS 與博物館研究的公眾參與方向之一。

就公眾的科學素養言之，科學類博物館定義公眾參與科學傳播的模式，較接近國際科學教育協會（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Education Association, ITEA）與國家工程師學會（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NAE）的談法。ITEA 指出，「一位具有科學素養的人，可以理解科技隨著時間發展而越來越複雜的特性，並理解科技是什麼，科技如何被創造，科技如何形塑社會，以及反過來如何被社會型塑」(Bell, 2008: 387)。NAE 定義科技素養為「理解自然與科技史，對於科技有相關的基本使用能力，並且對於科技發展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同上引）。ITEA 與 NAE 對科技素養的看法，跳脫一般公眾僅具備科學相關知識的框架，期待公眾能夠與更大的歷史、社會脈絡結合，批判性地思考科學與科技的社會建構過程。

誠如 Bell (2008) 認為，上述 2 種定義都同時指向好的科技教育應該包括讓公眾理解科技如何形塑社會，以及被社會所形塑，並且也應該包括強化我們批判性思考科技發展的能力。他進一步指出，雖然這種看法對科學與科技教育而言相對新穎，然科學類博物館確實有義務提供公眾注意科學研究發展與科技創新所帶來的倫理與權力議題。

這在現今的風險社會最為明顯，在公眾參與科學的傳播模式下，科學類博物館主要的角色之一是提供足夠的背景知識給公眾，最終希望在有足夠背景下，公眾能夠參與保育自然環境的相關政策制定 (Bisanti, 2012)。例如過去展示核能相關科學科技知識與展品時，只展示給參觀的公眾使用核能的優點，然隨著國際間陸續出現的核安問題，公眾對於核能會對社會帶來何種正負面影響，求知若渴，公眾不再是被動地觀看展示品，或僅是透過互動方式得到更多知識，公眾還希望透過博物館可以理解科學或科技發展的背景脈絡，並進一步在政治領域參與相關的政策制定。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8 江淑琳.indd 208 2016/1/13 下午 01:19:55

（二）提供公眾參與產製中的科學與科技

除了上述的角度外，本文提出另外一種公眾參與科學角度，進一步打破科學家與公眾之間的專家／常民之界限劃分，讓科學為公眾所需，讓科學理解公眾。

科學類博物館的功能在扮演科學專家（scientific expert）與常民（lay person）之間的中介者，提供各種知識平臺（platform），透過展示及空間，與公眾對話，回應公眾對科學與科技的疑慮。科學類博物館作為科學專家與常民的溝通中介，在科學科技發展初期就收集公眾意見，形成一種民主式、上游式參與（upstream engagement）(Kurath & Gisler, 2009)，一種提供專家與常民更多機會交流與相互學習的傳播取徑，最終讓公眾有能力參與科學科技政策的制定。

換句話說，過去博物館所展示的是已經發展完成的科學或科技（already-made science or technology），但是在公眾理解科學之下，或是從公眾理解科學到科學理解公眾（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public）的過程，科學類博物館不僅展示已經完成的科學或科技，並進一步展示發展中的科學圖像（the picture of science in the making），讓常民參與科學與科技的發展過程，科學專家與政策制定者可以在科學與科技還在發展的階段，就理解公眾的想法。這樣的做法有利於科學家與公眾對話 (Dijkstra & Critchley, 2014)，達到公眾參與科學及科技的理想 (Laurent, 2012)。此時，科學類博物館提供公眾「參與的公共性」之角色得以進一步展現，藉由扮演專家與常民的中介角色，再現進行中的科學（science in the making）以及相關爭議 (Laurent, 2012; Meyer, 2009)，促進「公眾理解研究」（public understanding of research）。

因而，這個時期的科學類博物館從展示科學與科技知識、以教育為目的單向互動傳播模式，轉向到以公眾參與科學科技的雙向互動參與模式。科學類博物館的角色不僅在於傳遞科學與科技知識，或是教育公眾科學與科技知識，而是透過展示功能，讓公眾多元理解科學科技與社會如何相互形塑並相互影響，提供專家與常民一個「中立」（natural）的會面與對話點（meeting point）。

此一傳播方式有助於減少科學專家與非科學家之間對科學與科技的認知差距。科學專家從實驗室得到知識，但不一定適用於實驗室以外的社會空間；常民雖然不具有專家知識，但常民從日常生活經驗累積豐富的常民知識（lay knowledge）或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或許比專家經過長期正規教育與實驗室研究所得到的知識更適用於生活世界。

科學專家與非科學家之間的認知差距還來自對科學「不確定性」（uncertainty）的認知。不確定性是科學的特色，對科學家社群而言是常態，科

學家在相信有所謂的「最終真實」下，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檢驗得到最接近「真實」的結果；但一般公眾需要的是借助科學的研究分析結果為日常生活下決定。例如，公眾觀看氣象預報的目的不在於獲得氣象預報所需的相關科學專業知識，而是希望透過氣象預報決定隔天的生活內容，科學的「確定性」（certainty）才是常民所需。因而，科學的不確定性特色使得專家與常民之間的認知差距加大，科學類博物館即可以透過展示與對話等方式，讓科學專家理解公眾在生活實踐上所需要的科學知識，盡量滿足公眾對於科學確定性的需求，提供常民可以接受的科學詮釋與論述。

Kurath & Gisler (2009) 有系統地論及美國及歐洲各國科學傳播中的歷史變化，我們在此基礎上，加入傳播模式與博物館角色，整理出不同層次的科學、公眾與傳播的關係，以及科學類博物館所扮演的角色（如表 1）。

在 Kurath & Gisler (2009) 的劃分中，第一階段為二次戰後，博物館所扮演的角色是傳統的訊息提供者，公眾在這個階段可以藉由博物館展示的單向傳播來想像科學的樣貌；第二階段為 1970 年代，博物館扮演教育公眾的角色，藉由博物館提供的教育內容，讓公眾理解科學的內涵與功用，博物館在這個階段除靜態地提供科學教育，進行單向傳播，也可以動態地舉辦活動讓公眾參加，與公眾進行互動，例如：參觀者可透過遊戲學習或提出對於科學的詮釋，並將其想法回饋給博物館；第三階段為 1990 年代晚期至今，博物館扮演提供科學家與公眾對話的中介者角色，促進公眾參與科學，亦即希望參觀者在理解科學、與科學家互動對話之後，再加上原有的每日生活實踐的經驗知識，進而可以參與制定科學政策。

公眾參與科學發展至今不過二、三十年，仍在持續嘗試各種可能 (Stilgoe, Lock et al., 2014)，下一節所提供的國外科學博物館之發展經驗，或可試著作為目

時間	科學與公眾關係	傳播模式	博物館角色
二次戰後	公眾「想像」科學：增進公眾對科學的想像，促使公眾支持國家科學科技發展。	單向傳播	博物館作為提供訊息的角色。主要的決策者為策展人或研究人員。
1970 年代	公眾「理解」科學：教育常民，提供常民相關科學知識。	單向傳播 互動傳播	博物館是一社會教育的場所。主要的決策者為博物館教育人員。
1990 年代晚期至今	公眾「參與」科學：專家與常民對話。	參與式溝通	博物館作為提供對話的平臺。由公眾與專家共同建構科學知識。

表 1：科學、公眾參與科學類博物館的關係轉變

資料來源：除「科學與公眾關係」一欄整理自 Kurath & Gisler (2009) 外，其餘為本研究自行整理。

前國際間公眾參與科學之個案，亦即本文在表一所提到的第三階段之初步實踐。本文仍要強調，公眾參與科學是一個持續發展的議題，這兩類個案尚未是最終的理想典型。

肆、公眾參與科學的實踐：科學類博物館的個案經驗

繼上述從應然面論述科學類博物館是否／如何促進公眾參與科學之後，本節結合文獻與研究者親身經驗及訪談，繼續從實然面提供個案，理解國外科學類博物館如何扮演公眾參與科學的角色。

就公眾參與科學的理想而言，前文已將其分為更細緻的幾個階段。從一開始參觀者與科學家、解說員，以及科學與科技展品互動，接下來參觀者可以進一步提出問題、與專家對話（dialogue），最終則是希望參觀者在理解科學、與科學家互動對話之後，再加上原有的每日生活的經驗知識，進而可以參與政策制定。

就公眾參與科學的理論而言，Bennett (2005) 曾借用 STS 學者 Latour 等人的論述，提出「市民實驗場」（civic laboratories）的概念，將博物館類比為實驗室，說明博物館的空間與展示本就具有社會建構的角色與功能，因而博物館不但要顧及一般公眾多元的觀看視角（civic seeing），公眾也應該有權利共同創造並建構作為展示與互動空間的博物館 (Bennett, 2007)。

近年來，「參與」（engagement） 是博物館學一項重要的議題，許多研究皆強調博物館應該轉型成讓公眾參與的機構，與展品、科技互動之外，還包括參與博物館的活動或節目 (Anderson, 2012)。亦有學者表示，博物館必須要加強觀眾參與的深度及強度，不能只提供策展人的聲音及想法，應該朝向與觀眾成為共同策劃人（co-producer）的方向前進 (Spence, Wareham, Bressey, Bam-Hutchison, & Day, 2013; Rentschler & Hede, 2007)。

就科學類博物館扮演公眾參與科學的實踐而言，歐美若干博物館正試著邁向讓科學專家與公眾進行對話的階段，實際作法包括將進行中的科學實驗室搬到博物館，讓科學家與參觀的公眾直接進行互動並對話。歐盟政府推動的「奈米對話」計畫（nanodialogue project）即為一例，此計畫讓公眾在科學與科技的發展階段就能參與。抑或如美國與英國聯合設立的「公民科學聯盟」（Citizen Science Alliance, CSA），邀請各領域的專家或公眾提供照片資料並加入資料分析，藉此達到公眾主動參與科學建構的目標。

本節即以這兩類發展中的科學類博物館運作模式做為博物館扮演公眾參與

科學的經驗個案。除此之外，本研究也訪談了臺灣科學類博物館從事科學教育及策展的從業人員，瞭解臺灣在此議題的發展現況與問題，希望透過與國外經驗對話，提供國內科學類博物館未來在公眾參與科學上的建議。

一、奈米科學：將實驗室搬到博物館

奈米科學與科技是新興科技，被認為對社會具有重要影響，1990 年代後期，美國與歐洲爭相發展奈米科技與科學，但各國學者與政策制定者也同時擔心奈米可能對健康與環境帶來非預期中的負面影響 (Dijkstra & Critchley, 2014)，因而奈米科技與奈米科學的公眾參與成為目前討論較多的案例。不少學者（例如 Bell, 2008; Laurent, 2012）以奈米科技與科學為例，說明科學類博物館如何扮演公眾理解科學與科技的角色，作為進展到未來公眾參與科學科技政策制定的橋樑。

Laurent (2012) 指出，歐盟政府在推動奈米科技的同時，成立了「奈米對話」計畫，目的在於進一步制定歐洲的奈米科技政策，將公眾的需求與擔憂納入政策中，聽取公眾對於奈米科技的傳播建議，該計畫所收集的公眾意見最後發展成歐盟的官方文件，在 2010 年 3 月的布魯塞爾會議中，定名為《溝通奈米科技》（*Communicating Nanotechnology*）。在《溝通奈米科技》中，明確定義科學類博物館需要從「公眾理解科學」轉移到「科學理解公眾」（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public）上（同上引：3），意即不只是公眾理解奈米科學或科技的相關知識與用途，奈米政策的制訂也要理解民眾對該項科技的真實想法，以及提倡以事實為基礎的公眾對話。簡言之，即是民眾可以提供對於奈米科學或科技的建議與反饋。

為避免窄化公眾參與科學的意涵，本文要釐清的是，「公眾參與科學」的概念意涵較「科學理解公眾」為廣，兩者並不等同，前者涵蓋了後者，後者僅是實現前者的要素之一。除此之外，與傳統、線性的科學傳播相較，「科學理解公眾」的概念特色在於，其翻轉了傳統線性科學傳播期待公眾理解科學與科技的內涵，轉而期待科學與科技的發展也能夠主動理解公眾所需，強調科學科技與公眾的互動性。尤其像奈米科學與新興科技在發展過程中時常會遇到某些潛在問題，需要政策出面以確保完整發展 (Laurent, 2012)，如能以「科學理解公眾」為認知前提，瞭解公眾對奈米科學科技發展的需求與疑慮，讓公眾得以與科學家、政策制定者對話，並進一步提供公眾參與科學科技發展與政策制定的機會，才能達到公眾參與科學的最終目標。

由歐盟所贊助成立的歐洲「觸摸奈米計畫」（Project NanoToTouch）嘗試以創新的科學溝通方法，實際將奈米實驗室搬到博物館，公眾可以透過玻璃牆看

到奈米科學家每天在實驗室的實作情況，名為「開放式的奈米實驗室」（Open Nano Lab）。博物館觀眾可以直接請教科學家任何問題並與之對話，包括對奈米科技所衍生出來的產品之疑慮、奈米科技的生產過程。在這樣的計畫架構下，博物館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吸引更多公眾參與科學科技發展過程，促進科學家與常民之間的科學對話，培養年輕科學家懂得如何與常民溝通，並瞭解觀眾對於此科學的理解程度，以提供可讓觀眾理解的詮釋方式並與之溝通，最終讓常民參與相關公共政策的制定 (NanoToTouch, n.d.)。

再以美國為例，「奈米尺度非正式科學教育網絡」（Nanoscale Informal Science Education network，簡稱 NISE network）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贊助，結合美國國內各博物館、研究人員與非正式的科學教育者所組成，目的在激發公眾覺醒、公眾參與並理解奈米科學、奈米工程與奈米科技。其中「奈米日」（NanoDays）主要是一個有關奈米科學的全國性教育計劃活動，由 NISE 參與者及美國國內 250 個博物館、研究中心以及大學院校舉辦 (NISE network, n.d.)。

在實際運作上，NISE 網絡透過 7 個地方中心協助博物館教育者與科學家接觸，替教育界與科學界創造更多有助於公眾參與奈米科學的機會，包括小型展覽、奈米遊戲 app、自己動手玩活動、科學咖啡廳、上述「奈米日」活動以及劇場舞臺表演等，透過各種互動式的活動，與觀眾進行溝通。NISE 未來還規劃「與博物館對話」（museum conversation）活動，協助參觀者理解並思考更多有關奈米科學的內涵與發展，進一步協助國家政策形塑未來奈米科學的發展 (Chun, 2014)。

回到臺灣的經驗。臺灣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以下簡稱「科工館」），在 2014 年中受科技部委託，推出了「看不見的尺度：奈米展示專區」（此為第二期計畫）。然而，其展示設計仍停留在「公眾理解科學」層次，雖然科工館在展場也提供互動式的裝置與觀眾互動，但主要知識傳遞方式仍在提供常民相關科學知識，例如：透過互動裝置讓觀眾體驗奈米原理、展示奈米相關標章、風險（包括尚未證實的風險），並未如上述國外案例，讓公眾能夠參與奈米科技的發展過程、與科學家對話。

除此之外，科工館受科技部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委託，建置了「奈米新世界」網站，然而，其網站設計及提供之資訊，皆停留在單向傳播的階段，而未涵括公眾參與。為瞭解臺灣為何無法實踐如歐美所提供之公眾參與奈米科學科技發展之方式，本研究訪談了此特展相關人員後，歸納出下列幾項原因：

（一）中央政府對公眾參與科學的態度是主因。科工館的奈米展示之經費來自中

央政府，而政府在科學傳播領域的重點仍偏重科普教育，政府對於奈米科技的定位影響了博物館的科學傳播模式。

（二）奈米科技涵蓋的範圍廣泛，多數專家卻只專精在某個特定領域；然而，如先前所提及，博物館接觸的觀眾類型十分廣泛，若欲將某特定的實驗室搬至館內，讓科學家與公眾互動，可能陷入僅著重在某個特定領域，難以期待民眾透過此方式全方位理解並參與奈米科學與科技。

（三）科學知識專業艱深，科學家平時接觸的社群及人士多為專業人員，科學家對於公眾語言的掌握有其難度，即便將實驗室直接搬進博物館中，讓科學家直接與公眾溝通，可能會產生因科學家無法使用一般大眾語言，而難以有效傳遞並溝通科學知識。

由以上的原因得知，將實驗室搬到科學類博物館中，在臺灣存在困難之處，除了政府對於博物館的期待及定位外，科學家的態度及溝通能力也是重要條件，同時還必須仰賴政府更多的經費補助方能完成此種實驗性計畫。

二、大家一起做科學——公民科學聯盟

第二個個案目前所進行的計畫雖然不是公眾參與科學較為關心的爭議性科學或科技，也並非會影響科學政策制定的社會性科學，但該個案提供了最新、最廣泛的公眾參與科學方向，也展現了常民以公民科學家的角色，收集並提供天文等自然科學資料與科學專家互動、對話 (Silvertown, 2009)，可做為科學類博物館在提供科學家與公眾對話方式時的參考之一，有助於科學類博物館扮演促進公眾參與科學的重要角色。

此個案由本文作者親身專訪，佐以線上資料文獻分析以及受訪者演講內容而成。研究者於 2013 年 8 月至巴西里約熱內盧（Rio de Jenaro）參與 ICOM 每 3 年舉辦一次的年會，參與者多為博物館實務界專業人士，以及少部分博物館學學者。本文作者為 ICOM 之公關與行銷委員會（marketing and public relations, MPR）會員，2013 年的 MPR 年會與同為 ICOM 之科學及科技博物館委員會（Committe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s, CIMUSET）共同舉辦以「爭議、連結與創意」（controversy, connections and creativity）為主題的研討會。來自於英國國立海事博物館（National Maritime Museum）的皇家天文臺（Royal Observatory）之 Marek Kukula 博士進行了一場以「公眾參與科學」為題的主題演講。Kukula 博士身兼皇家天文臺之研究員與 CSA 其中計畫之一的催生者及規

劃者等多重身分，對於本研究討論科學類博物館如何促進公眾參與科學助益甚多，因而在主題演講之後，本文作者即就公眾參與科學議題與 Kukula 博士討論並進行訪談。本小節所使用的資料來自現場演講內容、研究者面對面深度訪談，以及 CSA 網站資料。

根據訪談與文獻資料指出，CSA 是一個由美國和英國 7 個組織共同成立的合作夥伴關係，由此 7 個組織的館長擔任董事會成員，成員包括：美國芝加哥阿德勒天文館（the Adler Planetarium）、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 Hopkins University)、美國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英國倫敦國立海事博物館（National Maritime Museum）、英國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英國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以及地理軟體公司 Vizzuality。其成立的目的在透過科學家、軟體開發人員和科學教育者共同開發、管理和使用以網路為主的公民科學計畫，以促進科學本身與公眾對於科學及科學發展過程的理解 (Citizen Science Alliance, n.d.)。Kukula 博士表示，目前 CSA 的運作模式以網路為主，意即透過線上博物館（online museum）而非實體博物館來運作。由於這個計畫同時結合博物館、網路、公眾參與三項特色，因而被博物館界認定是一項新興的「科學傳播運動」（science communication movement。受訪者所用詞彙）。

CSA 此一線上博物館所帶來的「科學傳播運動」之特色在於：不依附或受限於實體博物館的架構，透過網際網路實現博物館的功能，並可以根據特定主題搭配數位文物資料呈現文物的不同風貌。擺脫實體展覽空間的限制，線上博物館可以在幾無限制的網路空間中展現最大創意、建構全新的主軸與框架，並且吸引來自於世界各地的觀眾前來參與。博物館甚至可以善用現有文物數位資源，搭配數位技術與互動內容，貫串全新主題、拼湊出不同的博物館風貌。線上博物館具備克服時空限制的特性，同樣也實現了博物館場域的內括性（inclusiveness。受訪者所用詞彙）特質，在網路普及的時代實現文物資源共享的理想。Kukula 博士認為，線上博物館可以實現「博物館要能夠有效的傳遞資訊、建立有助知識流暢溝通的場域」的功能，並且走出實體空間的限制，更真切地為社會大眾打造能「幫助觀看者建構自身知識體系」的多元場域。

基於 CSA 的計畫特性，以及線上博物館不受時空限制的功能，CSA 的建置需要更多的構想創意與策展概念，各合作單位以大眾為對象，設計規劃讓公眾參與的活動。該項計畫特色與實踐方式也展現在博物館參與者的稱謂上，相對於傳統博物館內的研究人員被稱為策展人或研究員（curator or researcher），參與

CSA 計畫的博物館研究人員則被冠上「公共」字樣的職稱，例如：公共天文學家（public astronomer），由此來強調此項計畫的「公共性」，「公眾參與」則是這個計畫的核心。

實際運作上，CSA 結合參與其中 “Galaxy Zoo” 子計畫之研究人員的意見，整理出 CSA 計畫的發想概念為：科學的基礎在資料（data），然而宇宙天文的資料難以窮盡，再加上過於專業的資料難以親近一般公眾，因此發展出了讓公眾參與的方式。其實踐的方式有二，一為讓公眾參與收集資料，透過專業及業餘的天文攝影同好將照片上傳至網站；二為讓公眾參與分析資料。經由這兩種方式的公眾參與，結合公眾力量來減少科學知識在「認識上的不確定」（epistemic uncertainty）(Daipha, 2012)，意即透過越來越多的資料呈現，讓公眾與科學家擁有更豐富的知識，提高科學的可確定性。至今，“Galaxy Zoo” 子計畫已吸引 50 多萬名志願者上網分享照片，並進行上百萬次的資料分析，其中，更透過公眾參與提供資料、協助分析，間接促成許多天文學研究者發表學術論文，反過來讓一般大眾更加深對星系的瞭解。

“Galaxy Zoo” 子計畫被視為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公眾參與科學的計畫，目前已經進行第 2 期的計畫。其促進公眾參與科學的方式可歸納如表 2。

透過這個計畫，不但吸引了很少到博物館參觀的觀眾，也吸引了一群藝術愛好者，他們因為這個計畫瞭解到科學也可以像藝術一樣美，而這些原本不屬於博物館的參觀者，也因為參與了這個計畫，願意動身至博物館參觀，並且成為忠實觀眾。Kukula 博士演講時強調，透過科學類博物館促進公共參與科學時的態度是：「勇敢做正確的事、做不一樣的事，唯有如此，我們才能達到目標」。

博物館在此個案的參與方式中扮演的是溝通的中介角色，此傳播模式能夠減少科學家與非科學家對於科技認知的差距。透過公眾的參與，讓常民提供日常生活所累積的常民知識給科學家，讓科學知識更廣泛地適用於生活之外，也能夠透過公眾參與，更快速累積起學科知識，並提供研究者利用這些資料進行研究。

以 CSA 案例來看，其線上博物館已成為公眾參與的平臺，在此平臺上，公眾可以參與、觀賞、討論、進而運用網站上所收集到各項資料；CSA 有明確的參與對象，具備完善的管理機制，自成一個完整的展示脈絡。除了 CSA 之外，諸如英國倫敦自然史博館（Natural History Museum, NHM）的「市民科學計畫」（Citizen Science Project）也提供民眾在線上參與紀錄野生動植物、收集樣本、謄寫書面記錄，幫科學家揭開收藏品的潛在重要性，並收集重要資料，協助科學家更充分理解世界。該計畫網頁上直接告訴民眾，「不需要特殊技巧，也不需要

方式	詳細內容
1. 接觸學校	與傳統科學類博物館相同，其主要目標觀眾之一即為學校團體。接觸學校除了能讓 CSA 計畫的教育功能夠發揮外，也能讓學生瞭解科學的有趣，並體認真正的科學價值。與學校建立 CSA 夥伴關係是其成功之重要關鍵之一。
2. 建置具吸引力的網站吸引公眾注意	CSA 下的 “Solar StormWatch” 子計畫是以遊戲風格進行設計（game-style development）的網站，冀望透過有趣的設計直接與公眾進行互動並引起其參與的興趣。“Solar StormWatch” 更獲得了 2010 年最佳網站獎（Best of the Web Award）。
3. 增加媒體曝光	透過與報紙（英國衛報）的合作報導，讓 CSA 計畫的曝光度更高，並且提供美麗的照片吸引讀者目光。除此之外，也透過社群媒體（如：Flickr 即擁有超過萬以上的追蹤者）、部落格以及網站建立其社群，並透過社群中的討論增加公眾的興趣與注意。
4. 進行專題報導	與主題雜誌合作，訪問有名的攝影師，請其談論對於科學的態度和感覺，透過敘事及感官，讓公眾注意到科學之美。
5. 製造新鮮有話題性的議題	使用從公眾處收集到的科學資料，以教學或是批判性的方式討論爭議性的話題，利用公眾收集到的知識建構新的知識。
6. 以主題呈現科學	讓科學及科技的呈現能夠更多元化，讓一般大眾除了瞭解科學外，也能夠學習科學知識，讓科學以多重面貌呈現，如：科學與美學、科學與疑問、科學與連結、科學與人物、科學與熱情等。
7. 利用競賽達到參與	在 CSA 成功後，以票選方式選出最佳的攝影照片，並將這些照片透過策展方式在實體博物館展示。在博物館中策劃有趣的活動，如：在星空下冥想、科幻文選的閱讀、兒童科學步道等，並利用公關與行銷等手段，在各媒體曝光、在地鐵站張貼海報、手冊，並與藝術文化雜誌合作，達到宣傳效果。
8. 建立專業社群	這被視為是 CSA 計畫最重要的目的之一，除了能與原本的專業學術社群聯結外，更可以建立公眾與專家之間的溝通平臺。

表 2：Galaxy Zoo 促進公眾參與科學的方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受自然史博物館的任何訓練，用不著讓博物館來告訴你該做什麼，就請當作一項有趣、自由隨意的方式去享受大自然即可，同時也一起為世界盡微薄之力」[2]。

線上博物館提供公眾參與的方式相當多元，除上述 CSA 與 NHM 之外，另一類型的線上博物館類型，是在虛擬空間中展示實體博物館所珍藏的展品。例如 Google 於 2011 年宣布建構線上「Google 藝術計畫」（Google Art Project），與數百間實體博物館、文化機構及檔案資料室合作，將實體博物館的展品數位化並展示，讓民眾可以根據喜好建立屬於自己的博物館與專屬藝廊，撰寫評論，與家人朋友分享，是將實體展品經由數位典藏轉為線上博物館展示的有趣案例[3]。

2　更詳細的資料，請參考英國倫敦自然史博物館 —— 市民科學計畫網頁，網址 http://www.nhm.ac.uk/take-part/citizen-science.html。上網日期：2015 年 1 月 31 日。

3　更詳細的資料，請參考 Google Art Project 網頁。網址 https://www.google.com/culturalinstitute/project/art-project?hl=zh-TW#。上網日期：2015 年 1 月 31 日。

上述兩類線上博物館提供了不同的公眾參與模式，其創意架構包含：（一）讓公眾參與資料收集並上傳，從無到有地建構博物館的內容，以及（二）將既有成品轉化為線上展示，由公眾建構屬於自己的博物館。這兩類是目前線上博物館提供公眾參與的主要類型，無論那一種類型，均有助於實踐 Kukula 博士在訪談中提及之「幫助觀看者建構自身體系」。

臺灣的國家型數位典藏計畫迄今累積豐富資料，要結合數位典藏成果並且展示於線上博物館，並非不可能。臺灣在博物館進行數位典藏的資深研究人員認為[4]，其重點在於如何結合網際網路與博物館學的專業，設計出公眾參與管理機制，將數位典藏的成果呈現於線上博物館網頁，再利用博物館的策展核心，設計出完備的公眾參與活動，就有機會達成如國外正在進行的數位博物館計畫。然而，在此過程中，也可能遇到國外科學類博物館所遭遇的困難，這部分將於以下的討論一節裡，與國外經驗一併述及。

伍、結語及討論

一、結語

本文試圖結合 STS、傳播研究以及博物館學 3 個領域，整理出科學類博物館在不同時期所扮演的主要科學傳播／科學溝通之角色，意即科學類博物館所扮演的不同科學傳播／科學溝通層次。本文也試圖補足傳播研究過去忽略了將科學類博物館視為廣義的媒介所扮演的科學傳播功能，於文中深入探討科學類博物館在當今公眾參與科學上所扮演的應然與實然角色。本文認為，科學類博物館作為一個公共空間，扮演展示與教育功能，具有「空間的公共性」，近來更嘗試提供扮演科學家與公眾對話的角色，發揮博物館所具有的「參與的公共性」特質，這兩項公共性特質，均有助於促進公眾參與科學。

本文認為，從 STS 的角度，在促進公眾參與科學上，科學類博物館可以在既有的展示與教育基礎上，展示已完成的科學知識或科技物當時之發展脈絡，讓公眾理解科學與科技所具有的政治性，使公眾對科學或科技的發展有更為周延的理解。除此之外，科學類博物館也可以提供正在發展中的科學知識或科技物之展示，並與博物館的參觀者互動，讓公眾理解發展中的科學知識或科技物，以及可能的風險，讓科學或科技的發展結果更符合公眾所需。最後，科學類博物館可以

4 此段資料為本文作者訪談國內大型博物館工作人員之訪談內容，訪談時間為 2015 年 1 月 29 日。為顧及研究倫理並保護受訪者，本訪談以匿名呈現，也不標註受訪者所工作之博物館。

扮演提供科學家與公眾對話的中介，使公眾的意見有機會呈現在科學或科技的發展過程中，除了讓公眾理解科學之外，也讓科學能夠理解公眾，最終達到公眾參與科學政策制定的理想。

上述科學類博物館所提供的這種「參與的公共性」，包括讓公眾理解科學科技的知識演化過程（尤其是科學與科技的政治性）、讓公眾參與產製中的科學與科技，以及讓公眾的疑慮與想法反映在政策制定上，從單向的科學傳播轉為互動式的科學溝通，從公眾理解科學進而參與科學，即是本文主標題所指稱「更民主的科學溝通」之「民主」意涵。

本文中所提供的 2 類個案，是目前公眾參與科學的最新發展，雖然尚未達到本文所期待的政策治理之理想，但其發展過程仍足以作為國內科學類博物館的借鏡。第一個將奈米科學實驗室搬到博物館的個案，提供公眾與科學家面對面對話的機會。奈米科學在目前仍屬於新興科技（emerging technology），科學類博物館成為科學家與常民互相學習的空間，有別於傳統上博物館僅展示已發展完成的科學與科技，這與我們在前文所討論到的科學類博物館作為科學家與常民的對話場域相謀合。第二個公民科學聯盟則是提供所有公眾一起來做科學，由公眾參與進行資料收集與分析，增加科學的可親近性，打破科學專家與非科學家之間的界限。公民科學聯盟目前提供公眾參與的科學對象雖非新興科學或科技，而是一項發展已久的天文學，不過，透過線上博物館結合新興的網路科技，做為科學家與常民相互學習的場域，適可作為目前發展公民科學的借鏡。

本文必須強調，讓公眾參與正在發展中的科學與科技，無疑是項極大的挑戰。文中的奈米科學個案展現公眾參與科學的方式是，與公眾溝通奈米科學科技發展的過程，瞭解公眾對該項科學科技的疑慮與考量，將公眾的意見納入科學科技政策的制定，這可做為未來臺灣的科學專家與政策制定者在處理爭議性的科學科技議題時的參考。文中的另一個公民科學聯盟所處理的雖然不是具有爭議性的議題，但這個個案所展現的透過公眾主動提供資料，與科學家一起形塑科學的發展，提供了公眾參與科學發展的具體方式及模式。將奈米科學實驗室搬到博物館或公民科學聯盟所提供的公眾參與科學案例，由於是尚在發展並進行中的個案，可能尚無法充分展現公眾參與發展中科學（science in the making ／ science in action）的過程，但這兩類個案均提供了科學類博物館的創新可能性，以及未來在實踐公眾參與科學時可以扮演的角色。

二、討論

在公眾參與科技科學的脈絡下，博物館的角色也在變化中。博物館不僅協助公眾解決科學問題，還肩負著進一步協助公眾解決科學在各種社會生活情境下的互動問題，因而前述的理想——公眾參與科學與科技、從公眾理解科學到科學理解公眾，以及協助公眾理解科學不確定性等，在國內外科學類博物館實務上，仍舊或多或少不斷出現挑戰。若究其實，原因大致可歸納如後。

首先，科學類博物館的研究人員或教育人員多具有科學或科學教育背景，他們諮詢的對象多半是科學家或與自己相關領域的專家，較少社會科學家或倫理學家；科學類博物館的工作人員也不習慣於呈現複雜議題，或回答沒有標準答案、答案模擬兩可的問題 (Chittenden, 2011; Mintz, 1995)。即便有研究指出，觀展的公眾很喜歡參與討論科學爭議，也認為這是科學博物館的業務之一 (Mazda, 2004)，然基於上述科學類博物館人員背景的侷限，現今許多博物館仍傾向提供專家對於科學的詮釋，也就是提供針對單一事實的陳述。

第二，就國外經驗而言，以目前科學類博物館的人員配置與經費籌措現狀，尚有難行之處，尤其美國多為自籌經費的私人博物館，英國雖然公立博物館多有政府財務支援，然而因政府預算逐年吃緊，公立博物館也需自行籌措資金。因科學類博物館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自籌財源，進行公共參與科學的計畫既非館務例行性工作，勢必影響既有博物館人員的工作負擔，也會減少博物館收入 (Chittenden, 2011)。然而，歐美各國博物館仍然願意與各方合作，除了能夠達到博物館的使命之外，更可以藉由與公眾的合作提高館方能見度，在募集經費及籌措資金時更為容易，因此也成為科學類博物館進行公眾參與科學的重要動機。

臺灣雖然也有類似的經驗，但面臨的困境僅有如下幾項[5]。首先，臺灣的科學類博物館之科學專業人員對本文所提及之「參與」的認知及接受度是項挑戰，以致於目前尚未出現如本文前述所討論、在歐美進行的奈米對話或公民科學聯盟之科學家與公眾雙向互動的公眾「參與」案例。臺灣科學類博物館的展示目前仍由研究人員主導，研究人員專業權威性高，不論在面對館內人員或館外民眾皆有其學科權威性，且研究人員並不認為公眾的聲音對於科學發展有其重要性，因而要實踐如歐美的奈米計劃或 CSA 線上博物館，挑戰性仍高。由此也可窺見，研究人員的背景經驗對於實踐公眾參與科學相當重要，其對於公眾「參與」的認知

5 為與國外經驗對照，本研究訪談了臺灣兩個國立科學類博物館對於公眾參與的態度和想法，此段資料為本文作者訪談國內科學類博物館工作人員之訪談內容，訪談時間為 2015 年 1 月 26 日。為顧及研究倫理並保護受訪者，本訪談以匿名呈現，也不標註受訪者所工作之博物館。

偏向由科學專家提供知識給公眾的單向線性科學傳播，相對地較未直接聯想到科學家與公眾的雙向互動之公眾參與面向。因此，臺灣科學類博物館對於科學的社會性面向之關注，還存有發展空間。

再者，這樣的計畫參與必須包含許多博物館專業人員，例如：展示、教育、研究以及資訊人員等，但臺灣博物館正式編置內的專業人員數量相較國外同類型博物館少，若要在博物館的公共空間實踐公眾參與科學，對館內正式編置的人員來說，是例行性工作外的額外負擔。最後，臺灣國立科學類博物館經費皆來自政府，雖然較無經費上的疑慮，但若要進行如國外將奈米實驗室搬進博物館，或是讓公眾參與發展中的科學，目前主要由教育部所提供的經費數額可能略嫌不足，就必須加入其他部會（如科技部）的經費贊助。然而，根據本研究訪談得知，目前政府政策仍以科普教育做為博物館重要的營運方向，實驗性質的展示及計畫較難申請到經費。由此觀之，科學類博物館如果要提供科學專家與常民的交集點，需要科學、學術、政府，以及其他非政府單位共同協助，找出社會中與科學科技相關的議題與討論方式 (Bell, 2008)。

要解決上述困境，政府扮演核心角色，除了提供經費之外，政府必須主動鼓勵公眾參與、與非政府單位共同協力，再加上科學家與研究人員的參與意願，如此才能有助於促進公眾參與科學。以歐洲為例，丹麥政府在 1989 年舉行第一次共識會議，英國政府在 1998 年成立第一個科學咖啡館（Café Scientifique）[6]，荷蘭的科學咖啡館在提供科學專家與參與者關於奈米科技的風險、優點與相關重要議題的討論上，也已經證實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Dijkstra & Critchley, 2014)。再以美國為例，由科學博物館、科學中心、水族館、植物園、自然中心、動物園以及天文館等非政府單位所組成的「非正式科學教育」（Informal Science Education, ISE）聯盟，由各類科學類博物館的專業人員相互協助，以非正式的方式促進公眾參與科學，為美國建立了完整的科學教育制度 (Stilgoe, 2007)。

第三，抓住重要議題也是促進公眾參與的要素之一。以奈米科學與科技為例，這是 19 世紀末最重要的發明之一，這項科學或科技的發展歷時數年，但公眾的疑慮頗高，因此對美國及歐洲而言，正是一個適合用來測試公眾參與科學科技的個案；然而如前所述，臺灣政府仍停留在以博物館進行奈米科技的科普教育

6　由法國物理學家在 1997 年提出，仿效知識份子於塞那河畔咖啡館內談話思考的模式，鼓勵常民參與當代科學科技議題。1998 年英國里茲正式成立第一個「科學博物館」，現在全球各地多有分布；另外，臺灣國科會（現為科技部）科教處在 2007 年也曾試辦，可參考陳恒安、陳政宏簡述，取自網址 http://proj.ncku.edu.tw/magazine/pdf/227CHF/227_P052-P057.pdf。有關全球各地科學咖啡館的發展現況，取自 http://www.sciencecafes.org/。上網日期：2014 年 12 月 4 日。

相關活動宣導層面，而欠缺了公眾參與面向。Stilgoe (2007) 指出，由於奈米發展的時間較長，正適合在政策發展初期就匯聚公眾意見，不必等到政策制訂之後再來修正，也可以避免一項新興科學或科技發展所帶來的風險，減少公眾焦慮；除了能建立該項科學及應用上的正當性，也有助於形塑該項科學科技的創新軌跡，強調該項科學科技的公眾價值，並打開新的政治領導空間。

又或者以臺灣是否興建核四廠為例，科學類博物館是否有可能促成支持與反對興建者、擁核與反核者的對話，提供或展示核電在二次戰後被推廣的整體國際形式，進而解構核電，以及針對核災風險提供專家／常民、支持核能／反對核能雙方的對話平臺。

臺灣的科學類博物館近年來致力於鼓勵民眾參與其活動及展覽，並且設計及提供多樣化的互動裝置，以吸引觀眾之興趣。然而，若對照本研究提出的公眾參與科學架構，其作為及思想仍停留在公眾「理解」科學層面，著重的仍然是教育功能、單向傳播及互動傳播層面；而如何在此層次上，往上提升至公眾「參與」科學層面，打破權力的關係（即博物館教育公眾），而把博物館定位為是提供對話的平臺，這將是科學類博物館的挑戰及未來努力的目標。除此之外，就博物館經驗的觀點來看，觀眾積極地參與除了可以達到教育性外，更可以增加對該主題的興趣並刺激觀眾主動地學習、自行建構其學科知識。

綜言之，既然公眾參與是目前民主政治的潮流，在公眾參與科學科技的模式下，科學類博物館可以運用既有的展示與互動式科技、舉辦公共論壇，讓公眾對具爭議的社會性科學議題或進行中的科學有充分認識之後，進一步扮演更重要的先驅領導角色，讓科學類博物館成為科學專家、政策制定者與公眾之間不可或缺的橋樑及平臺。最終，讓公眾一起參與科學政策的制定，是我們期待科學類博物館扮演促進公眾參與科學的最理想境界。

參考書目

邱家宜譯（2012）。〈追求民主——作為公共空間的博物館〉，《博物館學季刊》，26（4）：7-28。（原文 Barrett, J. [2012]. Attempting democracy: The museum as public space. *Museology Quarterly*, *26*(4), 7-28.）

張美珍（2009）。〈國小教師運用科學博物館實施科技教育課程探析〉，《生活科技教育月刊》，42（2）：36-49。

陳恒安（2010）。〈我來、我見、我征服？談科技博物館的 STS 展覽與導覽〉，《科學發展》，446：84-85。

黃俊儒、簡妙如（2010）。〈在科學與媒體的接壤中所開展之科學傳播研究：從科技社會公民的角色及需求出發〉，《新聞學研究》，105：127-166。

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2014). *Statistics*. Retrieved from http://www.aam-us.org/resources/assessment-programs/accreditation/statistics

Anderson, G. (2012). *Reinventing the museum: The evolving conversation on the paradigm shift* (2nd ed.). Lanham, MD: AltaMira.

Bell, L. (2008). Engaging the public in technology policy: A new role for science museums. *Science Communication*, *29*, 386-398.

Bennett, T. (2007). *Critical trajectories: Culture, Society, intellectuals*. Malden, MA: Blackwell.

-- (2005). Civic laboratories: Museums, cultural objecthood and the governance of the social. *Cultural Studies*, *19*, 521-547.

Bisanti, M. (2012). Museums -- From local to global. *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11*(2), 1-7.

Brossard, D., Lewenstein, B., & Bonney, R. (2005). Science knowledge and attitude change: The impact of a citizen science projec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27*, 1099-1121.

Butler, S. (1992).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s*. Leicester, UK: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Press.

Burgess, M. M. (2014). From "trust us" to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Deliberative publics and science policy.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3*, 48-52.

Chang, Y. (2011). *The constitu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marketing functions in the museum sector*. Unpublished Ph.D. Thesis, King's College London, London, UK.

Chittenden, D. (2011). Commentary: Rol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 Science museums engaging the public in emerg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urnal of Nanoparticle Research*, *13*, 1549-1556.

Chun, A. L. (2014). The shifting roles of museums. *Nature Nanotechnology*, *9*, 724.

Citizen Science Alliance. (n.d.). *Citizen Science Alliance website*. Retrieved from http://www.citizensciencealliance.org/

Daipha, P. (2012). Weathering risk: Uncertainty, weather forecasting, and expertise. *Sociology Compass*, *6*, 15-25.

Dijkstra, A. M., & Critchley, C. R. (2014). Nanotechnology in Dutch science cafes:

Public risk perceptions contextualized.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Retrieved from http://pus.sagepub.com/content/early/2014/05/06/0963662514528080

Falk, J. H., & Dierking, L. D. (2000). *Learning from Museums: Visitor Experiences and the Making of Meaning*.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Heath, C., & vom Lehn, D. (2008). Configuring "Interactivity": Enhancing engagement in science centres and museum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38*, 63-91.

Hooper-Greenhill (1999a). *The educational role of the museum* (2nd ed.). London, UK: Routledge.

-- (1999b). *Museum, media, message*. London, UK: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2007). *ICOM definition of a museum*. Retrieved from http://icom.museum/definition.html

Irwin, A. (2014). From deficit to democracy (re-visited).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3*, 71-76.

Jones, R. A. L. (2014). Reflecting on public engagement and science policy.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3*, 27-31.

Knell, S. J. (2007) Museums, reality and the material world. In S. Knell (Ed.), *Museums in the material world* (pp. 1-28). London, UK: Routledge.

Kurath, M., & Gisler, P. (2009). Informing, involving or engaging?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the age of atom-, bio- and nanotechnology.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18*, 559-573.

Laurent, B. (2012). Science museums as political places. Representing nanotechnology in European science museums. *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11*(4), 1-6.

Macdonald, S. (2002). *Behind the scenes at the science museum*. Oxford, UK: Berg.

Mazda, X. (2004). Dangerous ground? 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controversy. In D. Chittenden, G. Farmelo, & B. Lewenstein (Eds.), *Creating connections: Museums and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current research* (pp. 127-144).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McCallie, E., Bell, L., Lohwater, T., Falk, J. H., Lehr, J. L., Lewenstein, B. V., et al. (2009). *Many expert, many audiences: 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and informal science edu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the Center for Advancement of Informal Science Education (CAISE), Washington, DC.

McLean, F. (1997). *Marketing the museum*. London, UK: Routlege.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8 江淑琳.indd 224 2016/1/13 下午 01:19:56

Meyer, M. (2009, September). *From "cold" science to "hot" research: The texture of controvers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the Centre De Sociologie De L'innovation Mines Paristech, Paris, French.

Mintz, A. (1995). *Communication controversy: Science museums and issue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Association of Science-Technology Centres.

NanoToTouch. (n.d.). *NanoToTouch website*. Retrieved from http://www.nanototouch.eu/tools/open-nano-lab/

Nightingale, E., & Sandell, R. (2012). Introduction. In R. Sandell & E. Nightingale (Eds.), *Museums, equality and social justice* (pp. 1-9). London, UK: Routledge.

Nisbet, M. C., & Scheufele, D. A. (2009). What's next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Promising directions and lingering distrac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Botany*, *96*, 1767-1778.

NISE network. (n.d.). *NISE network website*. Retrieved from http://www.nisenet.org/nanodays/events

Rentschler, R., & Hede, A. M. (2007). *Museum marketing: Competing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Oxford, UK: Butterworth-Heinemann.

Silvertown, J. (2009). A new dawn for citizen science. *Trend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 *24*, 467-471.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2014). *Citizen science at the smothsonian*. Retrieved from http://www.si.edu/content/governance/pdf/Archives_06-2011.pdf

Spence, D., Wareham, T., Bressey, C., Bam-Hutchison, J., & Day, A. (2013). The public as co-producers: Making the London, Sugar and Slavery Gallery, Museum of London Docklands. In C. Scott (Ed.), *Museums and public value: Creating sustainable futures* (pp. 95-112). Surrey, UK: Ashgate.

Stilgoe, J. (2007). *Nanodialogues: Experiments in 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London, UK: Demos.

Stilgoe, J., Lock, S. J., & Wilsdon, J. (2014). Why should we promote 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3*, 4-15.

Tuss, P. (1996). From student to scientist, an experiential approach to science education. *Science Communication*, *17*, 443-481.

Väliverronen, E. (1993). Science and the media: Changing relations. *Science Studies*, *6*(2), 23-34.

Watermeyer, R. (2012). A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post-museum as pedagogical space. *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11*(1), 1-8.

Xanthoudaki, M. (2013). Reflecting on the role of informal learning and visitor experience in science museums. *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12*(1), 1-2.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8 江淑琳.indd 226 2016/1/13 下午 01:19:57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6(1), pp. 199-227, January 2016

More Democratic Science Communication: Exploring The Role of Science Museums Engaging The Public with Science

Chiang, Shu-Li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Chang, Yu-Chien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combine the following research approaches -- communication stud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and museum research -- to investigate what rol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s can play in public engag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paper looks at two types of projects -- nano science/technology related programs and Citizen Science Alliance (CSA) -- to present ho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s in Western countries are engaging the public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hopes that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museum can be highlighted in the emerging field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via this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Keywords: communication stud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public engagement of science

* Email: cshulin@googlemail.com
Received: 2014.12.04
Accepted: 2015.03.15

JCRP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8 江淑琳.indd 227 2016/1/13 下午 01:19:57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6 卷 第 1 期．頁 229-250．2016 年 1 月
DOI: 10.6123/JCRP.2016.009

318 學運帶動的媒體革命——夾腳拖與 iPad 網路直播模式的反思

孔令信 *
銘傳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摘要

318 學運在公民運動開啟新里程碑，更開啟了媒體革命，由學生打造的夾腳拖與 iPad 直播模式，提供了傳統媒體尋求轉型最佳參考。

928 香港占中行動，同樣運用網路直播、結合社群媒體產生更大的連結與互動，將抗議傳播至全球，產生更巨大的影響力，也開創新的公民運動模式。

學生運用網路直播、募資平臺與 O2O 三大數位科技，成功地完成數位匯流與媒體整合。退潮之後，這三大數位科技不斷地被實驗與複製，產生不少商機與媒體新經營模式。傳統媒體尋求轉型，更是紛紛強化數位的經營，顯見未來這場媒體革命最終將決戰戰場還是在數位。

關鍵詞：318 學運、928 占中行動、網路直播、媒體整合、數位匯流

* Email: lskung@mail.mcu.edu.tw
投稿日期：2015 年 7 月 19 日
接受日期：2015 年 11 月 2 日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壹、問題意識

318 太陽花學運不但打破臺灣長期以來的朝野政黨對抗的生態，更成功地進行了一場新媒體對抗主流媒體的大革命。同樣地，這場學運所掀起的公民運動，顯然在運用網際網路、新媒體與「大數據」（big data）在媒體平臺上成功地完成數位匯流與媒體整合，這樣的匯聚民意模式，無疑地帶給公民運動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發，也成功地衝擊傳統媒體對於民意調查與公民議題的經營，更顛覆了主流媒體議題設定的操作與操控輿論的影響力。

318 學運不但加速刺激傳統媒體的轉型工程，特別是數位匯流與媒體整合的翻新，同時也激發傳統媒體的正視，並進行新的彙整與運用新媒體和大數據來進行報導，圖表新聞與調查報導變成了新的主流。

此外，318 學運對未來公民議題的深化是有重大的幫助，當然對於未來的公民運動的發展也有一定的貢獻。

那麼 318 學運的這場媒體匯流與整合行動是如何運作？如何與公民運動結合而產生這樣大的改革與轉型動力呢？

貳、回顧國內數位匯流與媒體整合的歷程與問題

如果沒有爆發 318 學運，國內主流媒體一直都在忙著推動數位匯流、媒體整合工程，但是，即便走在「最後一哩」時，始終無法順利完成，這個困境始終無法突破，問題出在哪裡？透過回顧國內數位匯流與媒體整合的歷程與問題，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一、國內第一波媒體整合（1995/10/2 ~ 2008/11/3）的特色與問題

國內媒體整合第一波其實時程非常長，可以說受到網際網路的興起而開始，也因著 1990 年代網路的泡沫化而使得這個整合工程進行得非常遲緩。原因就是網路新興行業與電子商務的快速成長一度帶來全球風潮，然而虛擬事業與商務並未能在實體世界中造成全盤的生活與文化形態的改變，反而引來不少疑慮與不安。

《中國時報》在 1995 年推出「中時電子報」（chinatimes.com），在臺灣的媒體整合工程可以算是開了先河。可惜的是這一路走下來，科技與新聞傳播並沒有對話與整合，主要的還是由新聞產製者來引導工程人員，新穎的設備只使用於因著媒體需求而開發出的程式，其餘的就是空置，也不知道該怎樣發揮更多功能。

國內的媒體整合工程中，在 2008 年之前紙媒集團長期占有大眾傳播的優勢與影響力，所以對於改變的意識與興趣並不大，反倒是對於不同媒體的併購較有興趣。問題是媒體之間本來就有各自的優勢與群眾，併購的後續整合問題，常會是紙媒集團的重大挑戰。至於網路媒體在網路泡沫化的陰影中，紙媒採取的態度並不是積極地經營網路電子報這一塊，反而像是附庸一樣，有點聊備一格的感覺，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個媒體發展現象[1]。

二、國內第二波媒體整合（2008/11/4 ~ 2013/6）的特色與問題

2008 年 11 月 4 日旺中接手了中時媒體集團，原本在媒體整合上領先的中時集團突然轉手，出乎媒體界的意料，然而事實上這種發展也在意料之中[2]。因為網際網路新紀元已經愈來愈蓬勃興盛，傳統媒體特別是平面媒體所受到的衝擊最嚴重也最直接。e 化的平臺不但快速更普及於全球，這種新興媒體更有著 no paper 的好處，同時大量記憶體的儲存功能，充分可以解決報紙的發行與回收及收藏等各項問題。因著網路的出現也逐漸改變了閱聽者的習慣，網路資訊的取得付費的制度也未全面建構起來，在網路大量與免費的資訊提供下，平面媒體的競爭態勢與實力明顯地被削弱。

《中時》的起落就是一個明證，事實上在 2008 年金融海嘯衝擊中，美國不少平面媒體，特別是地方性媒體紛紛結束紙本印刷而改為網路報，連《紐約時報》也不得不販賣旗下的球隊來節省成本，更重要的是《紐時》的頭版從不刊登廣告的作風也改變了。形勢比人強。這也證明網路媒體角色愈來愈吃重。國內第二波媒體整合的關鍵就在網路，e 化的過程中數位匯流的趨勢愈來愈明顯[3]。

1　著名的亞馬遜（Amazon）書店就是全球第一波網路「.com」公司的代表，它在 1994 年 7 月開始營運，然而，一直到 2001 年第 4 季起才開始轉虧為盈，同樣與它一起發展的網路企業早就從 1995 年後陸續地泡沫化、來得快也消失得快。亞馬遜成了碩果僅存的 .com 公司，它的電子商務經驗也成了貝佐斯（Jeff Bezos）日後發展亞馬遜帝國最關鍵的資產與動能。國內《中國時報》率先在 1995 年推出「中時電子報」（chinatimes.com）開了先河。可惜，科技與新聞傳播並沒有太多對話與整合，主要的還是由新聞產製者來引導資訊工程人員，因此，最多只是完成設備的 e 化與編採流程的 e 化，編採人員在觀念上始終無法全面接受與調整過來，此時也無法看到電子商務帶來的商機，所以很難有更新的整合與突破。

2　2008 年 9 月 15 日雷曼兄弟的連動債問題得不到美國政府的紓困金援，一夕之間全球經濟體制重重受創，金融海嘯從華爾街開始衝擊世界各國。中時董事長余建新受到直接的衝擊，無法再支應整個中時媒體集團的財務。這一年 11 月 5 日虧損嚴重的中時刊出一則聲明：「中時媒體集團基於對社會的責任與使命，在經營環境日益艱困之際，為期永續經營發展，決定邀請旺旺集團蔡衍明先生接棒經營」（維基百科，n.d.）。

3　2008 年是紙媒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分水嶺，雷曼兄弟引爆華爾街金融海嘯衝擊的不只是汽車業、金融業，更讓長期引領社會輿論的紙媒也不得不面對轉型的問題。因為廣告市場風向已一點一點地

三、國內第三波媒體整合（2013/6 ~ 2014/3/18）的特色與問題

經過 2012 年的 9/1 反媒體壟斷大遊行與臺灣壹傳媒的打包出售事件，只說明一件事就是，國內業者高喊數位匯流卻苦無著力點。明知應該加速進行數位匯流工程，可是連「最後一哩」都會出現了爭議，造成媒體整合的工程是跌跌撞撞，甚至有點原地踏步的味道[4]。

追求技術整合，可是又礙於法規與市場環境，無法順利推動。新聞業界的競爭因而就開始注意內容產製的速度。想要用更快的速度傳播新聞，以吸引更多人再來看新聞，特別是要吸引年輕世代的新讀者，因為這個族群已經愈來愈不看傳統媒體的新聞了。他們停駐於網路的時間愈來愈多也愈來愈長，所以，鎖定這個族群的口味，即時新聞便成了新的競爭重點。

表面上看來國內四大紙媒集團又回到「內容」的競賽，問題是即時新聞所重視的是速度，搶先報導，犧牲最大的就是新聞的品質。換言之，一旦只為了搶快速度而發新聞，不但壓縮了查證的時間，有些媒體更是抱著先發了再說，結果錯誤的內容就在第一時間傳播出去，即便接著馬上更正修改或者撤稿，可是錯誤的資訊／訊息早就被閱讀大眾所接收，以訛傳訛的事數見不鮮。新聞的品質管制或者守門動作根本形同放水。

四、小結：搶攻即時新聞曝露出的媒體整合困境

總之，國內三波媒體整合，從媒體併購一直到數位匯流，整合的關鍵明顯地落在網路。網際網路所帶來的方便、即時與快速，愈來愈明顯，也愈來愈成為現代社會中重要的生活、溝通與傳播的管道，結合傳統媒體與網際網路的整合工程也愈來愈重要。只是這種整合不能光用加法，認為 1 + 1 就會等於 2，整合是需

向網路這一塊偏移，相對地讀報的人愈來愈少，同樣的理由就是讀者群也向網路上佇足瀏覽，看紙本的讀者愈來愈高齡化，沒別的，滑世代已經滑進網際網路（internet）世界！紙媒的經營愈來愈吃力，不轉型只有苦撐待變的話，不但傷老本更難以為繼。

4 臺灣壹傳媒的崛起靠的還是港式狗仔爆料與腥羶色作風，2008 年黎智英錯失買下中時集團的良機，記取教訓決定發展自己的有線電視——壹電視。然而壹電視從一開始就命運坎坷，向 NCC 申請執照就是一波多折，從 2009/7/7 到 2011/7/20 第三次申請才獲准。原本預計新聞臺將於 2011 年 9 月在中華電信 MOD 上架，卻卡在中嘉與旺中合併案，NCC 一直無法召集齊全所有的委員進行審查此案，引發蘋果與中時新論戰。兩大集團的較勁更在 2012 年九一反媒體壟斷大遊行中達於最高潮，近萬人自動自發地向旺中與 NCC 進行抗議，他們主要的訴求就是針對旺中反壟斷。九一大遊行之後，中時披露臺灣壹傳媒要出售的訊息。主因還是禁不起壹電視每天燒錢的壓力，一度敲定要給年代的練台生，半途殺出中信辜、台塑王與新加坡私募基金要打包買下臺灣壹傳媒，後因發現新加坡私募基金就是旺中蔡衍明時破局。旺中的併購中嘉案雖有條件通過，可是蔡衍明馬上反悔，此案又告夭折，國內數位匯流與媒體整合到此全部中斷，「最後一哩」卡住難行。至於壹傳媒打包出售既破局，黎智英重返臺北，強調要發展數位，壹電視確定賣給了年代。

要對話、協調與實驗的，但是我們發現不少傳統媒體仍採取往昔的新聞運作或傳播流程來處理這個整合工作，受限於舊思維，反而無法讓媒體整合速度加快，造成更多的人力與資源的浪費，這也是這三波整合過程中最讓人覺得扼腕的地方。

再觀察國內四大紙媒集團的即時新聞的戰爭從 2013 年 6 月啟動，2014 年元月時開始成為《蘋果日報》、《聯合報》、《中國時報》三雄競賽的局面（《自由時報》不動如山未加入競賽）。三大紙媒集團已意識到報紙日益在走下坡，網路的發展已成為未來新聞市場的主流。紙媒若不求突破或因應的話，遲早會走上關門的路。

要轉型才能生存下去，那麼關鍵就在如何結合傳統紙媒的優勢與新媒體（網路／行動載具等新媒體）？《蘋果日報》發動即時新聞戰的確帶動了集團本身的數位匯流與媒體整合工程，udn 則一直都是按著自己的步伐在進行數位匯流與媒體整合。旺中擁有最多的不同性質的媒體最需要進行的就是媒體整合，可是集團內的整合工作遲遲不見成效，即時新聞中心的設立也只是另設一個加快處理新聞的單位，並不負責新聞內容的整合，也不負責帶動集團的媒體整合工程。

至於《自由時報》不動如山的態勢，遲遲不參與網路的數位匯流及媒體整合，顯示出它的老大保守心態。但是在 318 學運啟動之前，《自由時報》也完成電子報的更新與建構，學運期間它的速度與反應也受到學生的注意，也加入即時新聞的競爭這一塊。

相對於四大紙媒的日益激烈即時新聞戰，網路媒體 ETtoday 強調重點在掌握「網路化的思維」；NOWnews 則全力經營網友最需要的新聞。ETtoday 的即時新聞向來是「隨採隨發」，十分重視即時性。同時網路媒體已屬雙向溝通，有留言或社群的互動機制，全力經營這些網路媒體的相對優勢。NOWnews 的作法則是朝網路新聞平臺的機制做到完整為主。並在 2013 年 11 月推出一套新的編採系統，讓新聞流動更加快速。另外，也提供網友「個人化」的新聞行動裝置，讓民眾更方便的閱讀新聞（徐依竹，2013 年 10 月 28 日）。

2014 年 2 月 18 日臺灣新媒體「風傳媒」的網站開臺，這群菁英多半是由《中國時報》與壹傳媒出身的資深記者結合在一起，一心想要打造一條新的新聞的路。他們的優勢是有豐富的新聞專業與倫理，缺點是還不太熟悉網路上的互動與連結。318 學運時讓風傳媒有第一次重要的練兵機會。

整體來看，網路媒體最大的優勢就是沒有紙張與印刷等成本負擔，還有就是速度始終能超前，讓紙媒瞠乎其後。更重要的還是網路上的社群模式與互動模式，帶來更多更大更直接的反應，這是傳統媒體一直都疏忽經營的地方。因此即

便四大紙媒集團鋪天蓋地搶攻即時新聞，爭取更大更多的流量或點閱率，對網路媒體來說，競爭不是問題，只要能夠掌握到更完整、更佳與更多元的新聞內容，加速新聞的流通與網友之間的更頻繁的互動，這場戰爭對網路媒體就已經是立於不敗之地了。更何況手機與平板電腦等行動載具使用者愈來愈多，這種閱讀媒介的大塊位移，原本就是網路媒體的優勢。只是紙媒集團要來搶食大餅，問題是傳統紙媒只注意到還是新聞內容的轉移，即時新聞雖然精簡多元，但是標題與用語還不夠年輕化、口語化與新潮化，結果在這塊大餅的搶食戰中，還是沒有占到大太的便宜。

國內在這樣的媒體市場與激烈競爭環境中，一方面是外在經濟環境的巨變，傳統媒體的數位匯流與媒體整合工程，卻一直都無法衝破最後一哩；另一方面網路大興、廣告市場大幅位移，更重要的是閱聽大眾閱讀與獲取新聞管道明顯地移往網路，傳統媒體該如何找到新方向與發展突破口呢？ 318 學運在發展過程中的媒體整合與運用，無疑地帶來新的轉型契機。

參、還原 318 學運的媒體操作實驗——從原始口傳到新媒體整合

當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在國內媒體市場競爭與適應過程中，2014 年 3 月 18 日一場學生發動的公民運動，除攻占了立法院，在政治上發出反服貿黑箱的訴求之外，更在學生爭取自主發言權的過程，自行開發出一套直播系統，運用網路向全臺、進而全球發送他們的聲音。 當時傳統媒體還想學生這一行動一下子就會結束，仍舊依著自己的步調在進行編採，卻沒想到學生以最簡單的媒體整合連結，把傳統媒體一直想要去完成的數位匯流與媒體整合工程成就出來。一場占領國會行動，不但讓主流媒體被擋在立院議場之外，更將 SNG 車的笨重與遲緩凸顯出來，這是一場媒體革命，也許推動學運的學生們從頭都沒有想到他們觸發了這股新媒體革命的歷史。這也可以說是國內數位匯流與媒體整合的第四波起點。

一、從口傳傳播到網路直播：搶到話語權

還原 318 當天晚上短短 7 個小時學生會成功完成占領國會行動[5]，從策劃到

5 318 當天晚上，清大研究生陳為廷帶領群眾，聲東擊西，拐走警察，接著衝進國會，用立法院議場上所有能用的東西擋住八個入口，不讓警察越雷池一步。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黃銘崇在〈回眸318〉一文中，對這次學運當晚的描述用了「一場不意外的意外——占領立法院」來形容。

行動採取的是最傳統的口傳指令，主要是怕情治單位從手機與網路上攔截到訊息。他們早就規劃好一旦成功時，接下來就是把行動聲明以最快速度向外發送。這時候當然就要運用手機、電腦與網路等新媒體發揮最關鍵的效果。占領議場的學生們先是運用社群媒體 FB、LINE 等「揪人」到占領現場，好鞏固占領成果。

接著就是將勝利訊息與重大訴求傳送出去，擴大占領成果。相對地，當時在議場外苦守的傳統媒體卻只能旁敲側擊，期望能有深入議場而有所突破。此時學生已在議場內以平板和手機架設直播的轉播點，將議場內的訊息放送出來，場外接應的學生則另架設轉播點，手機畫面不穩，改架攝影機直播，場內場外即時連線，24 小時內即有百萬人點閱。這樣發動新媒體宣傳攻勢，直接衝擊主流媒體的傳播模式。

學運期間（3/18 ~ 4/10）學生運用了最新的科技來凝聚他們的訴求與支持者，他們自動自發地在最短的時間建構起網路並提供相關服務，很快地布建好整個運動的神經脈絡，不但直接掌握到現場的話語權，更快速地吸引外圍支持學生的能量，讓更多人願意加入形成更多的串聯。實際上學生已經成功地創造了 O2O（Online to Offline）的新典範[6]。

二、手機平板加上夾腳拖的合體

在資訊的傳播與運用上，學生結合了夾腳拖與 iPad（平板電腦，行動載體）進行直播環境的開展，「原本 3G 走不通，隨即架設了 Wimax 行動無線網路基地臺。接著開始拉 60M/15M 的雙向專線。將拉進議場的有線網路擴增成無線網路。」也從「零時政府」（GΦV）的平臺建構了強有力的資訊入口：g0v.today。透過 HackFolder 許多報導都被整理在 g0v 入口網站。學生或支持者可以用最快的速度使用 Ustream 看影音直播／轉播、文字（包括英文）轉播、影音記錄、新聞整理（服貿東西軍）。

他說，「……一方面 318 晚上在立法院旁抗議的場面比起前幾次波浪，並不算太大，未引起警方太多的注意。……加上有一些聲東擊西策略，部分抗議的群眾開始『進攻』立法院議場。意外的是立法院的議場，居然就這樣容易地被『攻破』，而且更讓人意外的是當晚不但守住了，接著『氣餒的波浪（如本人）』紛紛出動，在立法院外聚集的群眾愈來愈多（黃銘崇，2015 年 3 月 18 日）。

6　歷史學者黃銘崇也觀察到占領立法院議場的學運現場：「……一臺 iPad 和一雙夾腳拖鞋，就架起了立法院議場的第一代轉播站，讓全民了解裡面發生了啥事。後來當然有升級版，且有媒體隨侍在側。隨時隨地，只要有行動，有動靜，就會有許多民眾的攝影機聚焦，或照相或錄影。有些時候，主流媒體的報導已經被政府導向特定的方向，可是民眾的照片、影片一出，套用年輕人的一句話『有圖有真相』，誤導的報導往往會被揪出，然後完全喪失其公信力」（黃銘崇，2015 年 3 月 18 日）。有了自己的大平臺，無疑地所有在線／離線 O2O 的串聯就可以隨時匯流，這也是學生成功造就出數位匯流的操作模式。

這個 g0v 入口網站無形中就成了學運匯流的大平臺，接納來自四面八方的不同載體的訊息，分流 → 匯流（整合資訊，進而發布訊息、影音或圖片）→ 分流（分給各種不同載體接受學生編整好的訊息），由這些分流載體再結合各自的粉絲團或群組，可以形成更大更廣的連結，這樣的傳播模式發展出來的就是病毒式的效應。

學生強調學習「零時政府」精神（即「自動自發」代表詞），就是看到了問題，然後發起了一項任務（挖坑），接著在社群裡提出，有人看到任務需求（坑洞），就開始解決任務（填坑）。學運期間不斷地有創新的 IDEAS 爆發出來，主要的動力就是學生們願意自動自發地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這應該就是學生創造出運動與媒體結合的主要動力來源吧。

就像為了讓這次反服貿事件廣告上刊到紐約時報，並讓閱讀者看完廣告後能取得更多資訊，有人一天內打造 4am.tw 網站，這個設計除以時間軸的方式述說服貿事件外，更符合廣告設計風格並有適應手機閱讀版型。

也有為了號召學生到立法院排班，學生們設計了「反服貿立法院 Facebook 好友排班表」網站，使用自己 FB 帳號登入，馬上就可以瞭解朋友或同學在立院排班的現況，自己也可以隨時加入排班。

還有人運用 Google Map 製作了「占領立法院地圖」提供給不熟悉立院周遭環境的外地學生參考。3/30 當天的遊行盛況與人數到底有多少？一位 PTT 鄉民透過臺北市政府 GIS 圖資及 Google Earth Autocad 算出實際的遊行人數，建立了一個科學化計算人數新指標。

整理學生在 318 學運期間所運用的科技與媒體，整合如表 1。

在學運期間，學生更大量地運用社群媒體，就像 3/30 大遊行那天，透過使用者在 Facebook 上面的打卡數字，並以光圈的方式展現出民眾在該地的影響力。還有透過整理「服貿東西軍」上的新聞，加上媒體來源的參數，去算出媒體對於服貿議題的傾向，以光譜的大小代表該媒體在 Facebook 上面的曝光程度，《蘋果日報》在這張「媒體傾向展現圖」[7] 上是遙遙領先其他同業。學生已大量地運用到大數據進行資料分析與圖像資料的建構。

這些都是傳統主流媒體較少觸及到的地方，這場學運卻是把資料新聞學

7 學運期間，《蘋果日報》透過整理服貿東西軍上的新聞，加上媒體來源的參數，計算出媒體對於服貿議題的傾向，其中光譜的大小代表該媒體在 Facebook 上面的曝光程度，此即為結合數據與議題還有圖表來表達媒體在議題上的報導傾向，此即為「媒體傾向展現圖」，《蘋果日報》為箇中翹楚。

	使用科技	運用內容
1	g0v.today	學生運用結合 IRC、GitHub、Hackpad、Telegram（通訊加密）Instant Message 及 Loomio.org：（線上協同決策系統，曾用來討論逆滲透方案）等協同工具，人們可以用最快的速度看影音轉播，使用 Ustream、文字（包括英文）轉播、影音記錄、新聞整理（服貿東西軍）。 打造媒體轉播專區，比 SNG 車還要快。 提供立院兩側濟南、青島路上人士無線上網服務。
2	Ustream、iPad	實況轉播軟體。
3	4am.tw	對國際發聲的窗口，讓這次反服貿事件廣告上刊到《紐約時報》，並讓閱讀者看完廣告後能取得更多資訊。
4	FlyingV.cc 及 VDemocracy.tw	群眾募資網站。
5	Google Doc	即時更新物資要求。
6	PChome	24 小時線上購物。
7	Tumblr 社群網站	資訊公開。
8	iReporter	CNN 公民新聞平臺。
9	Flickr Blog	相片公開。
10	Google Map	製作「占領立法院地圖」，提供給不熟悉立院周遭環境的外地學生參考。
11	臺北市政府 GIS 圖資及 Google Earth Autocad	算出 330 實際的遊行人數，建立了一個科學化計算人數新指標。

表 1：學生在 318 學運期間運用到的科技與媒體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ATTICUS W（2014 年 4 月 8 日）、Leave a Reply（2014 年 3 月 21 日）、癮科技（2014 年 4 月 8 日）。

（Data Journalism）的內容與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在在顯示出新媒體的輕便、快速、即時與互動的強大影響力。科技的改變決定媒體的發展與未來，這場學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立院議場的夾腳拖與 iPad 的組合，向全國與全世界直播太陽花運動的所有訴求。這個畫面已經成了 318 的重要象徵之一，相形之下電視臺的 SNG 車的現場轉播就顯得笨重而應變不及。

新媒體的時代已經來臨，雖然傳統媒體影響力依舊還在，閱聽大眾仍然持續地在透過這些大眾媒體來收視新聞的訊息，然而愈來愈多人在網路的平臺上交換訊息與消息，分眾的社群媒體愈來愈活潑，也愈來愈能連結更多同好，形成更具有特色的粉絲團。

三、在網路上匯流與分流：搶到速度與議題主導權

除了新聞採取「分流 → 匯流 → 分流」傳播模式，在輿論與議題的操作上同樣也使用這種「分流 → 匯流 → 分流」傳播模式，學生們成功地改寫新媒體領導

議題的主導權，傳統媒體不得不跟進效法，相形之下電視臺的 SNG 車，在手機與平板的連線直播中顯得格外笨重，學生自然是認為操縱了話語權。速度變成了大家共同追逐的重點，至於內容的正確與否？有沒有錯誤解讀圖像？其實並不重要，因為在混亂的現場中誰先動手打人就是迫害者，相對地誰先流血就是受害者的二元邏輯早就根深柢固地出現在新聞版面上或畫面上。無怪乎傳統媒體也在這場學運中自動選邊，各自集中火力報導自家重點新聞，呼應學運者自然被學生視為同路人，相反地只要有做不利學運的任何報導，自然會被視為反學運與站在學生對面的「反對者」，這樣的氛圍下更加強化的是反服貿／挺服貿的對立性[8]。

當傳統媒體還陷入二元對立、藍綠對尬的氛圍之際，學生的主張直接而具體地反對立委 30 秒的包裹表決，反對如此黑箱作業的立法過程，雖然綠委幫助了學生擋住警察，議長王金平也堅持中立，讓警方無法順利清場。但是，這場杯葛明顯是在對抗在立法院議場中議事的立委，就是等於打了藍綠立委與政黨各五十大板，立法院不再是最高民意中心，更不是人民想法的代表了。

這次學運中大量關於服貿／反服貿的訊息、論辯與評論，早就形成了一個大數據。主流媒體在現場直播上搶不過學生的新媒體，四大紙媒在競爭發展即時新聞上都在較勁搶速度，可是主動權在學生這邊，始終無法跑在新媒體之前；另外傳統媒體在原本優勢——內容深度與議題與輿論影響力上應可以發揮作用。然而，我們注意到傳統媒體本身早有既定立場，對於此次學運的反對／支持在版面與標題還有內容在在顯現，也成為學生直接討論或抗議的重點。為了強調學運訴求的正當性，甚至有學生打電話直接向反對的投書者或接受採訪的專家學者嗆聲抗議或辯論，無形地透露學生積極在鞏固自身的發言主導權，這種方式也是傳統媒體所難做到的。

由於學生這樣的主動與積極，另一方面也顯示出學生的咄咄逼人，有時也造成當事人的不滿，更容易激化雙方的對立，而難以討論下去。（意識形態明顯地在操縱著學運與反服貿的相關報導）所謂「民意」還是在有「框架」之下的訴求，只是學生用更直白與直接的口語來表達，自然有別於政治人物的話語。傳統媒體當然想運用以往的優勢與影響力來搶回操作議題或報導的主導權，可是學生一再

8 由於有手機有 App 有……各種新媒體，再加上每一位學生就是一個自媒體，「隨時隨地，只要有行動，有動靜，就會有許多民眾的攝影機聚焦，或照相或錄影」（黃銘崇，2015 年 3 月 18 日）。所以儘管各大主流媒體有各自的立場，或者被政治主導往特定方向去報導。可是只要現場民眾拿出照片、影音時，主流媒體就很難自圓其說。反而會因此而喪失其過往的公信力。還有學生主動發新聞、審稿，發布懶人包，這些以往傳統媒體一手包辦的新聞與言論產製流程，完全由學生自己來主導，無形中讓主流媒體在這場學運中的報導戰上陷於被動的困境。媒體的選邊報導情況也出現，在現場學生、民眾／媒體對立的情況也不時傳出。

與政黨切割與媒體切割，運用自己的平臺來發聲，甚至讓媒體來採訪，顯示出學生懂得運用傳統媒體來擴大影響力（在《蘋果日報》、《自由時報》與《紐約時報》刊登廣告就是很重要的一步）。

反觀馬政府的所有應變機制，依舊都是傳統思維與作為。於是學生更是積極主動地在網上集資購買《蘋果日報》、《自由時報》與《紐約時報》國際版的廣告，爭取更直接習慣閱讀主流媒體的中產階級，標題是「他們，為什麼在這裡？」附上 QR code，讓這些長一輩的民眾認識太陽花學運的真正意義與企圖。話語權攻向中老年族群，這是學生另一個重要的策略。問題是這些中壯年以上還有阿公阿媽們，有不少是不用（應該說不會用）QR code 去看新聞與訊息的，戰略上是要爭取這個中堅族群的認同，可是技術上卻用了最新的思維。顯然忽略這群老一輩受眾的感覺，等於是不尊重他們的習慣與想法。

然而，學生的這樣主攻策略也顯示出在他們的思想中新科技理所當然就是他們傳播與宣傳的基本工具，這個工具早就在手機與平板上做好了相關的整合，Apple 賈伯斯（Steve Jobs）就是這個平臺整合的教父，對老一輩來說平板系統的字體與螢幕大於手機，再加上有攝影與錄影功能，老一輩在習慣使用之後同樣也會發現 3C 產品帶來的便利性，一旦習慣了，QR code 對他們來說也將不會成問題。所以載體或頻道的使用不是大問題，關鍵還是使用者心態與思維，若還用傳統思維與作為的話，不但趕不上學生，恐怕也很難體會到學生在這場學運中運用新科技而完成的媒體革命。

四、小結：檢視學運期間新科技的整合模式

理論上，新媒體屬於新生代的「玩意」，1995 年的網路泡沫化一度引起業界對這個新生媒體的功能與遠景產生疑慮，曾幾何時，新科技不斷地改變世界的生活與通訊，Apple 在賈伯斯 1997 年重新掌權之後，更多的整合產品推出，最引人注意的就是 iPhone 與 iPad。這也是 2005 年蘋果公司同時進行兩個重大計畫，iPad 的概念比 iPhone 還要早，但是 iPhone 的時代性意義卻是更讓世人矚目。在 2007 年在舊金山的麥金塔世界大會，賈伯斯介紹 iPhone 時便提到：「今天，我們將一口氣介紹三項革命性的產品。」第一項是一臺寬螢幕的 iPod，而且還有觸控的功能，第二項產品是一支革命性的行動電話。第三項則是一個前所未見的網路通訊設備」（Walter, 2011 ／廖月娟、姜雪影、謝凱蒂譯，2011：653）。

「整合」是賈伯斯最精采的本事，也是蘋果不斷創新的動力。新媒體可以說就是新科技整合的產物，這個產物有強大的網路連結，行動載具 iPhone 與 iPad

可以輕便地攜帶，也注定了使用者隨時都可以成為一位報導者或紀錄者，新媒體在這次學運中再次證明人人皆可以為記者。

成就新媒體崛起的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環結——雲端（cloud）的建置。此中的佼佼者當推 Amazon 的貝佐斯，Amazon 的網路服務是從 2002 年開始上線，最重要的就是彈性運算雲（elastic computing cloud, EC2），能在短短幾分鐘做出一定規格的運算，它是以小時計費，客戶可以利用伺服器個體執行自家的程式，不必再另行購買電腦。Amazon 還可以幫忙個別公司打造內部通訊系統與獨立運作網路，並管理商品結帳、運送到其他零售商的流程。其實這就是 Amazon 商轉模式的複製與輸出，更重要的還是雲端這一塊的潛力無窮。2011 年 Amazon 進一步地啟用「雲端硬碟」（cloud drive），提供給用戶將數位檔案上傳到亞馬遜的伺服器儲存。雲端服務除了快速的運算之外，還有可容納大量、巨量的資訊，這些對 Amazon 來說又是一個「大數據」可以供自己參考，更可產生新的商機（Richard, 2011 ／閻紀宇譯，2012：233）。

對比上述 Apple、Amazon 等整合歷程與經驗，318 學運最精采的整合就是：

（一）運用了立院網路既有的系統結合 Wimax 行動無線網路基地臺，建構起一個無線網路大平臺，也就是完成全程直播的大平臺，不但讓參與者可以同時共享這個大平臺也可以各自獨立作業。

（二）建構資訊入口：g0v.today 網站，匯聚並整理所有訊息、影音與視訊傳播，這個入口網站成為強有力的轉播中心。所有匯流與分流的訊息都是透過這個入口網站進出。

（三）手機與平板是行動載體，學生運用 FB、PTT 與 LINE 等社群媒體進行連絡、溝通，進而採訪、共筆協作、編輯……。

這樣的整合與運作，和傳統媒體的採編運作明顯不同的地方就是：

（一）傳統媒體的記者在現場採訪、攝影、寫作，傳稿回公司（電臺或報社），編輯揀選、查證、彙整進行編版處理或記者自行彙整剪輯、過音等動作而完成新聞影（音）帶，送出播放。中間的每個流程都是專業的守門動作，整體是一個大的採編團隊。層層節制，上下分工，管理新聞品質與節奏。內容產製與頻道管理是各行其是，各管各的；不像學運學生是完全同步運作，在同一大平臺上可以共筆協作、可以分頭進行，相互檢查，沒有問題（專業性與查證上學生當然是比較弱）就上傳，一出手就在網際網路上被看見或可被點閱了！速度既快又即時。

（二）每位學生都可以成為記者，都可以發表意見或評論，成為自媒體（we

media）的這個角色門檻在學運中完全降低，雖然學生各說各話或者有不少地方是感情抒發，但是在大平臺上不斷發聲，也成了線上記者開始注意蒐尋，進而採訪的新管道與線索來源。當然這和傳統媒體編採分工，界限分明的運作模式明顯不同。

（三）學生這套整合式，既可以直播現場，比 SNG 車更輕巧方便又可以直接在他們的入口網站吐納更多訊息，匯流與分流都在這個入口網站上進行，不像傳統媒體是將網路放一塊，自家媒體放另一塊，如果沒有新聞企畫或媒體整合，這個數位匯流與分流的工作明顯地會出現問題。

簡言之，318 學運以科技與新媒體帶動新的社會運動的面貌，同時在傳播實務上的操作上，早就把傳統媒體的一貫新聞與言論產製流程給打破，即時且快速的新聞整合，匯入大平臺之後再分流傳輸給不同載體，發揮了更大的傳播效應。也讓學運的訴求與學生反抗的基調，不只傳向政府還不斷地傳向民間，不只臺灣國內，更傳向全球，其效應與影響完全不同於往昔的學運與社運了！

肆、318 學運帶來的社會運動與媒體革命效應

反省 318 學運最重要的是帶來新社運走向，首先它直接影響了香港占中運動；其次就是引發媒體革命與轉型的契機。最後就是新媒體不斷實驗激發傳播新模式，分述如下。

一、太陽花學運帶動新的社會運動走向

318 學運值得注意的還是學運主要的訴求從反服貿、反黑箱一直到 4/10 退場時所發表的《人民議會意見書》[9]，開宗明義地指陳臺灣代議政治嚴重失靈，黑箱決策與審議，警告的不只是馬江團隊，更提醒了朝野立委，這場反黑箱服貿的學運根本就是針對失職的朝野立委來發動的，人民直接占領國會議會場不但是為捍衛民主，更要奪回人民直接參與民主的權利。要向朝野展現追求民主的草根火力。

9　318 太陽花學運在學生占領立法院議場 23 天後光榮退出，在 4 月 10 日下午 5 點 30 分由學生代表宣讀《人民議會意見書》，提出公民參與要擴大、資訊要公開透明、國家安全、人權價值與弱勢權益要維護、衝擊評估要全面確實、國會要有實質審查權、談判要對等，主權要維護等六大主張，期許總統、行政院長和立法委員，能記得權力來自人民，務必要記得傾聽人民的聲音，並「請接受人民的領導！」詳細全文，參考蘋果日報（2014 年 4 月 10 日）〈太陽花籲政府傾聽人民議會意見書全文〉。

學生最關切的還是兩岸監督條例與機制的建立，他們鄭重指出：「人民議會非常擔心這次兩岸監督條例，會在政黨算計下淪為鳥籠條例，請朝野務必正視人民的主張與擔憂。人民才是偉大的立法者，總統、行政院長、立委們你們的權力來自人民，請你們傾聽人民的聲音並接受人民的領導！」（蘋果日報，2014 年 4 月 10 日）期待朝野政黨莫再為了選舉與權力再搞政爭了！多深入民間聽更多來自草根的聲音，解決基層民間的疾苦吧！一年過後再來看這個要求，顯然朝野政黨根本沒有聽進去，照樣玩政黨輪替權力鬥爭與選舉遊戲。

整體來看，318 學運中學生一直強調與朝野政黨有所切割，然而，事後發現許多參與學運的成員就是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的青年軍，顯然，所謂的與政黨明顯切割的說法並不正確。小英在 318 一周年前夕談到，民進黨無意「沾光」學運或取得政治利益，更無意與學運「保持距離」（劉康彥，2015 年 3 月 17 日）。不可否認地，她所率領的民進黨在九合一大選中大贏，並且讓她成為民進黨 2016 總統參選人，這些都是拜 318 學運所賜。不容置疑在野政黨對於 318 的背後操作是有其影響與利害關係的。

其次，學生主要的反對對象是馬政府與在處理兩岸服貿協議上的「黑箱」作業，儘管馬團隊亡羊補牢也強力宣導及宣傳，然而，對於兩岸關係之間的不確定性，明顯地已經影響學生對於馬政府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更多疑慮，此一疑慮無形中讓學生對於「臺灣是否能夠完全獨立於中國之外？」這樣的想法增加，在政治主權上，兩岸問題的確難解，馬英九上臺後，兩岸關係已見緩解，但是中共並沒有放棄統一的念頭，因此，儘管馬團隊強調服貿若不趕緊簽署，臺灣的經濟發展就有可能落後韓國，更有可能被邊緣化。但是這對學生來說，不被中國宰制，可能比經濟發展的問題來得更重要。換言之，「中國的問題」才是這次學運的核心問題。

從這樣的理解來看 318 學運時，反服貿是導火線，骨子裡還是觸及到兩岸之間的問題該如何解決。因此，你可以說 318 學運是一種公民運動的發顯，實質上 318 更接近的是一個政治主權的反思，對臺灣未來前途的自覺。它在媒體掀起了革命，同時在政治也開啟了臺灣藍綠兩黨之外，另一種反對聲浪，他們不滿意朝野兩黨的因循怠惰與相互抵制、無所作為，所以要回歸到地方、回到草根來尋求新的政治勢力。

最後，318 學運所發展的過程與退潮之後的發展模式，明顯地與傳統第三勢力不同，因為傳統第三勢力只有在選舉時才能發揮作用。一般情況中第三勢力常保持沉默，可是從 2013 年 8 月 3 日的「萬人送仲丘」起，由公民 1985 行動聯盟

所發起的「白衫軍運動」從網際網路上在 PTT 與 FB 的串連下，20 萬人齊聚，這種第一次公民自發的社會運動，直接衝擊的就是政府的軍事審判系統的回歸正常司法制度及 2015 年即將展開的募兵制。同樣地 318 學運也讓政府意識到這種隨時可以由網際網路上連結的分眾勢力，隨時都有可能集結上街頭，對政府政策同樣造成了直接的壓力，這樣的公民運動，比往昔社會運動聲勢與影響力更快速更有效果。而這些社會能夠一波接著一波地運作（像文林苑案、苗栗大埔案、反核遊行、巢運等等），最主要靠的就是社群媒體與網路的強力串聯，讓單一訴求或者多元訴求的社會運動或公民運動可以結合更多的同志聲援，即使這些同志並不認識彼此，但在網路上就有可能形成強大的抗議聯盟，對政府產生最直接與強大的壓力。

318 後的「路過」行動，規模雖小，但是同樣由社群媒體的連結下，聲援人馬直逼北市中正一分局，讓警察機關飽受壓力。這樣的社運操作新模式更給香港「占中」行動做出了一個示範。

二、媒體因應學運與占中行動觸發新傳播模式

國內媒體在 928 香港占中行動發動當天正逢教師節與周休二日，正常情況下的記者採訪發稿都會採取輪班處理。再加上對於香港新聞除了來自香港的壹傳媒，因為老板是黎智英的關係，是從頭到尾全程關注。此外其他三大紙媒和電視顯然就把香港新聞當做是兩岸或國際新聞來處理，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或影響性，港聞是很少會大處理的。這也是長期以來臺灣媒體的政策與心態。

9/28 當天凌晨，占中提前發動，《蘋果日報》是從香港現場做了 Live 網路直播，文字稿新聞也隨著影像一起 PO 上蘋果網站；《聯合晚報》在下午兩點發行之後，在 udn 的網站上馬上就改版，以占中新聞做為頭版來處理，相關新聞報導都是由晚報記者提供。《自由時報》整理從 26 日及 27 日一天與 28 日凌晨稿，做在 28 日一版〈群眾衝進港府廣場 // 港警暴力清場 6 萬人對峙 占中啟動〉應該是換版處理最新訊息。《中國時報》在內頁兩岸新聞只有〈港警昨晚清場 1 天逮捕 74 人〉一稿，此稿為記者楊家鑫在凌晨 04:10 發稿，沒有處理 928 占中啟動的相關訊息，中時電子報在 28 日這一天也沒有跟進報導占中最新的進展。

第二天（29 日）《蘋果日報》在頭版即做了跨頁報導，主標題就是〈香港在哭泣 6 萬人爭民主 催淚彈驅離〉加上內頁版面做了相關報導、表格與評論完整呈現。《聯合報》在一版頭題，主標為〈港驅占中 催淚彈鎮壓〉，內頁還做了〈1 分鐘看時事／震撼影像！用圖片看「香港占中」〉及〈1 分鐘整理包／

10 則新聞讓你看懂「香港占中」〉與其他相關新聞。《自由時報》的一版頭題〈7 萬港人占中　警狂射催淚彈　威脅開槍〉，內頁有 10 則相關報導與圖表；《中國時報》未放在一版頭題（一版頭題是〈中華隊銀恨〉）來處理，只在在內頁兩岸新聞版報導，頭題是〈香港占中突襲 警民激烈衝突〉。

對比四大報所呈現出來的版面與報導，可以發現這裡涉及到的不只是新聞報導的版面多寡、完整還有速度，更涉及到兩個重點：一是新聞專業的判斷，二是媒體企業文化的編採指導。

在占中啟動後，臺灣媒體被國內學者質疑最多的就是從 6/10 中國大陸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到七一大遊行，從 8/31 北京人大通過香港政改方案，到了學生 9/22 罷課與 9/28 占中啟動雨傘遍地開花，臺灣媒體報導明顯偏少，從《中國時報》還有部分電視媒體於占中不但不做重點處理，對於這樣的歷史事件也只是簡單帶過，不是專業判斷出了問題，就是媒體企業自我設限，選擇了迴避。後者，這可能代表了經營媒體的大老板已經將自己的手伸進編輯臺、主播臺，可能以其個人或集團的利益為優先，刻意淡化媒體應有的第四權角色。

回到新聞專業，紙媒在往昔最精采的地方就是對於事件過程能做出完整的整理並進行深度報導或評論，對於事件的解讀與衍生效應可以產生極大影響力。這也是在大眾傳播的傳統模式下，紙媒能夠站在主流位置並影響輿論的重要原因。但是在 318 學運中我們看到的是紙媒在這一塊的優勢已被網路直播給壓過去。同樣電視臺 SNG 車的 LIVE 現場轉播，受制於時間與地點還有節目的操作等因素，也難與網路直播競賽。低門檻而又便利的手機平板與網路，更機動地把太陽花學運的各種小大訊息與行動完全在第一時間內直播出去，只要能夠與網路連線的地方就可以接收，無需再等電視臺的新聞報導時段或紙媒的出報時間。

當占中在香港各街市遍地開花之際，參與的學生、市民本人都成了記者，當場就可以把自己所在的情況傳送出來，馬上就有人看到，馬上就可以趕到現場支援。這種強大的連結報導，比記者所可以看到的更多也更直接，甚至可提供各種不同角度，若再經過編輯加上時間序或地點序的話，絕對比過往紙媒的功力還要深，報導的內容也更廣。

以《蘋果日報》為例，318 學運期間《蘋果日報》最支持學生，無論是新聞報導與評論幾乎與學生的主張遙相呼應。更重要的是，失去「壹電視」的《蘋果日報》，雖無 SNG 車，但是以行動裝置替代直播。所以，20 餘日的學運線上直播工程在《蘋果日報》的電子報上持續不斷地播出，加上學生對蘋果的新聞與評論始終持著認同的態度，輕便的行動裝置直播使得《蘋果日報》在媒體競爭市場上找到轉型的契機。

再者，《蘋果日報》運用了美國西北大學與 Knight's Foundation 合作開發的 TimeLineJS 套件，呈現太陽花學運期間重要事件。TimeLineJS 能將新聞事件依照時間軸顯示，讓後來進來關心該議題的閱聽人，瞭解事情的全貌，以及整個事件前因後果。程式碼也放上 GitHub，採用 MPL 2.0 授權條款。學運中學生發行的《政誌》，《服貿跑馬燈》也是運用類似的時間軸概念來交代相關反服貿各類新聞的發展。

時間軸與圖資（表達地點）在網路直播上可以幫助受眾深入與全面瞭解事件發生的過程與實況，轉化到紙媒的版面上一樣可以深化報導。《蘋果日報》與《聯合報》的 udn 在經營即時新聞之際也同步發展時間軸與圖資這一塊的圖表新聞，這樣的整合，不但讓新聞事件完整呈現，同時結合以往自家媒體所擁有的文字庫、圖庫與資料庫形成的數據（某種意義下可稱得上是媒體自身的大數據）形成再製與加值（以圖表呈現新聞事件，即圖表新聞），明顯地已成為當前媒體的主流趨勢。

總之，無論是 318 學運還是香港占中行動，學生的媒體整合操作，都給傳統媒體帶來最直接與革命性的啟示，媒體整合原來是可以如此簡單與直接地操作，不見得要花上大筆資金。數位匯流「最後一哩」是可以如此便利地操作，進行融合再行分流，快速傳播出去，也可即時收到回應，來回直接互動，擺脫傳統媒體的「中介」指導，進而產生更大的傳播力與影響力。

三、新媒體不斷地實驗出新傳播模式

從 318 至 928 新媒體的整合播模式一再地被實驗與修改再實驗，不但國內如此，著名的 BBC、CNN 及《紐約時報》等也做了類似的實驗。像 2014 年 9/18 的蘇格蘭獨立公投的直播。

BBC 在投開票當天用直播的方式進行，國內各大媒體都是用即時新聞方式來做隨時的更新報導。《紐約時報》和國內「風傳媒」則運用網路的優勢連結 BBC 的直播在自家網站上，讓網友可以直接點閱最新的開票結果。這樣快速的開票連結，提供給國內媒體在 11 月 29 日國內九合一大選一個很棒的參考模式 [10]。

10 在 2014 年九合一大選中 udn 就往昔聯合報系既有的選舉資訊進行整合而做成〈2014 九合一選舉〉（http://udn.com/vote2014/trend）專頁專區，提供給閱聽大眾回顧歷史並觀察選情的變化與預測選舉結果。開票當天雖然有網路直播，但是效果不如三立電視臺開闢大選專區以文字轉播、電視線上開票直播與手機／ APP 開票直播，三管齊下，又有相關新聞背景與候選人資料解說，更吸引選民收視。藉此機會進行媒體整合，產生更大化的傳播效應。

由於開票本身就是一個繁蕪的過程，再加上地區大小，所以一開始的五個地區顯示的都是聯合派的勝利，網友上評論就會出現一些激烈的講話，當然也有人說還沒有完全開出，別急！……關心與討論都在這個直播系統上來回震盪，民意、意見與情緒都隨著開票過程跳躍浮動。這真可以說得上是一次民主選舉的新洗禮。

當然 BBC 也趁著這個機會把大英國協分分合合的歷史再次介紹給全世界，也做了專訪不同地區、國家到蘇格蘭留學或居住的外籍人士表達他們的 YES/NO，BBC 似有若無地還是在這個直播過程中選擇了站在聯合派這一邊，還是在開票過程中製作出議題與輿情，藉此「影響」選情[11]。

網路直播與連結各地區開票結果，更讓受眾直接反應自己的情緒，讓這場令人窒息的公投直接地放送到世界各地，再次證實新媒體整合模式的可行。受到這種新型傳播的鼓舞，國內的「風傳媒」，在香港 922 學生宣布罷課的當天也立即做出了網路直播，可是有一個問題出現，就是全程學生以廣東話或英語發表，對聽不懂廣東話的受眾來說，無法瞭解情況的發展與變化，只能依著影像做「猜測」，實在不行了，只有轉到《蘋果日報》的網路直播，因為《蘋果》將學生的宣言馬上 PO 在網上，這時候就一目了然了！

到了 9/27 晚上「香港獨立媒體網」在 FB 上隨時直播並連結當時的影音，讓關心此事的人士馬上就看到占中三子宣布提前啟動占中行動的宣誓鏡頭。「風傳媒」在當天連結了「香港爭民主全程公民抗命——LIVE 直播」並做文字直播。接著馬上推出「香港爭普選：等待民主曙光——引發占中的 12 個關鍵時刻」網路專題，綜合歷史、事件現場，大事記，還有影音與音頻，還原了整個占中行動的關鍵時刻，簡短文字卻有豐富的內容，如同電子雜誌或電子書一樣做出整理。這不就是從 318 開啟的新媒體傳播模式嗎？「風傳媒」在不斷地實驗與修改中逐漸找到更適合自己發展的方向與重點。很明顯地，網路的多元與複合式的運用，實驗出一套新的傳播模式，它可以不斷再修改精進，這也會是未來任何社會運動或公民抗命行動中最佳利器。

四、小結

從 318 學運到 928 香港占中行動，獨立媒體與網路媒體都扮演著關鍵的傳播

11 參考孔令信（2014 年 9 月 19 日），〈獨立未成 但蘇格蘭改變英國歷史〉，蘋果日報即時論壇，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forum/20140919/472880/applesearch/ 獨立未成但蘇格蘭改變英國歷史，作者於 9/18 觀看 BBC、紐約時報與風傳媒直播後整理。

者角色。可以說是獨立媒體、網路媒體催化公民運動的發生與發展，讓運動受到世人更大的關注；公民運動則加速獨立媒體、網路媒體的實驗與修改，更重要的就是整個運動就像進行一場跨媒體整合與數位匯流的整合實驗。這不但為社運創造出更有效率與更大的民眾參與能量，也給傳統媒體帶來突破困境的出口。

傳統媒體在面對市場的式微而尋求轉型之際，善用網際網路者在頻道上率先占到優勢，運用網路進行媒體整合則可加速這個優勢，進而懂得善用往昔的「大數據」（含文字庫、圖庫與資料庫）再製、加值，可以讓報導內容加深加廣，再以時間軸、地圖等圖表新聞方式呈現時，不但可以在網路上流行，也可分流到紙媒或廣播、電視等媒體產生更不一樣的新貌[12]。不但善用傳統媒體的優勢，更運用新媒體的即時、互動，擴展這個優勢！

伍、回顧學運的啟發與前瞻媒體的未來

318 學運期間，學生 23 天的占領國會行動，無疑地開展了學運的新頁，政治上的訴求也許還有許多政黨的糾結或政黨利益衝突等政治計算的盤根錯節，難以在最短時間內激發出更大的改革。然而，318 學運顯然在政治與社會運動層面上開創出一個新方向，套句民進黨蔡英文主席所說的，「318 運動給政黨最重要的兩個啟示，是『透明』與『公眾參與』」（游昇俯，2015 年 3 月 17 日）。「透明」針對的就是任何黑箱作業與私下的朝野協商，「公眾參與」則是拜社群媒體與網路所賜，可以因著議題或重大訴求，在最短時間內集聚民眾最大的聲音與能量，直接反映人民的心聲。這也是 318 所開創的新社運模式。

對於媒體來說，特別是傳統媒體，既遭遇到經濟上的壓力，又面臨新媒體的大軍壓境，最可怕的還是受眾因著科技改變而改變的收視新聞習慣，受眾的流失與廣告的失血，在在顯示傳統媒體的經營非改不可，否則只有坐困愁城關燈熄號了。

相對地，新媒體在 318 學運的充分實驗中展現出數位匯流與媒體整合的蓬勃朝氣，社群媒體的分眾性強大，早就顛覆傳統大眾傳播的大眾性。社群媒體的自主性，不再討好所有大眾對象，完全客製化與特色化，吸引的就是更多志同道合

12 像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在 2009 年 3 月啟動了它的「資料部落格」（datablog），也開啟了「資料新聞學」（data journalism）的先聲。重要的是衛報採取了「開放新聞學」的政策，有別於大多數採用付費模式的傳統媒體（林麗雲，2013：43，95）。國內 udn 2014 年 1 月 1 日成立數位創新處，下轄新媒體部及產品發展部，更是在 318 學運之後，更是積極發展資料新聞學這一塊，九合一選舉 udn 更加強化數據分析與視覺表現，聯合報系的新媒體部占了一大功勞。（曾玉婷，2014 年 12 月 23 日）進一步還發展出「圖表記者」，每位員工得具備基礎採訪能力，美術部門也不例外，再透過資料分析完成圖表新聞的產製。

的粉絲，同樣也顛覆了傳統媒體議題設定與操控輿論的優勢。社群媒體的即時性與互動性，在最短時間內馬上並同步就能夠傳達訊息、反映意見進而立即付諸行動。顯然再度顛覆了傳統媒體的由上而下式鋪陳民意。

最關鍵的還是手機行動載具結合網路雲端，本身就是一個雲端與諸多的螢幕的「分流 → 匯流 → 分流」操作，手機的主人就是自媒體的記者，隨時隨地都可以記錄與拍攝照片或錄影音傳到網路給全球人觀看，成為記者或編輯的門檻隨之降低，相對地對於新聞的定義與寫作，明顯地已經逐步在改變中，對於傳統媒體當然也得面臨這個巨大的新挑戰。

318 學運與香港占中行動在科技上的應用了三大數位科技：網路直播、募資平臺與 O2O（黑崎，2015 年 03 月 19 日），學運之後，這三大數位科技不斷地被年輕世代拿來實驗與複製，產生不少商機與媒體經營模式，每成功一次意味著網路與新媒體占有市場能力的增大與增強，相對地，傳統媒體在見識到這些成功的經驗，紛紛強化數位的經營，國外像《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衛報》等，國內的《蘋果日報》、《聯合報》的 udn、《中國時報》等也都跟進，未來的決戰戰場明顯地會在數位這一塊，同時「開放新聞學」的概念正在推行，具體地結合大數據、新聞分析與圖表整合的「圖表新聞」也逐漸成為顯學，這些在在顯示出 318 學運揭示了媒體革命已在 318 當天就啟動了！

參考書目

ATTICUS W（2014 年 4 月 8 日）。〈太陽花學運：科技創新應用總整理〉，《政治 • 社會 • 科技》。取自 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34042/

Leave a Reply（2014 年 3 月 21 日）〈從阿拉伯之春到　318 反服貿：新世紀的公民運動科技運用〉。取自 http://news.wowdigi.com/?p=1261

孔令信（2014 年 9 月 19 日）。〈獨立未成　但蘇格蘭改變英國歷史〉，《蘋果日報即時論壇》１。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forum/20140919/472880/applesearch/

林麗雲編（2013）。《資料好神，敘說故事百千樣：資料新聞學開講》。臺北，臺灣：優質新聞發展協會。

徐依竹（2013 年 10 月 28 日）。〈因應紙媒發展即時新聞 ETtoday、NOWnews 各有對策〉，《銘報新聞》。取自 http://mol.mcu.edu.tw/show_2009.php?nid=158337

曾玉婷（2014 年 12 月 23 日）。〈數據視覺化成趨勢　新媒體部培養圖表記者〉，

《銘報新聞》。取自 http://mol.mcu.edu.tw/show_2009.php?nid=166372

游昇俯（2015 年 3 月 17 日）。〈記錄 318 學運出書　小英：政黨應警惕〉，《醒報》。取自 https://anntw.com/articles/20150317-3yw9

黃銘崇（2015 年 3 月 18 日）。〈回眸 318〉，《歷史學柑仔店》，取自 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5/03/ 回眸 318.html

黑崎（2015 年 03 月 19 日）。〈回顧 318 學運，看數位科技的三大應用〉，《數位時代》。取自 http://www.bnext.com.tw/article/view/id/35695

廖月娟、姜雪影、謝凱蒂譯（2011）。《賈伯斯傳》。臺北，臺灣：天下遠見。（原著 Walter, I. [2011]. *Steve Jobs: A biography*.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維基百科（n.d.）。〈中國時報〉。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6%99%82%E5%A0%B1

劉康彥（2015 年 3 月 17 日）。〈318 太陽花周年前夕　蔡英文：民進黨無意「沾光」學運〉，《ETtoday 新聞》。取自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0317/479731.htm

閻紀宇譯（2012）。《Amazon.com 的祕密》。臺北，臺灣：天下雜誌。（原著 Richard, L. B. [2012]. *One click: Jeff Bezos and the rise of Amazon.com*. New York, NY: Penguin.）

蘋果日報（2014 年 4 月 10 日）。〈太陽花籲政府傾聽人民議會意見書全文〉。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0410/376872/

癮科技（2014 年 4 月 8 日）。〈原來短時間我們如此強悍：太陽花運動科技應用創新總整理〉，《科技新報》。取自 http://technews.tw/2014/04/08/%e5%8e%9f%e4%be%86%e7%9f%ad%e6%99%82%e9%96%93%e6%88%91%e5%80%91%e5%a6%82%e6%ad%a4%e5%bc%b7%e6%82%8d%ef%bc%9a%e5%a4%aa%e9%99%bd%e8%8a%b1%e9%81%8b%e5%8b%95%e7%a7%91%e6%8a%80%e6%87%89%e7%94%a8%e5%89%b5/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6(1), pp. 229-250, January 2016

A Media Revolution Driven by 318 Student Movement: Reflecting on the Live Broadcasting Mode Established by Students with Flip-Flops and ipad

Kung, Lin-Shi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Ming 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As the 318 student movement reached a new milestone in the Taiwanese civil activism, the movement also led to a media revolution where the students wearing flip-flops using iPad also enabled a live-mode broadcasting revolution, which epitomiz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mainstream media. During Hong Kong Occupy Central movement, using similar Internet live broadcasting, students employed the social media afforded with greater connections and interactions, spreading their protest across the world, causing more influence, and also opening up a new pattern of citizen movement. By applying the Internet live broadcasting, fund-raising platform and O2O digital technology, the students successfully accomplished digital convergence and media integration. After the departure from the Legislative Yuan, these three digital technologies continue to be replicated by a number of experiments, generate lucrativ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formulate new media business models. The implications suggest that the future of media competition still lies in the digital.

Keywords: 318 student movement, Hong Kong Occupy Central movement, Internet live-mode broadcasting, media integration, digital convergence

* Email: lskung@mail.mcu.edu.tw
Received: 2015.07.19
Accepted: 2015.11.02

JCRP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傳播研究與實踐6(1)-09 孔令信.indd 250 2016/1/12 下午 10:57:27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6 卷 第 1 期．頁 251-269．2016 年 1 月
DOI: 10.6123/JCRP.2016.010

太陽花運動中臺大新聞所學生在「E 論壇」的實踐

林麗雲 *

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摘要

本文討論在臺灣社會的脈絡下臺大新聞所「E 論壇」的學生如何建構知識並加以實踐。本文用生命史的方法與受訪者共同建構其實踐邏輯。訪談結果指出，「E 論壇」學生是解嚴後世代，具有本土民主自由的價值，也關心公共議題，因而選擇進入臺大新聞研究所，也學習了編採的技藝與新聞專業理念；在太陽花學運中有鑑於主流媒體的偏差，自發組成報導團隊，並學會負責（如建立編輯守則以及共同審稿機制）以回應讀者的支持。本文建議教育宜加入學生主體性的討論並重視培育學生的批判意識。

關鍵詞：太陽花學運、新聞教育、生命史、實踐轉向、社運與媒體

* Email: lihyunlin@ntu.edu.tw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壹、學生如何「貢獻所學」？為何日夜守現場？

2014 年 3 月 18 日晚上，我負責的「當代新聞議題」課程中有一組學生為完成一項社會觀察的作業，選擇到「反服貿晚會」的現場報導。晚會結束時，他們原本可以打道回府了。但是當他們發現有人衝過警戒線占領立法院時，這組同學立即跟上，在第一時間透過個人臉書與 CNN 公民記者平臺（iReport），向國內外發布立法院議場內的最新消息。隔一天他們的同學也來到現場，思考臺大新聞所在重大事件中如何「貢獻所學，為臺灣盡一份力」（新聞 e 論壇，2014：39）。他們決定組成團隊報導學運現場，以「臺大新聞 E 論壇」的臉書網頁（以下簡稱「E 論壇」）為發布平臺，以簡單的帳篷作為編輯室持續工作，那時有同學連續 48 小時未闔上雙眼，有的自願值大夜班；還有的同學運動期間長「駐」（住）在議場內。期間警察曾來「關心」，黑道曾來鬧場，春雨下的編輯室帳篷也曾漏水倒下，但「E 論壇」同學不曾離去，持續報導現場，在 21 天內共發出 1,234 則新聞，得到讀者讚聲與轉發。兩週內臉書平臺的粉絲數從 800 人增加到 135,000 人，成為臺灣新聞媒體臉書專頁排行第 13 名，超過大部分媒體的粉絲專頁（張約翰，2014 年 3 月 30 日）。

「E 論壇」的表現受新聞教育界的肯定。同學們受邀到國內外新聞系所（如文化大學新聞系以及香港大學新聞系）分享經驗。政大劉昌德老師也指出：「E 論壇」等新媒體的興起，讓對新聞保有理想的前輩重新燃起希望（陳芎薇，2014 年 11 月 4 日）。而我作為老師也常想到，同學說到要「貢獻所學，為臺灣盡一份力」，那麼在教育中他們學到什麼？如何貢獻所學？在沒有課程與老師的要求下，為何願意犧牲自己時間，日夜守護現場呢？從中又學到什麼？

目前臺灣新聞教育的討論多從教育者的角色出發，很少討論學生的實踐。鍾蔚文與臧國仁等從建構論的觀點，主張教學不應只照本宣科地傳授知識（即所謂「陳述性」的知識），而應培養獨立思考，訓練敍事智能（即所謂「程序性」知識）」（臧國仁，2009：245；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1996）。面對社會的變遷，鍾蔚文（2012：47）主張，由於科技匯流已打破現有的產業界限，傳播學院各系所不應設立教育目標，而由學生自行建構。以上學者已指出教育應著重學生如何形成問題意識以及科技匯流的趨勢。

本文認為新聞教育的討論應關注學生在社會脈絡下如何建構知識，形成認知並加以實踐。理由如次：第一，學生是教育的主體，應探究學生如何建構知識。在本案例中，學生除了建構知識外，還在重要事件中加以實踐，因此教師在研究上宜向實踐轉向。第二，教育機構是在社會中運作，學生也是在整個社會中

成長，其中科技是關鍵因素，但也不是唯一。因此教師應著重社會脈絡的因素。本文分析在臺灣社會的脈絡下，臺大新聞所「E 論壇」的學生如何建構知識並加以實踐。

貳、實踐轉向的分析

Stern (2003) 在〈實踐轉向〉一文中指出，實踐取向指關注行動者實踐。這個取向超越結構與行動的二元對立，並視兩者有辯證關係。此取向的預設及對本文的啟示如下。

第一，行動者的實踐乃依情境而定，不具普同性。這個取向是基於維根斯坦的「語言遊戲」，行動者是在特定的情境與條件之中作為及產生知識 (Stern, 2003)。行動者有其成長的社會脈絡，形成了新的感知，在重大的事件中，成為「歷史的行動者」(Touraine, 1998)。在本案例中，教師不能用自己的經驗去想像新世代學生的知識建構與行動邏輯，而要嘗試理解這個世代學生如何在臺灣社會脈絡中形成特定的理念，以及如何受到時代召喚而有實踐。

第二，在社群中行動者的實踐，不只是個人的，也是共享的。個別的行動者有理性計算考慮自身 (Bourdieu, 1977)。但在社群中行動者經由相互瞭解，相互學習，相互依存，為了達成共同目標而形成共同實踐 (Barnes, 2001)。在本案例中，成員彼此是同學或學長姐有相近的價值理念，有共同的目標。他們自願付出，到場排班。在此時社群與個人目標合而為一，他們的行動不只成就了整體，也成就自己。

第三，行動者可藉由反身性思考理解自身的實踐。行動者有時意識到自己行動的理由與價值理念，必須說服彼此或者公開說明；因此研究者可從「公開的文本」理解其行動邏輯。但是行動者當下可能不加思索立刻行動，未能完全意識到自己行動的理由。從 Bourdieu 實踐的邏輯來看，人們的實踐是基於生命歷程中所累積的慣習，在特定時空下作用 (Bourdieu, 1977: 79)。但行動者之後仍可藉由反身性思考反省行動的邏輯 (Giddens, 1984: 44)。研究者可用生命史的方法進入行動者群體的歷史之中，與行動者共同建構其實踐邏輯（王麗雲，2000；Collins, 2001）。因此，在本案例中，研究者需訪談當事人的教育歷程，以及在面對重大事件時如何應用所學，加以因應。

本文的目的有二。第一，希望在新聞教育中增加學生主體面向的討論，以瞭解學生作為行動的主體，如何建構知識並加以實踐，其實踐邏輯為何。第二，太

陽花運動是臺灣當代重要的事件，而「E 論壇」是當時重要的媒體，研究者藉由訪談「E 論壇」學生，希望有助建構當代的集體記憶。

基於此研究旨趣，我訪談了「E 論壇」常駐記者與編輯，請他們反思學習以及實踐歷程，包括教育歷程為何？如何形成記者的理念？如何實踐？目前訪談對象共 9 人。臺大新聞研究所二年級和一年級是當時「E 論壇」的主力；因此訪談對象包括 2014 年 3 月時為臺大新聞所二年級（2012 年秋入學）的學生四位（代號 PHJT）以及當時為一年級的學生（2013 年秋入學）四位（代號 SGKM）。另一位研究所三年級學生（代號 Y）是「E 論壇」總編輯以及行政組成員，為關鍵人物，因此一併納入訪談。訪談時間是 2015 年 8 月到 9 月。為尊重受訪者的隱私與意願，本文分析以代號呈現（表 1）。

參、新世代　新實踐：自由而負責的主體與集體

一、解嚴後新世代：「民主自由如空氣跟水，自然存在」

「E 論壇」的學生在 1990 年前後出生，是解嚴後的世代。他們沒有經歷過威權統治，未曾經歷過國家機器對運動者的鎮壓（如美麗島事件、機場事件以及 1988 年的農民運動事件）。1990 年代臺灣進入本土化以及民主化，他們也開始受國民教育，進入政治社會化的階段；如 1996 年臺灣第一次民選總統時，他們進小學；2000 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時，他們讀國中。這段時間臺灣的國民教育內容也有改變，如國中教育在 1994 年新增「認識臺灣」內容，在 2001 年「鄉土語言課程」也列入選修（表 2）。本土教育有助部分同學形成本土認同。如 Y 回憶的，她很喜歡「認識臺灣」課程，特別留下「認識臺灣」的課本，也抄下那門課老師

年級	代號	職稱
三	Y	兩位總編輯之一
二	P	兩位總編輯之一
二	H	編輯、常駐記者
二	J	編輯、常駐記者
二	T	編輯、常駐記者
一	S	行政小組、編輯、常駐記者
一	G	行政小組、常駐記者
一	K	常駐記者
一	M	常駐記者

表 1：受訪者資料

講的臺灣歷史故事，「因為跟我生長的環境有關……」。Y 並提到，「後來覺得這門課有一點像是我臺灣認同的啟發」。K 也說到高中歷史教育中的影響：雖然中國史仍是考試的重點，但臺灣史已占了一定比例；她也珍惜臺灣史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在她的認知中，因為有上一代的努力，對他們這一代而言，臺灣的「民主自由如空氣跟水，自然存在」。二年級的 P 也說到，因為對本土以及民主價值的認同，在太陽花學運期間，看到黑箱服貿以及警察用水柱車攻擊運動者時，便跟一年級的 S 討論說道，「我們國家要沉淪了」，其所指的便是他們擔心臺灣的民主價值岌岌可危。

他們多在大學時期有了政治啟蒙，開始關心公共事務。在 2008 年到 2012 年期間他們讀大學。何明修與黃俊豪（黃俊豪、何明修，2015；Ho, 2014）指出，這段期間適逢臺灣二次政黨輪替，由於執政者在社會議題上傾向保守，公民團體參與政府決策的管道緊縮，社會運動復甦。社運的氛圍感染了校園，也影響部分受訪者。2008 年的野草莓運動時，T 是大一，曾參加靜坐，因為她感受到「大家都站出來，那我們也應該要出去」。P 的同儕是野草莓運動的核心成員，她也跟著關心，從運動中看到國家機器的矛盾，如她指出的：「很多民眾就拿國旗抗議，很多拉扯，但警方卻搶了抗議民眾國旗，並且丟到地上。但警察怎可以踩我們的國旗呢？」

他們在大學校園通識課程或講座中也接觸到社會議題的討論。從中發現到臺灣社會有許多問題（例如樂生院拆除、廢死、都更、性別政治、中國人權等議題），而且那些問題就發生在自己的周圍，他們認為身為公民應關心這些問題，

臺灣社會變遷	個人成長（研究所二年級學生）
1988 解嚴	
1990	出生
1994 國中教育增加「認識臺灣」課程	
1996 第一次民選總統	小學
2000 第一次政黨輪替	
2001 國中教育鄉土語言課程列選修	
2002	國中
2008 二次政黨輪替野草莓	大一
2011 秋反壟斷運動開始	大四上
2012 9 月 1 日反壟斷遊行	研一上
2013 7 月洪仲丘事件	研一下
2014 318 太陽花運動	研二下

表 2：受訪者大事記

不應漠視。正如 K 所言，在臺大教授劉靜怡的「本國憲法」課程中討論到樂生療養院保留爭議案[1]，K 意識到「（弱勢者的）人命關天，且就在眼前，希望能幫忙改變」。P 也提到，2009 年 10 月，臺大學生社團舉辦有關熱比婭的紀錄片講座，與談者主張應關心國際人權以及對抗極權統治，P 認同與談者的觀點，並自認從此政治傾向有了改變，由保守轉而批判威權，支持人權[2]。

二、選讀新聞所，要成為專業記者參與社會

他們在大三選擇未來出路時，決定選考新聞研究所。對大部分受訪者而言，新聞工作是參與社會的途徑，他們也考量自身的能力（如語文專長）及大學主修，希望能成為專業記者，以參與社會改革。如 K 說到，「希望能做一些跟公共利益有關的事情；而當記者是一種途徑」。有的同學受到一些記者典範的啟發，希望能效法；如 2009 年黃哲斌寫下〈我乘著噴射機離開〉，促進〈預算法〉修法，限制政府置入新聞；大三的 P 覺得「那篇文章寫得很熱血，看完受到震撼」，希望也能成為這樣的記者，促進改變。

問及他們為何選讀臺大新聞研究所？他們大多回答，基於系所的特色——新聞實務專業以及社會參與兩個因素。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2015）的課程特色包括（一）培養具備新聞傳播技藝智能與倫理，（二）訓練獨立思辯及尊重多元之公民意識。近年來臺大新聞研究所的師生積極參與媒體改革運動（如 2010 年的反置入以及 2011 年以來的反壟斷運動），其實也逐漸成為該所特色。受訪學生多表示，他們就是想學習成為專業記者並參與公共事務，而選擇投考臺大新聞所。如 G 所說的，在準備研究所時，「覺得臺大新聞所的那種使命感跟那種性格，好吸引我」、「對這個社會有意識，不是單純說我想要從事記者工作……。所以選擇臺大新聞所」。S 也說到，「覺得臺大新聞所是真的比較有在『發聲』，想像中運動性格比較強」。

他們大多提到臺大新聞所師生參與反壟斷運動對他們參與公共事務的示範作

1 樂生療養院是臺灣第一間痲瘋病院。自 1920 年代政府對痲瘋病人採行「強制收容，絕對隔離」，強制病患住進痲瘋病院。2002 年 3 月 18 日，捷運工程局自行政院衛生署樂生療養院取得其中部分土地。2003 年，第一波拆除。並要求樂生居民遷出。樂生保留自救會與漢生人權立法推動聯盟要求保留院區以及保障院民人權。

2 在 2009 年於 10 月臺大學生社團（大陸問題研究社、臺大意識報社以及臺大濁水溪社）舉辦《愛的十個條件》校園講座。這個紀錄片是有關維吾爾人權運動領袖熱比婭，揭發中共政權專政獨裁殘暴的本質和作法。講座與談者（徐斯儉、吳豪人以及范雲等）分別從中國因素、人權、性別及政治思想的角度討論應支持受壓迫者對抗極權統治（Rousseau，2009 年 10 月 23 日）。

用，包括參與的必要、充份的論述以及改變的可能。三年級的 Y 自 2011 年即參與反壟斷運動，說到：「看老師們做社會事件做得那麼用力，……會覺得那是一種示範作用，之後你要踩入這個線的時候會很堅定。」二年級 H 也說到，「老師那時候不只是表態而已，還會寫文章什麼去 defend，覺得不用去害怕表示意見跟立場，如果你有足夠的論述」。一年級的 G 從中體會到「個體可以產生影響力。……最黑暗的時候，仍有一點救世精神」。

他們認為，新聞所的理論課程有助訓練思考，培養價值理念，也奠定後來行動的基礎。K 提到理論課程讓她「有辦法去對話，算是思辯上的訓練。」T 指出，「理論內化在我們的價值裡面，我們後來之所以會留下來（在「E 論壇」報導），這一定是跟理論有關」。G 也說到理論課跟議題課的影響：「內化的東西，影響我們的主體性，還蠻強的。並且表現在實際的行動上面」。

學生們在新聞實務課程中學習到專業記者的技藝。他們指出，臺大新聞研究所的實務教師要求學生以記者的角色到新聞現場採訪，且要求正確報導，並不斷修稿，反覆求真。如 S、K、G 都提到，採寫課老師讓學生直接面對社會真實的情況，而不是只能處理特定的議題。K 提到，採寫老師要求報導要符合真實，「對每個新聞稿的字負責，就是事情發展到哪裡，就寫到哪裡，這是原則。即使別人愛怎麼樣去揣測或者猜測，但是我就不寫」。G 說到這些採訪規範對後來在「E 論壇」編寫的影響，「一些採訪原則規範，都是老師上課教的」。

有的學生（如 S）說到從實務老師身上學到記者的角色、獨立的精神。如 S 從實務老師身上學到對權力者無所畏懼。P 也談到在實務老師身上學到的理想與熱情，「從他們的身教或者言教，……除了累積技能之外，我可以一邊去思考，我想要成為一個怎樣的新聞人。我希望可以成為跟他們一樣很厲害，而且還是有理想、有熱血的記者」。

有的同學在實作中也感受到報導對社會的影響。如 J 在深度報導課程中曾寫了一篇關於國道收費員解雇的報導，一再被轉傳，讓他感受到自己寫的新聞能有影響，能幫助到弱勢者。正如 J 所說的：「很多收費員把這篇文章拿去重新轉錄，重新使用，或者表達立場。我就覺得，哇，原來記者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他說到「深採（課程）給我很大的 empowerment，讓我覺得說原來記者可以發揮某個程度的力量」。

此外，有的學生會聚在一起討論公共議題，並結伴參與。例如研三的 Y 感謝班上有一群同學能一起關心社會議題，自己雖不是主要參與者，但仍會跟同學一起到社會運動現場。研二的 H 也說到：「跟志同道合的同學一起參與公共事務，

這個風氣還滿強烈的，不是因為寫作業，要分析它……，大家真的關心這些事情。會用課餘時間去關心，甚至一起去參加」。研一的 G 也說到「同儕給我的教育，其實影響我還滿深的，就是共學」。

在 3 月 18 日前，新聞研究所學生在教育過程中學習新聞專業的理念以及新聞編採的技藝。他們也一直關心臺灣的社會議題，也被社會議題牽引著。這似乎也預示著，他們勢必會被太陽花運動影響。但是在 3 月 18 日之前，其實沒人曾預想過，他們將展開一場前所未見的新聞實驗。這個嶄新的新聞實驗的誕生，實取決於教育過程中形成的理念，讓他們在特定情境下有所實踐，並且在實踐中形成新的認知。

三、遇到太陽花，「我是記者，我要在現場」

2014 年春天，我在臺大新聞研究所開設「當代議題」，內容以討論社會議題為主。稍早 2013 年 10 月左右，當所上在排 2014 年春季的課程，我自告奮勇向所上說，「由我負責」這門課[3]。因為當時的臺灣社會，內外矛盾已越來越明顯，如在新自由主義下貧富差距日益惡化；而內部的矛盾又受到外部因素（如兩岸關係的中國因素以及權貴資本主義）影響而深化。在 2013 年 7 月，知識界即發起「重啟服貿談判」的連署。我希望在這門課程中能跟同學一起討論臺灣內外的問題，想像前路。課程作業中有一項「社會學習」，鼓勵同學選擇到重要社會議題的新聞現場，親身觀察並做成新聞報導，經老師修改後上傳到本所新聞「E 論壇」的臉書平臺。那年 2 月開學後，臺灣社會騷動不已（如 2 月 28 日共生音樂節，3 月 14 日反核遊行等），學生很容易找到社會議題的現場，也有不少組已陸續到現場觀察，並已完成「社會學習」的作業。

學生中有一組選擇前往 3 月 18 日立法院外「守護民主之夜」的晚會。因為在前一天（3 月 17 日）下午立法院內政委員會中，中國國民黨立法委員張慶忠以 30 秒時間宣布完成《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委員會審查，引發一群學生抗議，並於 3 月 18 日晚上 6 點舉辦晚會，抗議草率的審查程序。我將晚會的訊息傳給修課的學生。其中有一組三人（包括 P）正愁作業題目，便選擇到現場採訪、錄影；另外 P 的好友 H 也協助幫忙，因為如前所述，新聞所同學經常相約參與社會運動。當有人衝過警戒線、進入立法院時，這組同學以及來幫同學的 H 也立即跟上。當晚學生透過臉書私訊與我聯絡。P 說：「我們進去了」，我問道：

3 2014 年春季，也是最後一年設立這門課。因為本所課程改革後必修學分太多，未來將不再開設這門必修課。

「要留下來嗎？」P 說：「想要留，因為不想錯過任何情況」。我也回答：「那麼可以記錄，留做歷史紀錄」。因為，稍早我也曾到那場晚會，印象中現場沒有電視臺的 SNG 車，因此提醒 P 可以做記錄。

但學生做的遠遠比我預期的還多、還快。他們在新聞所實務課程所學到的「我是記者，我要在現場」的思維已內化在心中；他們當下判斷這是重要事件，便開始把現場的消息傳達出去。事後再請 P 回想當時為何會選擇留下？ P 說道：「我覺得那是一個直覺，……我就覺得我要把裡邊發生什麼事告訴外面的人，因為後來傳出警察要清場……好像進不來了」。P 回想當時為何會留下來，「因為一直不斷告訴我自己，我要成為一個好的記者，我要成為一個可以把很多事情告訴大家的記者。如果認真回想，就可能是新聞所教育等等這些累積。沒有前面新聞所教我這些東西，我根本不可能去」。

由於這群學生也是所謂的「網路原住民」，進場後也立刻在社群媒體上發布訊息。他們是與網路一起成長的一代：在 2001 年教育部大力推動臺灣學術網路（TANet）到中小學網路時，他們進國中便習慣使用網路；而且臉書在 2008 年起推出繁體中文版時，他們正好讀大學，也習慣在臉書上打卡、發動態。因此，在 3 月 18 日晚上，P 很自然地便在臉書上發布議場消息；當時很多人看，按讚以及分享。P 回想當晚的情況，「就是大家好像都瘋了，都看我的臉書，我一直跟大家說不要再留言了，不要再按讚了，因為我的電腦已經過燙」。這個小組之一的李嘉軒是加拿大僑生，英文流利，她之前在傳播理論課程上也曾報告過 CNN iReport 的公民新聞平臺，因此便將現場影音新聞改寫成英文稿上傳 CNN 平臺，讓 CNN 跟進報導。3 月 19 日中午，《蘋果日報》（蘋果即時，2014 年 3 月 19 日）又報導〈CNN 公民記者　清秀女流利英語報導學生抗爭〉，讓國際社會也能瞭解學生抗爭的原因；有 16,000 人對《蘋果日報》的這則新聞按讚數，也讓更多人注意到這場運動以及接下來即將誕生的「E 論壇」。

3 月 19 日早上，臺大新聞所許多學生到了立法院。有的學生擔心黑箱服貿破壞臺灣的民主，如 H 回想說，「國家亡了——那個時候真的是這樣覺得」。有的學生（如 T）認為應仔細評估才能通過服貿，如保障臺灣弱勢產業。有的人（如 M 與 J）認為，這是重大歷史事件（臺灣人民第一次占領國會），應在現場。如 J 回憶起 19 日早上在現場靜坐的心情，「我同學在議場裡面做報導，他們只有 4 個人，我那時候跟同學說，我真的好想要做一點事情喔，我自己也是學新聞的，……他們可以做，為什麼我們不能做」。在場學生建立 line 群組以保持聯絡，互相提醒注意安全。

當天晚上，學生在 line 群組中決定要報導現場。他們本來在現場靜坐，但總想做點事，便決定要「貢獻所學」。H 回憶當晚的情況：「大家在討論，才想到在這裡到底可以做什麼事情」。M 在 line 群組中提議來報導，因為「我在現場看到的不是媒體報導這樣（衝突），就是很平和，用蠟燭圍起來的臺灣島地圖，然後中間寫民主。滿溫馨的一個場面」。群組中同伴也紛紛支持，如 H 當時便認為，「社會上應該知道的是，不只是他們這些人衝進來打破了玻璃，而是為什麼這麼多人要在這個時間點做這件事情。我真的很怕沒有報這些聲音，這些聲音就不見了，因為沒有人在記錄」。他們共同的認知是：三一八是重大事件，但主流媒體的報導卻明顯偏差（把運動者建構成是「暴民」或是「無知」）。那些報導跟他們在現場看到的不同；因此，他們決定把現場參與者的聲音傳達出去，讓社會大眾知道。

許多學生受到此一訴求的感召，紛紛加入。那時候 line 訊息一出來的時候，J 本來就想可以做些事，便不加思索地說，「好，我明天（20 日）去」。K 在此時加入，她認同以上訴求，想法也是「報導別人不報的事情，我來報」。「我是記者，我要在現場。」且和 line 群組上的同學（如 S、G、M）很熟，知道如何跟他們合作。

他們認為主流媒體未能呈現參與者的心聲，因此他們主要報導的方向便是報導現場參與者的聲音。他們首先做的是「百人大告白」，即訪問現場參與的人。如 J 說，「先去訪問在場參與的人，為什麼會來到這裡、什麼樣的背景，為什麼會選擇待在這裡？在那邊待多久了？是因為什麼狀況而來的，從哪裡來？」

同學們當下也決定用「臺大新聞 E 論壇」的臉書平臺發稿。「E 論壇」是由臺大新聞所設立，用來放學生課堂作品，由所的經費聘用學生擔任編輯，作品通常需經教師校閱。但學生當下決定使用此平臺，並請編輯同學交出帳號與密碼。事後問及為何選擇使用「E 論壇」，Y 回憶到，幾位同學討論後，曾比較現有與新聞所相關的臉書平臺，「E 論壇」已有八百位粉絲，比其他平臺更有效果。他們於是便向負責編輯的同學要來帳號密碼，開始上傳新聞稿並未跟所上報告。Y 回憶說：「如果那時候有人問我，這不是新聞所管的嗎？我可能會楞一下，就是我知道，可是我根本沒有想起這件事。」直到隔一週，要上傳議題課程的資訊到「E 論壇」（與學運無關），他們才驚覺已「占領『E 論壇』」。他們後來想到的說法是「平臺本來便是用來放學生作品」。「如果那時候老師們問，就說都是臺大新聞所的學生作品嗎？……不是 learning by doing，就是把作業 po 上去嘛？」然而老師們當時並沒有追問「E 論壇」的使用；實際上也有多位老師到現場關心，P 表示感謝，「因為老師們就是用這種心情去支持我們，我是覺得還滿感謝的」。

他們當時只是想寫場內的新聞故事，並不害怕或擔心。他們指出，臺大新聞研究所給他們的理念與訓練，讓他們不害怕。首先是新聞記者專業理念支持他們。如 Y 所說的，「可能大家有害怕吧，可是那個害怕最後都會被你的身為一個記者的勇氣給蓋過去了」。其次，新聞所的理念也支持他們，負責行政事宜的 Y 說道，「對新聞所做中學有很深的體會。就是說你當下缺什麼，一次兩次不好的地方就修正，就是會一直 run 下去，見招拆招」。他們在實務課程中已有現場報導的經驗，有信心能獨立寫稿，上場作戰。如 S 所說的，「那時也不會覺得那是一件困難的事，那些技巧我們都會，所上的攝影機和相機都會用」。J 說，「我不是抱持著學習的心態，而是我有這樣的專業，我想做這件事情」。如 H 所說，「也因為（之前）老師不會因為我們是學生，然後就覺得你這個可能訪不到，（因此）不會覺得自己是學生記者，就是在做記者」。

他們雖不害怕，但也想到萬一被警察驅離，必須做好準備，保護自己。他們尋找內外資源。包括自己建立論述，如發出聲明，主張我們是記者，在現場報導是有正當性的。Y 指出，「要寫聲明稿，代表就是有中心思想跟有立場的組織，挺起腰骨來，不能被欺負的。是一個理念型驅動組織，然後不要因為我們是學生就小看我們」。他們也請了新聞所畢業學長擔任律師，也連絡新聞法律的老師以及學運現場的義務律師團，以尋求法律協助。

四、是記者，也是「E 論壇」記者

這群學生基於自我認同（記者）與集體認同（「E 論壇」記者），自願日夜到場。學生們思考的主體包括「個人作為記者」，也包括作為「E 論壇」的「我們」。首先他們的自我認同是記者，認為在重要時刻記者要在現場，能參與歷史。同時，他們也認同自己是「『E 論壇』的記者」，並以它為榮。如 J 講到的，「我待在現場，就會覺得說，哇，可以報導，參與是榮幸」。J 也說到，很多人說「只看你們的新聞」，而且訪問對象也說「你是『E 論壇』，好啊，好啊」，並基於信任接受採訪。

因為對「E 論壇」的認同，他們希望「E 論壇」這個臨時的組織能運作良善。他們自我期許要盡量做好，讓其他的伙伴容易上手，也讓「E 論壇」能上軌道。也就是在此一集體認同下，Shirky (2008) 所說的「無組織的組織」便運作起來。

新聞所二年級的學生必修的課程較少，因此有的學生時間較多，幾乎一直在現場編輯室。H 與 T 常常連續 48 小時以上在編輯臺不眠不休。H 在編輯臺時，

會主動整理好未來幾天的流程，對她而言，這是實現自我，也體貼伙伴。H 回憶當時的心情：「當做一種實現自己對於新聞想像的機會，就是其實自己在享受。也希望我可以，用最大的努力讓別人不會那麼累」。M 也說道，因為有相互支持的伙伴關係，休息時也一直掛念現場，「因為伙伴關係，看大家都那麼努力認真在做這件事情，會被影響、會被感染。休息看到別人還在熬夜、採訪、還在爆肝，心裡會有一種焦慮感，反正就是想要跟大家一起」。或是「line 的群組中，一覺醒來就發現有上千條，就是幾百條、上千條的訊息，就會很焦慮，就是從頭開始看一遍，然後再跑去現場」。

一年級的學生雖然需要到校修課，但有的學生（如 S）向老師請假，幾乎每天都到濟南路現場。G 幾乎連續二十一天都在議場。S 則每天到現場。K、M 與 J 以及其他學生，因為擔心晚上人手較少，會到帳棚編輯室值班。他們希望「E 論壇」能正常運作，即使人不在現場，也會掛心現場沒人。如果 line 群組上發出現場需要人力，他們便會過去。在此，個人與集體認同之間並無衝突，因為有集體（「E 論壇」）在，個人能實現自我（當記者，好好寫稿，發文的效益更大），因為希望「E 論壇」能做好，所以個人也會為「E 論壇」付出努力。

基於上述的個人與集體認同，他們能協作完成重大事件的報導。例如，在 3 月 23 日晚攻行政院的大事上，當天下午「E 論壇」line 的群組已發出緊急動員，因為傳出當天晚上會有大事（即部分運動者將攻占行政院）。許多沒有值班的伙伴都回到濟南路編輯臺待命。K 與 J 後來被分配負責到行政院正門報導運動者與警察對峙的情況。他們兩人回憶現場情況：當時憲兵警察環峙，兩人手拉手，保護彼此，也免被人群沖散，他們跟著人群進入行政院；因為隨時在移動，無法寫稿，而且網路擁擠，也不能用 line 傳報導，於是用手機把眼睛看到的景象打電話回報濟南路編輯臺，讓留守濟南路帳棚內的伙伴可以寫稿。K 說，「想到的是，就是怎麼在最短的時間裡面得到想要的東西，回傳回去」。J 說道在行政院前如何拍下警察、長棍、水柱車的畫面，「前方就是裝備好的警察，帶著槍棍，我們是第一個看到，就馬上打電話說，是一生第一次看到長棍」。到了凌晨四點，J 也衝到前面，拍到水柱車噴出水柱的畫面，直到 K 拉著他快走。J 說到當時的心情：「我要馬上拍到，然後傳回去，把狀況傳回去」。

他們冒險到現場，協助完成攻占行政院的新聞稿。回想起來，他們認為值得這樣拚命去做的理由，即包括個人實現以及集體實現。如 K 與 J 所講的，「我們參與了，到了現場採訪，把消息傳出來了」，以及對論壇伙伴的集體認同，「我們信任編輯臺的記者與編輯會如實報導，一起把事情做好」。J 也講道：「我以

『E 論壇』為榮」。他說道，「我覺得在第一線，我拍到照片，我能夠傳回去是好事，能夠登上來那更榮幸，至於有沒有登上我的名，那是其次。因為我們就是為了這個，一個 team 在努力，人家所看到，不是只看到你個人而已，是看到整個 team」。

五、自主與負責的主體

當「E 論壇」開始運作時，便希望是以學生為主體，獨立於各方勢力。學生在接受訪談時表示，他們認為「E 論壇」應是獨立的報導者，包括獨立於任何勢力，包括政黨、運動團體以及老師等。同學所認知的主體性，包括「我們就是我們，不跟社運有關，也不跟老師有關，也不跟政治人物有關，是當時我感受到的主體性」。他們在臺大新聞研究所學到媒體要獨立於政治與商業利益。他們也不想成為運動團體的媒體，因此不會直接發出各團體的聲明稿。「E 論壇」僅限向臺大新聞研究所師生募集資源，不接受外界捐助。Y 說到，因為「怕有心人要透過募款來干預我們，就算他不會干預我們，也怕人家會不會懷疑純潔度」。

他們也希望獨立於所上老師，不希望老師干預。學生們都指出，一開始便沒有老師直接參與；基於師生間仍有權力關係，如果老師中途進來了，便會轉由老師為主導。他們大多感受到所上老師的信任與支持，也感謝老師在精神上與物質上的支持[4]，但希望老師不干預。如 Y 所說，「新聞所老師給我們很大的空間，很感謝老師們不干涉」。如果當時有老師認為不妥，他們仍會報導，正如 S 所說：「我們會另外成立一個平臺，但還是會報導」。G 則說，「想一些方式跟老師溝通，或者達到妥協，但是我覺得我們可能不會輕易說我們不要了」。

由於讀者（包括老師）的迴響與支持，學生們也負責。在此一自由自主的環境中，他們學會負起責任，認知到「因為讀者的信任，所以我們對於發出去的訊息相當謹慎」，報導均以真實為先。常坐編輯臺的 H 說到，「傳播出去的訊息，盡量每個環節希望有經過確切的查證，因為我們以前交稿子的時候，老師也會問（各個環節），然後都改得很細。」（H）《街頭守門人》一書（新聞 e 論壇，2014：89）提到，當粉絲數越來越多時，同學們相互提醒（編輯呂伊萱語）「現在貼文章出去，一秒鐘就會有幾百人看」，提醒事項中還包括「魏揚的『揚』，是手部揚，手部揚，手部揚，不要寫錯！」。

而且他們為了避免重覆同樣的問題，特別為此訂下編輯採訪守則。P 提到大

4　在退場後，E 論壇也另建一個「臺大新聞所『E 論壇』的臉書平臺」還給臺大新聞所。

家知道在專業倫理必須遵守某些原則，因此會提出來在 line 群組上討論。Y 回憶到建立守則的脈絡。「某一天晚上在 line 群組上討論特別多，如照片可不可以壓圖壓字，可不可以修圖，評論性文章可不可以發，開一個會，把很多要共識的事情講一下」，因此便在濟南路街頭召開戶外編輯室會議，決定主要原則。

他們為了減少錯誤也逐漸發展出共同審稿制度，並在實戰中形成扁平型的組織。剛開始在分工尚不明確階段，每個人都寫稿，但為了確保品質，便互相校對。之後稿量越來越多，才發現必須有記者與編輯群的分工。如 H 所說，「久了大家發現其實我們需要編輯臺統合跟溝通，後來就慢慢開始分工」。而且由於彼此理念相近，溝通成本低，如 H 所言，「沒有什麼價值上的衝突，又有信賴基礎，因此溝通成本低」。再加上彼此年紀相近，組織上也形成了平等的溝通型態。S 即說，我可以直接問學姐：「為何你要這樣改我的稿。」而且他們也善用網路協作軟體（如 hackpad 等）共同協作與編輯。在這種彼此信任以及善用科技的條件下，造就了重要的組織模式——扁平的組織。Y 說，「編採扁平化，記者編輯地位平等，是後來在實踐中慢慢去發現有這個好處」。J 說，「這個合作關係真的很難得，因為大家是平等的，真的是平等的，我覺得這個非常難得」。

六、新認知：「好的新聞，是有人看的」

隨著太陽花運動退場，「E 論壇」卸下濟南路的帳篷，學生們回到了校園。他們曾討論思考「E 論壇」的未來。第一是成立公司，正式成為新聞媒體。第二是成為社會企業。第三是群眾募資，完成新聞專題以及「E 論壇」回顧專書。他們選擇第三種，主要考量兩個因素：第一是他們必須完成學業。研究所一年級的學生仍要上課，研究所二、三年級的學生則要寫論文，有的要出國當交換生。第二是目前仍然沒有可追尋的新媒體永續經營模式。Y 便說到，「『E 論壇』的困境，就是大家沒畢業沒有錢，沒有經驗，社會歷練跟人脈都還不足以去撐起一個正式的媒體」。因此，他們選擇將記錄平臺的形成與運作，出版成書，名為《街頭守門人》。

也許有人目前看著「E 論壇」的粉絲數停在最高的 135,000 人，也沒有再更新文章，會以為：「『E 論壇』不是死了？」但是學生們經歷「E 論壇」後有了新的認知，也將帶著這樣的認知與經驗，實踐新聞專業。

他們在「E 論壇」實踐中創造了認知：「好的新聞，是有人看的」。在 2000 年以來，臺灣主流媒體控制在財團手中，多採取短線操作，如精簡人力，減少公益新聞，強調聳動、獵奇以增加收視率，甚至接受新聞進行置入性行銷，以假（廣

告）亂真（新聞）。學院新聞教育高呼重視新聞專業以及反對置入行銷；這種呼籲或被認為如暮鼓晨鐘，或被認為不符業界所需，甚至被大財團嘲諷「Show me the money!」但在新聞專業危機中，「E 論壇」學生創造一種可能的模式：在特定的條件下（主流媒體無法滿足讀者需求），他們排除各界（媒體主、政黨、社運團體等）壓力，與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基於新聞學基本原則（正確、平實以及查證），可以得到讀者的支持與回饋，讓他們相信好新聞是有人看的。Y 即說到，「『E 論壇』真的是一個美好的烏托邦，沒有政治勢力、商業勢力，也沒有業配，也讓我知道說好新聞是有可能的……，不需要太獵奇」。T 也認知到，「只要你有心寫好新聞，基本上大家會支持的」。J 也說到，「哇，原來平鋪直敘……，就是一個確實的東西，人家會去看，而且他們會去討論，會發揮影響力。不一定要聳動，詞藻不一定要很怎麼樣……」。

這樣的認知與經驗，讓他們未來更有信心實踐新聞專業。Y 說到「E 論壇」對未來工作的影響，「如果經歷過那個美好的烏托邦，會知道它可能實現的，可以再堅持久一點」。J 曾經在 3 月 23 日時報導占領行政院，他指出：「曾經在最前線，以後當記者並不害怕。頂多就是被噴或者被打」。G 說到「E 論壇」讓她相信自己的能動性，如她所說的，「經歷『E 論壇』就會覺得，其實人生沒有什麼不可能的，只要自己有主體性跟能動性。……只要我真的關心一個議題，我就可以發揮自己的力量」。

有的學生也期待有機會能延續「E 論壇」。他們認為，從「E 論壇」中瞭解在特定條件下（如社會需求與資源等）獨立媒體有生存機會。他們也正在累積更多資源（包括培養自身的技藝），等到社會有需求時再聚首，延續「E 論壇」。G 即講到：「『E 論壇』是未盡之夢，一直都沒有決定要劃下句點，……在等一個時機，……到時候再把大家召集起來」。

肆、結語

本文的發問是來自作為新聞所教師的問題：在太陽花學運期間，臺大新聞研究所的學生是如何「貢獻所學」？為何自發地組成報導團隊，日夜守護現場？為何學生有如此的動能？但過去臺灣新聞教育的討論多以教育者的立場出發，未分析學生如何建構知識、從事實踐。本文採取實踐取向，分析在臺灣社會的脈絡下學生如何形成理念，建構知識、形成認知並有所實踐。

經由與學生的再次對話與訪談，我有機會再度認識我的學生。「E 論壇」學

生理念的形成是累積的過程。他們是解嚴後世代，在臺灣民主化與本土化時受國民教育，重視本土民主自由的價值，讀大學時適逢二次政黨輪替、社會運動興起，他們關心社會議題，希望參與社會，並選擇專業記者作為參與的方式。因為臺大新聞研究所標舉新聞專業取向，以及近年來持續參與媒體改革而選擇了它，進來新聞所後也學習了編採的技藝與新聞專業理念，並遇到相近理念的同儕相互切磋。

具有上述特質的學生，在遇到太陽花學運時，共同的認知是：「在重大事件中，主流媒體不報，我們來報」。於是他們投入報導，建立了自我認同（是記者）以及集體認同（也是「E 論壇」的記者），因此會自主排班，協力報導。他們具備報導者的主體性，希望能獨立於任何勢力，並且在自主中對讀者負責，如建立編採守則以及共同的審稿機制」。

從以上分析可知，「E 論壇」得以在三一八學運期間表現受到矚目，主要基於以下因素。第一，主體的存在。參與的學生均是解嚴後出生，認為自由民主應是自然存在的，不容被剝奪。他們想要參與社會，專業記者是一種途徑與方法。第二，具備報導者的理念與技藝。他們新聞教育中也學到新聞工作者的理念與技藝。第三，具有報導意識，即在重大事件上找到資訊的缺口，報導主流媒體未能呈現的。這些條件缺一不可。雖然這些條件以及「E 論壇」的模式未必能複製，但這些精神與經驗將長久存在這段期間「E 論壇」成員的心中。

經由以上分析，我也反思了本個案對新聞教育可能的啟示。首先，在新聞教育的討論上宜加入學生為主體的觀點。教師應瞭解新世代的成長經驗，知識建構與實踐。老師與學生成長於不同世代，自身的經驗相當不同。例如，在本個案中，學生是解嚴後出生的世代，視自由民主如空氣般自然，不知警備總部為何物，能善用社群媒體以及協作平臺。在這個理解的基礎上，老師能做到的是支持與信任。而學生也能在此信任基礎上為自己負責。

其次，當學生意識到自我的主體性並且自動自發時，老師可以在教育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從本文的分析可知，學生大多因在教育的過程中（特別是大學時期）接觸到批判性的課程或討論，受到啟蒙，感到公共事務與自己相關，因而關心社會議題，能從自身角度提出報導意識，進而有所實踐。誠如批判教育學 Freire (2000) 所說，老師應指出社會問題，提供分析觀點，讓學生反思到這些問題，從自身的情境發展他們的問題意識，並據此提出行動方案。因此，若要培育學生的社會關懷與社會參與，課程宜加入社會議題相關的內容，並藉此培養學生的批判意識。

傳播研究與實踐6(1)-10 林麗雲.indd 266 2016/1/13 下午 01:20:38

再次，教育機構也應思考在社會變遷中的角色，並據此制定其教育目標。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不應與社會脫節，而應具體面對並回應社會變遷。系所的教育目標與學生的實踐間，具有辯證關係。在本個案中，臺大新聞研究所的目標是培養專業新聞工作者，在近幾年師生並有共同的社會實踐。具有此理念的學生選讀了新聞研究所，受老師同儕的影響，強化報導者的理念與技藝。而他們的實踐，也成為新聞教育中重要的實驗案例。

參考書目

Rousseau（2009 年 10 月 23 日）。〈蘊釀守護臺灣民主自由的新動力：記《愛的十個條件》臺大校園放映會〉，《PeoPo 公民新聞》。取自 http://www.peopo.org/news/41268

王麗雲（2000）。〈自傳／傳記／生命史研究在教育上的應用〉，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主編），《質的研究方法》，頁 265-305。高雄，臺灣：麗文文化。

張約翰（2014 年 3 月 30 日）。〈2014.3.30 臺灣新聞媒體臉書專頁排行〉，《張約翰臉書》。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2766545868289&set=a.10152448015708289.1073741832.799728288&type=3&theater

陳苧薇（2014 年 11 月 4 日）。〈《街頭守門人》以新聞記錄 318 運動〉，《蘋果日報》。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1104/499718

黃俊豪、何明修（2015）。〈馬政府時期的環境抗爭樣貌（2008-2012）：一個抗爭事件的分析〉，《思與言》，53（2）：177-216。

新聞 e 論壇（2014）。《街頭守門人：臺大新聞 E 論壇反黑箱服貿運動報導紀實》。新北，臺灣：衛城。

臧國仁（2009）。〈關於傳播學如何教的一些創新想法與作法——以「傳播理論」課為例〉，《課程與教學》，12（3）：241-264。

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2015）。〈教育目標〉，《臺大新聞所網站》。取自 http://www.journalism.ntu.edu.tw/p/curriculum/course%20map

鍾蔚文（2012）。〈尋找傳播教育的新典範〉，《傳播研究與實踐》，2（2）：41-50。

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1996）。〈傳播教育應該教些什麼？——幾個極端的想法〉，《新聞學研究》，53：107-130。

蘋果即時（2014 年 3 月 19 日）。〈CNN 公民記者 清秀女流利英語報導學生抗爭〉。

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0319/362503/

Barnes, B. (2001). Practice as collective action. In T. R. Schatzki, K. Knorr-Cetina, & E. von Savigny (Eds.), *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 (pp. 17-28). London, UK: Routledge.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llins, H. M. (2001). What is tacit knowledge. In T. R. Schatzki, K. Knorr-Cetina, & E. von Savigny (Eds.), *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 (pp. 115-128). London, UK: Routledge.

Freire, P. (2000).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NY: Continuum.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o, M. S. (2014). The resurgence of social movements under the Ma Ying-jeou government: A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perspective. In J. Cabestan & J. DeLisle (Eds.), *Taiwan president Ma Ying-jeou's first term in office* (2008-2012) (pp. 99-119). London, UK: Routledge.

Shirky, C. (2008). *Here comes everybody: 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 New York, NY: Penguin.

Stern, D. G. (2003). The Practical Turn. In S. P. Turner & P. Roth (Eds.), *The blackwell guidebook to 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pp. 185-206). Malden, MA: Blackwell.

Touraine, A. (1988). *Return of the actor: Social theory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6(1), pp. 251-269, January 2016

The Practices of Students at "NTU E News Forum" in the Sunflower Movement

Lin, Lihyun*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in Taiwan's social contexts, how the students of E construct knowledge and put into practices. The researcher adopts the method of life history to construct the logic of practices with the interviewee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the students belong to the post-martial law generation, have largely embraced democratic and free values, concerned with public issues, and chose to enter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where they have obtained professional crafts and ideas. In the sunflower movement, witnessing the bias of the mainstream media, they organized themselves to cover the movement. They have established editorial guidelines and collaborative review mechanisms to be responsible to the reader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educators can consider the students' subjectivity and nurture their critical consciousness.

Keywords: Sunflower movement, journalism education, life history, practice turn, social movement and the media

* Email: lihyunlin@ntu.edu.tw

JCRP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傳播研究與實踐6(1)-10 林麗雲.indd 269 2016/1/13 下午 01:20:38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6 卷 第 1 期．頁 271-288．2016 年 1 月
DOI: 10.6123/JCRP.2016.011

從小說話語看眾聲群像：評介巴赫汀之《對話的想像：四篇論文》

Catching Sight of Life World from Novelistic Language: Reviewing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by Mikhail Bakhtin

王孝勇 *

Wang, Hsiao-Yung

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Providence University

壹、前言

《對話的想像：四篇論文》很可能是國際 Bakhtin 學術研究社群中，公認為最具有代表性且旨意磅礴的經典著作。原因除了是本書大名鼎鼎的兩位譯者，分別是普林斯頓大學的 Caryl Emerson 教授與哥倫比亞大學的 Michael Holquist 教授，皆擅長將 Bakhtin 原以俄文書寫的論著翻譯成英文[1]；另獨自擔任本書編者的 Holquist 細心地從 Bakhtin 看似焦點各異的四篇論文中找到共向並賦予「對話的想像」此一命名，這使得英語世界或無法直接閱讀俄文的學術研究者，有機會系統性地認識 Bakhtin 諸如對話（dialogue）、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等現已廣

* Email: hywang2@pu.edu.tw

1 除了本文評介的專書，Emerson 教授另獨自翻譯 Bakhtin (1963/1984a) 的《杜斯妥也夫斯基詩學問題》（*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她還在 2014 年 7 月於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辦的第 15 屆國際巴赫汀年會上，發表與 Zhernokleyev 共同翻譯的 "Bakhtin's Defense" 一文，文章內容是 Bakhtin 於 1946 年提交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院（Gorky Institute of World Literature）的博士論文答辯過程（見 Bakhtin, 2014）。Holquist 除了有多本引介 Bakhtin 學說至英語世界的著作（見 Clark & Holquist, 1984; Holquist, 2002a），他與另位學者 Liapunov 還共同翻譯了 Bakhtin 早期哲學研究的幾篇論文並集結成書（見 Bakhtin, 1919/1990）。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為人知的時髦概念。Bakhtin 如何廣博深入地從語言學、歷史學、社會學等視角建構「小說理論」，並據此捕捉日常生活眾聲群像中既多樣獨特又具對話共識的語藝實踐和語藝展演，是本書最核心的理論與實務關懷。這更是 Bakhtin 學說近年在國際引發討論熱潮的主要問題意識。

貳、想像對話、想像巴赫汀

俄國語言哲學家 Mikhail Bakhtin（1895-1975）可說是相當多產用功的思想家。劉康（1995：62-63）回顧 Bakhtin 一生的思想脈絡，認為至少可從三個階段劃定 Bakhtin「輪廓分明、界線清楚」的理論體系，分別是早年的哲學——美學階段、1920 年代的語言學轉向階段，以及 1930 年代以後以小說敘事為核心、眾聲喧嘩為主旋律的文化理論建構階段。

事實上，雖然 Bakhtin 的思想歷程確實如劉康所勾勒，於不同時期（或因為不同的生命歷程轉折）有或異的焦點，但日常性語言的「對話」始終是他縈繞於心的課題。《對話的想像：四篇論文》所收錄的文章以小說話語的對話性（dialogicity）為研究素材，其中的主題規劃和字裡行間都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 Bakhtin 的哲學美學訓練、語言哲學體系，和文化理論視野。而就編者 (Holquist, 2002b: xxxiii) 所言，四篇論文排列的順序乃是以由淺入深為原則。

寫於編者引言後的第一篇文章〈史詩與小說：建立小說研究的方法論〉（Epic and Novel: Toward a Methodology for the Study of the Novel）(Bakhtin, 2002b)，寫於 1940 到 1941 年間。文章內容主要在透過對比小說 vs. 史詩這兩個 Bakhtin 眼中截然不同的兩種文類，勾勒小說話語的基本結構和特質。寫於同年間的第二篇文章〈從小說話語前傳談起〉（From the Prehistory of Novelistic Discourse）(Bakhtin, 2002d) 延續第一篇文章的主旨，但改從語藝歷史的角度追溯小說話語主要在古希臘、羅馬時期的發展，以及其中所體現的語藝意識。寫於 1937 到 1938 年間的第三篇文章〈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型〉（Forms of time and Chronotope in the Novel）(Bakhtin, 2002c) 則以 Bakhtin 獨創的字眼 “chronotope” 為主軸，藉由探討文本結構中時間與空間的內在連結性，推敲人的形象（the image of the man）如何透過不同歷史階段所遺留下的小說作品和語言文字，體現為獨特的存在圖像。這篇文章除了被認為是 Bakhtin 正式碰觸到文字圖像化（word image）、視覺性（visuality）等與當代傳播情境極為密切相關的議題 (Antonova, 2003; Morris, 1994)，Bakhtin 更試圖拓展綿延其歷史分析的縱深，透過中世紀民俗文化的

（folkloric）時空型替小說話語如何具有社會和政治的批判意識留下了餘韻。壓軸之作〈小說中的話語〉（Discourse in the Novel）(Bakhtin, 2002a) 雖寫於最早（1934 到 1935 年間），但卻是 Bakhtin 學術創作的巔峰成果。文中 Bakhtin 精湛地列舉出文化轉型時期必然出現的向心力（centripetal forces）vs. 離心力（centrifugal forces）的對峙抵抗態勢，並以「眾聲喧嘩」這個具有社會學語意的詞彙取代文學術語「多音複調」（polyphony），直指語言敘事、小說話語不僅是個人聲音的自由創意體現，更是對獨白主義的破除和歷史變遷的記載指標。對此論者指出，Bakhtin 從眾聲喧嘩看到的對話觀，儼然是語言暴力、神話霸權的解體崩潰，以及文化專制主義的窮途末路（劉康，1995；Clark & Holquist, 1984; Emerson, 1997; Holquist, 2002a, 2002b）。本篇文章除了是 Bakhtin 學術成就的高峰，更開啟了他後續以中世紀小說家拉伯雷（Rabelais）的狂歡化（carnivalization）筆法為例，具體而微地分析小說話語如何以降格卑賤（degradation）、去神聖化（uncrowning）等語藝策略嘲諷並顛覆主流的意識形態定見之後續研究歷程（王孝勇，2011；Bakhtin, 1965/1984b）[2]。

上述四篇論文的篇幅長達 422 頁。加上編者附於書末的名詞解釋（glossary）和索引（index），《對話的想像：四篇論文》一書無論就實體分量或是理論重量來看，都堪稱鉅著巨作、擲地有聲。而 Bakhtin 在長達四百多頁的文字書寫中，留給後人什麼樣的對話想像和 Bakhtin 想像？一般認為四篇論文在「對話」這個概念牽引下，環環相扣地指涉幾個共通的主題，例如：小說話語的本質和演化發展、小說話語的時間和空間、小說話語和其語藝歷史演進過程中所反映的變動語言觀和語藝實踐 (Clark & Holquist, 1984: 275)。而 Bakhtin 何以對上述主題熱切著迷、依戀不已，甚至願窮盡一生精力辛苦耕耘？這與他個人的生活處境和生命歷程轉折息息相關。這四篇論文皆寫於 1930 至 1940 年代之初。當時 Bakhtin 與其妻子 Elena Aleksandrovna（兩人在 1921 年於舊俄時代的度假小城 Vitbsko 結婚）在史達林統治下（1923 ~ 1953）被流放至哈薩克共和國西北部、西伯利亞之南的荒涼貧瘠小鎮 Kustanai。在那裡，Bakhtin 深受骨髓炎所苦，貧困輾轉地開始了往後十多年的流放顛沛人生。

2　本文上述對於四篇論文的介紹，僅為了引介其輪廓內容。本文第肆部分將對四篇論文有更系統性的評述。

參、流放顛沛時期的巴赫汀，與 1930 到 1940 年代的蘇聯[3]

列寧於 1924 年初逝世到 1930 年代初史達林開始「大肅清」（the Great Purge）的五六年間，蘇聯的文化思想界被認為仍是較為開放的。當時的知識份子信奉先前革命主義者「走向民間」的價值理念，關心俄羅斯文化傳統的現代化轉型問題，以及人類社會價值觀劇變的過程（劉康，1995）。在這樣思想勃發、批判意識高漲、知識分子入世的年代，Bakhtin 與其眾多學術界友人於列寧格勒市二度組織了巴赫汀學圈（the Bakhtin circle；年代為 1924 到 1929 年）[4]。他們經常聚會往來，並喜好從古典和德國哲學（主要是康德）的脈絡傳統進行知識討論交流。此時的 Bakhtin 雖然名不見經傳，但與其他學圈成員頻繁密切的學術研討奠定了 Bakhtin 深厚的哲學基礎。巴赫汀學圈所累積的豐碩成果最後於 1929 年以 Bakhtin 的真名發表（亦是 Bakhtin 第一本署名出版的著作）。書名於 1963 年再版時更改為我們現在看到的《杜斯妥也夫斯基詩學問題》（*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Bakhtin, 1963/1984a）。然而，這本書發表不久，Bakhtin 就被捕了，巴赫汀學圈也因此被迫解散。

Bakhtin 被指控的罪名至少有兩個。第一個罪名指控其參與反政府的地下宗教團體活動（劉康，1995：58），第二個罪名指控其著作和思想「腐蝕青年」(Clark & Holquist, 1984: 254)。這兩個欲加之罪都透露出 Bakhtin 在史達林政權眼中有明顯的反權威性，甚至可能造成政治統治上的威脅。審判拖了 1 年。當時已罹患疾病的 Bakhtin 後來被判決流放至哈薩克，刑期為 6 年。1930 年 Bakhtin 偕同妻子到抵了 Kustanai。他被禁止一切教學活動，也被剝奪所有可能的出版機會。史達林當局甚至不允許外人探訪政治犯，被流放者也不得住在莫斯科一百哩以內的區域。當時 Bakhtin 和妻子主要靠打零工維生。所幸 Bakhtin 自小在父親那裡學來記帳會計技能，讓他後來找到了一份在地區消費合作社擔任統計員的職務。

6 年刑期屆滿後，Bakhtin 由於承受著「流放者汙名」無法拿到重回列寧格勒的居住許可，更難以找到穩定收入的工作以維生。後來好不容易地在長袖善舞、有力好友 Medvedev 的推薦幫助下，Bakhtin 於 1936 年拿到一所學校教育學

3 以下這部分的書寫，主要的參考資料來源為劉康（1995）、Clark & Holquist (1984)、Holquist (2002a, 2002b)。

4 首次組成的巴赫汀學圈是在 1914 到 1918 年間，地點同樣位於列寧格勒市（但當時城市名稱為聖彼得堡）。成員雖與第二次學圈有些許不同，但 Bakhtin 都在其中扮演要角領頭的角色。

院的聘書，與妻子前往學校所在的摩達維亞自治共和國（Mordovian Autonomous Republic）的首府 Saransk[5]。無奈好景不常，Bakhtin 在這裡只任教了一年，史達林「大肅清」的風波自莫斯科、列寧格勒席捲而來，迫使 Bakhtin 辭去教職。雖然這次 Bakhtin 避掉了入獄或二度流放的命運，但此時他的健康已逐漸江河日下，需要經常性地入住鄉鎮的簡陋醫院接受治療。1937 年的秋天，Bakhtin 與妻子搬到莫斯科近郊一百多哩外的 Savelovo，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6]。1938 年，他因健康極度惡化而截肢了右腳。史達林極權統治下的文化肅清於此時達到了高峰，也接近了尾聲。

人生際遇是福是禍，有時難以簡單論斷或區分。Bakhtin 於 1930 到 1940 年代的流放顛沛經歷加上身體病痛折磨，卻反而讓他離開了政治風暴的中心。許多巴赫汀學圈的友人都在 1930 年代的大肅清裡被秘密警察逮捕，或送往集中營處決。對此，劉康（1995：59）認為 Bakhtin 在蘇聯這段堪與中國文革十年相提並論的歲月前夕就成了罪人，發配到落後的邊遠地區，也算因禍得福。此外，特別是 Bakhtin 在 Savelovo 停駐的幾年間，雖然飽受貧窮（例如窮到沒錢買菸，就隨手把剛寫就文字的紙張撕下一角來捲菸）和疾病摧殘，卻是 Bakhtin 有時間大量創作的日子（這當然也是因為 Bakhtin 當時賦閒在家、無法工作也找不到工作的緣故）。《對話的想像：四篇論文》的前三篇文章都寫於這個時期階段。加上稍早寫成的〈小說中的話語〉，1930 到 1940 年代初期是 Bakhtin 畢生最重要的書寫創作期。

再者，Bakhtin 也從親自遭逢史達林政權政治迫害的經驗，找到了研究的生活化素材：語言。Bakhtin 逐漸發現，史達林統治下最明顯的現象即是官方「語言」的同質單一化和教條權威化。在奉極權政治為圭臬依歸的年代，官方語言得以大量地宰制並控制公共生活、日常生活、民俗文化的所有面向，這跟歐洲中世紀的教會——國家統治傳統極為類似。同時 Bakhtin 也觀察到，在極權教條主義

5　據相關資料的紀載，Saransk 相較於 Bakhtin 先前被流放的哈薩克共和國 Kustani，至少在地理位置上較不邊陲，且還是重要的火車轉乘站。但此處仍有糧食短缺的問題，且居民人口僅 13% 具有識字閱讀的能力。而 Bakhtin 任教學校的教育學院雖然在他抵達的前一年即開始擴建，專任教師人數也從 10 人增加到 74 人，但仍沒有圖書館。不過即便此處有諸多情境條件的限制或不足，Bakhtin 在 Saransk 短暫一年的任教生活卻是相當豐富多彩又忙碌熱絡的。他大量開課（第一學期他教了三門必修課加上一門選修課；第二學期他開的是大三大四的課，包括現代西方文學、當代西方文學、中世紀文學、古典文學、文學方法論）、演講邀約不斷 (Clark & Holquist, 1984)。這段歲月應該是 Bakhtin 前半生最能與人「對話」、被人聽聞見識的時光。

6　由於史達林政權規定政治犯或曾遭流放的人不得居住於莫斯科一百哩以內，Savelovo 剛剛好符合距離隔離限制還又有火車可前往莫斯科（需要四個半小時），因此當地聚集了很多的前囚犯和前流放者 (Clark & Holquist, 1984)。

的年代，大部分的文學和文學家都依附於特定的「書寫文類」和「修辭風格」，以替官方權威所創造或信仰的史詩神話加以背書代言。Bakhtin 說這種中央集權、文化專制的統治階級價值觀即是「社會現實主義」（social realism）。而若欲破除社會現實主義的語言邏輯，Bakhtin 在小說話語中看到了一線曙光。

在 Bakhtin 的眼中，小說話語不僅僅是文學分析的對象，它更具有社會歷史的意涵。亦即，小說所具備的開放文本空間除了能彰顯日常性語言的變化生成、即時互動和瞬息萬變，它還得以構築於特定的修辭風格、語藝意識、批判意圖之上而解構單一話語權威，並進一步創造民主社會自然生成的眾聲喧嘩。Bakhtin 如何從小說「有意識的語言雜交結構」（consciously structured hybrid of language）(Holquist, 2002b: xxix) 中對比其在文類特性、修辭風格和歷史進程上，與代表官方語言權威的「史詩」之根本差異？小說的對話性如何譜出彈性變貌且貼近日常生活的時間意識與空間場域？小說話語如何超越文學美學的討論範疇，進而直指或暗諷極權政治暴力壓迫的荒謬可笑和泯滅人性？這些都是《對話的想像：四篇論文》所涉及的理論與實踐課題。

肆、從對話重建小說話語的理論與實踐

一般認為，Bakhtin 對於小說話語的理論和實務研究，與他早期曾感好奇並費心思量的諸多思想脈絡有相當的延續性。例如日常性語言的對話互動，可說是 Bakhtin 理論的核心和起點。但畢竟經歷了一番生命歷程的轉折。Bakhtin 於 1930 到 1940 年代之間所建構的小說理論，確已開出了一條更著重歷史感、更呼應時代性，甚至更具有批判革命性的路徑[7]。

一、從「絕對過去」到「未定當下」：對話即文本修辭的開放性

Holquist (2002b: xxvi-xxvii) 曾言，小說在文學研究上經常是不受重視的文類。當代的文學理論家多半認為小說是 18 世紀以後的產物。而小說所呈現的文本意義僅隸屬於文學美學的一般性範疇，對小說修辭美感的理解和詮釋更必須依循著某種完整性、封閉性、因果性的文學批評原則和審美觀。對此，Bakhtin 有截然不同的小說觀。

7 必須說明的是，《對話的想像：四篇論文》一書的著作皆氣度恢弘、縱貫古今，實難以在本文有限的篇幅中完整交代。以下的評介主要挑選每篇論文中最特殊亮眼的部分加以討論。此外，四篇論文的主題基本上具有相當的一致性和融貫性，無法絕對切割，這也加深了本文在烘托每篇文章各自亮點上的難度。

在〈史詩與小說〉中，Bakhtin (2002b) 將小說界定為一種「新文類」，並主張早在古希臘羅馬時期就出現小說化（novelized）的潮流和文本修辭風格。Bakhtin 首先說到，在希臘古典時期、羅馬文學的黃金時期、新古典主義時期，主流「高級」的文學文類乃是史詩，小說在當時較難以進入正統官方的場域範疇被正視討論。但在希臘時代曾因緣際會，小說有幾次逐漸占有主導地位，其修辭風格並廣泛地影響了戲劇、史詩等主流傳統的文學正典文類。雖然這股「小說化」的風潮直到中世紀晚期和文藝復興時期才集大成，但小說對正典文類和修辭風格的諧擬嘲諷（parody）以及小說本身的自我批判性，並非 18 世紀以後才突然出現的現象。

小說此一文類何以能夠透過特殊的修辭嘲諷主流官方的價值觀？這與小說的文本結構特質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性。Bakhtin (2002b: 11) 說，小說在修辭風格上具有一種特殊的三維性（three-dimensionality），這種三維性乃是時間軸上的絕對過去（absolute past）、未定當下（inconclusive present）與開放未來（open future）。不同於史詩在故事取材上多半以國家傳統、歷史傳記、神話迷思為歌功頌德的對象，彷彿所有真正崇高的事情「僅僅」發生在無法被當下驗證的絕對過去，我們亦只能對既定的社會價值和普遍的文化規範抱持著虔敬崇拜之心，Bakhtin 以古希臘羅馬時期的蘇格拉底對話（Socratic dialogue）為例，指出小說化的語言透過與過去對話、持續批判詰問的方式，得以把史詩中的英雄變成小丑、智者變成傻瓜、國王變成庶民。也就是說，小說本身的文本空間和修辭風格允許極度的幻想自由。古希臘羅馬的小說家無論在情節鋪陳還是場景設計上不但不具有約束性，還經常策略性地、故意為之地取材自那些過去被認為神聖不可褻瀆的政治人物與儀式，並試圖將史詩中的英雄「當代化」（contemporized），使之變成低俗且貼近每日生活和民間[8]。Bakhtin 相信唯有走出史詩所預設的封閉循環邏輯，我們才有可能擺脫官方意識形態的統治和文化洗腦，個人經驗、自由的創意想像甚至是烏托邦的開放未來，也才得以成為可能。

簡言之，如果史詩以諸多「預言」（prophecy）賦予特定的人事物或價值觀無上的政治權威，Bakhtin (2002b) 說小說透過與「絕對過去」的持續對話瓦解其正當性。在未定當下的文本空間中，小說獨特的對話性清楚地體現為文本修辭的

8　值得說明強調的是，低俗、汙穢、粗鄙、卑賤等字眼在 Bakhtin 的書寫中並非負面的意思，而是更貼近民間或民俗詼諧文化的特質描述。此外，與官方高級文化的純粹性和偽善道學相比，民間所形成的「非官方的真理」(Bakhtin, 1965/1984b: 90) 更具有顛覆既定的政治性和民主觀（王孝勇，2013）。

開放性。這種開放性不只具有文學美學的重大意涵，更間接地批判史達林以史詩邏輯遂行統治進而對文化思想進行箝制的諸多政治暴力手段。Bakhtin 指陳，「當下真實」才應該是為人關注正視的主題或主體。它源自民間的聲音而非官方的教條，它訴諸今天眼下（the “todayness” of the day）的對話互動和人際交往而非僵化陳舊的史詩敘事。小說修辭的開放性，強調的是親暱交往、對話互動中的語意未了性和持續演化性。

二、從莊嚴神話到詼諧多音：對話即語藝意識的辯證

延續前文聚焦於古希臘羅馬時期小說化修辭的探討和歷史分析，《對話的想像：四篇論文》的第二篇文章〈從小說話語前傳談起〉則主要以歐洲中世紀的「聖文諧擬」（sacred parody）為文類和修辭分析的素材。歐洲中世紀的政治權力來自於教會和國家這兩股勢力的結合。當時的社會的既定價值觀是權威崇拜、禁慾主義、追求靈性。雖然每年有短暫的幾天「狂歡節」，讓人們可以暫時脫離平日的苦悶苦行生活，但狂歡節的舉辦仍受到教會國家嚴密的監控和管理。

即便如此，狂歡節所帶來的諸多民間文化儀式，擅長於對神聖宗教文本（例如聖經）加以諧擬嘲諷。有時候把嚴肅的教堂聖歌改用街頭小曲的方式演唱並於其中添加上曖昧低俗的語氣，有時候甚至連傳教師在特定的節慶期間會以講笑話、奇聞軼事、裝瘋賣傻的方式進行講解聖經故事，或者在學校活動中以下流猥褻的解釋、吃飯酒醉的主題對拉丁文法以及教會所設定的階級從屬關係加以公然訕笑。這種把民間音調、粗俗主題和句法形式滲透拉丁文本的內部核心，讓過去被視為莊嚴神話的宗教語言和主題被「置入引號」，進而讓人在嘲諷訕笑中對其莊嚴神聖性加以懷疑的文類修辭風格，即是所謂的「聖文諧擬」。

以上述對於聖文諧擬的討論為基礎，Bakhtin (2002d) 直指「詼諧」和「多音」乃是小說話語前傳裡，最古老的再現／描繪／轉述他人語言的方式。從莊嚴神話定於一尊到中世紀民間文類修辭所體現的詼諧多音，Bakhtin 試圖將他早年對於杜斯妥也夫斯基「複調小說」的筆法分析提供了歷史學的理解脈絡。這裡，詼諧和多音構成了一種極為「小說化」的視野，得以讓不同國家、社會、階層、團體的諸語言「相互活化映照」（interanimation of languages）（同上引：51）。中世紀的聖文諧擬和詼諧多音即是後來複調小說所操演的語藝策略。

詼諧多音除了具有瓦解莊嚴神聖宗教修辭的效應，還具備特殊的知識社會學意涵。Bakhtin (2002d: 77) 認為整個中世紀拉丁文學的詼諧多音即是「對他人特定條件特質和話語的挪用、再製與模仿」，而這裡的挪用、再製與模仿更具有一

種全新的語藝意識。對此 Bakhtin 指陳，詼諧多音的「意圖雜交性」（intentional hybrid）和對話性，意味著不同言者本於特定的意圖、動機、策略、目的在與他人在一來一往的應答之中，透過「論辯」（argument）消弭自我與他者原先涇渭分明的距離、陌生感和從屬關係，以成就相對平等自主的自我意識和他者意識。Bakhtin 並且首次強調，無論是意圖雜交、對話性或是論辯，都是不同觀點、不同語藝意識之間的往復辯證關係和複雜鬥爭（struggle）。這裡，特定的語言不再呈現古典時期或獨白主義所呈現的僵化或高高在上位階，而是在「轉向民間」以積極回應他人或主動詼諧應答他人表述的語藝意識對話交錯之際，創造「國家語言的轉變、革新和多音」（同上引：67）。

綜上，Bakhtin 指陳中世紀針對宗教儀式加以應答的修辭風格即是後來我們在小說話語裡看到的話語多樣性（speech diversity）。它拒斥大一統的神性語言修辭，同時也意識到詼諧多音正是社會的、意識形態鬥爭所仰賴的條件資源和語藝策略。透過詼諧多音，社會和人民得以演化新生，並從頭創造一種在莊嚴神聖文體結構和主題內容中，都未曾且不得出現的語言活化現象和語藝意識辯證。Holquist (2002b: xvii) 據此指出，Bakhtin 的對話觀，即是持續在離經叛道和正規歷史之間擺盪折衝的語藝理論。因為 Bakhtin (2002d: 58) 本人就曾明白指出：「每件嚴肅莊重的事情，都有其喜劇詼諧的雙重性（doubles）和言外之意」[9]。

三、從線性風格到圖像修辭：對話即視覺語藝意識的凝聚

無論是意圖將史詩的「絕對過去」未定當下化，或是對中世紀詼諧多音性的文類與修辭分析，Bakhtin 試圖呈現的語言對話觀，都可見批判既定話語意識、裂解獨白主義、解構霸權暴力的語藝意識和社會政治關懷。Bakhtin (2002d: 61) 對此直言，唯有多音複調才得以將話語意識從語言暴政和語言神話中解放出來，而詼諧語言也唯有在多音世界的民主情境條件下才得以長成茁壯。這裡我們清楚看見，Bakhtin 試圖將詼諧多音這個修辭風格提升到一個全新的意識形態高度，使其具有意識形態鬥爭的潛力和語藝動能。「意識形態鬥爭如何可能？」，是本

9　除了中世紀的聖文諧擬，Bakhtin (2002d) 在本篇文章中尚舉出許多古羅馬時期所產生的詼諧多音現象或文類修辭，例如農神節（Saturnalia）、文學即興劇（the literary farces）以及接續在悲劇之後的第四戲劇（the fourth drama）。Bakhtin（同上引：58）甚至指出從知識社會學的脈絡來看，中世紀的詼諧多音主要來自於羅馬的口語傳統。Bakhtin 字裡行間流露出對於羅馬民間儀式的偏好嚮往，與古典語藝學者比較看重的希臘語藝有些差異。原因可能是因為羅馬文化相對於希臘，它有更直接的民間性，而這有利於詼諧多音的興起和發展。相關的討論亦可參考王孝勇（2014b：141-144）。

書第四篇文章所討論的主軸焦點。而在第三篇文章〈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型〉中，Bakhtin 試圖先從「時空型」的概念思考人類存在的視覺圖像化，以及不同時空型所醞釀凝聚的視覺語藝意識如何替小說話語的意識形態鬥爭打下理論和實踐的根基。

「時空型」指涉的是時間與空間的內在關聯性，及其在文學作品中的藝術展現 (Bakhtin, 2002c: 84)。Bakhtin 交代這個概念緣起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但這並非他的討論重點。他想要探討的是「時間與空間的不分割性」（同上引）。

事實上，Bakhtin 之所以從其熟悉的文學批評領域看見文本時空的連結，部分原因與他早年接觸的以康德為主的德國哲學思潮有關。在康德的哲學思想中，人類認知（cognition）的主體性問題乃是核心。認知必然串起人的內在心智（mind）和外在經驗（experience），而人對於時間與空間的體驗想像則是其中的關鍵。然而，不同於康德哲學的先驗超驗性（the transcendental）總慣於用絕對抽象的、放諸四海皆準的理論原則去思考人類的思考和判斷，Bakhtin 轉而強調的是人在立即（immediacy）認知經驗中的時空類目，以及人類如何透過時間和空間創作出不同的世界圖像（world picture）[10]。Bakhtin 舉出古希臘羅馬時期的三種時空型為例，說明人類的存在形象如何逐漸地被圖像視覺化，而擺脫線性風格的圖像修辭如何在中世紀民俗文化時空型中凝聚特定的視覺語藝意識 [11]。

第一種時空型是希臘羅曼史（the Greek romance）的歷險時空。這種時空型的小說敘事多半是樣板化的始於俊男美女的一見鍾情，接著兩人經歷諸多患難險阻（例如歹徒綁架、船難、颶風等），最終有情人得以終成眷屬。Bakhtin (2002c) 認為，希臘羅曼史的小說敘事雖然充滿了諸多隨機偶然性（random contingency）或機運（chance），但小說情節發生的時間軸線乃是既定已了的封閉循環（例如男女主角多年後的重逢，兩人依舊如初相識般的美麗俊朗，歲月絲毫沒有在他們臉上留下痕跡），空間則是任意武斷的隨意安排（例如為了要發生船難，就一定要有海洋的故事場景，但到底是在哪片海發生意外，對於希臘羅曼史的小說敘事者而言根本不重要）。這顯示希臘羅曼史的時空型跟史詩的運作邏輯較為接近，其中所體現反映的人類存在圖像，乃是高度語文化、機械性、從屬性的。

---

10 Bakhtin 對康德哲學的批判性解讀，乃是其早期哲學——美學階段苦心耕耘的領域。相關的討論主張可以參考 Bakhtin (1993) 的 *Toward a Philosophy of the Act* 一書，或是王孝勇（2012）的理論解讀和應用。

11 以下對於「時空型」概念與其視覺語藝意識的討論，部份源自個人於 2015 年 8 月開始執行的科技部研究計畫「穿越時空、重返視覺：Mikhail Bakhtin『時空型』概念的視覺語藝意識與實踐之初探」。前期的研究成果請見王孝勇（出版中）。

第二種古典時期的時空型是每日生活的歷險小說（adventure novel of everyday life）。與前述時空型最大的差異，在於第二種時空型更強調人類存在過程中諸多超越常理的轉折變化（metamorphosis; transformation）。Bakhtin (2002c) 以古羅馬作家 Apeleuis 的《金驢記》（*The Golden Ass*）中，一個男子陰錯陽差地被變形為一頭驢子因而展開不凡的生命歷險故事為例，說明每日生活中的人類存在圖像，其本質應要確切地反映人生的意外、偶然與不尋常。正是因為人生與人類的存在並非線性因果，也非處於「絕對過去」所預先設定的時間軸線與空間場域，日常性語言、小說話語才能與過去對話、與當下接軌、與未來靠近。

第三種時空型是傳記小說（biological novel）的時空型。延續第二種時空型所強調的個體主動回應每日生活的偶然性與跳躍性，Bakhtin 以柏拉圖在對話錄中呈現的蘇格拉底於公共廣場上的好辯形象為例，陳述個體對於他人話語意識的回應理解乃至於對話互動，並非私領域的言說行為，而是公開的、具有群體意識和關懷的語藝實踐歷程。蘇格拉底所呈現的人類存在圖像，即是「公共人物的全然外在性與公共性」(Bakhtin, 2002c: 133-134)。這裡的時間軸線是人類在追求真知的生命旅程中所呈現的自我意識成就過程，空間範疇則是在公共廣場對一整套的「國家」系統、神聖崇高真理加以再現、視覺化，並讓人對其加以品頭論足的對話想像。Bakhtin 相信，傳記小說時空型所建構的人類存在，應是高度視覺化的主體形構過程。蘇格拉底在雅典公共廣場上，透過與他人攻堅詰問辯駁真理知識為何的對話場景，基本上就是人類成就自我意識和批判意識的圖像隱喻。

延續古希臘羅馬時期的前三種時空型，Bakhtin (2002c) 在第四個民俗文化的（folkloric）時空型中，以中世紀民俗文化中常見的市井流氓、小丑、傻瓜等主題大量出現在小說敘事為例，說明公共廣場的論辯攻堅不只幫助我們成就自我意識、促進對話交流。它更是一個高度視覺化的奇觀（spectacle）和戲臺，搬演展演著一齣齣怪胎（peculiar）、脫序的詼諧喜劇。例如傻瓜這個角色形象看似天真無私，但正因為傻瓜乃是被既定規範、道德、政治「排除在外」的存在，以及傻瓜「不理解」（not understanding）生活中諸多條件規約（以至於傻瓜經常做出常人「無法理解」的脫序可笑行徑）的形象圖像，我們得以驚覺諸多看似和諧成理的事物基本上並非必然合理正當，甚至是為了替官方體制利己主義背書代言而試圖讓人「錯誤認知」（misrecognized）為普遍真理的意識形態產物。對此，Bakhtin 說民俗意識透過公然展演揭櫫了一個生機勃勃、充滿創造力和生命力的開放時間軸線。民俗意識更在空間範疇上得以進一步「瓦解舊的世界圖像」並「重建一個新的世界圖像」（同上引：169）。

從 Bakhtin 對於上述四個時空型的依序考察，我們可以看到至少兩個重點。首先，Bakhtin 透過人類形象建構的對話分析與歷史分析，展現出主體形構過程從線性到圖像化的發展脈絡。線性風格（linear style）和圖像風格（pictorial style）是 Bakhtin (Vološinov, 1929/1986) 在語言哲學時期就已提出的兩種互文引述模式（reported speech）。線性風格用以形容政治封閉的年代裡，一般言者必須對權威話語心懷崇敬、直接引述，不可任意妄為地添加自我詮釋的引述模式。圖像風格則是用來形容政治轉型和民主化場域中，不同話語意識的言者可以彼此滲透交織、對話互動的間接引述模式。對此論者指出，從古典到當代，圖像風格正逐漸凌駕於線性風格之上，這與外在世界的開放與民主進程，具有高度的聚合關係（王孝勇，2014a）。

此外，Bakhtin 在不同時空型中具體描繪的人類形象和存在圖像，本身即是就對話此一源自於小說等語言文字素材分析的概念加以視覺化的理論嘗試。事實上，文字圖像化或是視覺性手法展現早已是現在科技世代的主要表意機制。但暫時撇除科技或技術面向的討論，早在 1930 年代到 1940 年代之間的 Bakhtin，不但已看出語言文字和視覺圖像之間彼此緊密糾纏的對話性，更深信人在存在圖像的視覺化是挑戰權威、擺脫教條、放眼未來、迎向未知的語藝實踐策略，更是詼諧多音最淋漓盡致的化身體現。時空型此一概念在 Bakhtin 的筆下，凝聚了兼具個體獨特性和群體考量、既回歸日常生活又不忘日常性語言本就具有民主化動員力量的視覺語藝意識。

〈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型〉的結語篇章乃是 Bakhtin 於 1973 年所寫的補述，也是他去世前所留下的最後的文字記錄。Bakhtin 晚年有沒有見證西方 1960 年代社會運動的視覺化修辭風格，我們不得而知。但日常性語言如何在對話互動中動員社會與政治的抗議抗爭，Bakhtin 對此提出了相當關鍵的「眾聲喧嘩」觀點。

四、從內在對話到外在對話：對話即社會與政治的抗議

〈小說中的話語〉是《對話的想像：四篇論文》的壓軸之作。可見編者對於本文的重視不可言喻。事實上就 Bakhtin 思想脈絡的發展來看，本文的價值應在於其承先啟後性及其對諸多前期觀點的集大成。

首先，本文延續了 Bakhtin 於 20 年代對於杜斯妥也夫斯基複調小說的研究，但改用「眾聲喧嘩」這個詞彙取代「複調多音」，可見〈小說中的話語〉雖仍以小說話語為考察對象，但焦點轉變為探討「論述與社會生活」(Bakhtin, 2002a:

259) 的歷史辯證性。小說話語中街頭巷尾、都市城鎮、不同社會團體、不同世代和時代的修辭，其根本的社會性乃是這裡的研究主軸。

其次，本文延續 Bakhtin 語言哲學時期對於日常語言「有意圖混雜」或對話互動的討論，直指日常性語言得以透過特定的策略成為諧擬展演、重塑社會階層的眾聲喧嘩語藝，其目的在於話語意識的解放和意識形態鬥爭。

意識形態鬥爭如何可能？眾聲喧嘩意味著什麼？眾聲喧嘩如何動員或創造意識形態鬥爭？ Bakhtin 有以下的說法：

> 小說中的眾聲喧嘩，是「他人語言中有他人語言」，並用以折射出（refract）作者的意圖。這樣的話語建構了「雙聲表述」（double-voiced discourse），它得以讓兩個人同時講話但卻有不同的聲音腔調／意圖（intentions）：說話主角的直接意圖；折射出的作者意圖。這其中有兩種聲音、兩個意義、兩個闡述。它們彼此互相對話牽連（dialogically interrelated），並且認知到對方的存在，彷彿彼此間正在熱絡地對話。雙聲表述總是內在對話的（internally dialogized）(Bakhtin, 2002a: 324)。

上述文字值得進一步追究說明。首先，雙聲表述的型塑建構意味著每個日常生活的言說主體都必然具有相當程度的社群屬性和群體意識。因為唯有與他者對話、肯認他人表述的存在，個體才得以成就其主體性和話語意識。這點是 Bakhtin 學說一以貫之、反覆論及的認識論立場。再者，雙聲表述所揭櫫的複數語言與政治集權化下的獨白修辭（monologic style）具有根本的差異。在雙聲表述中，言說主體的話語意識乃是相對化的而非絕對神聖的權威。對於 Bakhtin 而言，唯有破除語言的暴力和一統，才能看見言說主體的情意情感和「內在對話」。最後，在雙聲表述所建構的密切對話互動中，Bakhtin 直指言說主體的意圖意識並不會消失或抹平，反而可被「折射」而出。順著這個主張，Bakhtin 直指小說話語和日常語言的內在對話性，是一個「充滿張力的環境」（tension-filled environment）。其中涉及向心力與離心力之間的折衝爭霸：

> 語言的向心力是與眾聲喧嘩相對的，或甚至是克服眾聲喧嘩的一股力量。它確保了某種互相理解的極大化（a certain maximum of mutual understanding），並化身為某種「正確語言」。……語言的向心力統一

> 了語言和意識形態的思考並創造了一個穩固的核心，也在日漸成長的眾聲喧嘩之壓力下，捍衛了早已形成的語言。然而，語言的向心力乃是在眾聲喧嘩之中運作。沿著向心力，總有一股離心力不間斷地運作著，並將語言與意識形態的集中化、單一化予以去中心化、去單一化。每個言說主體的具體表述都同時具有向心力與離心力。向心力與離心力交錯於表述之中。……語言生活中，總是充滿了衝突和張力的。因為其中同時存在者兩股背反的力量在持續爭鬥著 (Bakhtin, 2002a: 271-272)。

上述文字清楚可以看出 Bakhtin 所說的內在對話性，清楚體現了反對力量 vs. 語言霸權之間的意識形態鬥爭。Bakhtin (2002a) 認為在眾聲喧嘩的世界中，所有的話語都具有特定的意圖和意識形態。每一個對話片刻都是困勉而行的「話語意識的挪用」（appropriation）（同上引：293-294）。唯有當言說主體在他人表述上附加了自己的觀點、詮釋、評價，語言才能夠真正成為具有倡議性、目的性甚至是雄辯性的語藝實踐。而眾聲喧嘩的語藝也才能真切的「占據一個位置」、「選擇一種語言」（同上引：295），進而諧擬展演向心力所預設體現的宰制意識形態和語言暴力。而這正是在民主社會中動員社會與政治抗議的語藝實踐歷程。在此，眾聲喧嘩語藝從內在對話轉化延伸為社會政治的批判革命，並具體展現出一種獨特的外在對話性（outer dialogicity）。

綜合以上的討論，本文指出 Bakhtin 的眾聲喧嘩觀點透過內在對話性的營造，試圖重塑社會階層的既定分化態勢。Bakhtin 認為在離心力逐漸凌駕於向心力的當代世界中，每一個語言和對話都可在言說主體巧妙靈動的策略運用下，建構全新的社會關係。在此，民俗不再卑賤、方言不再低下、人的價值信念也不再被迫同質僵固。而小說話語在其中提供的例說，一方面旨在強調眾聲喧嘩中的意識形態差異，並在對話中將這些差異加以體現；另一方面更試圖超越語言語境的範疇，進而指向並訴諸社會政治、文化歷史的相對活絡。Bakhtin 透過眾聲喧嘩看到日常性對話中「話中有話」的後設語言（metalanguage），同時又將對話作為社會與政治的抗議視為眾聲喧嘩必然肩負的倫理承擔使命。這使得 Bakhtin 的小說理論被賦予「超語言學」（translinguistics）的學術美名，肯定其得以見微知著、以小搏大的理論與實踐意涵。順著 Bakhtin 的筆觸流轉，我們也似乎逐漸從語言和小說話語窺見日常生活和民主社會中，眾聲群像多樣豐富、獨特獨有、瞬間轉換的主體姿態，以及其在辯證詰問、政治動員之際所體現化身的「存在事件」（being-as-event）(Bakhtin, 1993: 1)。

伍、從小說話語看眾聲群像：巴赫汀學說的修辭性、視覺化與民主觀

《對話的想像：四篇論文》以超過 400 頁的篇幅厚實深刻地建構 Bakhtin 的小說理論。篇幅和理論本身的超高難度雖然不免令初學者卻步，但若能就大師鉅作字裡行間的諸多細節耐心品味沉思，讀完應有餘韻不斷、意猶未盡之感[12]。或許也正是因為 Bakhtin 學說的恢弘精深，因此在其理論架構中多處留下了值得延伸發展或再問題意識化（re-problematization）的可能性。對此，研究巴赫汀的學者或相關學術論著經常提到的研讀態度，是「與大師對話」的立場，而非照單全收。本文也是傾向接受這樣的主張。以下將從修辭性、視覺化與民主觀等三個面向，對未來 Bakhtin 學說的理論延展或 Bakhtin 學說與其他人文思潮的可能對話，繪製初步的藍圖。

在修辭性（stylistics）的面向上，不同於古典語藝理論主張詞藻語彙的經營無助於真理真知的探求，而更有甚者會淪為極權政治統治者用來消耗知識分子批判力和創造力的觸媒，Bakhtin 對於眾聲喧嘩在修辭風格上如何展現歷史的縱深和自由解放的想像實踐，有清楚的舉證與論證。「修辭」作為語藝五大要素（five canons of rhetoric）之一，它如何翻轉其長久以來劣於「創作」（invention）、「安排」（arrangement）、「記憶」（memory）、「發表」（delivery）的污名，值得後續研究持續追問摸索。

在視覺化的部分，Bakhtin 的「時空型」、「眾聲喧嘩」等概念確實對視覺語藝和圖像修辭的研究有直接的理論挹注。然而，目前的視覺研究者在理論和分析架構上較常借用的乃是 Barthes 的視覺語藝觀。這應該是因為 Barthes (1977) 曾從符號學的方法替視覺分析規劃了具體的步驟，並示範如何按圖索驥、依樣畫葫蘆地依序從語文訊息（linguistic message）的定錨功能與圖文搭配、圖像的明示義（the denoted image）、圖像的隱含／延伸義（the connoted image/the symbolic message）辨析圖像的「組織結構」，令相關研究者易於參考複製。然而，仔細閱讀 Barthes 的理論模型和分析策略，不難發現他對於圖像意義的結構分析仍有十分明顯的結構決定論，且大量仰賴研究分析者或圖像設計家直覺對應、套套邏輯的意義聯想（例如黃綠紅的色調搭配新鮮天然的蔬果，就等同於「義大利風

12 仍對原典感到力有未逮甚至心生恐懼的讀者，不妨先參考 Morris (1994) 編著的 *The Bakhtin Reader*。本書以節錄的方式收錄 Bakhtin 不同時期的代表作簡要版，加上編者的引言介紹，當有助於讀者對相關概念培養基本概略的認識和理解。

情」）。這與視覺化本身所聚焦的意義多樣動態性，乃至於圖像大量蘊含的「言外之意」，恐有相當程度的矛盾或落差。對此，Bakhtin 小說理論的視覺化傾向如何回饋視覺語藝的研究，仍值得持續探索開發。

在民主觀的部分，Bakhtin 的學說肯定不是唯一一個關注民主化實踐的知識結晶。許多當代的文化與批判理論家或從不同的面向，都試圖碰觸類似的議題。有趣的是，民主化的實踐經常和性別政治呼應接合。Bakhtin 在《對話的想像：四篇論文》中也多次將向心力所體現的獨白主義命名為「父親語言」（the words of a father）(Bakhtin, 2002a: 342) 或「準父權結構」（semipatriarchal society）(Bakhtin, 2002b: 11)。目前已有性別研究者主張 Bakhtin 的獨白主義 vs. 眾聲喧嘩或古典時空型分析有助於批判性別二元論述的整體封閉性，並對超越傳統性別本質論 vs. 建構論的理論泥沼有所啟發 (Francis, 2012)。Bakhtin 對於性別政治的可能立基乃至於囿限，應當也是民主素養深化過程中有待持續耕耘累積的方向。

參考書目

王孝勇（出版中）。〈Mikhail Bakhtin「時空型」概念的視覺語藝意識與實踐之初探：以 2014 年臺北同志遊行為例〉，《中華傳播學刊》，出版中。

———（2014a）。〈Mikhail Bakhtin 眾聲喧嘩的倫理與倫理困境之反思〉，《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48：135-191。

———（2014b）。〈眾聲喧嘩即倫理實踐：從 Mikhail Bakhtin 的語藝觀談起〉，《中華傳播學刊》，26：137-173。

———（2013）。〈從對話到對立的民主化實踐—— Mikhail Bakhtin 對話主義的理論轉折與政治方案之初探〉，《臺灣民主季刊》，10（3）：1-39。

———（2012）。〈Mikhail Bakhtin 的對話主義及其對批判論述分析的再延伸：以白玫瑰運動為例〉，《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40：149-202。

———（2011）。〈Mikhail Bakhtin 狂歡節概念的民主化意涵：從批判取向論述分析的理論困境談起〉，《新聞學研究》，108：183-223。

劉康（1995）。《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臺北，臺灣：麥田。

Antonova, C. (2003). Florensky's "reverse time" and Bakhtin's "chronotope": A Russian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the visual arts. *Slovo*, *15*(2), 101-114.

Bakhtin, M. M. (2014, July). *Bakhtin's defense* (D. Zhernokleyev & C. Emerson, Tra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5th International Bakhtin Conference, Stockholm,

Sweden.

-- (2002a). Discourse in the novel. In M. Holquist (Ed.),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pp. 259-422).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Austin Press.

-- (2002b). Epic and novel: Toward a methodology for the study of the novel. In M. Holquist (Ed.),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pp. 1-40).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Austin Press.

-- (2002c). Forms of time and chronotope in the novel. In M. Holquist (Ed.),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pp. 84-258).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Austin Press.

-- (2002d). From the prehistory of novelistic discourse. In M. Holquist (Ed.),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pp. 41-83).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Austin Press.

-- (1993). *Toward a philosophy of the act*.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Austin Press.

-- (1990). *Art and answerability: Early philosophical essays* (V. Liapunov & M. Holquist, Trans.).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Austin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9)

-- (1984a).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C. Emerson, Tran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3)

-- (1984b). *Rabelais and his world* (H. Iswolsky, Trans.). Indianapolis,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5)

Barthes, R. (1977). Rhetoric of the image. In S. Heath (Ed.), *Image-music-text* (pp. 31-51). New York, NY: Hill and Wang.

Clark, K., & Holquist, M. (1984). *Mikhail Bakht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merson, C. (1997).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of Mikhail Bakhti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rancis, B. (2012). Gender monoglossia, gender heteroglossia: The potential of Bakhtin's work for re-conceptualising gender. *Journal of Gender Studes*, *21*, 1-15.

Holquist, M. (2002a). *Dialogism: Bakhtin and his world* (2nd ed.). London, UK: Routledge.

-- (Ed.). (2002b).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Morris, P. (Ed.). (1994). *The Bakhtin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of Bakhtin, Medvedev*

and Voloshinov. London, UK: Arnold.

Vološinov, V. N. (1986).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 Matejka & I. R. Titunik, Tra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9)

傳播研究與實踐6(1)-11 王孝勇.indd 288 2016/1/12 下午 08:05:14

徵稿啟事

《傳播研究與實踐》在 2011 年 1 月出版創刊號，由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出版，是傳播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的共同園地；凡是符合本刊定位與特色的研究性論述，均歡迎投稿。每期並針對新聞傳播之關鍵議題，規劃專題，促進學術討論與交流。本刊將對下列議題規劃專題論文，歡迎各界人士賜稿：

第十二期專題（2016 年 7 月）：新聞史專題

第十三期專題（2017 年 1 月）：風險溝通、媒體再現與公眾認知

壹、定位與特色

《傳播研究與實踐》主要在提倡世新大學創校以來「學」與「術」並重，以及二者相互引領的對話精神。本刊之特色與使命如下：

一、提供華人傳播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對話平臺；

二、鼓勵傳播學術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之整合性、實證性、反思性、前瞻性之研究論述；

三、促進傳播學門內部不同系所以及與其他學門的知識匯流。

貳、本刊內容

一、研究論文：歡迎任何具原創性研究成果之完整論文（文長 15,000 字至 20,000 字）投稿，來稿書寫方式必須符合學術論述格式；符合本刊定位與特色之研究成果將優先刊登。

二、專題論文／論壇：透過邀稿方式，每期針對學術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共同關切之議題，邀請學者專家從不同觀點撰文，進行理性的、多元的以及民主的觀念交流。除邀稿外，專題論文亦歡迎各界投稿。 專題論文自三卷二期起，均依研究論文方式送雙匿名審查。

三、特邀論文：不定期邀請學者專家針對各期專題之主題或針對學術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共同關切之議題撰文。

四、研究紀要：研究論文通過審查，雖未達一般論文要求，但研究議題重要，研究成果具初步參考價值者，以研究紀要刊出。

五、典籍再現：透過邀稿方式，每期選擇對傳播研究社群或實務工作社群具備重大影響的經典著作，進行跨時空的詮釋和省思（文長 2,500 字至 5,000 字）。

六、口述歷史專題：不定期刊出由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研究人員規劃之口述歷史專題。

七、田野筆記：反思與實踐：針對當期專題論文／論壇題旨，邀請專家學者針對其個人田野經驗，分享反思與實踐之心路歷程。

參、審查制度

一、研究論文將送請 2 至 3 名學者專家進行匿名審查，匿名審查評審人選由本刊編輯委員會推薦。

二、本刊主編考量期刊定位和特色，對於通過匿名審查的來稿內容有建議修改權。

三、審查結果分為以下四種情況：

（一）刊登；

（二）修改後刊登；

（三）修改後再審；

（四）退稿。

四、研究論文審查（包括編輯委員會內部審查、評審審查、主編審查、作者修改）約花費 3 至 6 個月。當兩名匿名審查者意見不同時，在以下兩種情況中，將送交第三位匿名審查員評審，再由編輯委員會決議是否刊登：

（一）刊登 vs. 退稿；

（二）修改後刊登 vs. 退稿。

肆、來稿須知

一、來稿格式請參考本刊網頁之最新論文體例。未提及之處，請自行參考《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第六版撰寫體例。

二、來稿採隨到隨審方式，無截稿日期；請勿一稿多投。稿件請儲存成「.doc」文件檔，並以「稿件名稱」作為文件檔名，透過本刊線上投稿系統上傳；上傳方式請參考首頁上的「使用說明」。若有疑問，歡迎寫信至本刊詢問，電子郵件：crpjour@gmail.com。

三、本刊只刊登原創性論文，凡已於國內外之刊物發表之論文，無論語文異同，請勿投寄；於國內外研討會發表之論文，請於會議結束並正式宣讀或發表後，再行投稿；同一稿件，請勿同時投遞多份刊物。一經發現，本刊即予撤稿。

四、「典籍再現」、「口述歷史專題」、「田野筆記：反思與實踐」文稿將由主編審查，再由編輯委員會通過後即可刊登。

五、「研究論文」來稿刊出，贈送當期期刊 1 本以及抽印本，不另致贈酬款。「專題論文／論壇」、「典籍再現」來稿刊出，則致贈當期期刊 1 本。

伍、論文體例

請參閱本刊線上投稿系統：http://aspers.airiti.com/CRP

傳播研究與實踐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第6卷 第1期 2016年1月 Volume 6 Number 1 January 2016　　科技部TSSCI 期刊

出版者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 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
	Airiti Press Inc.
Publisher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Inc.
期刊地址	116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17巷1號
Add	No. 1, Lane 17, Sec. 1, Mu-Cha Rd., Taipei 116, Taiwan
電話 Tel	+886-2-22368225 ext. 3103
傳真 Fax	+886-2-22367150
電子信箱 E-mail	crpjour@gmail.com
華藝地址	234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一段80號18樓
Add	18F., No. 80, Sec. 1, Chenggong Rd., Yonghe Dist., New Taipei City 234, Taiwan
電話 Tel	+886-2-29266006
傳真 Fax	+886-2-29235151
電子信箱 E-mail	press@airiti.com
國際標準期刊號 ISSN	2221-1411
ASPERS	http://aspers.airiti.com/CRP
Airiti Library	電子期刊全文請上華藝線上圖書館，網址為http://www.airitilibrary.com/

Copyright © 2016 by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 Airiti Pres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airiti press 訂閱單

傳播研究與實踐

發行公司：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與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發行
郵寄地址：23452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一段 80 號 18 樓
連絡電話：+886-2-29266006 轉 8695　　傳真專線：+886-2-29235151
服務信箱 : press@airiti.com　　Airiti Press 網站：http://www.airitipress.com/

個人					圖書館／機關團體				
	新臺幣	歐洲	美洲	亞太		新臺幣	歐洲	美洲	亞太
一期	$ 350	€ 31	US$ 36	US$ 33	一期	$ 700	€ 48	US$ 56	US$ 53
一年	$ 600	€ 58	US$ 66	US$ 60	一年	$ 1400	€ 96	US$ 112	US$ 106

卷	期	～	卷	期	數量		金額		總金額	
* 臺灣單冊郵寄處理費 65 元				郵寄費用	數量		金額			

注意事項

- 期刊將在付款後兩個營業天內寄出。
- 價格及建議出版日恕不另行通知可能變更。
- 機構團體是指圖書館、政府機構、公司使用者及公司以個人名義訂購。
- 個人訂戶是指單一個人使用而非以營利為目的者。
- 對於有意或無意扭曲「個人訂戶」一詞者，Airiti Press 保留法律追訴權，並得求償損失。

訂閱者資料

個人姓名	
機關名稱	
發票抬頭及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電子信箱	
收件地址	

付款方式

☐ **郵局劃撥**	帳號：50027465　戶名：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 **支票付款**	公司：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23452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一段 80 號 18 樓

☐ 信用卡																	
發卡銀行	☐MasterCard　☐Visa																
信用卡號																	
信用卡有效期限	西元　　年					月			卡片背面末三碼								
持卡人簽名	須與信用卡背面簽名相同																

☐ 銀行匯款	
戶　　名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銀　　行	國泰世華銀行 - 中和分行
帳　　號	045039022102（總行代碼：013；分行代碼：045）

付款後請傳真或回函本訂閱單，即完成訂閱。

airiti press Subscription For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You may subscribe to the journal by completing this form and sending it by fax or e-mail to

Address: 18F., No. 80, Sec. 1, Chenggong Rd., Yonghe Dist., New Taipei City 234, Taiwan (R.O.C.)
Tel: +886-2-29266006 ext. 8695 Fax: +886-2-29235151 E-mail: press@airiti.com Website: http://www.airitipress.com

Publisher :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 Airiti Press Inc.

PERSONAL RATE				INSTITUTIONAL RATE			
	Europe	US/CA	Asia/Pacific		Europe	US/CA	Asia/Pacific
1 Issue	€ 31	US$ 36	US$ 33	1 Issue	€ 48	US$ 56	US$ 53
1 Year	€ 58	US$ 66	US$ 60	1 Year	€ 96	US$ 112	US$ 106

Vol.		No.		~	Vol.		No.		Copies		US $		Total US $	

*All Price include postage

PLEASE NOTE

- Issues will be sent in two business days after receiving your payment.
- All orders must be confirmed by fax or email.
- Prices and proposed publication dat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 Institutions include libraries, government offices, businesses, and for individuals where the company pays for the subscription.
- Personal rates is available only to single-user personal subscribers for personal and non-commercial purposes.
- Airiti Press reserves its right to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to recover any losses arising from any intended or unintended misrepresentation of the term "Personal Subscriber".

BILLING INFORMATION

Name	
Company	
Tel	Fax
E-mail	
Shipping Address	

INTERNATIONAL PAYMENTS

Pay by Credit Card	
Card Type ☐JCB ☐MasterCard ☐Visa	
Card Name	
Card Number	
Expiry Date _____ / _____	CVV number
Signature	

Direct Bank Transfer	
Beneficiary	AIRITI INC.
Address	18F., No.80, Sec. 1, Chenggong Rd., Yonghe Dist., New Taipei City 234, Taiwan (R.O.C.)
Bank Name	E.Sun Commercial Bank, Ltd.Yong He Branch
Account No	0107441863017
Swift Code	ESUNTWTP
Bank Address	No.145, Zhongzheng Rd., Yonghe Dist., New Taipei City 234, Taiwan (R.O.C.)

傳播研究與實踐6(1)-14 訂閱單.indd 296 2015/12/29 下午 07:44:55